

Im
WELTINNENRAUM  ES

资本的內部

KAPITALS

Für 全球化的哲学理论

[德] 彼德·斯洛特戴克 ■ 著

EINE PHILOSOPHISCHE
THEORIE DER

常 阂 ■ 译

 GLOBALISIERUNG

■ 莱
■ 丛

对（全球化）问题的一个优雅的答案，
让后马克思主义者和持善意观点的全球化反对者也
表示认同。

——德国《Volltext》文学杂志

Peter Sloterdijk

彼德·斯洛特戴克 (Peter Sloterdijk)

彼德·斯洛特戴克，1947年生，1968~1974年在慕尼黑大学和汉堡大学主修哲学和德语语言文学，1975年获得汉堡大学博士学位。他于1992年起任卡尔斯鲁厄设计高等学校美学和哲学教授，同时任该校校长；亦在维也纳绘画艺术学院任教。他是德国公众眼中仅次于哈贝马斯的德国哲学家。

全球化，在作者看来是一个500年前从环游世界开始的进程的终结。同时：后全球化时代的因素也已初露端倪。他将21世纪初开始的全球化从“球面学”的角度，从根本上进行了剖析并阐释了其发展进程。毫无疑问，资本主义已经遍及全球，但它却以不同的方式对待地球上的居民：约15亿人作为全球化的赢家生活在一个舒适空间当中，这是一个“世界内部空间”，它的边界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却坚硬而排他，就如同1851年首届世界博览会举办地伦敦水晶宫的隔墙一样，把三倍于水晶宫内的人口阻隔在它的大门之外。

SSAP
Sino-Slovak
Publishing

ISBN 978-7-5097-5088-9



9 787509 750889 >

www.ssap.com.cn

译
歌德学院(中国)
翻译资助计划

ISBN 978-7-5097-5088-9

定价：49.00元

〔德〕彼得·斯洛特戴克
著
常阡
译

资本的内部

全球化的哲学理论

IM WELTWEITEN RAUM DES
KAPITALS:
FÜR EINE
PHILOSOPHISCHE THEORIE
DER GLOBALISIERUNG

译 歌德学院(中国)
翻译资助计划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资本的内部：全球化的哲学理论 / (德) 斯洛特戴克 (Sloterdijk, P.) 著；常昉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1

(莱茵译丛)

ISBN 978 - 7 - 5097 - 5088 - 9

I. ①资… II. ①斯…②常… III. ①全球化 - 研究
IV. ①C9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24016 号

· 莱茵译丛 ·

资本的内部

——全球化的哲学理论

著 者 / 彼德·斯洛特戴克

译 者 / 常 昉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全球与地区问题出版中心

(010) 59367004

责任编辑 / 段其刚

张 骋

电子信箱 / bianyibu@ssap.cn

责任校对 / 师军革

项目统筹 / 段其刚 董风云

责任印制 / 岳 阳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889mm × 1194mm 1/32

印 张 / 13.625

版 次 /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字 数 / 292 千字

印 次 /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5088 - 9

著作权合同 / 图字 01 - 2011 - 4321 号

登 记 号

定 价 / 49.00 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

©Suhrkamp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2005

All rights reserved by and controlled through Suhrkamp Verlag Berlin

The translation of this work was financed by the Goethe-Institut China

本书获得歌德学院（中国）全额翻译资助

译者序

接到彼德·斯洛特戴克的这本《资本的內部》(Im Wel-tinnenraum des Kapitals) 的翻译任务纯属偶然。但在偶然之中，似乎又觉得一切早有安排。就在 2011 年春，南大高研院的一次交流活动中，一位美籍教授向我们提起了斯洛特戴克这本在西方世界全球化理论方面影响力不菲的书。回去后，我就在网上查阅资料，发现国外的介绍不少，但国内中文网页上信息奇缺，甚至百度百科中都还未有斯洛特戴克这个词条。于是我一边顺手建立了关于这位德国著名当代哲学家的百度词条，一边进一步地了解这本书的一些相关信息，初步了解这是一本斯洛特戴克成书于 2005 年，用边叙事、边哲学思辨的方式来论述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著作。同年 6 月，一个很偶然的机，歌德学院委托并资助我翻译社科类专著，推荐的书目居然就是这本《资本的內部》，当下既感慨事情竟然可以如此巧合，但同时又深知此书的翻译任务非常艰难。

关于作者

彼德·斯洛特戴克，1947 年出生，出生时即罹患严重的溶血症，接着又出现了黄疸。母亲是德国人，父亲是荷兰

人，两人在战后的乱世中相逢，但没过多久婚姻就破裂了。在访谈中谈及自己的姓氏时，斯洛特戴克也评价自己较早地就在一个“没有太多父亲元素”的氛围中成长。1976年获汉堡大学博士学位，20世纪80年代以来，成为一名自由著述者。1988年，他获得了法兰克福大学的一个客座讲师的位置，1992年在卡尔斯鲁厄设计高等学校取得教席，担任教授至今。2001年，斯洛特戴克接替前任海因里希·克洛兹（Heinrich Klotz），担任该校校长一职。

1983年，斯洛特戴克的成名作《玩世理性批判》（*Kritik der zynischen Vernunft*）（也译作：《犬儒理性批判》）一经出版，即风行一时，在一年中销售了10万多册，成为最畅销的德国当代哲学著作之一。斯洛特戴克也由此一举成名，成为哲学批判理论的一颗新星。纵观斯洛特戴克三十年来的著作，会发现他是位极其高产的作者。从成名作《玩世理性批判》以来，斯氏几乎年年都有新书问世，甚至一年内有多本著述出版。此外，他与别的学者的不同还在于，他的研究似乎并不囿于一两个领域，相反他涉猎极广，很难将之纳入到某个系统或者中心议题之下。但总的来说，他的著述是围绕着以下三个议题：首先，斯洛特戴克提出这样一个批判性的问题：我们如何能辨别并抵制那些阻止我们走向幸福和真理的力量？其次，他受海德格尔的影响，通过不同的方式寻求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已经在这里，但究竟什么是“这里”，谁是“我们”。最后，斯洛特戴克乐于充当时代的诊断者，他自己常常自称是时代的诊断者，而不自称哲学家。他喜欢从事“危险的思想”，时时对社会现实进行

译者序

分析评判，力求把握未知的未来，以期找到有利于现实的良方。他爱作夸张和尖锐之论，其报告和著作无不充满激情，文采飞扬。

因此，斯洛特戴克也总是可以引发话题和讨论。他最初于1997年在巴塞尔做了一次题为“人类公园的规则”（Regeln für den Menschenpark）的报告。1999年，他又在巴伐利亚的埃尔茂宫（Schloss Elmau）做了同名报告（与前次报告相比有修改），同年该报告的文字版出版。它引发了公众以及大众传媒关于生物及基因技术应用的大讨论。2002年至2012年，斯洛特戴克与德国另外一位著名的文化学者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Rüdiger Safranski）在德国中央电视二台（ZDF）主持“哲学四重奏”（Das Philosophische Quartett）电视节目，在屏幕上与知识分子们讨论诸如恐惧、超级大国美国和全球化资本主义等话题。这位多产的哲学家已成为媒体明星，在德国公众的眼中，斯洛特戴克是目前仅次于哈贝马斯的德国哲学家。

译者首先想结合自己在译书过程中的理解，用非常简单的话语来概括一下本书的主线和结构：

《资本的内部——全球化的哲学理论》这本书共分为上下两篇，粗读书的章节目录就可以形成大致的印象：上篇“世界体系的形成”主要钩沉了全球化的历史进程；而下篇“大内部”则探讨了世界体系形成后的宏大内部空间及其特点和规律。作为一名哲学家，斯洛特戴克的眼光是独到的。对于全球化历史的回顾，他并非采取按一定顺序，如时间

的，或按主要人物的生平履历，来简单罗列历史事件和事实数据的方法；相反，斯洛特戴克非常蔑视这种所谓的历史研究（参阅本书第 32 章：后历史）。而对于世界体系形成后的宏大内部空间，作者也通过自己对于事物的深刻洞见，做出了非常深入的揭示和描摹。斯洛特戴克这部著作给作为译者的我最为突出的印象就是：作者始终致力于使用隐喻式的意象这样一种简化的方式来揭示全球化世界的复杂问题。

对于全球化问题，作者发现了既往研究中存在着政治学和社会学话语权垄断的问题和不足，认为必须要从哲学的高度来构建全球化研究的新的范式。他首先思考了全球化这个概念的来源问题，并在第一章“宏大叙事”中指出，“首先人们就应该回忆球体动机的哲学来源”。全球〔或者说地球 (Globus)〕是个名词，然后从这个名词可以派生出全球的 (global) 这个形容词，作为动词的全球化 (globalize) 再从这个形容词派生而来。我们平时一直言说着的全球化概念则是动词再名词名后的产物（英文是 *globalization*，德文为 *Globalisierung*）。而在斯洛特戴克看来，所谓全球化，究其球体动机的根本，则有着三个阶段，同时也是三个按照象征性和技术媒体的不同而处在不同意义层面上的全球化。首先它指的是古代人们对于世界的认识。“在思想中测量天的维度是为第一次全球化”（亦可称为天体全球化），这是古代宇宙学家对于世界结构的一种合理化安排。接下来的就是被称为“大地全球化”的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人们不再像古代那样，通过线条以及切线的方法来构建理想的几何体，而是亲身用船只在海上绕行作为真实球体的地球。这一

译者序

过程时间上大致可以看作从 1492 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开始，直到 1944 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为止，政治上则可以称为殖民主义的发展以及欧洲国家的扩张。最后一个阶段则是 1945 年至今，它是一个用更新的媒体实现对作为球体的地球绕行的时代，我们可称之为电子全球化时代。在解释“什么是全球化？”这个看似简单，但实则很难给出一个清楚的回答的问题时，斯洛特戴克巧妙地使用了球体意象来说明全球化的最核心本质。

上篇钩沉大地全球化历史的章节中，作者巧妙地赋予全球化本来的动作意义，这样便围绕着全球化的主体、方向、方法、工具、思维等方面一一还原了大地全球化历史的真相。航海家们作为全球化的主体，使用当时条件下的舰船通过一次次前赴后继的航海历程，最终实现对众多未知地带的探索和开发。航海活动在大地全球化之初与我们今天理解的航海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当时的人们对于海洋有着莫名的恐惧，但同时仍然认为地球的主体元素是土地，而非海洋。也就是在航海的过程中，人们才渐渐意识到，海洋，也就是水元素才是这个地球上占主导的成分。航海家们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有所发现，从外部世界带来新的知识，绘制地图，以便下次航海仍然能够继续找到上次发现并做过标记的地方。与今天的远行不同的是，当时的人们对于外面的世界知之甚少，既有初次探险的喜悦与激情，但同时也意味着不可预测的风险。要想在这样的航海活动中坚持下来，就必然要有无与伦比的决心和信念，把航海的事业当成一种类似使命的东西。而航海家或者说全球化的主体首先要通过自我说

资本的内部

服和自我咨询让自己成为一个能够真正摆脱种种现实束缚的行动者。所以说，航海活动的持续展开，既有资本主义发展的巨大经济利益的驱动，同时也有基督教作为航海团队的一种精神维系力量在起作用。

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大地全球化进程被认为已经结束。同时由于现代化的交通和通信工具的大规模投入使用，环绕地球的工具成为飞机或者电子信号。整个世界开始通过新的媒体和通信工具得以同步化，距离被最大限度压缩。资本主义世界由于资本和技术的关系，而高度的融合在了一起。对于同步化了的、物质资料丰富、生活优裕的世界，需要有新的隐喻意象来加以概括。作者在论述这一复杂问题时使用了俄罗斯文学家陀斯妥耶夫斯基在《地下室手记》中提到的“水晶宫”（Kristallpalast）意象来说明“消费社会”。在这里，作者一方面与本雅明提出的作为宗教的资本主义保持距离（同时，作者也明确地表达了对于本雅明的巴黎拱廊街隐喻的态度），另外一方面也不愿使用通行的略显单薄的“世界市场”概念。对于水晶宫，作者还将之具体化为一个有着分层结构的娇纵空间（Verwöhnungsraum）。与大地全球化时代成为主体，摆脱束缚（Enthemmung）作为单边行动的关键词不同的是，在娇纵空间中，无论身处于哪个层次，人们的生活都被打上了一种“减轻负担”（Entlastung）的烙印。

在上下两篇中，我们都能感觉到单边主义这个概念的存在，只是在上篇中谈及大地全球化的航海行动时，单边行动几乎是一种必然，于是便也没有强调这种行动单边性的必

要。与此同时，斯洛特戴克回顾这段历史时也不讳言欧洲中心主义的视角。相反，作者认为，“历史”就是单边主义的成功史，大地全球化就是一个单边主义的行动时代，欧洲人非对称性地占领着世界。于是，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时代就顺理成章的是一个后“历史”的时代。这一历史时期与大地全球化时代的本质不同在于，行动不再是纯的单边主义行动。过往的时代中，行动者的行为不会带来对称性的后果。殖民者在海外的暴行不会带来负面的后果，相反他们会带着新的知识、巨大的财富和利润回归。然而到了全球化饱和形态下，各个地方的受害者开始向行动者回馈他们行为的后果。这就给今天的时代打上了后单边主义以及后殖民时代的烙印。殖民还是后殖民，历史还是后历史，其突出的特征就在于密集这个拓扑学概念。因为在前密集（vordicht）时代，不密集的分布给单边的行动留下了足够的空间，而到了密集的情况下，人们不得不去适应所谓交互式的存在方式。

此外，本书中还有几个重要概念的翻译问题有必要在译序中提上几句。

“世界内部空间”（Weltinnenraum）

在诸多重要概念中，首先值得一提的就是本书的德文标题中的“世界内部空间”。德语书名全文是“Im Weltinnenraum des Kapitals”，直接翻译过来应该是“在资本的世界内部空间里面”。学术文章和著作中常有这类使用介词短语做

标题的现象，而在翻译中常常会只保留名词短语部分，译作“资本的世界内部空间”。但是出版社的编辑同志们认为，“资本的世界内部空间”这个短语还是过于冗长，而且也不符合中文的表达习惯。所以中文译本就不妨考虑不要过于追求逐字翻译原标题，而采用一个既能达意、又尊重中文表达习惯的版本。此外，考虑到斯洛特戴克将本书的下篇命名为“大内部”（此处的内部为“Interieur”，与内部空间“Innenraum”用词稍有不同，但表达的精神实质一致），因此，我们有非常充分的理由相信，《资本的内部》是个既简洁明快，又不失原著精神实质和风貌的书名。

虽然世界内部空间并未能在书的标题中出现，但这个源于诗人里尔克的重要概念还是有必要提及。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尼采哲学对诗人里尔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诗人对世界的认识也被打上了深刻的认可现世、不寄希望于彼世的思想烙印。这需要深切地观察自然、人的行为以及感情生活。所有这些构成了里尔克的连接了外部世界与内心世界的“世界内部空间”。里尔克试图通过自身的体验力量来克服人与物因为环境的抽离而渐渐失去生机的现代性基本体验。他用一种诗化的泛灵论方式来使世界重新焕发生机，体验便不再是柏拉图式的世界灵魂，而是一种与有时代特色的（同时代的）“诗人式居住”相适应的个体—宇宙强度。作者独具匠心地在第36章“里尔克几乎遇到了亚当·斯密”中安排诗人里尔克与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来了一次隔空对话。

“近代” (Neuzeit) 和 “历史”

“近代”这个概念在本书中非常重要，共以名词或者形容词形式累计出现达 91 处。在这里把这个并不复杂的概念单独提出来的原因在于，作者在德语中用的是“Neuzeit”，这个词在字典中有两个意思，一个指近代，区别于古代和中世纪；另外是一个有隐喻意义、但较常出现的用法，表示新时代。很显然，斯洛特戴克这里使用的 Neuzeit 是历史发展阶段中这个近代的意思。然而新问题又出现了，在中国的历史阶段划分中，提及世界近代史，通常是以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作为开端。而德语中 Neuzeit 所指的近代概念则肇始于 15、16 世纪交替之时。从欧洲人的视角来看，它以 1453 年占领君士坦丁堡、1492 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或 1517 年马丁·路德推行宗教改革等一系列历史事件为标志，在精神和思想领域，则受到了文艺复兴运动、人文主义兴起以及印刷术传播的影响。而在本书中所指的近代，则是以 1492 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为其开始的标志事件。所以说，读者在阅读本书时，理解近代这个概念时要知道，它比一般历史教材上讲的以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为发端的世界近代史要更向前推了一百年左右。同样以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为发端的是本书中打了引号的“历史” (Geschichte)。这个概念在本书第 32 章中较多地出现。斯洛特戴克使用打引号的“历史”一词时，均特指大地全球化的历史，即 1492 ~ 1945 年间的这段历史。同时，在他看来，有且仅有这段历史才能被看成真正的“历史”。而此后的岁月就是一个后历史

的时代。

“地球” (Ökumene)

对于 Ökumene 这个概念在第 29 章的标题中翻译成地球也是一个妥协的结果。因为这个词在这里取德语中最基本的含义：“在地球上自然形成的、边界确定的人类生活和定居的空间”。作者在论及这个概念时，追溯了古希腊关于人类作为同一种属的统一体的思想，顺道还提及了中国古代的“天下”观。由此可见，Ökumene 是个历史的、可变的量，在人们的认识以及作为同一种属的人的生活世界还很局限的时代，人们对于天下的理解也必然是狭隘的。而随着大地全球化的进程，人们对于人类生活和定居的空间的定义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未知地带被开发出来。然而，Ökumene 最终的扩张极限是整个地球。在笔者看来，Ökumene 这个概念的重要性在于，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本书的一个重要的中心思想，即作为单边主义扩张行动的大地全球化过程也是一个打破人们既往的经验，大大拓宽人们生活 and 定居的空间的过程。如果我们把作为人们生活 and 定居的空间的地球 (Ökumene) 和前面讨论的“历史”这两个概念叠加起来，就能比较清楚地看到斯洛特戴克试图展示在我们眼前的全球化的空间和时间上的两个不同维度。带着这样纵深的视角去审视全球化时，复杂问题也一下子变得清晰了起来。

最后还想谈谈本书的翻译。

译者序

首先说说原著的语言风格，德语作者总体上非常注重语言风格的雕琢，文学作品如此，哲学和精神科学领域尤甚。因此，德国人的语言风格甚至“要求人们在说话和书写时不能擦掉额头上知识的汗水；要通过语言的本身来展现他在精神和智力上的优势地位。”斯洛特戴克的风格则是在巨大的知识和信息量的铺陈之间，展示其睿智和冷峻。如前所述，这本书还用了半叙事、半哲学思辨的方法，所以说，它的语言风格也是随着写作手法的不同而处在不断的交替之中。其次就是哲学和社会科学类专著中，作者一般都会旁征博引，所以概念多、人名多、书名多。

在翻译过程中，笔者通过对原文文体风格和语言表述的权衡，不断具体地在不同的地方使用不同的翻译策略。如在叙述性笔法较多的部分则采用了比较灵活的译法，以保障流畅性和可读性；而在翻译哲学思辨较多、在大量概念间游走的段落时，译者则力求最大限度的保持原文的风貌与原文的逻辑关联。这样的段落可能会让有些读者觉得可读性差了一些，但是即使是德语的原文，也并非以可读性见长，而是需要人们在耐心地研读中去体会作者想要表达的含义。

书中出现的重要概念、专有名词以及参考文献都在译文中附上了原文，以便有能力的读者自行查阅和比对。限于笔者自身水平有限，错误和疏漏之处在所难免，希望方家和同行能够及时批评指正，以期再版时能够修订之。

译者还想借此机会首先向为本书提供翻译资助的歌德学院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还要向在翻译过程中给我在原文的

资本的内部

理解上提供了大量帮助的 DAAD 专家 Dietmar Mehrens 博士表示诚挚的谢意。由于原文中还有不少文献名称是西班牙文和法文，在翻译过程中，我也得到了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西班牙语和法语系同事们的诸多帮助，在此向他们一并表示感谢。最后，我还想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编辑同志们表示感谢，感谢他们细心的编辑和审校工作。

常 晷

2013 年冬于南大和园

谨以此书纪念齐格福里德·温赛德 (Siegfried Unseld)

目 录

第一部分 世界体系的形成

第1章	宏大叙事	3
第2章	彗星	21
第3章	重返地球	29
第4章	世界时间，宇宙时间	37
第5章	离开东方，进入均质空间	47
第6章	儒勒·凡尔纳和黑格尔	52
第7章	水世界：现代主元素的转变	59
第8章	幸福女神或是：机会的形而上学	71
第9章	风险贸易	76
第10章	狂迷与时间：资本主义和心灵感应	80
第11章	主体性的发明——初步摆脱束缚及其入门指导	87
第12章	漫反射能量：领先的本体论	102

资本的内部

第 13 章	航海的狂喜	118
第 14 章	无边大海上的企业认同感 人才分离	123
第 15 章	根本运动：金钱回流	128
第 16 章	理由和保证之间：论陆地思维和海洋思维	132
第 17 章	探险与真相	145
第 18 章	发现者的标志 论制图学和帝国的名字魔力	151
第 19 章	纯粹外部	170
第 20 章	海盗理论 白色恐怖	175
第 21 章	现代和新大陆症候群——美国学之一	181
第 22 章	全球化的五顶华盖 欧洲空间输出面面观	188
第 23 章	船舱的诗学	190
第 24 章	船上的牧师 宗教之网	193
第 25 章	总督之书	199
第 26 章	全球化的图书馆	203
第 27 章	译者	208

第二部分 大内部

第 28 章	同步世界	215
第 29 章	第二地球	221
第 30 章	免疫学的变形：走向薄墙“社会”途中	231
第 31 章	信仰与知识——以此标志（全球标志） 你将胜利	241
第 32 章	后历史	257
第 33 章	水晶宫	264

目 录

第 34 章	密集的世界和二次摆脱束缚：恐怖主义 作为纯粹攻击的浪漫派	277
第 35 章	凶手不明和责任伦理 控制论的复仇女神	293
第 36 章	资本主义的世界内部空间 里尔克几乎 遇到了亚当·斯密	302
第 37 章	矫纵空间的突变	332
第 38 章	重估一切价值：过剩原则	350
第 39 章	例外：引诱的解剖——美国学之二	365
第 40 章	不可压缩或膨胀的再次发现	391
第 41 章	赞赏非对称性	406
第 42 章	天界和尘世的左派	413

第一部分

世界体系的形成

……于是海盗的地球就这样无依无靠地在暴风雨般的苍穹中飘去。

亨利·米肖 (Henri Michaux), 《不可描述的地方》
(*Unbeschreibliche Orte*)

第 1 章

宏大叙事

本书致力于一个我们不太确定是否是不合时宜，抑或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通过重构全球一体化的历史的方法，试图通过充满哲学灵感的大部头小说的方式，勾勒出当代理论的概貌。这样的要求在谁听来是陌生的，那么他一定会顾虑这样的要求带有太多的挑衅意味；但若是完全不提出这样的要求，亦是在知识上的悲观主义。自古以来，哲学思想就在致力于陈述我们是谁，我们要做什么。至少近两百年来，这其中还包括了关于我们在“历史”中的定位的信息。时间概念挤入古欧洲哲学思想迄今为止只对传统的成分起到了部

分修订的作用。然而，当片面的神化时间的时代看似结束后，生存过的空间也对自身的权利提出了要求。至少康德就很清楚地知道，就连理性也拥有在空间中辨别方向的模式。^① 如果沿着这条线索一直追下去，就必然得出哲学行为的任务已经改变的观点：哲学是在思想中领会的地点。在哲学洞悉其所作所为时，它就像一场关于形势的研讨会，在这里，各家争鸣。而为了使形势澄明，一部宏大叙事的巨著则是非常必要的。

正是这样的著作，所谓的巨著最终只属于它自己的时代。正是鉴于这一至少主导了一代学人的统一认识，这样的尝试显得不合时宜。这种观点当然不是无缘之木。它基于以下的可信的信念：这类名著，尽管它们试图大致构建“历史”的进程，却不可避免地带有狭隘的特性；由于受到决定论的先入之见的影响，它们将无耻的线性关系的目标投射带入事件的进程当中；它们由于无法改变的欧洲中心主义思维而与殖民主义的剽窃世界媾和；它们因公开的或是遮遮掩掩的方式为幸福布道的同时，却襄助世间产生了更大程度的不幸；现在终于要有一种与之完全不同的思想产生出来，一个严谨的、多元价值的、非一统的并且首先是对自身视角的决定性有着清醒认识的关于历史事件的言说。

在这个观点之上，除了总是向错误的方向推出的结论以外的一切的东西都是正确的。很显然，当思想史家用同时代

① 伊曼努尔·康德：《何谓在思维中确定方向》（*Was heißt: sich im Denken orientieren?*）（1786），载《康德十二卷全集》，第5卷，威廉·魏舍德（Wilhelm Weischedel）出版，法兰克福，1995，第269页及其后。

人的敏感性回溯哲学叙述的经典文本以及时过境迁的经典圣经诠释的时候，必然会感觉到，那些东西像极了一堆狂想曲式的夸大其词。迄今为止被称为历史哲学的东西无一例外的是仓促行事的疯狂体系。它总是导致将材料匆忙地装配在暴力画出的直线之上，好像思想家们都罹患某种过度积极的症状，使得他们在追求错误的目标。幸运的是，古板的教条能够彰显魅力的时代过去了，它们曾借助于一手简化的概念将信徒们通往世界历史的机器空间的道路阻断——如果不是，甚至是通往巴别尔塔管理层的道路。迄今历史哲学的产物不过是子虚乌有，这在今天即使是对于外行人来说也是一望即之。在今天，每个大学新生，每个艺术品商人，对于这些产物都有了足够的认知，以至于在他们说出诸如世界精神、历史目的、一般进步等表达时都会展示出某种微笑。

人们对于这种澄清的满意状态维持不了多久——因为人们关于宏大叙事的终结通常的话语只要不满足于驳斥其不可忍受的简化的话，就会偏离它的要点。这种话语自身不是已经发展成了一个舒适的元宏大叙事？这个新的理智的神话是否在不知不觉中与一种讽刺意味的，在范围上追求令人厌烦，而在宏大上追求有狂躁之嫌的东西的惰性同流合污？在后辩证法和后结构主义怀疑论之后，近几十年来，并不真正跟随着思想的部分截瘫？敌视思想的专业化来自偏僻档案中的细节层面，就像近来的人文科学领域中方兴未艾的情况那样，是否是这种截瘫现象最温和的一种表达方式。

如果说迄今为止人们所熟知的各种宏大叙事——基督教式的、自由渐进式的、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的、法西斯

式的——都被看穿地视作霸占错综复杂的世界的不合适尝试，那么这一批判性的认识既没有宣布关于现存事物的叙事不合法，也未作尽力思索用强光的光学透镜来揭示逃避整体的具体细节。思想难道不是一直以来就在从事一种令过度的事物具体的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挑战？那么，这种挑起抽象行为的过度从根本上来说不是同适度的平静的天性格格不入吗？既往方式的宏大叙事的苦痛并不在于它们过于宏大，情况恰恰相反，它们不够宏大。当然，关于“宏大”的概念还可以继续探讨下去。对我们来说“足够宏大”意味着接近过度的极点。“……思想如果没有不间断地将自己和混乱加以比较，那它还能是什么呢？”^①

这里的大纲是“球面学项目”的一个副分支，该项目做出了一个涵盖范围很广的尝试，将叙事的和哲学的用一个部分新怀疑主义的，部分新形态学的方式相互配置起来。^②在实施计划的过程中——2004年时，球面学的三本著作已问世——讨论了球体动机（Kugel - Motiv）在哲学宇宙观以及在古代欧洲神学中的发展；在一些地方还更加详尽地检验了一些心理动力论方面的推论，并检测了人类学方面的形成力量。从中也使得一些有着高心理语义学或是宗教使用价值的经典思辨重现光明。在包裹着的球体中，古代人发现了

① 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弗里克斯·迦塔利（Félix Guattari）：《哲学是什么？》（*Was ist Philosophie?*），第247页。

② 参阅《球面学Ⅰ—气泡》，微观球面学，法兰克福，1998；《球面学Ⅱ—全球》，宏观球面学，法兰克福，1999；《球面学Ⅲ—泡沫》，多元层面学，法兰克福，2004。

一种“庇佑的几何学”(Geometrie der Geborgenheit);其中,如同已经呈现的那样,展示出一种形而上的或是全体性的生成世界图像的动因。《球面学Ⅱ—全球》中讲述的关于上帝的球面和宇宙球体的叙事公布了为什么这个崇高的、想象中的整体生成物在近代伊始便被宣判消失的原因,^①而与此同时,人类的住所地球作为一颗行星的重要性却日益彰显出来。一切生命联系赖以维系的地球在几个世纪漫长的黎明中作为唯一而实在的球体升起来了,同时,近乎所有的迄今为止被看做伙伴关系以及充满意义的天空却落得空无一物。地球由于人类的实践活动而变得具有致命性,同时以往有活力的神性的球面现实性主观的消解,提供的不是单一的人们今天称为全球化的发生事件的背景;它就是全球化戏剧自身。它的核心在于人类免疫性的条件在被发现的、网络化的以及独一无二的地球上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的观察之中。

如果说本研究在哲学角度方面与其他研究在逼近主题时强调了什么样的不同之处的话,那么它是建立在一个迄今为止并不受重视的事实情况之上,即,我们讨论的历史客体——地球仪——是个充满了喜欢躲藏在惯常之物表面之下的形而上学的牢骚的东西。作为地理与哲学的杂合体的地球仪,从其逻辑与形体的独特性中发展出概念来绝非易事。虽然这个印刷而成、遍布黄斑的蓝色球体首先看起来不再是物中之物,它不过是各种物体中的一个小东西,政治家也好,

^① 参阅让-皮埃尔·莱纳,《球面的人》(*Le monde des sphères*),两卷本,巴黎,1996、1997。

资本的内部

还在上学的孩童也罢，都可以用手一拨让它转动起来；同时，地球仪也以图像的形式再现了独一无二的整体和地理意义的单元，这是一切生命、思想和发明的基础。这是大地的场所问题，它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日益凸显地发展了起来：古代的宇宙观中，地球矛盾地被理解成边缘，包裹住只能从内部观察到的宇宙；而到了现代，它是一个并不处在宇宙中心的球体，关于它是圆的，我们则可以通过外部的视角来使自己确立信念。这还会导致墨卡托之后几代人的“世界观”出现不可预期的后果。地球是圆的这一唯一信念（*Monogeismus*，这是斯洛特戴克自创的一个概念。——译者注），在我们看来日益成为一个焕发着青春的事情，然而，独神主义（*Monotheismus*）却在任何未来都只是个年老体衰的信仰命题，即使借助于来自中东地区的貌似虔信的炸弹也无法真正地发出声音。试图证明上帝的存在不得不承受失败痛苦；地球是圆的，这一事实却被越来越多的事实反复证明。接下来我们就将致力于这样的众多证据堆积起来共同指向了我们居住的强大而又精深的星球统一性的状况。

以这样的暗示，我们触及了哲学的核心地带，前提却是，我们致力于这样的假设，哲学思考不仅是如同我们近来所听到的那样，是个没有客体的行为，也即是一个权宜之计（*modus vivendi*）；还客观上拥有回避谈及自身研究对象的权利。哲学也可以合乎艺术规律地作为一种总体关照其隐喻的准科学，作为一般性的创造生成的叙事理论以及最终作为处在情境之中（*Sein - in - Situationen*），别称处在世界之中（*In - der - Welt - Sein*）的冥想。我把它命名为“浸渍理论”或者共

第1章 宏大叙事

在的普遍理论，并从这里开始成为近来的哲学和装配艺术的亲缘关系。^①

关于全球化，常见的观点中有一个主要特征，明确地说就是严谨的诙谐。究其本质，这涉及一种野性的哲学思考，并且当同属该行业的人们不掺和到辩论中时，它的感觉最为舒适。于是乎，今天同时代的政治话语也好，文化理论也罢，最富哲学思想的话语实际上并没有显著地参与到关于世界理论的行会中来。对于地球最有效的归纳和总结是通过货币及其各种变化的形式，作为商品、数字、图像以及作为名流，这一切运作起来自然如常。世界智慧的专业成员们对此也不比一个舆论尚不完全公开的国家的任何一个报纸读者能说出更多的东西。当代的哲学家们按照自己本专业的规则就这个主题发表意见时，通常只能是在非常边缘化的出版物中，对于公共话语并没有产生什么值得一提的影响——纳格里（Negri）和哈尔特（Hardt）在世界范围广泛受到重视的《帝国》也许应该是个例外。

这使得情况的讽刺意义越发升级，人们可能会认为，使得哲学具有相当的投票表决权会带来观念的混乱证明了一个值得欢迎的状态。可以有根有据的论证，直到近来还假托要变得更加实用的哲学身上不可能发生比归并入不分等级的日常性理解之中更加糟糕的事情。人们甚至可以宣称，明确的主张让哲学的言说方式变得不那么特殊证明了人们与时代高

^① 《球面学Ⅲ—泡沫》，第2章，室内，A节，“我们生活、纺织和存在的地方”，见第501~534页；以及第3章，第9节，“帝国——或者：舒适的温室；向上开放的娇纵等级”，第801页及其后。

度的某种思想之间的关系——而今天的高度已经一改过往那种高高在上的坏习气。因此，非哲学家们在全球化领域内的话语领导权可以看成是一个重要的标志，即“社会”——或者说人们用这个词来指代共同生活并使用政治手段的大多数，已经对于哲学归纳出的危险的兴奋情绪，同样也对于关于世界形势的家长式的普遍化话语产生了免疫力。为什么要报怨哲学的边缘化呢？

我的目的不在于否定这样一种视角的积极因素。政治学者和社会学家们对于全球化事件的话语垄断，此外人们还以易怒的方式将新闻学的延续归功于此，所有这些总的来说都完全可以接受。不能接受的则是，所有这些辩论中使用的无一例外都是哲学的术语，这种业余的使用则导致了心灵上的影响和意义的扭曲。如果有人不顾及艺术的现状进行哲学思考，那么最终所进行的总是个神话传说的工作，或隐蔽或公开，并且通常会招致不良的后果。关于当前替代哲学潮流最值得一提的副作用就是病态性地增生出了大量未经验证的、在民族国家的边界不再能够站得住脚的陈述。盗版的无知自由地在整个世界循环着。它们是用来证明这样的论点——今天一切东西，只要对于顾客来说结束了，要么就在所有的市场上被销售，要么就完全没有销售——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有趣的是，通常这些还是有着自由精神的人，这些神学和哲学宏大叙事的敌对者，当他们用那些未加派生的概念，全球性、整体性，空间、时间和情境，单一性、多样性、交互作用，包含和排斥以及其他的词汇依次排列，写出的主导性文章完全沉浸在了政治上传染性的假设当中。

为了防止这种过于急躁而产生的令人不快的副作用，首先人们就应该回忆球体动机的哲学来源。这可以从一个非常简单的提示开始，“全球”（Globus）是个名词，它代表了一个简单的理念，即宇宙观，还有一个双重的绘图学上的物体。它是古代人理解的天，现代人理解的地；这个名词可以派生出一个相应的常见形容词：全球的（globale）事件，然后再通过英语中的动词“to globalize”绕了一个弯路，构成了新的名词——产生了这个杂合形式“全球化”（Globalisierung）。当然，这个概念总是具有强调当下世界发生事件的主动性的优势：全球化发生了，总是通过对远方的影响的操作。

下一步就是要确认，想象一个球体作为生物的以及反思的生活的容器或是载体，这对于古希腊人从哲学角度对宇宙进行规划有着建设性意义。西方古代，也就是柏拉图以及其他的古希腊先贤们的宇宙观是将一切存在物放到了一个包罗万象的球面的图像中。这一观念的构成物的名字在今天，尽管总是被怀旧打断，对于欧洲人的记忆来说也是当下的，因为从古代开始，这个存在物的宏大的圆形就叫做宇宙（Kosmos）——这个名词唤起了人们对于宇宙（Universum）装饰和美的特点的记忆。同样这个东西被称作天或乌拉诺斯（Uranos）。泰坦神的名字表达出了世界在一个终极的苍穹中有它的穷尽的观念——这种世界观，它也能给人带来希望。人们声称把天想象成为一个宽广的花瓶，恒星被固定在里面，人们不必担心它们会坠落下来。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天就是一个外部的球状的包裹，它包含一切，又不为任何东西

所包含。^① 在思想中去测量天的维度是为第一次全球化。这个时候产生了哲学的福音：人，尽管他所经历的各种无序令他抑郁非常，却不必担心掉落到宇宙之外。

因此：全球化真正的发端肇始于古代宇宙学家们对于世界结构的合理化安排。他们第一次以概念的，或者更确切地说，以形态学的严肃性，在球面的形体中构筑全部的存在物，并且将这个令人愉悦的秩序构成物放到智识的观察之中。经典的本体论无论作为世界的学说还是作为上帝的学说都是一个球面学说——它提供了一个两种形体中的纯粹地球的理论。^② 这一理论将塑造成的良好形状——圆周形，以及回到自身之物放置在中心的崇高几何学而获取声望：它因而获取了对于圆形物体的逻辑、伦理以及审美的偏好。对于欧洲传统的思想家来说，善和圆的形状显然可以导致完全一致的结果。因此，球体可以作为有效的宇宙免疫系统。关于不圆的理论作为一种理论成果则是到了相当后来的时间才进入游戏——它宣告了经验科学的胜利、上帝的死亡、混乱的计算以及古代欧洲的终结。

回忆这些状况意味着毫无保留地公开“全球化”究其总体是一个逻辑上和历史上比当下的新闻话语中，经济学、社会学和警务方面的知情人理解得更为强劲的过程的原因。无论是工作日还是周末的相关政治演说，都只触及由日益加快的商品、符号以及微生物的交换为标记的最新的阶段——

① 《物理学》(Physik), 212b。

② 参阅迪特里希·曼克的经典的研究《无尽的球面和万物中心》，哈雷，1937；重印版，斯图加特/巴特-肯施塔特，1966。

为了能够较迟才提及货币市场及其虚幻影像。如果要当下化我们作为全球化而讨论的事件的全部本体论的严肃性——存在与形式在一个独立物体中的相遇——就要在这个过程中特别强调出迄今为止并未充分被认知的阶段性差异。因此，在全球化这个概念中，加上了大地的（*terrestrisch*）这个形容词。它应当阐明，我们提及的是较长的历史中的某个篇章，而对于它在知识界所引发的维度，当前讨论的参与者们却常常并没有恰如其分的认识。

大地的全球化（实际上是通过基督教—资本主义的航海事业推行，而政治上则通过殖民主义和旧欧洲的民族国家移植），如同所说的那样，构成了一个所谓的三阶段进程中可以完全一览无遗的中段。三阶段进程的开始在另外的地方非常详尽地讨论过了。^①而这个历时 500 多年的中间阶段则被作为“欧洲的扩张”写进了历史书中。对于绝大多数的历史学家来说，都可以很轻松地将 1492 ~ 1945 年这个历史阶段看成一个封闭的事件集合——这是一个当前历史体系逐步获得其轮廓的时代。前文已经说过，在这个历史时期之前是所谓的宇宙全球化的时代，强大的球体思想学说影响下，人们以经典的存在学说偏爱球面的物体。这一时代亦可命名为形态学的（或者更直接地说成：本体形态学）全球化。而这个历史时期之后则是所谓的电子全球化时代，它包含了今天以及后世。全球化的三大阶段的区别因此首先在于其象征性和技术媒体的不同：是用线条和切线来测量理想的球体，

^① 参阅《球面学Ⅱ—全球》，法兰克福，1999。

还是用船只来绕行真实的球体又抑或是用飞机和通信信号在地球的大气圈中穿行，这些构成的是划时代的差别。本体论的差别在于，人们设想的是一个能够包容一切实体存在的世界的宇宙，还是一个承载了各种不同的世界形成事件的地球。

球面形而上学的高潮——但丁（Dante）和库撒的尼古拉（Kusanus）是其最杰出的见证者——同时也是它走向消亡的转折点。用球面宇宙观来解释世界的学说的逐渐消亡开始于一个我们在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的踪迹中应该称之为文艺复兴的重要文化阶段。伟大的历史学家和形态学者布克哈特关于历史进入近代的行程建议使用“发现世界和人”（*Entdeckung der Welt und des Menschen*）的表达式——这一点，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与大地现实主义的上升阶段是完全一致的。若我们望向大海，它肇始于葡萄牙人的航海活动；若我们仰望天空，它则始于哥白尼“革命”以及开普勒对于天体按圆形轨道运行的金科玉律的背离。这种认识上的反叛使得带给人们无限宽慰的苍穹陨落了，因为理想主义的圆形失去了它的基础。逻辑的和经验的篇章必然的后果则是：从那些日子起，人们开始以全新的方式来关注地球——也许人们总有一天能够理解，对于人们的大脑的发现和绘图也可归入完全相同的转向中去。在它的后果中也用有力的证据经验地证明了近代对于地球是个球体的唯一性信仰。探测地球的时代开启了，而我们今天进入这个时代的饱和阶段也才刚刚不到半个世纪。

饱和这个概念在既定的语境中就拥有了行为理论的意义：当欧洲的行动者自航海时代开始以来表达出来的强烈的

侵略性占领世界的欲望满足之后，最迟于1945年开始，创建了一种新的氛围，而这种世界生成的模式与以往时代有着鲜明的不同。它的特征在于，对于主动发起的行动有着越来越大的束缚。当大地的全球化在几个世纪以来都作为一种单边性的行动在重复的时候，人们在最近几个世纪以来的氛围中，往往带着必不可少的悔悟去反思这段历史中的行动和观念——它有着一个警醒世人的名字“欧洲中心主义”，就好像在向人们宣称，要从曾经那个高傲的中心摆脱出来一样。我们要将这个时代纪元定义为单边主义的行动时代——作为非对称性的占领世界，它们的出发点是欧洲的港口、宫廷以及勃勃野心。需要说的就是，为什么这一系列过快的、英雄的而又可悲的行动会被冠以“世界历史”的名字而进入历史书——以及为什么世界历史在这个词的含义上正在消逝。当“历史”标记了单边主义的成功史——并且这个定义我们还会在后面捍卫它——那么今天的人们就必然生活在一个后历史的国度中。这种现状是如何与把自己看成不可或缺的民族以及单边主义世界概念的继承人美利坚合众国相互共存的，我们也将后面专门的章节里讨论。

在伦理意义上，全球化的饱和始于当各个地方的受害者向行动者反馈他们行为的后果的时候——这也标志了后单边主义、后帝国主义以及后殖民时代形势的核心。全球化也在技术意义上达到了饱和，当快速的交通运动以及超高速的媒体让航海时代的世界交通如虎添翼的时候（但其实新的发展也并没有多少实质性影响，从量上来看，航海运输比以往更加繁荣，世界贸易中95%的物资交易是从海路完成的）。

乘坐飞机，人们甚至可以在当天就实现远距离的往返，而世界另一头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恶性犯罪或是自然灾害，大约几分钟后就能知情。从系统意义上讲，全球化也达到了饱和，向开放空间渗透的行动者们不得不认识到，所有的首创精神都必须听从于相互作用的原则，而绝大多数的进攻性力量在一定的时问之后都会反馈到源头那里。反作用力的作用时间已经缩减到了不超过个体生命长度的时间范围内，甚至在一些极端情况下小于行动者们的任期，这就使得行动者们不得不越来越多地面对他们自身行为的后果——因此，人们把对于一些战犯，如皮诺切特、米洛舍维奇、萨达姆·侯赛因以及其他的单边行动者的审判看成是当今世界伦理上的一大进步。当司法审判的力量逐步扩大的时候，彼世的报应观——这曾经一度被看成是高级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就越来越失去其意义。世界历史以及世界法庭所依照的理想命题则随着日益增长的密度的规律而不断赋予自身新的意义：在越来越密集的世界中，所有的行动者，尽管他们内心早就大大试图超越，却不得不实际上暴露在大量观察者以及竞争对手的评价之中；可以预见到的抵抗以及针对措施赋予了“现实”这个概念当下独有的色彩。在强烈的交互事件中，单个的首创性精神必然会屈从于不断增长的交互阻碍的法则——最终所有同时的行动累加起来，稳定在一种类似高速震动的胶冻状物体的状态之中：这就是所谓的“后历史主义文明”概念所指的东西。因此，“合作”和“相互阻碍”其实说的是同一个东西。

1944年，随着建立在黄金之上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世

界货币体系的形成，大地的全球化可以认为已经完成；^① 最迟它也是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左右，随着电子信息以及卫星在地球轨道的建立而终结。在同样的运动方向上，还包括一直犹豫不决，但最终建立起来的国际法庭。作为正义的港口，全球范围内，只要犯了罪，在这里都会对行为人做出追诉。

在这一水平上，当前的第三次全球化进入了人们的视野。本书第二部分将谈及这一关于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空间”的布置以及安排问题。为了描写全球化了的，这个我们亦可称为“同步世界”的世界，我们将借助于使用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 1864 年的小说《地下室手记》（*Aufzeichnungen aus dem Kellerloch*）中提到的意象“水晶宫”——这个隐喻源起于 1851 年伦敦世博会时著名的巨大建筑。俄罗斯文学家使用这个隐喻，指出了西方文明的本质就像一个最终的浓缩物置于人们的眼前。在这个庞然大物中，作家看到了一个吃人的结构，坦率地说就是一个现代化的巴力神——这是一个狂热崇拜的集装箱，而人们在其中膜拜西方世界中魔性的东西：货币的权力、单纯的运动和醉心的享乐。巴力神崇拜的诸多特征，对此今天的经济学家称之为“消费社

① 参阅马丁·阿尔布洛（Martin Albrow）《告别民族国家——全球时代的国家与社会》（*Abschied vom Nationalstaat. Staat und Gesellschaft im Globalen Zeitalter*），法兰克福，1998。以半描写、半纲领性的给全球时代概念下了定义，阿尔布洛试图表达在哥伦布航海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以欧洲人的世界合成为标志的 500 年后，世界已经达到了一个全球性的新质量或者说新阶段，而对于这样的新阶段，人们需要以一个新的时代纪元的概念来应对，或者说要给当前的时代起一个新的名字；参阅本书第 28 章，本书第 219 页及其后。

会”的东西可以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水晶宫隐喻最清楚、最有说服力地表现出来，就算我们试图和作家传递出来的关于宗教的心灵上的影响保持距离——同样也和瓦尔特·本雅明巧妙而又朦胧的指出的“作为宗教的资本主义”保持距离。“水晶宫”容纳了资本的世界内部空间，在这里，我们安排了里尔克和亚当·斯密的一次虚拟的交流——我们会在合适的时候让他们出来说话。当我们重新提及“水晶宫”的时候，首先就是为了表达出感觉到通行的“世界市场”的概念是多么不合适，以及要刻画出在渗透到各个领域中的金钱关系的魔力下的生活状态。资本的世界内部空间不是古罗马广场上的市场，也不是露天的市集，而是一个温室，它把一切原本处于外部的东西都吸纳到内部中来。随着全球消费宫殿的观念的确立，就不能不提及完整的商品内部世界的刺激性气候。在这样一个水平方向上的巨大的罪恶渊薮中，做人首先变成了一个购买力的问题，而自由的意义则表现在在市场上不同的产品中做出选择的能力——或者是自行生产这样的产品。

在普遍的空间感觉方面，对于全球化的第三次潮流来说起决定意义的在于，真实的地球被去空间化了，在原来的拱穹形的地球的位置上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近乎无法膨胀的点，或者说是一个由节点和线组成的网络，它不过是把相隔任意远的电脑连接在一起罢了。如果说第二次浪潮是通过较低或者是中等的速度让人们的观念往地球巨大的膨胀延伸的话，那么第三次浪潮中，超高速度令人们失去了近代时获得的广袤感觉。对这一现象，今天人们以一种对于世界体系中过度交际的状态非常复

杂的不快作为回应——这种感觉是不无道理的，因为当我们今天来热烈庆祝远程通信技术带来的好处时，却有无数人经历到的是一项令人生疑的成就。借助它的力量，我们今天可以让处在很远的人也可以相互间弄得极度不快，而这在从前只会发生在近邻之间。在否定了距离的尊严的地方，地球就连同地方性的癫狂一起缩减成近乎于虚无，直到有着近乎无限延展性的地球最终只剩下一个象征性的标志。

在关于本书书名的简单说明之后，还必须回答一个问题：《球面学Ⅱ》^①的最后一个章节的标题在多大程度上是认真的，并以修改了的形式嵌入本研究当中。因此，作者请求大家相信他，世界末日话语的末日论和终结论对于他本人来说是如此令人感到可笑，甚至倾向于相信这些东西的读者中最悲观主义的那些人也会如同作者一样对那些东西不屑一顾。本来并非真的要讲最后的地球，因为当时的目的在于举出一个在哲学上异化了的西方。在这个关于存在和范围相遇的宏大叙事的背景下就有必要弄清，为什么大地的全球化不是众多历史中的一段。如我需要说明的一样，它是相互发现的诸民族，或曰“人类”的生活中唯一的一段时间。因此，它在哲学意义上称为“历史”或者说“世界历史”乃是实至名归。

世界历史是将地球塑造成文化和极度兴奋状态的载体；它政治上的风格就是欧洲国家的单边主义行动的胜利进程；

^① 《球面学Ⅱ—全球》，第8章，最后的地球（die letzte Kugel），法兰克福，1999，第801~1004页。

而它的逻辑就是把所有的物体预先按照均质的空间、均质的时间以及均质的价值不加区分地予以理解；而它的操作模式则是密集化；它经济的后果是建立起世界体系；它的能源基础是迄今为止还大量存在着的化石能源；它的基本审美姿态则是歇斯底里的情感宣泄和对爆炸的膜拜；它的社会心理结果是要作为远方的某种苦难的知情者的强迫症心理；它的活力的机遇在于有可能跨文化的比较幸福的来源和管理的策略；它道德的核心点在于从占领的伦理过渡到由被占领者行使束缚的伦理；它文明的趋势则从密集的减轻负担、保险以及保障舒适中表现出来；它在人类学上的挑战就是要批量的创造“最终的人”（die letzten Menschen）；而它的哲学后果则是有机会在无数的大脑中看到一个地球的升起。

不难承认，迄今为止分裂的诸世界挤压成为一个地球大小的语境是一个主题，在这个主题中，哲学和历史学因为事件的原因统一起来了。如果翻阅一本记录了最近 500 年历史的日志，它有一个让很多人感到不快但实际上却又恰如其分的书名《欧洲世界史》^①，那么就能明白，为什么说麦哲伦以及他的后来者们乘船环绕的地球是最后一个，甚至也是唯一的一个了。

① 参阅汉斯·弗莱尔（Hans Freyer）《欧洲世界史》（*Weltgeschichte Europas*），斯图加特，第 3 版，1954；对欧洲中心主义的视角关照下的大地全球化适时的修改，参阅 A. G. 霍普金斯（A. G. Hopkins）主编《世界史中的全球化》，伦敦，2002。

第 2 章

彗星

当古代希腊的哲学家和几何数学家们 2500 年前开始用数学的方法来测量宇宙时，就已经有着很强的形式上的直觉印象：一切最终都围着圈子在转动。他们对于宇宙空间的兴趣源于球体在构成上完美的简洁与对称。对他们来说，最简单的形状同时也是最完整、最高贵、最美的。过去集中在古老学院或是其他高深莫测的学术论辩场合的宇宙学家们自此不仅可以作为最强的理性主义者，也可以作为最优雅的美学家的面目出现。如果不是几何数学家，或是本体论者，都不再被看作是懂得美的人。那么作为至美的天空和作为至善的

物质体现的整体有什么不同呢？古希腊人对于浑圆整体的先入之见式的好感一直延续至德国唯心主义时代：“你们可知它之名？一与全之名？它之名谓之美。”（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许配利翁》）

于是乎，完满的美的名字——Sphaira——从现在起是由几何的方式表达的。世界的形式之于构成世界的物质之上，这意味着其中完满的美学起着主导的作用。并且这种美学一直统治着欧洲，直到现代人找到了其他的关于美和不美的规则机制。如果要将这难以捉摸乃至宏大的宇宙分别纳入某种观念之中，那么，就如同人们所想的那样，将之设想为一个球体的形状。这是由这种超客体的高雅天性决定的，平凡的肉眼则无法认识到它：有一个球，它对于通俗的知觉来说太大，而对于感性的理解来说又太细微。这并不真正地令人吃惊：因为自从哲学开始向民众观念中的感性世界宣战以来，不可视性一直被宣称为更深层次的现实的重要的特征。^① 能被感官感知的东西，按哲学家的观点来看都是现象和例证，而恒定本质的东西则总是闪现在概念化的思想之中。但是无论是理念的产物，还是显而易见的现象，没有哪种东西能像宇宙球体这样令为之沉思的人们既满意而又感到屈辱。它既被人们叫做宇宙，又被命名为乌拉诺斯，在随着过时的观念一起沉入故纸堆中后，只在远处闪着光辉。

一旦涉及地球上的全球化问题的概念化，或更应该说成是图像化，就不得不进入丑陋审美学的领域范围。在这一进

^① 参阅赫尔穆特·帕博《世界的不可见性》，法兰克福，1997。

程中，起决定作用的并不在于人们清楚地意识到了地球是个球体，甚至可以在教会语境的时代谈论此事，而在于地球形状的特殊性，它的棱角成为关注的焦点。只有这些东西才是科学感兴趣的。因为不完美的形状，不能用几何方法生成的形状才是经验研究的领域，并且也只适合经验研究。人们可以心安理得地将纯粹的美留给理想主义者，而亦美亦丑或是丑陋的东西才是经验主义者所关注的。完美之物不必援引经验便可设计出来，而事实情况和不完美的东西则必须有赖于经验的方法加以调查。因此，天体宇宙的和形态学意义上的全球化概念是一个哲学家和几何数学家的事情，而地球上的全球化问题则是一个地图学家和航海探险家们的事情，这之后，又成了政治经济学家、气候学家、经济学家、国际安全专家和其他一切研究复杂而不平之事的专家们的事情。

为什么必然是这样，是很好解释的：在宇宙形成的时代，地球自身的形状受制于宇宙空间的自然作用，不可能更完美。因此，在亚里士多德和天主教的宇宙观中，地球只占据了一个最为卑微的，在整个苍穹中最为遥远的地位。它的位置居于宇宙的中央，这听起来虽然无比矛盾，却正蕴涵了地球实际处于宇宙等级的最下端。^①虽然这种天际中像果皮一样包裹着的分层系统能带来处在最受保护的:center之感，然而它也阻断了地球同居于高处的完美的联系。因此，在形而上学的话语中，常常可以听到“尘世的”这样的说法，以

^① 参阅雷米·布拉克《作为人类的谦卑的地心说》，原载《国际哲学杂志》1994年第1期，第2~25页。

及一种站在与世隔绝的遥远空中带着高傲的神情俯视着地面上一切的不完美。必须承认，形而上学的理论家们知道，他们所言为何，即如何看待一个一半时间是黑夜，而那儿的万事万物都有着自己的死亡或终结的地方。理想模型和死亡之间的截然不同给古人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他们不得不将没有死亡的天国同面临着死亡威胁的下界分离开来。于是乎，他们越来越心怀着双重宇宙观：一切在月亮的下面发生的事情，都存在着失败，最终面临着消亡；这里的运动是线性的、有穷的，能量亦不是无穷的。因此，古代人并不认为，这样的运动法则最终会推演出什么正确的东西。相反，不可损坏的模型和永恒天空的更替则是居于月亮之上的空间之中。人的境况的特殊之处却恰恰在于这样的事实：尽管处于地球重力的规约下，却作为上述两个空间的公民而存在。通过每个单个的意识，裂缝从当初的分离振动中产生，其结果则是月球上端的，完好的空间从月亮下面的破败的区域中分离出来。从尽善尽美中被驱赶出来，并在月亮下的所有客体上留下了裂缝、伤疤和不规则的形状。对于美好的乡愁则是人类灵魂中的裂缝，它总是让我们回忆起明亮的、可以看到美丽苍穹的日子。

虽然将地球的地位降低了，却仍然给形而上学的统治带来了吸引力，因为此时上和下是清晰区别开来的状态。这种清晰的好处只有严格的层级划分才能实现。下面的无法通过自身的力量，以自然的方式达到上面；这样，能够随意的渗透到下面来，则成为上面所保留的一种特权。因此，在过去，思考被称为从天上而来的想，这意味着思考就如同一种

借助于逻辑而离开地球的行为。思想家在古代被看成是先验而明的人，他们总是居于高处，向下俯视，就像但丁在《神曲》的天堂之旅中描摹的那样。艾辛多夫（Eichendorff）《月夜》（*Mondnacht*）中的诗句——“那样，就如同天空/悄悄地吻上了大地。”——读起来就如同宣告了一直以来塑造了欧洲人存在于世界上的行为举止的模板的终结。这其中当然还包括笃信世界的陌生性是可学习的。当然，艾辛多夫已经生活在那样的时代，天空只是好像吻了大地，灵魂在宁静的土地上飞翔，这样的象征似乎在车上成为可能，在美丽的陌生之地寻找回家的路途。

真实的情况却是，在艾辛多夫的时代，上面的世界早就失去了权势，它对于大地的初夜权也早就不复存在。多个世纪以前，新的物理学发现就已经证实了天不过是空无一物的空间，而童话般的苍穹也并不存在。放弃自上而来的补充对于很多人来说并非易事。直到海德格尔，都在为没有了天的大地而悲叹——这样的大地，它是“存在史上的彗星”。我们知道，这个今天听来别致而又有些阴郁的名字并不是指任意的一颗行星，而是我们自己的星球，也就是在这里，人类提出了真理的问题，以及存在的意义的问题。地球上的居民共同随着他们的星球运动，海德格尔的这个认识是古人关于地被天所包围的最后遗迹。

大航海发现地球是圆的，天体观察发现不存在苍穹，而远在这些发现之前，地还躺在天的包围之中。按照死亡学的观点，地球上的一切都会面临着消亡。地球模糊的圆形的形状也并不能阻止这一趋势。它就是时间流逝的秀场，按这一

规则，任何产生了的事物自其发端，就已经蕴涵着终结。所以，地球上一切事物都无一例外的会有终结，就像钟总会停摆，不可逆转，导火线也将会燃尽（这对于“历史意识”来说的意义在于，与其说最后的爆炸声是开始，不如把它视为结束）。人理解了自己的处境，就要懂得，没有人可以活着离开。所以，在这个阴沉的球体上，就必须练习用当下哲学很时兴的术语来讲的“奔向自己的死亡”——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现在不像古代，不再用“会死的”来指称人，而使用“暂时的”这个概念。一个历史学者如果谈到人类群体如何开始他们的时代，并设想一下人类进化的终结时，他一定会这样回答：他们组织了一场奔向死亡的集体长跑：作为顺从的先进队列，作为狂欢的狩猎，作为不断进步的努力，作为玩世不恭、自然主义的淘汰赛，作为生态学上宽容的练习。人类在地球的表面以各种徒劳的方式试图挨过不可避免的最终结局，而作为宇宙天体的表面，地表不可能是完全平整的。完全的平整不过是理想化的状态，粗糙和真实得以收敛。

也许并不是偶然，人们在刚刚开始论证地球的表面并不是平整的，1853年，黑格爾的学生卡尔·罗森克朗茨（Karl Rosenkranz）就在《丑的审美学》（*Ästhetik des Häßlichen*）中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对丑的感受。在这个新的，非理想主义的接受学理论当中，人类的故乡成为关于自然丑的学说的典型案例。

纯粹的、粗糙的天体物质，如果它仅受到重力学规律的影响，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审美上完全中性的状

态。它并不必然美，也并不必然是丑的；但它却是随机的。以我们的地球为例，如果说作为一个天体，它是美的，那么它就必须是一个完美的球体。但是实际上它不是。它两极扁平，而赤道附近突出，此外，它的表面还非常的不均匀，有着很多的起伏。地壳的全景图向我们展示了，地表是由完全随机的突起和凹陷构成，从立体几何的角度看，无法对其轮廓进行归纳。^①

基于上述考虑得出的结论，人们可以将后理想主义时代的地球审美原则表述如下：作为一个真实的天体，地理开发的地球并不是美的，而是有趣的。有趣就意味着，从美到丑的道路已经走完了一半。尽管在看到它的形状时，还会有短暂的不快和月亮下面世界的谦卑，直到今天，我们还使用 *conditio humana*（人类生存条件）这个词。总的来说，情况发生了转变——不规则在新的观察视角下也拥有了它的魅力。现代意义上，有趣的和丑的审美学不仅引入了理所当然的随机事件，换言之，具体的以及非对称的东西为研究对象的经验研究方法，同时让失望变得可以享受，释放反攻方向的力。这实际上给失控现象带来了好处，失控用好的话说叫实践。没有失控概念就不可能有现代的有说服力的理论，它将各种动机整合在了一起，给予我们动力涉足不完美和不愉快的领域。（参阅本书第11章）

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生存于地球表面的区位优势，便会扔

^① 卡尔·罗森克朗茨《丑的审美学》，莱比锡，1990，第20页。

下控制着人类生活于不美好之中的挑衅的怒火的缰绳。所以在现代，愤怒理所当然地成为一种基本态度——叛逆的理由；普罗米修斯成为时间的泰坦神，而斐罗克特则是他的秘书。^①现在，当形而上学统治下大有裨益的无视偶然性，不考虑增加负荷以及理顺干扰因素迅速失去了在有序的上部世界的支持，也就意味着要停留在不完美当中，奔走于怪异和非定形之间，忍受矮小和厌恶。对这些事物的描摹反过来让这些事物反对自身。新的美学将罅隙、喧嚣、裂缝、不规则性都纳入视野中，以真实来获取令人反感的作用。

大地上的全球化在美学角度来看，是有趣战胜了理想。其结果，众所周知的地球是一个球体，作为几何形状，它是令人失望的；作为有趣的天体，却能唤起注意力。对它——以及对它之上的其他所有的物体——抱有一切期待：这构成了我们整个宇宙纪元的智慧。从美学史上讲，现代的艺术体验如何与尝试联系起来，让我们为不规则事物的感官刺激睁开早已被几何简化蒙蔽了的眼睛。

^① 作者让反派主人公斐罗克特说出了古代最叛逆的言语：“我觉得神是邪恶的”；参阅索福克勒斯《斐罗克特》，第452行。

第 3 章

重返地球

合乎逻辑的情况则是：在新时代，不再是形而上学的思想家们，而是地理学家和航海家们接过描绘我们世界的形象的任务。他们的使命就是用图像的方式来呈现终极的球体。对于已经失去了外围包裹的人类来说，所有圆的大型天体中只有自己的地球还有意义。环球旅行家、地图制图员、殖民占领者、国际贸易商人甚至是传教士和他们的后卫骑兵，他们来自那些心怀善意的发展帮助人员，或是把钱花在远方以增长阅历的旅游者——他们所有人看来都似乎明白了作为苍穹的天空毁灭后的地球不得不履行相同的功能的道理。物理形态上真实的地球是

一个表面不规则分层，有着混乱的褶皱，还被各种风暴侵蚀的天体，现在我们要环绕它，并了解它。因此地球仪作为新时代的世界观的标志性圣像诞生了。从1492年纽伦堡贝海姆地球仪开始，这是迄今为止存世最早的关于地球形态的模型，到NASA的地球摄影测量照片以及和平号空间站传来的地球的照片，现代的宇宙学进程铭刻着在不同的媒体中地球图像的外形变化和精确化的印记。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期——而且也不是在航天时代——人们能够否认可视化地球的探索必然带有的半形而上学的特质。在天空毁灭之后，任何试图勾勒大地肖像的人都有意或无意地处在崇高的宇宙结构学的传统之中。为了保障勾勒世界图像的新方法的效力，就必须不仅要在想象上，同时还要在技术上克服重力的作用。

有代表性的则是，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就已经大胆地把他的于1845~1862年出版的，在那个年代成为最著名的科学类畅销书的五卷本代表巨著（其中第五卷在作者死后才得以出版）命名为《宇宙》。若我们回顾历史，就能认识到，这部著作以其时代特有的机遇，以宏大的全局“物质世界的描写”，从优美精神教育的方面，弥合近代欧洲人的苍穹是不存在的，以及有关天体宇宙讨论的最终定案给他们带来的心理失落。洪堡大胆地将形而上学的损失展现成文化上的盈余——并且至少在同时代的公众当中，看似取得了巨大成功。在全景式的自然油画中，整体的审美观替代了已经消失了的被包裹在壳中的宇宙观。美的物理学让神圣不可侵犯的圈层图景不再不可或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洪堡，人们也许可以理所当然地将其称为最后一位宇宙

结构学家，在他的世界图像的勾勒中，并没有把地球作为出发点，去观察外部的空间。他更多地按照他那个时代或是我们今天的习惯，选取了宇宙空间中的任意一个点，从那里出发，像一位访客一样，从一个陌生的天体不断地向地球迫近。

人们从深度的宇宙空间以及最远的星云所处的地带开始，一级级慢慢下降，穿过属于我们太阳系的星体层，到达由空气和海洋包裹着的地表层，它的构成，温度，磁场强度，关于它的生物圈，在阳光的照耀下在地球表面生长……出发点不再是主观的、从人类利益出发的。尘世不过是整体的一个部分，从属于整体。自然的视角应该是普遍的，宏大的和自由的，不应该囿于近处的抑或是兴趣……的动机。物质世界的描写，世界的绘画因此就不该从地球上的东西开始，而应该肇始于充盈于天际空间之物。可分辨之物个体的丰富性，即物质现象的丰富，以观念的领域在空间上不断缩小的方式不断增长……我们从只认识到重力规律统治的区域中下到我们的行星……上来。^①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降级的运动：它不再是形而上学的统治方式——传授一种自上而下俯视大地上一切的观察方法，而是已经策划安排了一个天文望远镜的角色。从他回到地球的方式来看，可以明确地知道，洪堡尽管做出了整体的和安慰性的姿

^① 亚历山大·冯·洪堡：《宇宙》（*Kosmos*），汉诺·贝克改编，斯图加特，1978，第48、52页。

态，但在关键问题上已经站到了现代科学的阵营之中，并决定反对地球上的人们由于邻近感官而产生的种种妄想的迷醉。如同贝海姆、徐纳尔、瓦尔德西米勒、阿皮安和大小墨卡托等地球仪制造者和宇宙学家一样，洪堡也要求人们从外部去看我们的行星，并拒绝承认外部空间只不过是处在局部地区的，像锅灶一般家中的，社会子宫的想象力的延伸罢了。

打开进入无穷尽的大门使现代定位的风险异常敏锐。尽管刚开始还是以很混乱和间接的方式，人们却知道，他们包含于或者说迷失于无穷无尽中的某个地方——其实两种说法意义大抵相同。他们意识到，除了同质不定空间的冷漠，他们不能再依赖任何其他。外部作为一种陌生的自我权利的量在自身中扩张，经由人的场域的接近假设。它的第一同时也是唯一的原则是不与人发生任何关系。人类想象应该在外部寻找些什么——只要想一想美国和苏联的太空计划——必然是不稳定的，令人沮丧的甚至是自我麻醉的建立在无意义之上的事业。任何时候，外部化的、中性的、均质化的空间成为新时代的自然科学都是第一事实。外部空间优先的定律给人的科学提供了公理。

这样一来，人的地理定位感官就发生了激变。地球现在成为了人们回归的星球，无论人们距离它有多远。外部就是一切回归的原点的总和。外部的思想第一次在宇宙结构学领域中被提升为标准。新的，不可避免的从外部而来的运动产生于空间，并回到地球，空间便不再是托马斯·迪吉斯（Thomas Digges）和乔达诺·布鲁诺（Giordano Bruno）那个时代的简单得像果壳般包裹着的天空。它是物理学家无穷

尽的永远沉默的空间，帕斯卡警示着新的无神论物理学的同时承认，它使他的心绪置于惊慌之中。但丁在天堂旅行时，从恒星天上向地球俯视，必然会不由自主地因为地球的渺小而发出微笑，那么这种感动则与伴随着洪堡从光秃秃的外部空间回到充满生命的地球上时的惊讶完全不同。新时代与形而上学时代相比，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来赢得垂直线。飞的概念代替了人们古代乃至中世纪时的“飞升”；地球是作为一个机场而存在，人们从这里起飞，并降落，而过去，它则是个飞天的起点，人们从这里离去，为的是终有一天能够不再回来。从外部的目光并不源于思想认识的灵魂先验地洞见了地面上和地球外部的东西，而是源于物理的、技术的、航空和航天的想象力的发挥，此外，它在文学和制图上的表达总是会超前于技术上的。

当然，在洪堡的《宇宙》出版之时，行星天以及包裹在外面的恒星天的学说已经被人们摒弃了几个世纪。到了洪堡的后期，即使是令人振奋的天文知识的传统媒体，从阿尔古因到黑格尔时期，传统宇宙论的常用教具天体球仪也早就是前代人的东西。抬头仰望星空也成为一门从新兴自然科学当中细分出来的新的分支。随着研究最外部空间及其中天体的天体物理学的发展，古代的天空中的星座神话传说知识迅速衰败。继续从事天文研究的人必须意识到，当仰望一个人类赋格的空间时，我们一切的希望和投射都将毫无回应地迷失在空空如也之中。

就如同强调地球是我们回归到的星球一样，欧洲人——

在他们的宇宙学、民族学和心理学的启蒙之后——保留地球作为“宇宙中的智慧神经节点”，并在任何语境和情况下都要与之建立联系。示范性地表述从宇宙空间的外部向自我反思的人类的回归，成为亚历山大·冯·洪堡的使命。一代人以前，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就将人性情中能够从过大、最外部和最陌生的东西回归到自身的能力刻画为崇高的感官——崇高在这里意味着人在反抗一切在压倒性的优势中自我放弃的尝试中对自我尊严的思索。^①正当洪堡的世界绘画实施着从星空乃至海洋的维度的无比遥远的自然回到一切布置的亭亭当当的文化沙龙里时，他的同时代人正致力于最后一次接受进入宇宙的优雅。最宏大的世界观在这里成为审美生活的紧要事件。^②这意味着以资产阶级的，也就

① 参阅康德《判断力的批判》，§26“关于对崇高观念不可或缺的对自然物大小的推测”，以及§28“关于自然作为一种强力”。与其他浪漫派学者不同，康德认为，崇高的基础并不在于无边无际的巨大之物单纯的呈现，或是拥有绝对强势的力，而是主体能够以坚持作为理性之物（而非在自然中可松懈之物）存在的方式成为一种保全其尊严的主体回归到自身，即使看来是不成比例的。

② 洪堡在这里比他的同事兼竞争对手达尔文走的远得多。后者乘坐贝格尔号于1831~1836年环游世界（德语版：图宾根，1981）只记住了少量清楚的崇高的“绘画”，具体如下：“那些深深的烙印在我的记忆中的画面中，没有哪些能够超越那些应该是处在巴西的，从未被人类活动污染的，处处显示着生机的原始森林，又或是在火地岛，到处都弥散着死亡和瓦解的气息。两者都是神奇的自然力的伟大创造的神庙：任何人在这样无穷的孤独当中都不可能感受不到，在人身上除了单纯的身体内的气息，还有些别的东西存在。”（第372页）

而且达尔文还知道，地球研究者们单凭审美已经不行。传统的审美必须按照时代精神补充对（量的和灵活的）崇高审美的内涵：“自然的景象中，从高山上向外望去的景象，尽管从一个意义上讲肯定不美，却很奇特。从科迪勒拉山最高的山脊向下看，不为细微的细节所打扰，周围物质的维度所带来的震撼印象充满了人的精神。”（第372页）

是说归根到底是消费方式的沉思生活（*vita contemplativa*）的继续。如果人想“受感动地”“深入地”体会庞大，那么这个过程必然在自身的内部发生。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就用精确的言语表达了资产阶级的孤独感官。

内部“对于个体来说，就是整个宇宙。他将远和过去集中在其中，他的沙龙就是世界剧院的包厢”。^①

由于宇宙的安全感遥不可及，人们思索着自身在空间中所处的位置，无论处在多远，都必须回归到自身——最好是以完全不离开自己的“四面墙壁”的方式。因此，现代性上典型意义的人就成了包含其身体扩大和旅游活动的“居住的人”（*homo habitans*）。虽然本质的超验和超世界中家园的梦想已经破灭而无法挽回，但相反，超验之物，也即是思想的和居住的主体的自我联系作为从外部回到自身的可能性的条件，在19世纪的思想中却更加确切地表现了出来。超验的转向——认知成为自我的认知机制和局域的认知境况——构成了洪堡对世界描写以及唯心主义和后唯心主义时代的思想家们哲学系统构建的核心。它给其他一切追随18世纪晚期人类科学发端的种种预先规定的人类学思想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连自然的研究者也不由地意识到隐秘地为哲学所熏染的地球概念：它现在是一个超验的天体，作为一切自我反思的

^① 瓦尔特·本雅明：《巴黎，19世纪的首都》，出自《启迪·精选集》，法兰克福，1961，第193页。

地域条件发挥作用。^① 它是个示范性的中间体，这里，经验的和超验的统一到了一起——一方面是对平常的对象做惯常的研究，另一方面是稀罕的智慧的唯一载体。作为产生了关于星球的理论的星球，地球发出荧荧的磷光。那些奇怪的智者在地球上向均质的空虚中思考，不断地思考，为的却是能够从外部重新回到地球上来。现代化了的居住是现代性的认识的可能性的条件。因此，洪堡引入了“球面”（Sphären）的表达，依其自然，不再是统治了两千多年的亚里士多德想象的包裹着大地的天空理论，而是超验的“观念的球面”，它并不是指宇宙中的真实，而更多的是一个由构建模式、辅助概念和空间想象理性半径的总体。

在洪堡时代停留在思想球面的东西，到了 20 世纪可以具体化为一种在真实的物质空间中的运动：1969 年 7 月 21 日，在尼尔·阿姆斯特朗之后第二个踏上月球的奥尔德林后来撰写自己的回忆录，回顾自己的宇航员生涯，那本书的名字就叫《重返地球》。^②

① 在洪堡以后几代人，诸如尼采、胡塞尔和梅洛庞蒂都明确地把它记录下来。参阅施特芬·贡采尔《尼采哲学和在西方中“适宜的气候带”》，载《辩证法》2000 年第 1 期，第 17 页及其后。

② E. 奥尔德林，纽约，1973。

第 4 章

世界时间，宇宙时间

对于大地维度来说，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来，有一点已经非常明确：在环绕的地球空间中，每个点是等值的。通过这种中性化，在新时代的空间思想必须也经历一个巨大的意义转变。人类传统的在地域的方向、标记和吸引中的“生活、纺织和生存”模式已经被一种新的在同质的可任意分割的想象空间中的任意地点的定位系统超越。^① 在现代

① 参阅赫尔曼·施密茨用现象学的方法使其哲学系统澄明，第三卷，《空间》，第一部分，《肉体的空间》，1988年第2版，波恩，第119页《方向空间》（以及第219~231页），第120页《地点空间》（同于第132~135页）。

的、地点空间的思想占上风的地方，人们就不能再在他们传统的世界内部空间和其中延伸与合并的幻象中固步自封。^①他们不再只居住在以故土为中心的天空之下。如果他们以共同思考、共同发现、共同赢取的行动方式参与到伟大的觉醒中，便会放弃狭隘的出生地域。他们离开自己的语言区域和他们头顶的一片天空，为的是能够随时在一个不可制伏的、优先的外部进行运动——尽管只是一个日益精心布置的社会政治和内部建筑不断相互靠近的外部空间。

欧洲扩张的示范国家的那些新的行动家们不再固守于故土，他们也不再在它的声音和气息中飘移；他们不像以前那样顺从于它的历史上的点滴和神秘的吸引力中心；他们忘记了什么是着了魔的源泉，也不记得圣地教堂和充满力量的地方的意义，更加不再清楚模棱两可的偏僻之处有着什么样的诅咒。对于他们来说，出生地空间的诗学不再具有决定意义。他们的生活也并不囿于他们所出生的狭小空间之中，他们也并不在密闭华盖下的、本民族的天空下呼吸。相反，他们学会了在别处、在外部、在抽象的地方开展他们的活动。他们所在的地方今后就是地图，地图上的点和线条共同构成了他们毫无保留的定位。世界地图（mappamundo），在这张将各种知识集中起来的纸上，标记出了他们所处的位置。地

^① “世界内部空间”这个概念来源于里尔克。面对人与物因为环境的抽离而渐渐失去生机的现代性基本体验，里尔克试图通过自身的体验力量来加以克服。他用一种诗化的泛灵论方式来使世界重新焕发生机；体验不再是柏拉图式的世界灵魂，而是一种与有时代特色的（同时代的）“诗人式居住”相适应的个体-宇宙强度。参阅本书第36章。

图屏蔽了国家，地球的图像对于空间想象思想来说，却使现实的延伸渐渐消失。

地球仪作为大地测绘学上的里程碑式的杰作，能给现代人其他任何东西都无法比拟的有关位置的信息。因此，它也开始了历时长达五百多年之久，令人瞩目的成功史。它的垄断地位——无论是用大的平面地图还是平面展开图的方式（Planisphären）来表现地球的表面，直到20世纪的最后四分之一的时候，才被卫星图打破。^①而在它占据统治地位的年代里，地球仪不仅是新的均质化区位的主流媒体，也不仅仅是所有在旧世界及其依存关系中居于统治地位或拥有知识的人手中不可或缺的世界观的器物。此外，由于地图的不断更新，它还记载了向外扩张的欧洲人不间断的通过海路或者陆路对新的地带的发现、占领、开发和命名的方法在外部空间伸张自我。每隔约十年出版一次的新地图和地球仪就会表明这一过程的最近进展，马丁·海德格尔后来这样写道：

新时代的本质是将世界作为图像的占领。图像这个词现在意味着：想象的构建的生成物（das Gebild des vorstellenden Herstellens）。^②

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大众媒体中吹嘘的所谓“全球

① 当然，三维的地球仪的成就已经被自16世纪晚期普遍出现的平面投影展开图形式的地图中和了，后者的优势在于，它可以书本和图册的形式出现。

② 参阅马丁·海德格尔《世界图像时代》（1938），载《林中路》，第6版，1980，第92页。

化”概念，这让人感觉似乎是个新近才出现在我们周围的新生事物，在这样的视域中去理解，它所呈现出来的不过是事件中的一个迟来的、诡诈的瞬间。人们只有在将新时代及其一切后果都看成是从冥思的球体思辨到把地球理解成球体的实践的过渡时，才能真正看清它的真实维度。当然还需要强调的是，直到 20 世纪时，残存在欧洲大陆上生活着的人们心中的托勒密式宇宙观才真正完全结束了它在人们心中的垂死挣扎。当下，他们却必须如同在最后一分钟时补上这一课，而此前他们在近半个千年里面，一直都拒绝去理解：虚拟地来看，在可以环绕的球体的每个地方，即使再遥远，也都可以通过对方的交易而使其受到损伤。

陆地上的全球化的含义，只有在人们将其看成是对空间政治放弃的历史，才能真正揭开其面纱。这种放弃看起来对于胜利者来说是必要的，对于失败者来说是不可忍受的，对于大家共同来说则是不可避免的。地球仪用隐含的方式传递给其使用者一个形而上学的信息，即所有的生活在地球表面的生物，从其绝对意义上来看，都是处在外部的，尽管它们以各种方式，如结对居住，或是集体的隐蔽象征来试图将自己包裹起来——系统论者可能会在这里使用交际这个概念。思想家们看到宇宙中开阔的天空，并把它们幻想成为苍穹——不可测量，却仍然是封闭的——于是他们便不再担心因为处在外部而感到寒冷。在他们看来，世界是什么都不会失去的家园。自从他们环游了这个承载了一切彗星、植物、动物和人类文化的行星后，在他们的头上便出现一道巨大的裂缝。而当他们向上仰望时，看到的是无底的外部世界。第

二道裂缝则是文化上的，它在民族学的启蒙后告诉了每个人，在另外的地方，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是完全不同的。我们认为是永恒的、规则的东西，不过是局部地区的承载着我们的生活的内在依存关系。而一旦离开了它，你就会发现，在混乱之上有着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建立起来的秩序。这两道裂缝，宇宙的和民族的，让观察者更加认识到了存在与本质的（*Dasein und Sosein*）偶然性。它们共同昭示了，这不是构成了新时代免疫学的灾难的“失去中间”，而是“失去了边缘”。最后的界限不再是它们以往看起来的样子；它们所能给予的停止，也不过是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错觉：这条挂失信息（技术上：固定边界的去本体化）是新时代的祸音（*Dysangelium*），它同发现新的机会空间的福音（*Evangelium*）同时广泛传播。好消息凌驾于坏消息之上，这是这个时代纪元的重要特征。

在伊比利亚港口停靠了知识瘟疫的船只。从印度归来，从相反的方向回到故土，第一批环游世界之旅的见证者们以别样的目光投向这个世界，它从现在起只能叫旧的世界。经历过环球旅行，再回到家乡的港湾后的人们——就像麦哲伦1519年到1522年的环球旅行船队上幸存的18名船员那样，刚刚到岸下船，就蜂拥进教堂，唱起赞美诗——再也无法去把那个他重新踏上的土地神话成家园般的世界洞穴。从这个意义上讲，塞维利亚是第一座城市，它的港口，更确切的说是圣卢卡德巴拉梅达港是世界历史上的第一个迎接环球旅行归来的见证者的地方。过去的家乡呈现在回归者的清醒了的、感伤的目光中，只成为一个位置。在这些地方开始适用

新时代的空间法则：人们不再将自己的出生地看成是世界的以及存在物的中心，其他的一切事物都只是围绕在它的周围。生活在当代，生活在麦哲伦或者阿姆斯特朗以后，就理所当然地会把故乡投射成为从外部感知到的点。从旧的世界过渡到各个位置点的集合反映了人类环游世界后对地球现实的新认识。所处的位置是个想象世界中的点，依傍在它旁边，本土的人将自己理解成为从外部被理解之物，而被环绕之人则在其近旁回归到自身。

这一过程中最奇怪的事情莫过于，就像无数欧洲本土的人那样，几乎有史以来都对此熟视无睹，歪曲隐瞒，抑或在行动中畏葸不前。而在 20 世纪末的时候，却突然一下子仿佛找到了全新的理由，开始致力于一个闻所未闻的“全球化”现象。人们若有准备地事先提醒他们：1900 年前后的世界形势——在 20 世纪民族主义的倒退之前——在诸多方面，比之 2000 年前后要更加开放，全球化程度更高，他们会说出什么话来呢？当然：环游世界之旅发生得越频繁，所需的时间越少，“生活世界”转变为周边区域位置的变化就进行得更为普遍。这当然也就可以解释，为何直到有了便捷交通工具和超高速信息传播手段的时代，地区性的免疫结构的去神话化才传染性地被人感觉到。

在全球化的过程当中，全球化逐层地把脚踏实地的、定居一处的、以自我为导向的，以及从自我中来有着强大治愈力的集体生活的梦想外壳（Traumhülle）炸裂开来——这是那样的一种生活，人们除了在自身的近旁以及出生地以外，从来也不曾到达过其他的任何地方〔海德格尔的域（Gegnet）

概念给了这种空间性一个迟来的、无用的名字]。这样的一种生活并不了解其他的世界宪法 (Weltverfassung)，除了自我遮蔽自我的、原生态的、微观球面被鼓舞而宏观球面用墙围着的那个。对于后者，世界就是一个植根于地方的、自我为中心的、单语种的、群组子宫的 (gruppen - uterin) 想象力的、有着强大围墙的、社会宇宙的延伸。前现代的空间是一个以它的方式被有活力的质充满了的容积。然而全球化却将包围在四周的外部向着各个方面移开，开放贸易的城市，最终甚至包括闭塞的小村庄都纳入交通空间中去，交通空间把一切地方的特殊性都简化到统一的度量上去——资本和几何。^①它炸开了自我生长的内部球面 (Endosphären)，并把它们放置到网状结构上去。纳入了网状结构中，扎根于一地的人们的定居生活就失去了思想上原有的认为自己就是世界的中心的优先权。

从这个意义上讲，新时代的历史，就像前面说过的，首先不过是向着均质的外部空间的“革命”史。只有当地球上的居民们渐渐明白，直接的相邻关系的范畴已经不够用来阐释在延伸了的空间中与他人及他物之间的关系时，它便对地球施以解释。它用消解居家性的旧调调的方式带来了区域本体的灾难。在这一启蒙的进程中，所有古欧洲国家在法理上都成了地球表面上的一个区域位置；众多的城市、乡村和地带在事实上则变形成了有

^① 关于这一说法的中世纪晚期的前提条件，参阅克罗斯比 (Alfred W. Crosby) 《现实的测量：量化和1250-1600年的西方社会学》，剑桥出版社，1997。

着无限可能性的交通站点。在这里，活跃的现代资本以其五种变体——商品、货币、文本、图像和名流——畅通无阻。^① 地球表面的每个源自经验的地方都潜在的可以成为资本的一个地址。在可到达性方面，资本则是将一切空间点视作技术和经济的手段。哲学家通过思辨设想的球体宇宙模型固然是将最强的安全感上升为一种世界观，然而新的“世界苹果”——贝海姆确实这样称自己的地球仪——却向纽伦堡人，接着再向欧洲人，谨慎地、残酷地同时又有趣地宣告了新时代的拓普信息：人类是生物，他们生活在一个不平整的球体的表面上。这个球体从整体上看并不是母体，也不是给人带来庇护的容器。

地球仪最好放在一个昂贵的架子上，底下是雕镂的花梨木脚，中间是金属的子午线环架；它对于观察者来说最好要能起到类似一个直观性和有限性的范式的感觉：它总是再现了一个物体的图像，它缺少遮蔽的边缘和外部球面形的包裹。在它上面的看起来就已经是外部了。

① 商品和货币是资本不同的形态，是非常浅显的道理，但是文本、图像和名流也是资本的事实，却是现代的文化业行动者们才开始学着理解的，与传统的保守精神相悖的东西。为什么说文本和图像也是资本的形态，可以参考乔治·弗朗克（Georg Franck）的《注意经济学》（*Ökonomie der Aufmerksamkeit*），慕尼黑/维也纳，1998。关于名流的政治经济学：托马斯·马乔（Thomas Macho）《从精英到名流——政治领导的结构变迁》（*Von der Elite zur Prominenz. Zum Strukturwandel Politischer Herrschaft*）载《水星》，第534~535册，1993，第762~769页，以及同一作者的《名流之面——可视性政治化笔记》（*Das Prominente Gesicht. Notizen zur Politisierung der Sichtbarkeit*），载S. 阿诺德/克里斯蒂安·福尔迈斯特/迪特马·席勒编《20世纪政治表演——权力的感性》（*Politische Inszenierungen im 20. Jahrhundert. Zur Sinnlichkeit der Macht*），维也纳，1998，第171~184页。

人们在19世纪和20世纪哲学中称为存在的东西，都被所有的地球仪很直接地表达了出来：所有看地球仪的人，都被要求设想自己是一个存在于地球和外部虚无的边界上的存在物。没有哪种情况比如下的事实更深刻地揭示了近代地图学的艺术——当然也包括其思想方法：地球表面的大气层在任何我们所知道的地球仪上都没有被表现出来。平面的地图也只是再现了没有大气层的土地。空气元素对于一切较旧的地球模型来说都理所当然地被忽略掉了，就好像只有固态的物体才有被图像化的资格一样。直到20世纪，空气才被加了进来，目的是列举出人类生活的环境关联的超具体条件。然后才可以明确地说，存在和浸没是两个同样强大的概念。

在欧洲的图书馆、主人书房和沙龙里起装饰作用的每个地球仪上都体现出了外部空间优先的学说。欧洲人作为发现者、商人和旅游者率先突入了进去。但是他们同时又通过回归到裊糊起来的内部空间的方式来拯救自己的灵魂。什么是沙龙，不就是一个人们谈论远方的可怕的东西的地方吗？只要可以，和地球仪平行展示出的浑天仪就否认了由地球仪暴露出来的信息^①；它依然虚假地构筑了一个包裹着人类的苍穹，但是，它的作用更多的只是装饰性的，成为星象学艺术的手段，从了解星座和命运的知识转换成了修身的心理学家和摆地摊的算命先生。天空作为一种假象的形式渐渐除去了

^① 参阅艾礼·戴克 (Elly Decker) 《浑天仪——一个为了自己的世界》 (*Himmelsglobus - eine Welt für sich*)，载《聚焦贝海姆地球仪》 (*Focus Behaim Globus*) 第I部分，纽伦堡，1992，第89-100页。

魔力，没有人能够挽回。看起来像高高的苍穹一样的东西，是一个通过大量空气而感知的深渊。余下的是被绑架了的虔信和坏的诗歌。^①

① 巴尔托德·海因里希·布洛克（Barthold Heinrich Brocke）的诗《苍穹》（*Das Firmament*）[载《上帝中的尘世之乐》（*Irdisches Vergnügen in Gott*）第一部分，汉堡，1723]体现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例外情况。它可以解读为对帕斯卡关于在无穷尽的空间中永恒沉默的格言升级的回应。其实布洛克这首诗从标题开始就错了，因为对他来说，实际上已经不再有能够保持宇宙稳定性的苍穹了，而只存在着一个在上帝中的非空间性的灵魂的固定：“就像无底的大海的宽阔洪流/放在下沉的铁块上一样/那一瞬间，深渊的空间就一起击在我精神之上。/巨大的坟墓，充满着不可见的光线，/充满着明亮的黑暗，没有开始，没有限制，/吞噬了整个世界，埋葬了想法；/我整个存在的本质就成了一粒尘埃，一个点，一个虚无，/我失去了自我。这突然将我击倒；/绝望溢满我的胸膛；/独自一人的，噢，神圣的虚无！满怀喜悦的损失！/永在的上帝啊，在你当中，我又找寻到了自我。”这些诗行很明确地说明了三方面问题：一，诗人理解的苍穹已经不是最初的宇宙意义上的苍穹了；二，类比海洋，天空在他的想象中是一个人们可以在其中毁灭的东西；三，在没有实地的地方，想象力之船的破碎只能由“本质的向着近处的趋势”的上帝来解救。苍穹的思想不仅产生出一个诗歌中的彼世，还有一个昏乱中的彼世。丹尼尔·保罗·施雷伯（Daniel Paul Schreber）在他的《一个神经病人的回忆录》（*Denkwürdigkeiten eines Nervenkranken*）第六章中写道，一些来拜访过他的逝者的灵魂，声称自己的地址就是“苍穹”。

第 5 章

离开东方，进入均质空间

为了建立起外部的优先地位，麦哲伦和德尔·卡诺（del Cano）以及弗兰西斯·德拉克（Francis Drake）（分别于 1519 ~ 1522 年，以及 1577 ~ 1580 年）环游世界的事实似乎还不够。两个环游世界的航海英雄事迹在全球化的历史上始终拥有一席之地，因为它们的当事人都决定乘船向西而行，这就构成了世界史的影响以及不竭的精神内容的方向转变。无论是麦哲伦，还是德拉克都追随了哥伦布的直觉，认为一直向西方去便能到达印度。这简直成为一种有着先知作用的强迫症状。尽管哥伦布在其第四次航海经历（1502 ~

1504) 时, 仍然没有能够从他自以为找到了通往印度的航路的错误认识中觉醒过来——当时, 他却非常认真地以为, 中美洲的岛屿距离恒河只有十天的航程, 而加勒比的居民是印度大可汗的臣民——但当时的时代仍然是倾向他那一边的。他选择向西航行, 无疑是将此前难以想象的太阳神话的向着东方的趋向转移到“西方的解放”道路上来, 是的, 以他发现了西方还有一片大陆的事实, 他成功地否认了东方在人们心目中享有的神秘主义——形而上学的优势地位。自此, 我们不再是回归到“起源”或是太阳升起的地方, 而是不断进步地, 不带一丝乡愁地跟随着太阳而行。因此, 罗森斯托克-胡絮 (Rosenstock - Huessy) 完全有理由写道: “哥伦布横穿的海洋使西方变成了欧洲。”^① 自此, 一切以全球化或是普遍的关于地球的理解名义下发生的事情, 都完全处在了大西洋倾向的标志中。

当葡萄牙航海者从 15 世纪中叶开始破除了把人们看向西方的目光阻止在赫拉克勒斯之柱旁的魔幻的阻碍之后, 哥伦布的航海则最终算得上是欧洲人兴趣迷失方向的信号。只有这种“革命性的”去东方化才能使得人们发现两块新的印度大陆, 其实它们应该叫美洲才对。半个千年以来, 全球化从文化和拓扑学的意义上讲意味着“向西”或是西方化。这应该完全归因于哥伦布的航海发现。^② 为什么一定是这

① 欧根·罗森斯托克-胡絮:《欧洲革命和国家特征》(Die europäische Revolution und der Charakter der Nationen), 默尔斯, 1987, 第264页。

② 向西行的趋势的提示, 见贾科莫·马拉马奥 (Giacomo Marramao)《西部通道——全球化的哲学》, 都灵, 2003。

样，而不可能是别的样子，新现象学之父赫尔曼·施密茨（Hermann Schmitz）在他的有关空间哲学的著作《哲学的系统》中愉悦地加以指出。关于哥伦布，他这样写道：

在西方，他为人类发现了美洲，因此，空间也成了地点空间。使用如此故意夸张的表达是因为，哥伦布——还有后来将首创精神付诸实践的环游世界旅行家麦哲伦——以他们向西航行的巨大成果迫使人们经受了关于空间想象的振聋发聩的变迁。这在我看来比其他任何一次过渡都更深入地走进我们新时代的思想意识方式。^①

向西方的转向归纳出了欧洲在全球化了的地点空间中行为方式的几何化。即使是最简妥的表示目前还未加以开发的区域，也要从一开始就遵循一种新的方法论的理想模型：对于欧洲人的（这意味着首先是伊比利亚的）方法、兴趣和措施的可达性方面，把地球上所有的点都平均地加以理解，当然，真正的干预则可能要几个世纪以后再开始，甚至完全没有进行。地图上著名的被标记成为“未知领域”（*terrae incognitae*）的白地，在未来成为待了解的点。它们对于有着用安静的研究方式来满足认知癖好的人来说，绝对具有无上的吸引力。对他们来说，16世纪出版的很多有着巨大影响力的地图上就标记了广阔的澳大利亚大陆。那上面

^① 赫尔曼·施密茨：《哲学的系统》（*System der Philosophie*）第三卷，同上，第441页。

写着：“Terra australis nuper inventa nondum cognita”，意为：新近发现，但还没有研究，但是已经标记作为今后可以彻底研究和评估的地带。“还没有”的精神首先是作为地理学家的事情而取得话语。新时代是个“还没有的时代”（nondum - Zeit）——一个有着多种可能性的时代，它使自身从永恒的静止以及神话的旋转时代中解放出来。

哥伦布航海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对于现代化的地点空间运动产生了变革式的影响。西方，在过去的理解中是一个方向，风向，但首先也是太阳落山的地方（对于古埃及人来说也是死亡之地）——完全成为一个由方向空间决定的量——获得了文明史上影响很大的意义，促使地点空间和几何地对地球以及空间的介绍形成突破。随着向着西方的觉醒，开始了各种运动，它们终有一天会以向着各个方向的无关紧要的交通而终止。无论是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还是19世纪，穿越北美大陆：这两次“向西前进！”号召的最伟大实践为后世人们在已知区域内任意两点间规律的往来交通打下了空间探索的基础。人们20世纪时使用最平淡无奇的概念“循环”（从交通的意义上来理解）所描述的事件，却只有通过地点空间思维的胜利才成为可能。因为现代化的交通概念是构建在平等的去程和返程按规律重复的基础之上，所以只有在被泛化了的地点空间中才能得以实现。它将平面内几何上平均的各个点按照路线和行程归纳于其中。铁路交通作为19世纪最重要的交通系统，火车也被命名为“在地点间移动”（Lokomotive），这是不足为奇的。也正是铁路交通的普及应用，才使地点空间的远近变得无足轻重。

19世纪的技术人员们知道，克服空间的障碍的铁路交通与通过电报使空间距离完全蒸发是紧密相连的。因为后者的线路往往是随着铁路的铺设而延伸的。^①

我们称为世界交通的东西，其实前提在于从地理和水文的角度看，发现海洋和陆地是一个完整的整体。真正的交通产生的条件是要有一个行程的体系。而这个行程的体系又必然包含一个给定的区域，它是一个知地（*terra cognita*）或是知海（*mare cognitum*），在其中往来穿越成为一种有规律的模式。当往来穿越成为标志的时候，交通就构成了全球化进程的第二个，也是规律化的阶段。这一进程最早是由欧洲人从以发现新地带的冒险史开始的。

^① 参阅阿曼·马德拉《交通的发明》，巴黎，1994，第68页及其后。

第 6 章

儒勒·凡尔纳和黑格尔

说到全球化的交通意味着什么，它的意义又如何，恐怕没有人比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1874 年的小说《八十天环游地球》当中用更趣味和到位的方法直观地加以呈现。这本书以它那种特有的急速飞驰的浅显，揭示了作为交通项目的现代进程的一个断面。它勾勒出了一个准历史哲学的命题：现代化关系的意义似乎在于世界尺度内的交通的通俗化。只有在一个全球化了的地点空间内，才能组织起新的移动需求，无论是人员的流动还是货物的运输都建立在一种静默的重复运作之上。交通是往来运动的集合。当长距离的

交通也被扩大为一种可信的机制时，环游世界究竟是从哪个方向来进行，已经变得无关紧要了。促使凡尔纳笔下的主人公——英国绅士斐利亚·福克（Phileas Fogg）——和他的法国仆从帕斯帕杜（Passepartout）向着东方开始他们八十天的环球之旅的，不过是非常偶然的外部因素。背后的起因其实是南亚次大陆上的大印度半岛铁路最后一段建成开通，使得柔佐到阿拉哈巴德的行程缩短至三天，伦敦一家日报的记者为此写了一篇极具挑衅意味的报道。这成了促使福克和他在改良社的牌友们打赌八十天环游世界的诱因。从根本上说，福克和他俱乐部的朋友们还是围绕着旅游的实践是否能够将他们的理论预言付诸行动的问题。晨报上那篇有着巨大影响力的文章包含了一个时间表，旅行者可以根据它来预估从伦敦出发，环游世界，并重新回到伦敦的时间——在这里其实不必强调，在那个时代，不列颠首都伦敦乃是当时各个地点的中心，大部分的船只和资本是从那里出发，踏上去往世界各地的行程。这次行程时间的预估是建立在以向东方航行的方法来环绕世界这一基础上的，这不仅仅因为英国人习以为常的对印度的好感，也因为时代的一般原因：自1869年开通了苏伊士运河后，欧洲人敏感地意识到了在世界交通中的巨大加速，并且由于航程的大大缩短，向东航行也变得更有吸引力。福克旅行的进程可以说明，东方也已经完全的西方化了，有着婆罗门教和大象的印度在现代的意义上也不过是以地点空间方式呈现的，现代交通技术可支配的地球表面的任意一段曲面而已。

这里是晨报上的一段时间计算：

资本的内部

伦敦到苏伊士途经塞尼山和布林迪西，坐火车和汽船共7天；

苏伊士到孟买，汽船13天；

孟买到加尔各答，火车3天；

加尔各答到香港（中国），汽船13天；

香港到横滨（日本），汽船6天；

横滨到旧金山，汽船22天；

旧金山到纽约，火车7天；

纽约到伦敦，汽船和火车9天。

共计：80天。

“真的呀！总共只要80天！”安德鲁·斯杜瓦特叫道……

“但是还必须得算上各种意外情况，糟糕的天气、风向，说不定船还会损毁，火车出轨，这些事故还得算上才行……”

“一切都包含在内”，福克答道。

“也包括印度当地的土著破坏铁轨，把火车停，或者把邮车弄翻，抢劫旅客？”斯杜瓦特追问道。

“一切因素都包含在内”，福克再次答道。^①

凡尔纳在此表达的信息就是，在技术饱和了的文明时代，已经不存在冒险，而只有对延误的担忧。因此，作家特别在作品中强调了主人公在旅程中并未增长见闻。主人公福

^① 儒勒·凡尔纳：《八十天环游世界》，埃里希·费微安译，苏黎世，1974，第23~24页。

克独有的冷漠让他不会被任何其他的波动干扰，作为一个环游世界者，他也不再负担有见证每个地区的神奇的任务。因为在环游世界之后，地球，即使是在最远的地方，对于旅行者来说不过是一个个早已经在报纸、游记或是百科全书中被一一记载得很清楚的情境集合。这也就解释为什么在整个旅行过程中没有什么所谓陌生的东西。无论这期间发生什么样的小插曲，比如在印度，有人要用火刑处死寡妇，还是在美国西部印第安人打劫，原则上说，这些都只不过是一些过程和状况，作为伦敦改良社的会员们早就对此耳熟能详了，亲历现场的旅行者也不会知道得更多。旅行者如果带着这样的前提去旅行，就既不是出于娱乐，也不是商业的目标，而是一种纯的偏好运动的原因：ars gratia artis；motio gratia motionis。^①

来自意大利卡拉布里亚的旅行家卡雷里（Giovanni Francesco Gemelli Careri）因为家庭的矛盾而倍感郁闷，于1693年至1697年间环游了世界。他就属于那种没有商业利润方面的兴趣的旅行者。自他以来，这样的旅游者成为一种在游戏计划中构建起来的量。1699年出版的《世界游记》（*Giro del Mondo*）就属于纯兴趣的全球化文学作品中起到奠基意义的文献。格梅里·卡雷里也展现出了发现者的姿态，

① 关于对纯运动偏好的赞扬，参见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8年；以及托马斯·德·昆西（Thomas de Quincey）《运动的荣耀》（*The Glory of Motion*），1849，（德文版《英国邮车》，第一部分，运动的魔力，载德·昆西《一个英国鸦片烟鬼的忏悔和其他作品》，斯图加特，1962，第287页及其后。）

他就相信，自己拥有了时代精神的委托，回家后应该向人们讲述在外面的见闻。他在墨西哥的观察以及对太平洋通道的描写历经几代人都被视作民族地理学方面了不起的成就。尽管后来的旅行家们都偏爱用一种主观化的口吻来描述所见所闻，但是，旅行和写作之间的关系却是一直持续到 19 世纪都不曾改变。1855 年，布鲁克出版的《会话辞典》上，一个旅游者（Tourist）被定义为“一个旅行者（Reisende），他没有明确的（比如科学研究方面的）目的，只是为了旅行或是事后描写这段行程而旅行”。

在儒勒·凡尔纳那里，环游世界的主人公已经不再有记录的职责，而成为一个单纯的旅客。他以运输服务业的客户身份出现，付钱旅行，但旅行本身既不成为一段经历，也无须做任何报告。环游世界对他来说成了一次体育运动，而非一次哲学的课业，甚至不是教育纲领中的一个部分。因此，福克就可以像一个运动员一样，自始至终保持沉默。

关于环游世界八十天当中的技术方面，凡尔纳在 1874 年的视阈之下不是幻想家：考虑到当时（19 世纪）运输业革命的主要交通手段，火车和蒸汽船，主人公福克的旅行是完全符合当时的艺术的发展，将冷漠的英格兰人从 A 处送到 B 处，然后再返回。尽管如此，当主人公福克作为一个泛化了的“盲目的旅客”的原型出现的时候，在他身上还是有了预言家的特性。他与周围的风光之间唯一的关联就在于，他乘坐交通工具从这风景中穿过。斯多葛式的旅游者更喜欢关着窗户旅行，作为一个绅士，他坚持自己不必须把一些东西当成是必须要看的权利；作为一个漠不关心的

人，他拒绝做出任何的发现行为。这种态度预示了20世纪旅游的一个大众现象，组团旅游者们到处上车下车，看到的東西和宣传广告册页上的图画一般无二。福克和他的前辈旅行者们相比是个绝对的相反例子，16、17和18世纪的环游世界者和地理学家们的每次出海都带着发现、占领和丰富的期望。19世纪开始，紧随经验旅行者（Erfahrungsreisende）步伐的是体验旅游者（Erlebnistourist）。他们去到远方，为了丰富提高自己。

关于20世纪的印象派旅行者，文化哲学家赫曼·凯撒林伯爵（Hermann Graf Keyserling）以他的游记使之达到了一定的知名度——他的《哲学家的旅行日记》（*Reisetagebuch*）在一战后的岁月里成为德国每个严肃的读者必备的家庭藏书。作者用了13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他在世界各文化之间穿行一周的旅行，就如同一个黑格尔式的试验的方式——由于拖延了回归到德意志乡村（deutsche Provinz）而恍然大悟。^①与凯撒林相比，福克显得更具有优势，因为他不必装作整个旅行中还学习些什么本质的东西。凡尔纳是更好的黑格尔主义者，因为他理解了在充分布置了的世界中不再可能会出现实质性的英雄人物，最多只有次元的英雄而已。作者只是想到安插了在从纽约到英格兰，横渡大西洋的时候，因为煤炭短缺，而点燃了船上的木质结构的情节，在这一瞬间，作者还是触及了英雄情结，并且给了自我牺牲的

^① 赫曼·凯撒林伯爵（Hermann Graf Keyserling）：《哲学家的旅行日记》（1918），法兰克福，1980。

思想一个符合工业化时代精神的表达。此外，在一个摆放整齐的世界里，只有体育和怪脾气描写了男性劳顿的眼界。相反，当凯撒林意欲像一个迟到了的世界精神的拟人化主体环游世界，以期到达自我时，就有了那么一丝可笑：他的箴言就是，“通往自身的最近的道路就是要绕着地球一周”。然而就像他的书中所说的那样，旅行着的哲学家不是获取经验而是收集印象。

第 7 章

水世界：现代主元素的转变

在关键点，儒勒·凡尔纳小说中的主人公的出行计划完全合适地反映出了全球化最初的冒险经历：计划中，通过水路的行程无可争议地超过了通过陆地的行程。当环球旅行成为一种精英的时尚运动时，则可以说明那个时代人们心中留下的麦哲伦以来的全球观的痕迹。麦哲伦以后，人们原来认为地球主要是由陆地构成的观念被地球大部分是海洋的观点所取代。哥伦布面对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国王宣传他的航海计划时，尚可以信誓旦旦地宣称：地球是很“小”的，并且绝大部分是由陆地构成，而水域只占了表面积的四分之

一。即使是中世纪时的海员，也认为陆地面积大于海洋的面积。这当然是出于一种很好理解的动机：海洋并不是一种令人喜爱的元素。近一段时间以来的所谓海洋浪漫主义，就像山地浪漫主义一样，不过是现代化的城市语境中感伤思潮的新发明而已。在海边生活的人们对于广阔无垠的大海的仇恨是有着很深层次的实际原因的，在《约翰启示录》（*Johannes - Apokalypse*, 21 章，第 1 节）当中有这样的句子：当救世主降临后，就不再有大海了。这句话也在卡梅隆导演的电影《泰坦尼克号》当中，被船上的牧师在船尾竖直，船马上就要沉没的时候恰如其分地引用了出来。

16 世纪早期的欧洲人不得不在极短时间内去理解并思考一个事实：地球因为其表面占绝大多数的海洋，而不应该再被称为“地”球。所谓的地球，不过是被水世界所覆盖，其表面四分之三的面积是水，这是新时代关于地球的最基本的全球地理信息。而对此，人们却并不想搞清楚，这究竟是福还是祸。

同人们先前的陆地的先入之见彻底说再见并不容易。产生于哥伦布之后、现存最早的标记出了北美大陆以及西印度群岛的地球仪是诞生于 1510 年的金属制成的雷诺克斯小地球仪，同很多在它之后的世界地图或是地球仪一样，它将马可·波罗提及的 Zipangu 岛（即日本岛）标记得距离北美大陆西海岸非常近。这也反映了人们当时对于新发现的大陆西岸水域面积的大大低估一直存在，也表明了哥伦布所犯的错误，即从北美洲出发，通过一路向西而能抄近路到达亚洲的希望，在不断被重复着。过了十多年，产生于 1523 年或 1524 年的布里克森那地球仪（*Brixener Globus*）的南海

(*mar del sur*, 即太平洋) 上还用三桅帆船来表达麦哲伦的环球航行; 一直传播到东欧的传单上在 1522 年秋还谈了维多利亚号的回归。然而后麦哲伦时代的第一个地球仪的制造者并没有能把“海洋的革命”体现在地球仪上。这里并不能说明什么可以指责的局限性, 因为在当时, 还没有任何一个欧洲人能够衡量, 船长德·卡诺和麦哲伦船队中的意大利籍航海日志记录员安东尼奥·皮伽费塔 (*Antonio Pigafetta*) 所陈述的事实。他们写道, 在绕过了南美洲西南部的陆地尖角后, 他们从 1520 年 11 月 28 日到 1521 年 3 月 16 日, 在一直良好的风向中“共用了三个月零二十天时间”在一个广袤而又不知名的大洋上一直向着西北方向航行, 他们把它命名为“太平洋” (*mare pacifico*), 因为在整个的航程中没有遇到任何的风暴。^① 在这段简短的描述中蕴藏着海洋水文方面的一次认识上的跃进。自古代地理学以来, 托勒密式的陆地占主导的信仰被彻底地打破了。

麦哲伦之前, 在人们托勒密式的世界观中, 陆地多大程度上主导着整个地球可以从哥伦布航海前几十年, 即 1495 年产生的由意大利威尼斯僧侣法·莫拉 (*Fra Mauro*) 完成的, 堪称中世纪晚期最具艺术性的伟大的世界地图中看出。在他的时代, 这幅地图不仅包罗万象, 而且最为详尽。它自然是表达了中世纪欧洲人心目中的地球的样子, 陆地形成一个免疫的圈子, 而水元素则只占有一个非常边缘化的地

① 安东尼奥·皮伽费塔:《第一次环游世界——麦哲伦 1519-1522 环游世界的目击证人实录》, 由罗伯特·格林出版翻译, 1978, 图宾根/巴塞尔, 第 93 页。

位。水域在这张地图上，除了较靠近中心地带的地中海和其他的河流以外，都处在四周的边缘地带。经验的现实和想象在法·莫拉的地图上以很完美的方式达成了妥协，在很好的、符合当时的艺术历史发展的再现了陆地的情况之下，该地图非常严格地遵循了欧洲人当时的观念，把地球上的海洋想象得尽可能小。

如果没有后代的地球仪将麦哲伦所经历的事实以图像的方式翻译出来的话，欧洲人不可能对于“革命性”的海洋扩张有着合理的认识。基于此，人们的思想开始有了陆地思维（Festland – Denken）向海洋思维（Ozean – Denken）的转变——这是一个同哥伦布—麦哲伦以来，世人的三大世界图像（在地图上以 *orbis tripartitus* 出现）向近代的，囊括了南北美洲的四大陆模式过渡一样有着无法估量的历史地位的转变过程。至于说到第五大陆——神秘的大洋洲（*terra australis*），16世纪时，人们还梦想那是地球上最大、最富饶的一片大陆，然而，大洋洲的发现史就成了一部缩水史和失望史。直到欧洲人把幻想中的大洋洲缩减到它实际的范围为止，欧洲人历经了几个世纪。最后，不列颠人把这片令他们失望的大陆变成了惩罚犯人的殖民地。那些英国盛产的“不可能再改造好的，令人生厌的罪犯”被“储存”在了这里，与本国领土保持着非常理想的距离。^①

① 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 Said）：《文化与帝国主义——权力时代的想象力和政治》，法兰克福，1994，第18页。萨义德讽刺的表述反映了英国流放政策的玩世不恭，首先是把加勒比，接着是新英格兰，最后又把澳大利亚作为功利主义的流放犯人政策的目的地。

概念历史显得对于行家来说更加的陌生，而且具有描写性。地球表面相互联系着的陆地群很快就要独自承载环绕包裹的名字“大陆”（*continens*），而直到尼古拉·哥白尼，这个词都是指所有的一切或是最终世界边界的苍穹。当潮湿的星球还被固执地称作“地球”（*Terra*），如果地球表面的陆地部分还要使用大陆（*Kontinent*）这个愚蠢的名字来自我修饰的话，那么它只能是透露出欧洲人是如何来回应海洋革命的：从环游世界的震惊之余，欧洲人回到了错误的命名上去，它能在无法适应的新当中粉饰出人们熟悉的旧来。被环游过后的星球根本不能用占主导的海洋中冒出的小片陆地来命名，而大陆也根本没有资格保有它的名字，因为大陆恰恰不是环绕包裹的成分，而是被海洋环绕包裹着。但是，不仅是在语义和词汇方面，近代的历史还是一个在认识到了海洋和商品大潮的优势地位的情况下，大地的空间和实体思想在不断延宕和躲避的历史。面对海洋的事实的确给整个近代打上了大地保守主义的烙印。

早期全球化知识中最具进攻性的尖端隐藏在麦哲伦航海中瞥见了海洋范围的扩展，并认可了水才是地球上的真正世界媒体。世界海洋（*Weltmeere*）才是全球事件的载体，并且作为突破界限的资本洪流的自然媒体：这是作为航海时代英雄的哥伦布以来，一直到作为航空媒体时代的先驱林德贝格的整个历史纪元中一切消息的消息——而固守本土的欧洲人延续几个世纪一直与之相抗，并不断表达着他们对于乡村（*Provinz*）的意志。旧的地球应该重新沉入洪积层中的洪流中去，然而这次并不是来自天上的洪流，而是来自从未听说

过的航行日志中。海洋世界最伟大的文学家麦尔维尔 (Melville) 在 19 世纪时, 让他笔下的一个角色发出这样的呼喊: “是啊, 你们这些愚蠢的地球上的孩子们, 诺亚的洪水还未退去。”^① 地球的统一及其分布成了一个海洋元素的事情, 欧洲的航海行动, 无论是民间的、军事的还是海上劫掠的, 被证明直到航空技术的兴起前都是全球化最有效的手段。在海洋上, 欧洲强大的国家声称建立起了在海上漂移的帝国。想要有理解世界的需要, 那么在这个时代必须按照海洋地理的方式去思考。《纪事晨报》上带有挖苦意味的旅行计划已经认可了这一事实, 比如 80 天的环球旅行中, 除了 12 天乘坐火车以外, 一共有 68 天的时间是在海洋上。只有海洋给广博的思想以基础; 海洋独自便可分发近代的博士帽。麦尔维尔也完全有理由还是让小说中那个角色说道: “捕鲸船就是我的耶鲁学院和我的哈佛。”^②

从麦哲伦、德尔·卡诺的认识中首先得出实践结论的人当中就有年轻的君主卡洛斯一世 (Karl V.), 他于 1516 年加冕成为西班牙国王, 于 1519 年 5 月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

① 赫曼·麦尔维尔:《白鲸记》, 理查德·姆曼迪译, 慕尼黑, 1964, 第 364 页。

② 同上, 24 章。通过这种海上漂流的研究, 水上的经验主义在面对大学经院主义中不断增强, 这也属于近代理论文化的主要事件 (直到大学也吸收了经验思考并且用运动的经验主义去反对静止的经验主义)。众多把自己去 (Selber - Hinfahren) 和自己看 (Selber - Anschauen) 上升成为信条的人当中就有费尔南德斯·德·奥维耶多 (Fernandes de Oviedo), 他在《印度群岛通史和自然史》中不遗余力地重复着: “我在这里所说的东西, 人们在萨拉曼卡、波罗尼亚或巴黎是学不到的……”转引自约翰·H. 艾略特 (John H. Elliot) 《旧世界中的新世界——1492 ~ 1650 占领的后果》, 柏林, 1992, 第 44 页。

皇帝。皮伽费塔于1522年在西班牙瓦利阿多里将他的航海日志作为最机密的关于最新世界形势的证据呈递给卡洛斯一世。^①太平洋以及从西线环游世界的超人努力的情况被他很恰当地比喻为一个充满着奇迹同时也是令人震惊的新事件。在几次尝试重复麦哲伦航行未果的情况下，他认为应该放弃重新从西线到达摩鹿加群岛的想法。于是1529年，他通过《萨拉戈萨条约》，以35万杜卡特的价格将西班牙对该岛的所有权转让给了葡萄牙国王。这后来被验证为是一项很划算的交易，当距离测量技术改进后，人们证实了诱人的香料岛按照西班牙和葡萄牙在1494年签订的划分世界的《托尔德西亚斯条约》其实处在属于葡萄牙的势力范围上。

当两大帝国对远方的土地进行跨国交易时，显然无论是卖方还是买方都并不确切地知道交易地标具体在何处。这一交易行为比任何其他事件都清楚地反映了全球化早期的投机本质。当我们今天把在投机资本最早的活动中的世界形式的震惊对应为全球化的时候，就显得有些可笑。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从一开始起就是在地球仪和投机交织的征兆中确立的。^② 同样，洞察到商人的资本总是体现出从某一国家的联

① 皮伽费塔：《第一次环球旅行》，同上，第265页。

② 参阅《哥伦布文集——16世纪资本主义农业和欧洲世界经济形成》（*Das moderne Weltssystem. Kapitalistische Landwirtschaft und die Entstehung der europäischen Weltwirtschaft im 16. Jahrhundert*），法兰克福，1986；同一作者，《现代世界体系Ⅱ——1600~1750年间的欧洲》（*Das moderne Weltssystem II. Europa zwischen 1600 und 1750*），维也纳，1998；世界体系这个概念在沃勒斯坦看来，绝不意味着将所有的国家和文化纳入新的关系中去；他指出，当前构建起来的经济的交易空间已经超越了市场、国家和帝国的范围。

系中解放出来的倾向和现代化的经济方式具有相同的历史。1776年，亚当·斯密就写下了这样的句子，就好像在表述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一个商人……并不必然是某一个国家的公民。对他来说，最不重要的莫过于在哪里经商。即使是很小的契机也有可能促使他将资本和他经营的产业转移到另外一个国家去。”^① 卡洛斯一世的远洋海上帝国是通过贷款建立起来的，其中有佛兰德斯，还有奥格斯堡，后来还有热那亚的银行贷款。贷款的银行家们转动地球仪，便可形成图像概念，知道贷款向何处去，利息又从何处回归。

从一开始海洋上的冒险就将它的行动者们牵扯进了争夺不透明的远方市场潜在机遇的竞争当中。对于他们来说，西塞尔·罗德斯那句臭名昭著的话是很有道理的：“扩张就是一切。”^② 马克思一系的经济学家称之为原始积累的东西——就像举的例子那样——通常更多的是财产名义、选项和使用请示的积累，而非在投入资本的基础上对生产的经营。发现，并在形式上占有远方的领土为无论是领主还是资产阶级当事人委托的远洋航海奠定了期待未来收益的基础，它可以是以猎物或以贡物的形式，也可以是通过从未被禁止的，梦想着有巨大利润空间的正常贸易手段。

① 亚当·斯密：《国富论——本性和原因的研究》，霍斯特·克劳斯·莱克腾瓦德编，慕尼黑，1990，第343页。

② 奥斯瓦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将这句话阐释成为文明阶段的公理，这是先于古代文明的消亡而发生的。参阅《西方的毁灭——世界史形态学概要》（*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 Umriss einer Morphologie der Weltgeschichte*），慕尼黑，1923、1979，第51页：“扩张是个灾难，是恶魔般的可怕的事情，它抓住……并且消费……世界发展阶段中迟来的人们。”

通过早期商人航海和地图学家导致的地球全球化显而易见地远离理论方面的兴趣；它从由葡萄牙人开始进行起就果决地遵循着一个反沉思的认识模式。追求控制新发现的世界，就必须放弃理想化和演绎法。海的试验（*experimentum maris*）给新的世界体验概念提供了标准。在大海上，首先就很清楚，近代是如何想象理论和实践的相互作用。弗朗西斯·培根之前一百年，无论是委托人还是环球的行动者就已经知道，关于地球表面的知识就是力量，而且是最称手的也是最能带来效益的力量。越来越精确的地图直接赢得了人们理解和把握的质量；新的关于海洋地理的认识为争夺开放的海上空间提供了有力的武器。因此，地理和水文方面的新信息长期以来作为国家机密和商业机密被严格地保守在小圈子内；葡萄牙国王对于胆敢将自己的发现和海岸线的描述标记在地图上并复印多份的行为处以死刑，这也是为什么当时著名的航海家导航指南书以及当时航海线路的标记均没有能保存下来的一个重要原因。^①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用阿拉伯数字计算与用欧洲地图计算的正好相反。12世纪，印度人使用的数字零由阿拉伯人传到欧洲后，使算术有了快速的发展，地球仪成为欧洲人的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球形的地理政治和世界贸易的道具。

就像哲学家怀海特（Alfred N. Whitehead）一句著名的

^① 直到18世纪晚期，发现探险的航海日志还都一直是海上强国的机密文件；参阅乔治·福斯特对库克船长第二次探险的观察《塔希提的发现之旅1772-1775》，赫曼·霍曼（新版），图宾根/巴塞尔，1979，第395页。

话说的那样，没有人从家中出来，想买零条鱼，于是也没有人从葡萄牙到卡利卡特（Calicut）或是马六甲（Malakka）去，为了带回零个丁香到仓库中。欧洲人盯上了太平洋上的一些盛产香料的小岛，于是它们不再是模糊的世界地图上的小点，而是可以获取利润的象征。地球仪在会使用它们的人手里，就成了可导航的地球的真实再现。它还呈现出了货币的来源，它们从未来向我们的当下扑面而来。人们甚至可以把地球仪看成一个神秘的时钟，远方的岛屿和陌生的大陆的符号显示着利润的时间，近代的地球仪作为一个机会的时钟能给远洋航行的人和敢于接受风险挑战的人带来好运，他们今天就已经能在那边的世界的海岸边看到明天的财富了。近代具有当下精神的行动者们，占领者、香料商人、淘金者以及后来的真正的政客会从这个在从未存在过的时钟（Noch - nie - Gewesen）显示的时间上读到对他们的事业和国家有用的东西。

显而易见，为什么同一批世界地理专家们为封建领主和资产阶级大企业家们服务。在新世界面前，国王和贩夫走卒没有区别。幸运女神决定谁才是幸运儿，根本不会管他是否出身贵族。卡洛斯一世就在自己的大臣马克西米利安·特朗斯西尔瓦努（Maximilian Transsylvanus）的建议下与当时顶尖的、为商界和学界精英们工作的世界地理学家墨卡托（Gerhard Mercator）和阿皮安（Philipp Apian）保持着友好的交往。雷蒙·福格（Raymund Fugger）——当然他不仅是贩夫走卒——于1535年委托福腾巴赫（Furtenbach）制作一个私人的地球仪，它后来在基希巴赫（Kirchbach）的福

格家族庄园中展出。与比它早不了多少的克里斯托福·席普（Christoff Schiepp）制作的韦泽地球仪（Welser - Globus）一样，福格地球仪也是个制作精良的孤品。未来的趋势当然是印刷出来，拥有大量副本的地球仪。它们给全球化进程带来了最初的大众传播的基础。然而无论是孤品还是系列产品，每个地球仪都向它的观察者诉说着在突破边界的地球空间中获取利润的欲望和必要性。

航海英雄麦哲伦，当他永远地离开了葡萄牙，1518年3月22日和西班牙国王的代表一同将充满希望的目光投到地球仪上的时候，认定香料岛屿就在地球的那一端的某个地方。于是当即签订了合同，乘船出海发现这些岛屿。在合同当中，即使是从上述来源而来的虚拟财富也详细地加以了规定。这里以罕见的明确性表达了“发现”这个概念——近代认识论和政治学的关键字——并非一个自主的理论的量，而是投资现象描述的一个特殊情况。投资行为则又是一个风险贸易的情况。在风险贸易的模式扩散的地方——借贷、投资、企划、发明、赌博、保险、风险控制、储蓄——就会产生出一种新的人类，他们不满足于把命运交到上帝的手上，而是希望通过规划在机会的游戏中创造自己的幸福和未来。这种新的类型的人在财产和资本经济中获得了经验，损失使人聪明，而负债则会令人加倍智慧。新的历史时期，核心的人物是那些“负债生产者”——其实我们对他们还有个更好听的名字“企业家”——他们灵活地变化着经营过程和观点，使用通过一切允许的和不允许的手段，运用一切有先例或是毫无先例可循的方式获取利润，以便他们能够及时地

资本的内部

清偿债务。负债生产者给欠债思想注入了近代改变了的意义：从一个伦理的缺憾中产生出一个有利于刺激经济发展的关系。如果不积极看待负债的意义，就不会有资本主义。负债生产者是那些在“资产阶级时代”开始不停地转动货币滚动的车轮的人。^①

近代的主要事件不是地球围绕着太阳转，而是货币围绕着地球在转。

^① 将企业家定义为“负债生产者”要感谢古那·海因森（Gunnar Heinsohn）和奥托·施塔格（Otto Steiger），他们提出了令人信服的关于近代的经济作为财产经济具有巨大革新活力的解释模型。《财产、利息和资本——经济理论的未解之谜》，汉堡，1996。

第 8 章

幸福女神或是：机会的形而上学

在经济和心理政治的对决（Konstellation）中，罗马神话中的幸运女神再次登台，进入了欧洲人的兴趣范围之内，因为古代神话中没有任何一位其他的神的形象能和当代商人的以及海员的企业信仰如此紧密地契合起来。幸福女神的回归符合在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的机会主义，蒙田（Montaigne）的随笔以及培根（Bacon）的实验主义中体现的机会本体论的世界感觉。即使是晚期莎士比亚的新宿命论也属于这个时期典型的自我陈述。在他们前途黯淡的时刻，将人理解成天生好斗的、充满着嫉妒心的却又注定会失败的

风险承受者。在这里，世界大舞台上的所有表演者都像球一样，而幻想的强权、邪恶的天才、金钱的魔鬼以及欲望的恶魔在同他们进行着游戏。

幸运女神到处以一个典型的全球化女神的形象出现：不仅仅因为她永远像一个讽刺的杂技艺人那样站在球上保持平衡，同时她还教导我们，生命，就其全部来说，不过是一场赌博游戏，胜者没有什么值得自豪，而失败者也无须怨念。早在6世纪时，博依图斯（Boethius）就在他的关于《幸福和不幸的治疗药物》^①一书中为中世纪的幸运思辨奠定了基础，同时成为文艺复兴时期关于幸福哲学灵感的源泉。假借幸福女神之口，他提出了在幸福车轮之上的存在的前提：

这是我的力量，永不停止地进行着这个游戏：命运的车轮，我不断的轮转。让最上面的到最下面去，让最下面的到最上面来是我的乐趣。如果你愿意，就一起来参加这个游戏，但有一个条件：若是你按我的规则跌落到了最下面，不得把它看做是针对你的不公。^②

这段话在寻求稳定的中世纪人看来更像是一段警告。因此，在他们眼里，幸运女神，不如说是脾气女神是个命运轮转的恶魔形象，而在新时代，人们在轮转的命运车轮中看到了符合他们行动动因的机会形而上学。在命运车轮的四个最

① *De remediis utriusque fortunae.*

② 转引自阿尔弗雷德·多伦《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的幸运女神》，载《瓦尔堡图书馆演讲》，第2卷，第1部分，1922/1923，第82页，拉丁语，第79页。

基本状态——上升、顶峰、下降、谷底——当中，新时代的人们不仅看到了积极行为的最基本的风险，同时也认识到了商业运气的典型阶段。

幸运女神也不再单单是以其在命运轮上的形象出现，而是带有了明显的海事的标志，比如鼓起的风帆和舵，后者同球一样，是幸运女神形象中最原始的道具之一。这当然也说明了，幸运不仅仅是随机分摊到某个人身上的东西，同时也和个人的能力紧密相连。早在古代，人们就把幸运和出海联系在了一起，新时代，人们所做的不过是把这种联系再一次加强而已。也许新时代把色子加到了海事的标记之上，色子落下，便生成了 *cadentia*——这个风险贸易的概念——同时也是现代世界的一个核心概念：机会。在人们总是用概率来计算成功与失败的地方，这就是下落的色子来决定命运。人们甚至可以从再次焕发生机的文艺复兴时代的幸运女神思想中，在为数众多的意义和语境中^①，发现原型自由主义上升的成功哲学。而命运车轮的滚动在他们看来地位却又如同上帝对市场的判决。对于成功来说，排除一切主观上的控制和方法的因素，就只有偶然事件起决定性作用。在哲学视角下，自由主义和随机的解放又有什么区别呢？那么新的经济活动，难道不是一种试图对幸运加以修改的实践活动吗？

16世纪时，人们就已经深刻地认识到，除了远古蒙昧时代已经出身烜赫的世袭世家贵族和在中世纪及近代过渡时

^① 克劳斯·莱切特（Klaus Reichert）充满着真知灼见的著作《幸运女神还是交替的永恒性？》，法兰克福，1985，使我们注意到了其中的一些。

代在国家公共管理中担任职务而形成的贵族阶层外，时代又催生出了乱世贵族——也就是所谓的幸运贵族——他们是新时代从幸运女神的怀抱中蹦跳出来的宠儿。从这些偶然的机机会贵族当中产生了全球化时代的新精英阶层——一个一夜之间暴富、成名以及受益的群体，却并不清楚，是什么样的力量将他们托了上去。不可信的沃坦神之子们（Wotanskinder），从弗图那图斯（Fortunatus）到大骗子菲利克斯·克鲁尔（Felix Krull）是除了企业家和艺术家以外充满机遇的近代的产物。近代不仅是个穷人设法通过努力来改变命运的时代，同时也是那些天生喜欢碰运气的人的时代。他们会投靠贵妇人或女贵族，整日游手好闲，全身心地投入到诸如鸟类飞行或是星空的研究中去。而那些没有经过努力便成功的人们，除了心安理得地品尝着“机遇的份饭”^①，还能干什么呢？

尼采给出了随机分派的公式：“冯·温格菲尔（Von Ohngefähr，Von ungefähr 的古老写法，在德语中意为随机的，尼采用这个文字游戏将这个短语变成一个名字——译者注），他是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贵族。”将自己看成这个贵族的族裔，并将色子的标记引入徽章上：从这个母体中孕育

^① 相反，18世纪晚期，人们又发现了存在着一种所谓纯粹意义上的倒霉的人，或者如同马尔图斯（Malthus）所说的穷人，他们“被出生到了一个本来就已经很拥挤的世界上”，而他们的父母却又无力供养他们。这些不幸的孩子们，按马尔图斯的说法，“在这个世界上真正是多余的。在大自然的餐桌上没有为他们摆好的餐具”。转引自阿尔曼·马德拉（Armand Mattelart）《交通的发明》（*l'invention de la communication*），第79页。

出了尼采在其悲剧著作审美神义论中所说的新的生命的辩护方式。解放了的幸福在新时代昂首望向天空，这是一片旧时的悲苦所不曾知晓的天空。“偶然的天空处在一切事物之上。”^①——后形而上学启蒙的精英公众应该把它当做改善了的福音。人们谈及的是一片笼罩着解放了的内在性的天空，远离彼世的复仇。新时代的天空是随机掷色子的游戏场。若是尼采忘记了在罗马帝国时代幸运女神也是依靠富人偶然的捐赠或兴之所至的布施生活的奴隶和失业平民的女神呢？

^① 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Ⅲ·日出前》。

第9章

风险贸易

在全球的游戏场上承担着在不确定的地平线上计算出的风险：新时代的攻击和渗透文化的实用主义基础就以这一基本概念彰显出来。欧洲扩张主义的实践活动的侵略性的根源并不在于地区的心理动力倾向，它不是一种特质的虐待狂，将其特有的形式向全球的世界空间内推进。这更多的是欧洲的实践方式和心性向一般化了的的风险贸易的一种转型，而第一代发现者们身上令人惊讶的、有着几乎奇效的进攻力量正是源于此。新的全球主体甘于冒风险的精神如同“最后理性”一样受到获得利润，从而清偿债务的压力的鼓舞。

1500年前后的欧洲人并不比此前任何时代的人们更加贪婪、暴虐，又或是更加勤劳能干，他们只是更加有风险精神——这意味着，从债权人这方来看，更愿意借款，而对于债务人来说，更加依附于借贷。这应该是从古代乃至中世纪时期掠夺自然资源的方式向投资式经营方式的一种经济发展范式的转变。通过这种经营性的行为，按期给付利息的约束转换成了实践的勇气和科技上的发明。企业是金钱的诗学。^① 就像困境能带来革新一样，债务也能激发起赢利行为。

就是因为外部世界同时也代表着未来，因为人们理解的未来才是收获、财富和升华的发源地，于是海员们和外部中心主义的商人们启动了向外投资的洪流。在此后五个世纪的发展中，形成了资本主义信息化的地球。全球化自哥伦布时代开始指的就是国家、企业和个人心理行为普遍的未来化。它将地球降格到利润形式之下，而利润则又意味着是“大胆的”金钱，当它越过大洋绕了一大圈后，就会大量增长并回到原来的账户上去。从这个方面来看，大地的全球化可以看做是狭义的近代商事行为的压印机。因为这种行为早期无法非常明确的同冒险行为，神秘主义化的谋划——丹尼尔·笛福，本人是一个倒霉的投机商人，从事过葡萄酒、烟草和纺织品的贸易，却很认真地研究过这个问题^②——，行走江湖的招摇撞骗以及偶然的或是有组织的犯罪行为清晰地划

① 参阅耀亨·霍里施（Jochen Hörisch）《头还是数字 金钱的诗学》，法兰克福，1996。

② 丹尼尔·笛福：《计划论》（*Essay on Projects*），1697，德语版标题“Über Projektmacherei”，威斯巴登，1975。

分界限（参阅本书第 12 章，第 109 页），所以直到今天，全球化的扩张行为还带有着很强的多义性。

近代的实用主义心脏是在甘冒风险的新科学下跳动的。地球就是能够一眼望见广义的投资行为所在地域的显示器，或者说，它同时也是冒险的投资商们下注的赌桌。随着它的出现，它快速的实现以及定期的更新，开始了一个“全球化游戏者”的时代。在这里，虽然很多船只沉没了，但是太阳却是永不落山的。他们都是游戏者，将地球仪拿在手中，试图在远见、远程投机和远方的利润方面超过自己的竞争对手。在皇帝的箴言“再继续”（Plus oultre）的引导下，卡尔四世的舰船在大洋上穿行，它促使人们的思维不再仅仅简单的望向更远的地方或到更远的地方去，而是从根本上奉行一直继续下去的原则。熊彼特（Schumpeter）认为“再继续”是近代的商事主义的关键词是再正确不过的一种认识。

“远见”（Television，原文中使用该词还巧合了电视这个词——译者注）的原则不仅仅才产生于能够移动的图像的电视时代，究其本质，它早在企业经营的预见和远见为全球这一不断促进更新的媒体服务的时候就产生了。不断刷新的地球仪以及地图的认识比 20 世纪才出现的移动图像的电视早了不知道多久。出售摩鹿加群岛的卡洛斯一世和购买者约翰三世都是这种远见的风险文化的典型代表人物。从他们于 1529 年（参阅本书第 7 章，第 65 页）达成的交易可以看出，从那个时候起，国家的统治者不再是上帝的第一任仆从并代表他来统治属地，而是一个依赖资本的国家的第一个企业家。在这些国王的带动下，欧洲各国的人们纷纷形成了新的

第9章 风险贸易

投资群体，到最晚 18 世纪前后开始，成为以民族国家为名义的商事载体。^① 当经济化的民族国家在美国大革命后纷纷经历了民主化的进程后，人们便认识到，国王在这样的政治投资群体的监事会中成了一个不具备生产能力的因素。后来的历史发展也奠定了国王的长期结构性失业。

① 关于企业家式领主的类型，参见维尔纳·宋巴特（Werner Sombart）《资产者——现代经济人的精神史》（*Der Bourgeois. Zur Geistesgeschichte des modernen Wirtschaftsmenschen*），慕尼黑，1923，1987年新印刷版，柏林，第102页及其后。

第 10 章

狂迷与时间：资本主义和心灵感应

发现的历史无数次地被书写成了航海的冒险史、占领者的成功史和犯罪史、帝国强权的嫉妒史以及新使徒主义的教会史（在他们那里则又是使命勋章与教派冲突的嫉妒史）。“欧洲的扩张”服务于作为对象的赞扬与摒弃的一切形式，它在旧的世界里成为自我怀疑收获剩下的收成的场所。^①

哲学上充分思考的发现史，无论是大地的，还是海域

① 关于这种根本基调的态度转变，人们可以从对比 1892 年庆祝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四百周年时的胜利喜悦和 1992 年五百周年时惩戒的气氛清楚地看出来。

的，在我们看来都从未认真加以考虑，更不要说尝试着去实施它。也许首先就是因为，对全球化进程以哲学方式加以总结的必不可少的核心概念在哲学词汇中还只居于非常次要的地位，有些甚至还完全缺席：差距、扩张、外部、华盖、野蛮人、成像、密度、单一性、失控、可派出性、理解、控制、投资、资本、绘图、媒体、使命、教会、风险、反馈、债务、陌生、罪行、交通、联网、狂迷系统、世界系统、愿望思维、玩世主义。即使是最核心的表达，诸如“发现”一词，在尤阿金姆·里特（Joachim Ritter）和卡尔弗里德·格林德（Karlfried Gründer）编写的《哲学历史词典》（*Historischen Wörterbuch der Philosophie*）——一本专业术语研究方面有着极高跨文化水准的辞书，当中却只字未提。^①关于这种哲学学术研究上词汇的缺失以及这种现象的讨论，将在后文中再详细做出。现在我们却首先要勾勒出一个全球化的发现哲学的理论草案，以及研究这种取决于发现的、全球化了的人类学社群，别名人类的理论究竟需要探讨哪些问题。当然，这里用意并不在于挖苦讽刺，然而我们确实要从发现者狂迷的呓语开始着手。

显而易见，地理发现的实践活动是一个充满冒险的突

① 如果我们考虑到另外还有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媒体”在哲学历史词典中也缺席的时候，也许就能明白凸显它们的意义所在。参阅耀亨·霍里施（Jochen Hörisch）《媒体：哲学中的盲点》（*Der blinde Fleck der Philosophie*），载《德国哲学杂志》2003年第5期，第889页及其后。很明显，一种哲学若不能理解自身对于发现和媒体的依赖，那么它都不能被称为传统意义上的哲学。

破，它密切联系着异乡的陌生的外部空间。如果再进一步观察，会发现，促使做出这样行动的原动力是多么的非同寻常。如果没有一种激发他们的狂迷体系，并证明这种向不明确和未知空间的跳跃乃是明智之举，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航海行为就无从谈起。一种成体系的狂迷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能够告诉别人，这些都是有理有据的可行项目；一个没有传染力的狂迷，就不能算是一种狂迷。^① 哥伦布本人到了晚年，甚至都不满于再认为自己仅是名航海家、一块新大陆的发现者以及率先把它用地图勾勒出来的人。渐渐地，他确信自己是受上天启发而派来的使徒，并给海上带来和平与安宁。受他自身无与伦比的伟大功绩的鼓舞，他把自己的名字，克里斯托符鲁斯（Christophorus）阐释成上帝之子及他的宗教，又把他的父名西班牙化了的写法科龙（Colón）说成是占领者及他们的生存之道。这是在成功心理左右下的一种很典型的语言美化现象，也是近代的企业家世界以及他们所信奉的自然生发的信仰中的典型现象。他在1502年出版的《预见之书》中暗示自己是海上的弥赛亚，而他的到来则是自古以来就已经有着预示的。^② 没有成功的狂迷，就不会有所行动；没有行动，就没有机会把自己的“发烧”传

① 参阅本特·符吕夫贝格（Bent Flyvberg）、尼尔斯·布鲁策里乌斯（Nils Bruzelius）、维尔纳·罗腾加特（Werner Rothengatter）《大项目和风险：解剖野心》（*Megaprojects and Risk: An Anatomy of Ambition*），剑桥，2003。

② 参阅《传教书志》（*Bibliotheca Missionum*），第1卷，1916。哥伦布关于自己：“主将我变成了新的天和新的地上的使徒 [……] 这 [……] 终于实现了以赛亚（Jesais）曾经所预言的东西。”

染给别人。哥伦布是个狂迷的实干家，甘愿狂迷兴起于全欧洲，而后又在 20 世纪被美国人在心理技术上加工得臻于完美（然后又通过新兴的咨询行业，重新引进到欧洲来）。在“通过把幸福带给别人的方式来寻求自己的幸福”口号的指引下，甘愿狂迷的心理在世界各个地方都具有可操作性。

这种无私与自我服务的完美结合准确地表达了近代人们心理上的“自我兴奋”或者叫“自然生发的狂热”。它在特定时期被德国哲学家们神秘化为“自决权”，并无限度地加以泛化。如果说自我兴奋必须以较小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话，那么它将以自我咨询和自我说服两种面目出现——两个语用学的表达形式，是为了强调主体性罢了。近代，由于绝大多数的行动者在其自我动机上都并非完美，所以他们依赖于出谋划策者，从旁协助他们相信，并且去尝试他们的使命和幸福。对于成功的倡导者以及占星学家来说，随着远洋交通和资本的流转，他们的黄金时代也到来了，并且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历史迈向 21 世纪的门槛。于是乎，人人盼望着去远方做生意发大财的近代也成了占卜师和谋士们的乐土。担心资本有可能在流通中贬值变得超越经验。同时也令人惊讶的是，当人们相信资本和货物的流动的真实性意义时却不相信细微禀性的流入与流出。激浪派的思想（远程感应的、天体物理的、磁力的以及货币金融的）打破了实体烦琐哲学的霸权统治地位，尽管到欧美的日常生活完全改弦更张还要持续 400 年之久。

安顿·福格（Anton Fugger）作为西班牙皇家南美殖民

地的大金融家，当时已经成为世界隐形的主宰。晚年，他深深迷恋一位名叫安娜·梅格勒（Anna Mergeler）的迷人的女药剂师，而她则因为与一位牧师有染而声名狼藉。1564年，奥格斯堡市议会的大法官因巫术而将她诉诸法律，但最终还是被无罪释放，因为福格的威名直到他死后多年仍然像一道护身符一样。福格本人在灵学上就很有野心，自认为在安娜的帮助之下，获得了可以通过水晶球看到遥远的地方的事物的能力。令他很不高兴的是，他在水晶球中看到了他的下属穿着比他更光鲜的衣服。这一发现，对于在那个衣着还意味着身份和地位的年代来说，当然意味着制裁与惩罚。^①

在被红军旅的恐怖分子刺杀前的岁月里，德意志银行的董事会主席，阿尔弗雷德·海尔豪森（Alfred Herrhausen），在有着日耳曼语言文学专业背景的女咨询师葛尔特鲁特·赫勒（Gertrud Höhler）的影响下，在整个公司内部引入了所谓的增加团队活力的自我体验练习，以期达到使员工获得更高的工作效率的目的。可以说他的这位令人瞩目的咨询师比其他任何人都早地认识到了这个时代的流行元素，要培训出更加具有灵活性的，高情商以及高智商，有团队合作能力的

① 参阅吕达尔·罗佩（Lydal Roper）《受威胁的男性：新时代早期的资本主义和巫术》（*Bedrohte Männlichkeit. Kapitalismus und Magie in der früheren Neuzeit*），载《俄迪浦斯和魔鬼，新时代早期的身体与心理》（*Ödipus und der Teufel, Körper und Psyche in der frühen Neuzeit*），法兰克福，1995，第127~133页。在同一篇文章中，作者还谈及了现代远程通信技术的传输问题：按安娜·梅格勒的说法，在福格的水晶球中锁着一些被诅咒而只能在风中漫无边际的游荡的罪犯的灵魂。这样的信息传输会不会虽然很快，但却并不十分可信呢？

还要能够自我激励的（当然人们甚至可以说，更加有着宗教改革意义的）员工。^①

上述两个事实向我们呈现出了一个新时代的连续统一体：在无效的实践活动的基础上，去寻找有效的能够带来福祉的途径。这也从很大程度上刻画出了当前咨询行业的现实，他们往往回归传统的精神世界寻找元素，再将它们改造后并应用到现代的企业当中——可以类比如下：就是让禅宗佛教去适应一批显然不做任何冥想修行的当事人。

人们称之为欧洲扩张的东西，其实——这一点人们无论怎样都不可能足够强调——并非本来植根于基督教的使命思想；更多的则是通过扩张和体系化的殖民主义以及远程的商事风险贸易将传播、传输和传递表达为一种自我权利下的行为类型的释放。它包括一般意义上的幸福的传递、高级文化的输出、提供咨询以及所有的成功和利好传播的全部过程。从这个意义上人们甚至可以说，近代总的来说构建起百年一遇的传教科学的对象。基督教的传教士，当他们跳上出海的轮船时，就已经很早地认清了他们的历史机遇。^②

近代，属于传播幸福的人有占领者、发现者、研究者、

① 关于她当前的咨询理论，可以参见赫勒《胜利者的心跳：情商革命》（*Herzschlag der Sieger. Die EQ - Revolution*），杜塞尔多夫，慕尼黑，1997。人们应该注意到“心跳”这个词迷人的多义性。另外反思失败者的心跳，以一种负面警告方式的逆向咨询来自理查德·塞耐特（Richard Sennett）《灵活的人——新资本主义的文化》（*Der flexible Mensch. Die Kultur des neuen Kapitalismus*），柏林，1998。

② 参阅菲利克斯·阿尔弗雷德·普拉特纳（Felix Alfred Plattner）《奔向海路的耶稣会士：通往亚洲之路——发现史论稿》（*Jesuiten zur See. Der Weg nach Asien.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r Entdeckung*），苏黎世，1946。

资本的内部

布道者、经营者、政治家、艺术家、教师、设计师还有记者——但他们都会从自己的咨询师和后盾者那里得到支援。上述这些人无一例外的都要通过狂躁的任务书，其实人们也可以把它们称为千载难逢的使命，来粉饰他们的实践。他们花钱雇用专业的人员来为他们打气，以弥补心中抑郁的空缺，排遣怀疑的情绪。他们总能指出一条明路，告诉他们如何才能成为一个现代化的主体，也即是一种受理性激发的行动者。

第 11 章

主体性的发明——初步摆脱束缚 及其入门指导

作为主体（Subjekt - Sein）意味着占据一个位置，行动者以此出发，可以实现从理论到实践的过渡。而这样的过渡往往在一个行动者寻找到了某种动机，促使其不再犹豫，而采取行动。自古以来，采取行动最强有力的动因就是强制性命令——这应该是有着内在的和情感的，或者是外在的和社会的自然属性。然而现代性文化中有所作为的因素与他治是格格不入的，因此，就会寻找并找到一种方法，让发号施令者似乎进入了听从命令者的身体内部，这样一来，听从命令

者的服从和让步看起来就好像是听从了某种内心的声音一样。通过这样的方法就要求、创造并完成了“主体性”的事实情况。这句话的意思是：个体参与了某个能够对自己发号施令的机关（Instanz）的构建。其组织构建本身在向行动过渡的瞬间对行动者并非是以无以遏抑的激情或是无法回避的强制使之屈服顺从，而是令其自我意识到的好的理由和意义重大的兴趣，因而它在原则上是不为人们所察觉的。

正确理解的主体性同时始终蕴涵着行动的能力，而且绝对不是以一种非理性的勃然大怒或是不可抑制的情绪发泄意义上讲的行动——法国心理分析学用专业术语“行为通道”（*passage à l'acte*）来描述这一现象。主体也不是每一个，如同拉康主义者或者是密码学天主教徒认为的处在任意一个“宏大的他者”的象征性的秩序之下的东西，而是那些参与到形成企业家能量的心理形成的现代性试验中的个体。只要谈及作为主体时作为“来自自我动作的行动”或是自主的思考，那么这一任务就必须始终被考虑到。一个企业家永远是处在“从自我出发”的行动的过渡阶段，同时，到达行动的桥梁，无论是自己建立或者假手他人，都必须是基于利益建立起来，而且完全有可能是基于一种理性利益。能够正确地指明他自己的利益的人，用现代哲学的话语规则来说，总是会倾听“理性的声音”（*Stimme der Vernunft*）。将理性完全宣称为自己的，才足够洗净行动当中他治的嫌疑。理性的声音是否真的能完全成为倾听者私人的财产，对于进阶了的启蒙运动来说显得越发可疑，因为理性的要求往往总是和主体的另外一个内心深处的声音意见相左，那就是情感。面

对这个两难情况，浪漫派做出了“比单纯的理性更理性”的表述，从而做出了情感优先的选择。

打开近代主体性内核中的倾听自我意味着展现出，用自我或是他人来咨询、说服以及发出行动的符号的方式，将“主体”武装为具有行动能力的个体。主体化过程便和授权以及相应的训练密不可分。我们拒绝批判理论（Kritische Theorie）所宣传的对于现代主体性作为自我控制的代理——从心理分析学上说叫做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的误解。成为主体（Subjektwerdung）的真正意义只能在提高军备以及摆脱自我行动束缚才可以理解——某种程度上即是：通过它的歇斯底里化。一个现代的行动者一旦没有专门的自我咨询（Autokonsultation）以及自我说服（Autopersuasion）的训练支持的话，是不可能真正成型的。对他来说，依靠上述的成绩一般来说不在于理论的认识，而在于有利于实践活动的认识的运用。通过自我咨询和自我说服应当最终可以导致自我摆脱束缚。

从理论到实践的过渡因此也构成了主体性的本质。然而行动者在此会去向何处，却是完全无法预测的。一个人出于内在的，在观察者看来或多或少不透明的动机而有可能采取某种行动，就呈现出主体的最强的特征：不可预估性。^① 伦理哲学将这种事实情况命名为自由或者叫做行动的不确定性。谁基于主体的自由而一定要他的授权，就必须看清他是如何在有效控制的世界里使被激活的权力点屈服。因此，正

^① 它甚至于还比经常提及的自信力动机具有优先地位。

是对于权力控制的理性要在内部作用。理性又是如何，如果一直不清楚的话，在何种程度上在内部对释放的权力点或者说主体掌舵呢？与主体发生了关系，就能很容易明白，并从根本上判断它是值得怀疑的。还有：如果谁涉嫌秘密地谋划着什么，作为主体便非常值得注意。因为主体性本身也隐含着不确定的攻击性，所以人们只有以自由漂浮的怀疑的态度来面对它。^① 关于这个叫做主体的生成物根本的可疑性来自嫌疑人做出潜在的和当前的行为“是出于自身”^② 还是着了魔又或者是屈从于某个未知名的强权而成为傀儡。主体是个不平凡的，由野心和自省或是能量和奸诈构成的综合体。

近代最早一批主体究其精确的定义应该是耶稣会士，下面我们就将详述。他们在16世纪时异军突起，作为一支反宗教改革的力量，提出了毫无歧义的号召：面对新教的优势，要让落后的天主教派赶上差距。耶稣会士们的主体性心理技术和媒体武装的显性尝试则表现在一系列建立在“更好的理解新教徒们自己都还没有搞清楚的成就”的要求下的努力。在这场赶超的演习当中，显现出了无与伦比的宗教派别的摆脱束缚的价值：只有以实际行动去宣扬其信仰的皈依，才能无可辩驳的具有巨大的说服力。基于这一观察，宗

① 参阅博里斯·格罗依斯（Boris Groys）《涉嫌：媒体现象学》（*Unter Verdacht. Eine Phänomenologie der Medien*），慕尼黑，2001。用海因茨·冯·佛尔斯特在方法论上良性的术语来讲，人们可以使用“准备着”（*Bereitschaft*）这个词，即随时准备允许他人（也包括自己）给自己来个惊喜。

② 对于欧洲及法国关于主体的争辩的语言分析的总结，参阅德贡布（Vincent Descombes）《主体的补足成分》（*Le Complément de sujet : Enquête sur le fait d'agir de soi-même*），巴黎，2004。

教战争的时代开始出现一个心理语义上的军备竞赛，在其演进过程中，宗教派别不仅仅是动因，甚至被作为武器拿在手中。因为新教徒是作为低级的原教旨主义者出现的，所以耶稣会士的立场就以生成性的原教旨主义的升级版为蓝本。整个耶稣会士的全部表演归根结底都基于他们的基本立场——他们赋予行动者一个真正的信仰必须化身成为行动的角色。相应的，恭顺也必须成为主布置的作业。修教会的秘密在于，它懂得按照新教的心理灵活性在天主教的内部创造一个等值对应物：因此，它要做的事情就是在教派间的世界内战中为天主教派充分利用叠加了的激情迸发的动员系统和苦行的实施系统。

这种激进的、有着多种技能的活动分子便不能再满足于坚守传统的“谦恭、贫困与贞操”的誓言。这是在基督教修教会创规以来就有的规定。他们以完全现代的方式——借助于他们著名的第四条戒律——而直接屈从于教皇的命令。耶稣会士们把自己设计成完全没有意志的精确的仪器，并交付到使用者的手中。让他们进入运行状态的力量就取决于天主教会人世间最高的权力机关。他们还带着狂热的讽刺把自己变成最现代化的牵线木偶，而牵线就掌握在唯一的使用者手上，他就是反现代性的罗马统帅（记住：谁想得到权力，必须成为强权者不可或缺的工具）。为了能够成为这样的牵线木偶，他们创造出一系列的学习和课业的组合——一方面用来改变自身的意志，从而成为完全可用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在智力上能够适应最新发展的需要。耶稣会士们丧失自我的服从（Kadavergehorsam）作为一种隐喻，表明了一

种经典的主体性的配置，即最高的行动动机和完全的可支配性之间的结合。^① 耶稣会士走向主体性的道路过分地夸大了恭顺，导致了促使做出行动的动因受到外界力量——权威——的支配，然而这种模式对于非天主教徒以及反权威者来说到了 20 世纪被宣布无效。这种模式的效率自始都是不容置疑的，然而他们的能力却大到，让他们的主人都不得不开始起疑心——这种猜忌使得天主教会内部发生多番争吵，终于在 1773 年取消了修教团。

依纳爵的转型（die ignatianische Wende）通过将天主教后特里廷时代的四种主体：运动员、僧侣、士兵和学者设计统一在一起。^② 这些类型共同构成痛苦技能和努力的磨炼的文体主体。早在希腊古典时期人们就已经认为，没有痛苦和努力，塑造人的实践活动或曰教育，就不可能达到既定的目标。首先是晚期中世纪激情虔信提供了媒介，使得较早先的努力实践的总结能够成功。因此，可以认为它对于形成主体性文化的作用是怎么高估都不会过分的。此外，向内部的转型则是由于 1215 年以后对于所有基督徒都有约束力的每年都要尽的忏悔义务。得益于当时一个广泛的宗教风潮，早期近代的城市中的市民阶层渐渐缺失的激情被唤醒——它的关键

① 关于作为动力机器式的主体性，参阅安森·拉宾巴赫（Anson Rabinbach）《人体发动机——能量、疲劳及现代性的起源》（*The Human Motor. Energy, Fatigue, and the Origins of Modernity*），伯克利，洛杉矶，1992。

② 关于这种四主体，在德国唯心主义时代还包括官员和知识精英。参阅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作为官员的主体》（*Das Subjekt als Beamter*），载曼夫雷德·弗朗克/杰拉德·洛莱/威廉·范·莱仁编《主体的问题》，法兰克福，1988，第 401~420 页。

词是“效法基督”（*imitatio Christi*），而在形式上的标志性事件则是在 13 世纪时设立了圣体节——由此，产生了主动获取自身的被动性的倾向。没有这种倾向，“人间的条件”（*conditio humana*）近代主体性的风格化则是无法想象的。反向（*Widrigkeiten*）可以被感受成为激情的地方，痛苦转化成为能力。而由于这种转化，主体才能以一切“观念”（*Vorstellung*）的载体呈现出来。这些观念当然也还包括被动的感性世界全部的修正以及所有的促使主体有所行动的动机。据此，主体就只是有能力将自我构建成为自己的痛苦的主人和所有者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讲，主体性就是一种倾向性，它如同一辆汽车。它内部由一种狂热的（此后还可以叫做：兴趣式的）动机构成的动力系统和一个理性导向的控制系统共同组成。现代的主体性更普遍地表现为一种狂热的原因在于，现代的激情是一种处在来自自身内部的强力的屈服下的能力形式。

耶稣会士后辈的主体在组织其摆脱束缚时很自然而然地使用了更为现代化的手段。他们同变革了的时代精神保持一致，回归到内部的发号施令的机关，如显见、道德约束、天资或是决策，以及与之结盟的外部因素的影响，如律师、秘书、参谋以及理疗师。在内部因素方面，后来被总结为“信仰”这个概念术语，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于 1896 年在他的著作《信仰的意志》（*The Will to Believe*）中以构建式的反讽说道，即使是经验感性的人在表达引导生命的假设命题时也常常会表现得像“不会犯错

误的教皇”一样。^①从这句俏皮话当中，人们可以得到如下启示，对于现代的个体来说，一般意义上的树立起一个对于他个人有约束力的“最终的权力机关”是很成功的。美国自由主义心理学家詹姆士认识到了“教皇式统治”并非一个罗马教廷的独创，而是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心理功能，在一切个人主义化的生活方式有所抬头的地方，它就必须会显性地被激发出来。内心的教皇的任务是，阻止怀疑的倒退，从而在个人的基础上使之有效，理解教条的心理语义，在更安全的基础上的休息以及从这个基础上能够走出来。这个权力机关能够起作用要归功于，主体，即使由于近代所常见的教育学驯化已经基本上被束缚了起来（这在心理分析上往往可以算作神经官能症），也会通过“机会社会”的不确定性来找到自己的道路。这让他们每当内在或者外在的情况允许时，总能够实施从犹豫到行动的过渡。只有很小一部分一直在反思的人强调，像哈姆雷特那样，人不可能真正被任何某种东西所说服，从而必须要有所行动。^②它的可能的补偿是通过特别是齐克果（Kierkegaard）首先研究的主体的聚集而实现“跳跃”的摆脱束缚的方式来实现的。

现代占主导地位的人物当然不可能是像很多作家描述的那种过度在内心反省的类型，也不是那种从这种情况而产生

① 威廉·詹姆士：《他们武断地提出意见像不可能犯错的主教一样》，载《詹姆士文集》，约翰·麦克德尔默编，芝加哥和伦敦，1977，第724页。

② 参阅沃尔夫·李佩尼斯《感伤与社会》（*Melancholie und Gesellschaft*），法兰克福，1969，第188页及其后。

的持续的被束缚状态。他更多的应该是展示出一种实用的犹豫不决，而绝大多数情况下又会在可以预计的时间内终结——既有可能是发自自我的决定，又有可能是来自外在的某种推动力。这样一来就明显了，所谓的反思的任务不过是为了摆脱束缚有所行动做准备而已。只有在极少数例外情况下，现代性的思考赢得一种拖延行动的功能。此外，人们便可推得，在现代，几乎没有什么东西比观察的哲学的态度更加难以相信。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自胡塞尔以后的现象学家们能以他们的 20 世纪初期的学说来展现，人们是如何符合艺术的保有这一态度的。在那个一切其他的事物都集中于向前迈步（*Schritte vorwärts*）的时刻，明确地迈出了使哲学成为可能的“后退一步”（*Schritt zurück*）。此外，如同对于士兵一样，对于政治上的整体论者来说，直到 20 世纪，任务与义务的思想仍然为他们效力，伦理和借口以一种前现代的或者说跨时代的方式相互交融。

笛卡儿、康德、费希特和马克思之后，未来的主体不再是从禁欲的苦行过渡到实践，而是从理论到实践——“理论”这个词理所应当不再是指思想家静静地观察存在事物的符号的行为：这里指的是一种为有效行动而积极构建充分理由——可以说，这是一种生意，要把它做到达到摆脱束缚或者说有所行动的临界点为止才有意义。康德提出，将自我咨询的最高权力机关，即“定然律令”（*Kategorischer Imperativ*），牢牢绑缚在具有判断力的主体之上，用以将所有论证合理的实践活动放入背囊之中——此外，如果必须结束于肌肉瘫痪，每个个体就会想到，从细节上用尺骨去测量自

己的行动（这可以推出：定然律令的使用价值在于它的崇高，这种崇高保证了它的不可应用性）。微微过剩的不能与摆脱束缚相对接的理论性思想具有作为科学化了的哲学的自身价值——它不是过渡到一个外在化了的实践活动，而是完全以自我的实施为导向——因为轻声细语的理性之音很少能够像罗马教皇那样清楚地发号施令，而又因为受到行动感召的人往往在行动前的那个时刻仍然并不清楚地知道，他们是否在自身内心的论坛上倾听到一个清晰的命令。如前所述，他们身边聚集着一大批咨询者和动员者，而这些人唯一的任务就是帮助行动者实现迈出行动的那一跃。主体性自我说服的形式（我自己为自己提供咨询）事实上呼唤着摆脱束缚过程中的分工——这是一种事态，近来的唯心主义哲学将之神秘化为一种趋向于主体间性的转折（就如同，好几个人并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但他们凑在一起而变得更加强大）。实际上，咨询业的现代化就是这样的。

把自己理解为主体对于计划有所作为的人来说，其不可估量的好处显然在于，可以不去考虑外部的主人——作为束缚的力量的代表——，而现实中，当我们索要表达和行动的自由权利时，主人的阻力就必定不在考虑之列了。如若现实中的主人不做出部署，让出道路，统一起来的表达和扩张的“主体”的第一个行动就是，通过“革命”的形式打掉他的王冠。出于这个原因，“革命”不仅仅是个政治事件，也是个哲学的箴言。革命代表着一种幻象，看起来现实中的弊端都被革除掉了。因此，自1789年以来的政治动荡中，基本都会出现来自解放哲学家的代表团。

主体历史的美好的瞬间构成了人们对于清除国家里最初的干扰者的伟大日子的回忆，接着，它就被自由党人加工成为地道的新神话。国庆节也因为就一直是独立日——它当下化了动人的画面，当人们赶走了外来的主人，并把中产阶级的行动和表达自由通过立法上升为国家意志的时候。关于这种节日的幼稚的幸福来源于把社会的一切弊端都归因于外来的主人，而随着他们被驱赶后，一切问题便会迎刃而解。革命后时代则是这样的时代，主体从这种幼稚中成长出来。作为主体的最大缺陷便体现在，主人因发号施令的权利而必然包含的对其下属发出的摆脱束缚的号令的职能要由我自己不无漏洞地承担下来。自己做自己的主人是一项向现代人提出的基于历史脚本的不可避免的任务。同样是在这个脚本中可以读到，他们不会成功，以及为什么不会成功。

作为一个主体所面临的无所适从的局面给一些知识分子创造了市场，他们从旁帮助那些受到苦难的，信息不畅的以及积极性不高的主体。在被驱赶走的主人留下的空白中，意识形态主义者从 1793 年到 1968 年不懈地努力，直到后来比他们更机警的后来者咨询师们出现并占据了无主的空穴。意识形态主义者（他们 16 世纪时有着类似功能的先驱则是意大利的文书以及封建领主们的忏悔神甫）常常会以“历史”及其不可更改的规律性的名义来使自己或他们的雇主摆脱束缚。——因此这些人的一项不可避免的任务就是，把那些经常是显得暴力的低语塑造成宛如从历史的科学中必然流淌出来的产物。因为“历史”仅次于“自然”，长期以来被人们看成是行动的最高当事人，所以受到它的委托而采取的行动

则具有最优先的地位。还不必强调，这类的历史主义不过是一种用法则加以掩饰的机会主义的一种形式。以必须完全顺从地面对“历史法则”（以及在具体事务上的应用）为借口，他们找寻到了参与到不可避免的暴力行动中来的最机警的方法——尽管绝大多数知识精英避免亲自参与到某些他们建议别人去从事的罪行中去。而从他们对于行动者给出的建议来看，无论是极左还是极右主义都是近亲，他们令人尴尬的如此相毗邻。

最尴尬的局面，也是最清楚的：青年时代的卢卡奇关于革命者施加暴力的犯罪乃是无人道义务的笔记（1922年）与希姆莱在1943年8月所作的为党卫军的大屠杀进行鼓吹的波兹南演说（Posener Rede）就显得异曲同工。无论是黑格尔学派的布尔什维极端主义的合法化论调，还是康德主义的纳粹侵略和种族灭绝政策的实施者，尽管他们的方案差异如此之大，但却以惊人相似的狂热做出了有利于伟大历史的尝试，并通过有着远大预见的非道德论者发号施令。在两者身上都可以清楚地看到，自我迈出行动的步伐作为一种违背更善良的必须意愿（Müssen - Wollen）是如何只有通过明确的摆脱束缚的人物才有可能实现。^① 由于知识分子活动家们把世

① 卢卡奇在他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笔记中谈及所谓第二伦理时，以间接的方式表达了摆脱束缚的原则：如果当第一伦理禁止杀戮，那么第二伦理便从中创造出一条律令。参阅诺伯特·博尔兹（Norbert Bolz）《摘自解除了魔咒的世界的——两次大战之间的哲学极端主义》，慕尼黑，1989，第13-20页。希姆莱在他的演讲中说：“我们所拥有的唯一的专员（Kommissar），是我们自身的良知……”“命令我们去进攻的专员，则一定是我们自身的勇敢……”在这里，指出专员泄露出了党卫军人在内心要与苏俄的灭绝政策执行者开展残忍程度竞赛的道德图景。

界描写成不可调和的两方——进步和反动、劳动和资本、本土和深不可测——的战场，所以他们的话语就或多或少的明显带有泛化了的世界大战的发出命令的面貌。^① 提供建议者中的那些中庸派们则退守到了怀疑论的领地，并把犹豫不决的状态雕琢成为一种小自由的生存形式。只要怀疑变得尖锐，他们就总是摆出一副拒绝和阻止的样子。

当意识形态主义者的时代结束，咨询者的时代到来之时，无论是当事人，还是他们自己采取行动的方式都不再囿于好战尚武的方法，因为在他们的世界图景中虽然存在竞争者，但他们不是敌人。于是他们以自由市场和人权的名义来行事——但是人们当然也清楚，这绝非如同野餐那样轻松。他们的技艺在于坚定地把经济成就以及它的影响因素，如领导能力、直觉以及人格魅力等，表达为通过这样或者那样的方法可以习得的能力。他们必须要能成功构建出这样的虚构现实，即在作为和幸运之间存在着某种可以掌控的联系。^②

咨询者完全取代意识形态主义发生在 1968 年之后，新

① 托马斯·曼 (Thomas Mann) (1918): “智慧的人一旦有了必须有所行动的信念，就立刻处在了政治谋杀的面前，或者说，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围绕他的行动的伦理性问题，政治谋杀也可能是他的行为方式的后果。”《一个不关心政治者的观察》(*Betrachtungen eines Unpolitischen*)，法兰克福，2002，第 581 页及其后。

② 关于早期的占卜术为摆脱束缚和行动方向指明道路，我们在这里只想说这么多，随着古代技艺和文本的复兴，原本被禁止的一些实践活动，如对预兆的解读，必然会重新归来。（参阅本书第 10 章，第 83 页及其后）——招致的后果还包括当代的甲骨文预言产业。关于早期新教主义时期的占星术，克劳蒂娅·布罗塞德 (Claudia Brosseder)，《星空的魔力：卡斯帕·帕依瑟、菲利浦·梅兰克顿和其他维滕堡占星家》，柏林，2004。

马克思主义再次摆出一副了不起的姿态，好像弗洛伊德式的返老还童了，还带着受到点怀疑的侵扰，它和托马斯·曼用一个20世纪40年代很流行的字眼“知识法西斯主义”所说的东西之间比过激的行为举止有着更多的共同点。^①自此，无理要求的牺牲者成为主体，即是：一个缺乏自信和摆脱束缚的关键词的行动者，不可避免地处在一个过大的舞台之上，被移交给模棱两可的专业咨询师，可他又不愿或者不知道再说些什么。真实的行为或多或少的还是保持了在黑暗中摸索的成分，因为想要全盘控制试验的框架条件不过是乌托邦式的幻想。近来的咨询热潮从具体的假设出发，不能做出太多的行动者，最好应该得到知道自己并不知道太多的咨询者的支持。从这以后，苏格拉底又存在于我们当中。对于这样质量的咨询信息，雇主们渐渐已经愿意付出任何代价：不仅仅是工业巨头花钱通过咨询来寻求赦免。德意志联邦各部也在近年以“查询委员会”的名义购买了大量耸人听闻的咨询意见——对此花费了数十亿欧元的巨资。甚至在2004年初，一向以宽容挥霍浪费而臭名昭著的联邦审计局也被鼓动而有了咨询需求。

当意识形态在世界各地纷纷淡化后，唯一一个强有力的能够促使人们摆脱束缚采取行动的关键词在今天就是创新。只有很少的人意识到，以往的历史律令在这里展现出了它的最弱级。当新人（*der Neue Mensch*）被以一个巨大的召回

^① 托马斯·曼：“必须要去除知识法西斯主义当中的神话，并转换其功能使其符合人性。我已经很久没有再干其他的事情了。”《给卡尔·凯伦依（Karl Kerényi）的信》，1941年9月7日。

行动从市场上移走以来，技术的、生产过程的以及设计上的新动态就成了对所有人来说最强的吸引力。他们被迫追问：如何去做，才能保持领先？谁创新，就能确信：他行动的准则就随时有可能构成一个普遍的立法原则。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自摆脱束缚的主体从土地上获得了乐趣以来，创新这个托词也变得可有可无了。乐趣文化中的行动者作为庸俗的主权主义者在他们浅显的良好自我感觉中嬉戏，有意识的“让自己走”（Sich Gehenlassen）对他们来说已经是充分的动因。他们可以放弃咨询者，因为他们已经直接转而面对诱惑者；必要时，他们把自己托付给他们的表演家、教练员或是编笑料段子的人（Pointenschreiber）。主权意味着，能自己决定自己要往哪个方向堕落。

第 12 章

漫反射能量：领先的本体论

随着转向海洋，随着航海的风险贸易以及随着新的幸运技艺，近代的欧洲行动者们提升起了关于主体性的兴趣，它从根本上说与人类一切既往的处在世界中（In - der - Welt - sein）和受引导（Sich - führen - Lassen）的风格化都迥然不同。在人文主义中被看做自我的构建者和发明者，在唯心主义中作为一切想象的主体的人，在完全不了解以往阶段的程度上成为一个新行为的行动者，新影响的缔造者，新观念的承载者。主体性和攻击性之间牢固的联系让我们认识到，处在游戏之中的的是一个行动者文化的内部稳定。未来的行动

者仍然长期处在其自身攻击性和原创性过度要求之下疲于奔命，因为他们从来就未能成功地令人信服地说出，他们的行动以及迈向未知的步伐究竟能带来什么。15世纪末以来，在艺术活动上的天才和创造显而易见的不停踏步是一个证据，证明了现代性不具备对自身原创力量表达态度的能力。如果人们认为作品和行动是从某种天生的禀赋中产生出来，那么实际上就隐晦地把行动者解释成为一个发了狂的人，也在一个很值得注意的意义上，最终行动者的行动就被推到一个超人的力量之上。它一下子抓住了行动者，并将之置于一个超越责任之上的状态。因此就会发生，当人们证明是行动者而不是灵感参与到上帝拯救世界的计划中，遇有异教的艺术或战争天才时：也会以同样的方式将行动者从“事件的中心”移除，然后将之塑造成一个中间媒介的、超越于责任之上的个体。如果人们直接谈起创造，那么等于是退归到了同义重复。人们把作用归于创造精神，而创造精神之所有起作用的意愿乃是源于他们能够起作用。

在两种情况当中，令人振奋的观察都会战胜被动员起来并释放力量的精确的感知，并阻止一个到达了行动文化高度的语言的发展。这种效应奠定了整个新时代的欧洲哲学的基本状况，因而对于作为那个时代的主要事件，无论是商人的和帝国的强权占领世界，还是行动者摆脱束缚采取攻击性的行动，都完全全然的失语了。当然，这种缺失有可能是因为某种成见，即船长和征服者们有可能留下传记，但是不可能留有理论。事实真相是，只要人们在非学术类的文献语言中稍加搜索，就很容易能找到船长的理论。从哥伦布的航海日

记到梅尔维尔关于阿哈船长的观察，欧美档案隐藏着关于进攻的知识百科全书，只是它还有待编辑修订罢了。没有必要提及，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些都是些要抛弃的档案，因为欧洲为烙印的世界史结束后，进攻已经转型成为合作——相应的，新一代的伦理哲学不再对单一性的、暗淡无光的发现和行动发生兴趣，转而把目光投向了相互性、责任、公平、副作用少以及地区增长了敏感性的容忍度。

为了能理解近代的活力，人们就必须认可这种令人不舒服的想法，“精神”和“行动”是不可以被分成两部分来记载的。然而这在哲学传统中只被极少数人承认——但仍然要算上黑格尔，人们可以在他谈及拿破仑的话语中读到关于智力和能量的综合观察的一些结论。对于黑格尔来说，耶拿的胜利者就是一个世界灵魂的显现，并且当然是欧洲行动文化最优秀的转世灵童。在这里通过一个严肃的人格主义给攻击精神做了注释：可以说，当1789年运动的思想 and 资产阶级的法治国家的秩序需要在一个领袖的形象中统一起来的时候，拿破仑就诞生了。没有谁对攻击性精神的称赞能比得上黑格尔对于波拿巴现象的合法性警句式的阐释，如同拿破仑的军事政策，总是以运动的必要优先为其出发点，是从保持原样的港湾中驶出，向外扩张渗透，或者人们能从中发现出一个伪装起来的船长理论。同样一个模式的反讽的变体则是马克思的性格面具（Charaktermaske）理论：资本也总是能及时地催生出那种能够让它觉得恰如其分地，在特定情况下甚至是与之同流合污地代表它的人物来。作为无条件的藐视一切阻碍利润生成的事物的观念，资本自我拟人化为资本的

占有者阶级以及企业家，它们能够聚集进步的能量，打破一切静止的社会关系，并冲破所有一成不变的状态。

然而，凭借类似“世界灵魂”或者“精神和行动力的综合体”等表达并不能获得太多（同样少的当然也还包括马克思的性格面具理论），因为我们通过它们并不能对于新的行动文化中精力充沛以及必须以智识来理解的元素之间相交叉的模式获知更多。在这种尴尬的局面面前，在文学中寻找信息就显得不无裨益，文学总是以它独有的方式来触及这个问题。

在这里，我们只需要举一个例子就够了：在海因里希·曼（Heinrich Mann）的小说集《精神和行动》（*Geist und Tat*）中有一段关于拿破仑的话，在我们的眼中，它证明了这样的一种文学性的表达方式时而有用，但只是一种附属的作用，对于这个概念本身来说，却还未能从根本触及。故事讲的是圣·赫勒拿岛的被放逐者拿破仑使用第三人称来书写自己的回忆录，就好像这个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在一开始就把作者带入他自己的历史中：

这位伟人，当然作者很早就认识了他，就像炮弹被打到战场上一样的闯进了这个世界。革命将他派来。他一生中都始终保有一个信念，拥有一个躯壳，保持原有的道路……^①

^① 海因里希·曼：《精神与行动》，小说集，慕尼黑，1963，第125页及其后。

来到这个世界上，就像炮弹被打进战场一样，海因里希·曼在1925年——那是个新自由主义的拿破仑热的语境，将这种攻击型的存在模式刻画得淋漓尽致。也就是在这个时代，海德格尔于1927年发布了他划时代意义的关于《存在与时间》的分析。在他们的努力下，这种人被抛到世界当中（In - die - Welt - geworfen - Sein）的存在形式第一次以破除一切既往哲学的原偏见，打破知识屈从于理论典型之下的条条框框的方式话语化。海德格尔的“被抛掷”（Geworfenheit）概念化了前理论时代开辟世界的模型，在开辟世界的过程中，“理解”构成了运动的人生的不可避免的特质——就完全如同费希特的弥散的“被植入了一个眼睛的力量”在具有认识力的被抛掷状态中加以澄清。海因里希·曼关于伟大的行动者的记录以及海德格尔关于人生的暴力性的阐释在这里相统一，它们都提出了“飞弹式存在主义”（projektiler Existentialismus），在这种哲学观中，人生就像一枚智能子弹一样。从力量和视界的交织中产生出一个不断向前的运动性，它并不是以异律的进攻命令的后果的方式，而是以不断从早就已经存在的进攻中去不断寻找关于自身情况的必要的但同时又始终是不清晰的信息的方式。被投入世界中的个体并不是一个纯机械的飞弹，他更像是一个向着不明确方向发射出的巡航导弹，它能在飞行的过程中，根据自己的意志确定自己的方向。

如果说一个人要像一颗炮弹被打到战场上那样进入世界当中，那么他首先需要有一个发射装置。海因里希·曼没有花费力气去说明：负责将拿破仑送出来的大炮到底是什么，他

只简练地使用了“革命”这个一切进攻的使命的总概括。1789年以来，自命救世的激进分子们总是能从革命当中看到一种断然的向前因素。海德格尔将这个发射装置扩大了，他把它解释为存在（Sein），它将个人投入进入世界的轨道上去，或面对死亡。但是，当小说家的所谓的拿破仑飞弹通过革命的“思想”（以及由此既定的一个欧罗巴合众国的目标）而被赋予了一条给定的道路，那么海德格尔抛掷出的人物却还要在飞行的过程中慢慢去完成自我投射和编程——他们并没有事先设定好的目标程序，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是盲目的行动者，是战场上战斗已经结束后，打偏了，却仍然在飞行着的子弹。

在这个抛掷的过程中的自我设计上有一点至关重要，即设计不可能存在于一个自我反思的意识当中，如果人们这里的自我反思指的是思想回到意识中曾经的某个事实情况之上。事实上飞弹式的个体不可能存在着自我反思的模式，他更多的是把前逻辑时代的热情和干劲带到了他的认知方向中来——正是这个就是根本本体论者关于存在者被抛掷后的设计能力的强劲词汇。如果把设计揭示为人的第一行动性的话，就可以见到一种智识上的充沛精力的模式，此时思想并非跟随存在，而是与存在并驾齐驱。存在并不是一个黑暗的运动，等待着“启蒙”的光照亮，并指出前进的道路。存在本身就是个有着亮光的攻击点，尽管它亮度不大，射程也有限。20世纪早期的存在哲学有着划时代的承载力，因为它们明确地把向内自省的力转为了向外的投射。它们把目光自由地投向本来明亮的、前自我反射的和前被禁止的运动性

之上。这里有着从过去优先向着未来优先的转向的核心角色，在这种优先当中，一些那个时代的作者，就是系统论专家和未来学者，有好的理由来认识到 20 世纪西方文明当中的主要精神事件。

存在哲学当然究其自身只是反映主体探险行动不断发展的文学的后卫队，当学校智慧只能幻想，即使是海德格尔大胆而冒失的学院主义也不例外。行动主体性空间中的伟大探测，从莎士比亚到约瑟夫·康拉德，从卡蒙斯到加西亚·马尔克斯，从马基雅维利到陀思妥耶夫斯基，都在这样一个高超的水平球面上运动，乃至于行动的生命哲学理论——它们喜欢谈及工作、政治以及交际行为——在它之旁像个二流货色。这不仅体现在表现方式上，也体现在概念方面——费希特、尼采，也许还有柏格森算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例外。面对杰出的行动，哲学家们的无能也许是由于一个习惯的原因：他们因为自己的先入之见，而总是会习惯性地出于利于反思态度的给予束缚相对于进攻以优先地位。这恰恰让他们不能认识到像等待着理性骑上来的冲动的野马的主动性能量。

人们探究反思文化在研究行动世界时的犹豫不决，并想获取更深刻的原因时，只要看到，在所有激进行动的研究中，伦理的阴影在不断增长，并将其能量通过渗透而抛掷到现实之中。如果人们把充分获得行动信息的在其不可制服的双重光晕中的行动力量规定为一个根本量的话，那么实际上谈及的是一个还没有把合法的和犯罪的能量彻底清楚分开的权力机关。谁如果非常严肃认真地去领会歌德《浮士德》

中的“行动”（Tat），一开始还真难以找到非常清晰的标准，把经济行为、政治考察、宗教使命或者艺术创作这类行为同在实施过程上有着极近的亲缘关系的犯罪行为足够清晰地区分开来。区分各种行动的任务归于历史的书写者，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行动者都想通过自己的力量来控制历史对其行为的评价。无论哪一个行动者，无论他叫哥伦布、皮萨罗、拿破仑还是列宁，都不能在做出行动之前就清楚地知道，他在之后是会被别人看成蠢货还是罪犯。歌德的名言——行动者总是没有良心的——非常言简意赅地总结了这一现象。行动的人当中那些更严肃一些的试图解读出一切真实的行动的悲剧本质的——并非不去为自己寻求超越法律状态的无罪判决。在他们身边很早就涌现出一类行动者，他们坦白地承认这种不确定性给了他们极大的创造的空间——人们用一个18世纪的词语来形容他们就是“褻渎神灵者”（Frevler），若是用了更一般而没有特定时代烙印的词语，就是“冒险家”。所以这些人目空一切的实践进入实践哲学的范畴也就很好理解了，而且就正是这群人当中有着那些以最大的精力去旋转现代化进程车轮的行动者。

这种目空一切的原因本身应该被如此命名：而新时代的哲学，尽管有黑格尔漂亮的名言警句，却从来没有能够说服自己去思考这一问题——人们甚至可以把它看成是哲学问题上的一大遗漏。如果哲学做到了黑格尔所要求的，那么从1500年到1900年间，它在实践部分就已经为冒险家主义创建了新的学科分支，或者说至少是作为殖民主义的主持人，作为未来革命的咨询者——，它甚至会以更加大胆的形式去

资本的内部

研究为亵渎神灵者提供的咨询意见 [在我们所知范围内,只具名地出现过一次,即在《萨德作品集》(*Oeuvre des Marquis de Sade*)中]。它也就能发出现代化了的和现代化的激情的三个基本声明:欧洲扩张、机械制造和运动战争,而不是在它们的面前进行内心的流亡以寻求逃避。哲学在任何时候都从来没有准备着去承担这个任务,它给它自己从资产阶级的角度去看招来了荣誉——对此应付出的代价则是所谓的心甘情愿的自我阉割。这样的后果则是:人们从哲学文本自找的无关痛痒中感到了一丝不快。于是很多著名哲学家将他们作为哲学家本该理解的东西说成不被允许去理解,以解救自己的灵魂。这时,他们的意识状态就和一个受过良好教育而又多愁善感的黑社会头目的女儿极为类似。她想要无忧无虑地生活下去,就必须始终躲藏在对父辈的巨额财产的来源并不知情的迷雾中才行。^① 很少的思想家,他们并不蹈常袭故,无论是培根、霍布斯、德·萨德、尼采、斯宾格勒还是柏格森,都视既有的条条框框无足轻重,或干脆打破,用以满足自身和行动精神的邻近。他们被人们称作“资产阶级的黑暗作家”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谈到黑格尔,总还是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他能否被看成是羊群里的一只狼呢?因为他实用主义的“世界精神”说到底不过是个总能及时回归到合法的必要性屋顶庇护下的更高层次的犯罪行为。

① 关于这个比喻的来源,请参阅海因内·弥尔曼(Heiner Mühlmann)《文化的本质——文化发生理论提纲》(*Die Natur der Kulturen Entwurf einer kulturentwickelnden Theorie*),维也纳/纽约,1996,第129页。

欧洲所具有的派出必需的殖民行为或曰“传播文明”的团队的危险禀赋在基督教资本主义顺从驯化下从未减退乃是以整个扩张时代所具有的持续的意识状态为前提的，即使是基督徒或是资产者，只要在状态允许或者情况要求之下都可以在规定下有所例外。这种情形的出现往往在于，当行动者面对异域的居民时，因其陌生性而认为其低贱。所以在基督教背景下，对于行动者来说，最优的出发点状态毫无疑问是，把他们的扩张运动设想成为一次使命。在这个时候，神职人员一般也会给士兵和商人让路。次优的方案则是按照骑士或者士兵的习惯，将束缚性的规范暂时搁置，当然，行动者也时刻准备着在这种非基督教义的行为成功之后再次回归到原来的状态。这种心理动机的组合在西班牙征服中南美洲以及美国的西进运动中展示出了不容辩驳的有效性。新时代的行动者意识就是要以成功运转的自我说服机制为前提，它要总能帮助行动者为其采取行动以某个特殊情况或者事后取得特别许可等方式来打开方便之门。

关于行动者主体性的自我说服机制如何在具体的案例中行使摆脱束缚的功能，恐怕没有人比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1868年的小说《罪与罚》当中展示的那么细腻而详尽——这是一个心理学伦理的研究，特别是小说的前半部分可以看成是一本实践哲学在顾及特别许可下走向犯罪的行动手册。虽然整部小说总的倾向是尝试证明“俄罗斯灵魂”的西化必然失败——“西化”（*Verwestlichung*）在这里意味着：一个圣彼得堡的年轻的用益主义者接受拿破仑的理想。在他的实用主义方面，小说首先处理了一个知识分子在何种条件下

会渐渐过渡成为一个行动者的问题。正是因为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毫无疑问地缺乏犯罪能量——否则他会在实施了杀人犯罪后一直沉浸在负罪感带来的精神错乱当中？——所以他最适合用来研究这种即使是最大限度被束缚的人，也会在自我摆脱束缚中成功地做出最血腥的后果的前提条件。答案则是借助于诡辩式的构建所谓习惯法中例外情况的特权。拉斯柯尔尼科夫在面对检控官波尔菲利的时候引用了自己文章《关于罪》中的一段话，他认为自己证明了革新与犯罪之间不可消解的联系：

我推断，所有的，不仅是伟大的，而且还包括那些越过一般水平的人，这意味着那些拥有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一技之长的人，说出点新的东西，究其本性必然会成为罪犯——或多或少，不言而喻。否则的话，他们便不可能从旧的轨道中脱出，与此同时，安于这样的轨道对于他们来说又是断然不可能之事……^①

根据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思考，要想拥有犯罪的特权与义务，就只需要成为特殊的或者说是有着革新能力的人就可以了——当然这里的罪行指的是排除普通人对于革新的阻碍。所以说犯罪这个概念指的就是“以更好的名义去打破现状”。^② 知识分子的自我说服从他们成功地以足够的证据自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斯韦特拉娜·盖尔译，法兰克福，1996，第351页。

② 同上，第352页。显然，卢卡奇在其左翼法西斯的阶段与拉斯柯尔尼科夫观点是一致的。

认为自己属于那个特殊的范畴的那一刻起，就已经达到了效果——不必要强调，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做好准备，要把他的主人公刻画成为妖魔的（后来人们说成：白恋的）谬误判断的牺牲品。从小说的试验规定来看，现代化的行动摆脱束缚的结构可以从杰出、革新和革命三者的综合体中找寻，当然还要再添加上一点民主的、救世主式的动机。它们共同构成了基督教和人道主义背景前的无数个现代化的罪行的矩阵。^①

如果人们认真研究拉斯柯尔尼科夫简单地将人划分成普通人和超过一般的人背后的过程理论的内容的话，就可以测量出这个想法究竟有多大影响效果（不过，我们这里还要暂时地忽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后面的进程中，带有反现代化烙印地试图“在上帝面前”或“在爱的面前”去抵消这种差异）。在“超过一般的人”的概念当中隐藏着一个基于不同的速度、不同的强度和不同的形成轨道而将人类分裂开来的提示。这种分裂导致了，那些在加速了的研究工作，在更加大胆的旁道和更加意想不到的生产过程中的个体能够比其他人更快地窥得某些真相、现实以及技术。由于在这些新的真相、新的现实以及新的技术上拥有的时间优势，

① 在黑格尔耶拿时期的现实哲学中可以找到关于罪行的一些碎片，这些可以看成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分析的一个前阶段。罪行在黑格尔那里被解释成对抗形式上被认可的普遍（作为“单个的权力意志”的姿态，第215页）的例外权力的隐秘的声明，在其中，要求真实效力的法律作为一般性的正反议论的行动，这就是说，实施了作为伤害者的伤害。参阅黑格尔《耶拿体系Ⅲ——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汉堡，1987，第212页及其后。

他们把一种你追我赶的紧张气氛带到了这个世界上。对此，余下的或好或坏都必须做出回答，要么决定跟上脚步，要么拒绝跟随——大约基于这样的理由，走在前面的人的优先地位并无规范的力量。如果人们把环绕在拉斯柯尔尼科夫所谓的超越一般的人周围的那种伪人类学的光环褪去，就只剩下一个过程理论性的内核：这里提及的所谓的超越一般性不过是把个体和团队纳入亦可被人们称为上升的“发展”的形成轨道中来——如果还有可能使用这个表达——而不必为此去为了其他或早或晚要补上这个“发展”的人的义务做出陈述。当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强调了会说出“新词”的人和那些只会蹈常袭故的人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时，就已经承认了一个进步主义的基本命题。从进步主义当中可以推导出普通人有义务追赶上差距，否则等待他们的另外的可能性就是默许被排挤出去。他的世界图像展现了两种速度的人类，并且追赶的人和被追赶的人是相互分裂开来的。拉斯柯尔尼科夫两代人之后，熊彼特又在他的经济发展理论中声称，在经济生活中，功能主义地看，只存在着创新者和模仿者。

这样的命题催生出一个幼稚的领先的本体论，据此，领先的和处在主要场地之间的差距完全可以看成是领先者的试点功能：这种差距向多数展示了整个的旅程的方向向着哪里——尽管拉斯柯尔尼科夫不否认平均的保守权利，他甚至表示相信向前运动和保持原样之间存在着永恒的矛盾冲突。在这个模式中，杰出者的领先将通过召唤摆脱束缚而体现出来，摆脱束缚则又完全要通过积极的藐视伦理和传统的形成

的阻碍的强制力，为自己开辟道路——因此就又回到了创新者不可避免的罪行的论点上来。当然，陀思妥耶夫斯基假借现代主义者拉斯柯尔尼科夫之口来发出在其基本概念上受到经典形而上学影响的反革新的声音：事实上，在一个完成世界（另外一个世界既不可能是东方的基督教柏拉图主义，也不可能是西方后特里廷时代天主教亚里士多德教会所设计构建的）的形而上学的框架内，每一个革新活动都有着恶魔的原创性嫌疑，所以每个创新者最终都需要赦免的回归。对于基督徒来说，上帝爱人这个事情已经足够有创新性了（这是创世纪作品中唯一一个实质上的附加物）。

即使按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对于第一个取得世界的理论以及更高强度的行动者的领先优势的理解仍然还没有获得最关键的东西：迄今为止，对行动者束缚优先的免除以及纯粹进攻性的释放仍然没有能够足够地发出声音。当然，拉斯柯尔尼柯夫所谓的“超越一般的人”也还身负形而上学的偏见下的革新之过，他们不仅获得了同时代人的欣赏，同时也时刻受到善良人的指责，因为他们并不甘于将自己添加到爱情和交际的共同体中去，而要突破人性的单位，并把它变成一个竞争者的集合。在真实的领先和落后的效应影响下，这里有胜利者，也有失败者。

尼采在他的代表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当中刻画了一个从根本上说被宣布无罪的进攻性学说的轮廓。按这本书的基础倾向，人们可以把它归入一种酒神式的实用主义中去。在自身当中感受到了行动的火星的存在，宣布它无罪比单纯的定理要更加丰富：哲学文本到颂歌的转变本身就是进

攻性解放的例证。从其语言形式来看，这种诗化了的哲学实际上显示出单纯的教义的能量。随着一条自我生成的面向所有人以及没有人的基督教福音的穿透力，杂交的查拉图斯特拉的言语行为重复着横渡大西洋——就是从那时开始，人们才可以说，哥伦布的行为在思想上到达了。查拉图斯特拉哲学上的核心位置在歌唱家召唤出自己的歌曲中的热情的地方——他把它叫做偶然，而这种偶然的通俗性与它的神性又丝毫不构成矛盾。歌唱是一个偶然的亮的力量，它筋疲力尽，却赞同这种筋疲力尽——不管怎样，还有英雄像太阳一样的给予为没有人反过来给予他一些什么的给予者带来了忧伤。“处在一切事物之上的是偶然的天空、无罪的天空、随机的天空、傲慢的天空。”“冯·温格菲尔，他是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贵族。我把它还给一切事物……”^① 这里还包括预言家表达自己的孤独的诉苦：因为它体现了从来源性向未来性的过渡，因此他就必须承担在余下的未加速的生命中孤独的后果。一个他那样的人不是从起源上存在，而是从领先中存在。他演说的热情标记了一个人拥有的领先到一个人是领先的过渡。生活在领先中的人，总是来得太早。

激进的领先的人在他存在的轨道上概括旧时欧洲的运动精神，过去的几个世纪中，只是分散地产生一些话语。其中的一句来自奥利弗·克伦威尔，他说过：“一个人不知道将去向何方时，他已经比以往任何时候攀登得都要高了。”另外一句话是拿破仑从俄罗斯逃回来时说的：“崇高与荒谬仅

^① 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Ⅲ·日出前》。

一步之遥。”^① 欧洲运动智慧最深刻的话语却是荷尔德林 (Hölderlin) 在一首题为“诗人的勇气” [Dichtermut, 然而在后来的一稿中却将标题改成了“害羞” (Blödigkeit)] 的话：“因此！手无寸铁的徜徉/生命中勇往直前，不必担忧！”

不必强调，尼采的洞见在旧欧洲崩溃后只残存故纸堆的价值；不必现在才补充，随着行动帝国移交到美国，“世界历史”游戏对我们已经过去了——我们将在后文中解释，为什么美国人也抓不住待创造的历史（参阅本书第39章，第373页及其后）。欧洲片面性的黄金时代已经属于遥远的过去，从自由贸易时代残存下来的剩余的片面性当中还能产生出什么呢？今天大胆的歌剧表演的评论和传奇的邮件盗窃电影还会提供这方面的信息。总的来看，一个对真正历史模仿的时代开始了，人们对于它的规则还知之甚少，然而有一个事实是清楚的，自从快速反馈出现以来，命运的另外一种风格统治了舞台。

^① 叔本华将这句话的知识产权归于托马斯·潘恩 (Thomas Paine)：“du sublime au ridicule il n'y a qu'un pas.”，参阅《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1部分，第34条。

第 13 章

航海的狂喜

按主体的方面来说，早期横跨大西洋的航程可以被描述成为一门非正式的由航海发现者们操作的狂喜技艺，就如同萨满教巫师进入癫狂状态而将另一个世界的信息带到现世来一样。只是，这里人们并非是到达天国的彼岸，而是大洋的彼岸。就像一切早先的超验论或准超验论一样，风险的彼岸并非平白无故得来的。早期的远洋航海者必须经历非常艰难的苦行，才能寻找到到达彼岸的通途。航行在茫茫大海上，由于天气原因，航程变长，船员们既要忍受缺少食物的饥饿，还要受到无尽的孤独与无聊的煎熬。因为酷热、寒冷、

恶臭、拥挤、噪声、恐惧带来的失眠也会令船员们在漫漫航程中变得情绪不稳，极易发生躁动。每艘航行在远洋上的船只都会使船员时刻产生一种他们在其他任何地方可以称为“临终之事”的东西离他们如此之近的感觉。日常的程式就是下一个港口或是死亡，在海上冥思着人类行动的不可确定的目标性。作为终极观，伊纳爵式的课业不可能比横渡大洋更加的明显。没有哪些船上的苦行者们比试图寻找最艰难的两处航海路线的船员们那样更能清楚地体会航海的法则：“港口或死亡”。一处是东北部的路线，在欧洲的北海和东西伯利亚之间；另一处是西北部的路线，在格陵兰和阿拉斯加之间。在这两条几近不可能的航线上，即使到人类历史迈向20世纪的门槛时，为数众多的探索者和风险投机商人们都一一以失败告终。在这两处航路上，近代向不可能发出挑战的远航必然带来牺牲。

如果人们考虑到18世纪以来的市民世界的精神气质类型以及防范风险的意识，并把今天的社会称作是一个治疗和保险的社会——这是一个和以往的宗教社会完全有别的生成物，那么至少忽视了在宗教和治疗的社会之间存在着一个中间世界，它既参与到上述两种规范当中，但在实践上又保有着自己的权利。直到19世纪，航海都构成了一个处在宗教和治疗之间的自主的第三种情况。无数人试图在海上寻找陆地上失望与消沉的治愈方法。也许尼摩船长的船就是最后一艘愚人船，在船上，一个伟大而孤独的厌世者可以以泰然自若的方式发泄他心中对于令人失望的大陆上人类的抗拒。在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看来，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

证据，无边无垠的大海，无论对于感伤的还是对于狂躁的与现实世界难以苟同的人来说，都是很好的一剂良方。于是他的小说《白鲸记》（*Moby Dick*）——该书于1851年出版，还在儒勒·凡尔纳的关于大地和地下的，以及海洋的和海下的全球化的小说之前25年——以如下的文字开始：

就叫我伊什玛利吧。几年前——具体是多少年，也无关大局——我口袋里没有一分钱了，在陆地上也再无我可留恋之物。于是我就想，可以乘船出海去看看。这挺符合我的，一来可以改改我的坏脾气，二来海上的气候也有利于我的血液循环。每当我发现，我唇边又开始显出严厉的样子，我的心灵再次被潮湿而又多雨的十一月所充斥，而每当我发觉，我又不自主地伫立在棺材店前，跟在每个我遇到的送葬队伍的后面，特别是当我沉重的心情如此强大地控制着我，以致我需要强大的道德原则来阻止我冲过去，把队伍中的人头上戴着的帽子打下来时，我认为，现在已经是最合适的时候，立刻出海去了。这对我来说，是枪和子弹的替代品。卡托以一种哲学的姿态拔剑自戕，而我却立刻上了船。^①

这个信息是很容易解读的：除了寺庙和白杀以外的第三种选择，一个彻底抛弃在陆地上无法继续下去的生活的方式。在航海的全球化的整个过程中，不安分的欧洲人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汇集到了一起，为的就是打破原有球面固定的东西以

^① 赫尔曼·梅尔维尔：《白鲸记》，第25页。

及地区的束缚。这里所说的不安分（restlessness，这是个较早时候的移民研究的核心术语）将企业家精神、消沉、模糊的期望以及犯罪式的斩草除根不加区别地综合到了一起。金钱的不安分掺杂在“被连根拔除了的物质生存条件”的不安分当中。^① 海洋就如同另外一座炼狱，它现在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人们逃离令人失望的陆地和故乡。这里聚集起来的都是那些在风中、在失望中迅速变老的人们。对他们所有的人来说，就只有维克多·雨果关于吉利亚特——雨果1866年的第三部长篇小说《海上劳工》（*Les travailleurs de la mer*）的主人公——的一句话：“他戴着风暴和大海的黑色面具。”^②

新的航海行动的彼岸是被理解成一个经验的来世，而它仅仅对于能够敢于全身心投入的人才是开放的。一个人不能半投入到航海中来，就像一个人不能一半的身心去信奉主一样。登上甲板的那一刻起，就意味着他与岸上的一切事物断了联系。也没有人知道，在先前死去的船员中有多少人能够真正领会帕维亚战役中的英雄佩斯卡拉侯爵在揭示他战争中的冷血无情的秘密的那句名言：“我的主……让我的桨四周的暴风雨风平浪静。”^③

无论是新的不安分者登上远洋的航船，还是从某个地点出发，展开一份旅行游记，设想着去到遥远的地方：欧洲人

① 参阅迪尔克·贝克：《不安分的金钱，打破时限》，载《为什么要社会学？》，柏林，2004，第109~124页。

② 维克多·雨果：《海上劳工》，德文版，赖纳·G.施密特译，汉堡，2003，第36页。

③ 康拉德·费迪南·麦耶：《佩斯卡拉的诱惑》，载《选集》，维利·布兰德编，第二卷，汉堡、比勒菲尔德、斯图加特，1953，第544页。

一直以来的兴趣和渴望中都浮现着一个横跨大洋的超验直觉。欧洲人向往的好的、更优越的生活最终都归于大洋彼岸的完全不同的神秘吸引力。这与水手或是渔夫们口口相传的令人毛骨悚然的传奇迷信故事是毫无共同之处的。彼岸不是宇宙空间的边缘，而是另外一片大陆的海岸线，加勒比，后来又叫美洲。横渡大洋就代替了一种升华。

直到将超验移至水平方向才使得乌托邦文学成为可能，作为一种思想的流派，作为书写的方式以及愿望的原浆（Plasma）和本体化了的宗教的铸模。在16世纪突然横空出世的乌托邦文学作为一种题材组织起了一个建立在进一步阐释之上的愿望文化，接着又包含其相应的政治，并可在一个替代世界中脱离一切语境地建立起来——按照对现实不满的人的口味，并总是借用了新时代的原事实（Urfaktum），真正的发现新世界在于其无穷无尽多样化的存在形式，海岛的，陆地的 [特别是太平洋上的数不清的岛屿，经验世界（experimentum mundi）也许在那里还要重新开始]。研究档案就会发现，经验的和想象的在早期的发现时代总是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借助于快速复写的新媒体——无论是书籍、游记、小说还是乌托邦故事，或是地图、地球仪还是世界地图——对真实的新世界以及它的想象的变体的纪念产生出一个后形而上学的愿望统治，它的实现即使不是触手可及，也必然不会遥不可及。同时，一种自我实现的一厢情愿（self-fulfilling wishful thinking）开始起作用，它学着梦想和现实统一地朝着偏僻的世界和物质财富而去，就如同那里可能存在的矿藏已然包含了他们有望占有。

第 14 章

无边大海上的企业认同感 人才分离

在外面的时候，也许只有那些通晓海事，并且能始终保持一个团队的人们才能收获成功的幸福。发现者的船只上的团队构成了一个幼稚但行之有效的团队构建的过程，他们是第一批团队构建者，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所谓的“企业认同感”技术。在船上，这些先锋们认识到，要统一团队的思想，去争取看似不可能之事业。自 19 世纪以来不断地被政治化了的、新欧洲的不断进步以及不断丰富的主导思想从心理史学的角度上来看，其本质就是早期的航海全球化时代的团队梦想的图景在一个民族国家及其社会的视野上的逆向

投射。他们试图将航海中的那种向前行驶的必然律令迁移到相对静止的生活的关系中来。从布洛赫（Ernst Bloch）试图为一般化的渐进主义举出优秀的例子的著作中可以解读出，他似乎是要把社会主义从海洋的方面加以改进，然后再把它作为一种理性过滤后的、向外迁移到新世界的梦想加以推荐。进步是时代中的流亡：就好像是某种智慧，相信借助于获得财产的欲望可以解放出生产力，就可以把南部海上的关系在各个地方建立起来。因此：客观上可以满足的愿望的那部分最终必然是有道理的。^①

诚然，对于在外部可以意外获得利益的梦想能够帮助那些新涌现出来的全球化主义者稍微削减脸上对于陌生外部的恐惧。因此，海员们和其组成的团队并不是完全的需要心理治疗的病人，因为在家乡已经身如浮萍，所以更适合到外部世界去闯荡一番。他们其实常常真的已经一只脚踏上了未涉足的事实情况的地面，而茫茫大海之上，时常也确实让他们觉得，奇迹就在前方。最为强有力的船长当然是那些能够最有效地动员他手下的船员团结一致向着纯粹的前方行进，特别是能像传播一种疯狂一样，号令大家永不回头的人。如果没有那种持续的乐观主义魔法，早期的大量航海探险早就因为心灰意冷而中途黄掉了。有了发现者荣耀和获得大量财富的美好愿景，领头人能把大家从心理上统一到一起。当然，对于有异动者的严酷惩罚也是这种成功技艺当中不可或

① 布洛赫关于新时代的地理乌托邦的著名的话语：作为“水平的掘金主义”的表达形式。

缺的成分。葡萄牙人麦哲伦率领的船队在1520年行进至南美洲最南端的海岸，船队中的船长们开始哗变。试想一下，如果当时麦哲伦没有排除一切阻力和顾虑把这些叛乱分子——其中还包括西班牙贵族成员——清除出来，并处以极刑，那么他手下的人就根本不能理解什么才叫做无条件随行。如果他没有像皮加费塔所记载的那样，在船上实行，凡言回归和食物短缺者即斩的禁令，那么他们的向西航行就根本不可能到达马鲁古群岛，那么第一次的环球航行也会在其行进到五分之一时就终止了。^① 哥伦布第一次横渡大西洋时，按他自己在航海日记中的说法，曾经涂改了行驶里程，为的是船员们不会因为航行太久而产生逆反心理。达·伽玛在一次遇到海上风暴时，发现船员们有哗变的趋势，于是他当机立断，命人把船长们以及军官们的指南针、地图和测绘仪器全部扔进大海，目的就是禁绝船上产生任何回航的念头。从上述近乎疯狂的船队的实践中产生出一种航海探险心理学，它要求在每个关键的时候，都要能立刻做出反应，把乐观的精神同那些消极气馁的精神断然的区分开来。

后来，当这些航海中的智慧重新传到陆地上的人们当中时，后来的人们才把这种号召人们毫不动摇地前进的做法称为前进的思想。籍里柯（Gericault）作于1818/1819年的油画《美杜萨之筏》上就把海洋上的那种经典的灾难景象呈现在面前，同时，也把海上的那种前进和后退的不同心态在一幅画作中展现出来。第一眼看画作，就会发现，筏子左边

^① 参阅皮加费塔《第一次环球旅行》，同上，第84~86页。

是意志消沉的一批人，而右边的人则自信满满，悲观者满眼看到的是自身的苦难；而乐观者则望向海平线的尽头，寻找着能够拯救他们的船只。从外在表现来看，筏子上的人体现出了自新时代以来起到构建意义的关于希望和沮丧的争吵。^① 自达·伽玛手下的船长们发生哗变，继而被他平息以来，整个全球化的运动都是一个营造什么样氛围的战争，也是一个使用某种方法使团队能够团结起来目标一致的争夺。到了今天，这就演化成了在公共媒体上的决定放映什么样的节目的权力以及在企业当中谁有参与建议权。很多情况下，积极的那方面存在着所谓绝望的情绪——与不竭的乐观主义心理联合起来——，就能推动那些誓不回头的人的世界“革命”。船上的悲观主义者，他们今后会是潜在的或当前的现代化行动的哗变者，他们中还有悲剧意识的再发现者。他们更倾向于在更加理性的借口前面放弃现有的行动，当然，他们也不会把自己视为成功者。历史对于这些停止主义者来说是这样书写的：他们的口号或潜在或明确地提出：历史要停下来！这种号召可以把不祥预感者、悲剧主义者、失败主义者和领取养老金的退休工人们联合起来。^② 然而所有这些保持静止者、失败者、拒绝者以及他们所拥有的文学论坛加在一起的重力都无法去抗衡摆脱束缚后的行动者和那些

① 参阅克劳斯·海因里希《美杜萨之筏——三个关于魅力史的研究附多种材料和附录》，巴塞尔/法兰克福，1995，第9~45页。

② 关于“让历史停下！”这个动机，参见埃里克·沃格林《秩序和历史》，第四卷《天下时代》，1974，第329~333页。为什么这个命令式在大地的全球化（1945/1974）完成后显得多余了，我们将会在后面讲后历史主义的时候再次提到。

招摇撞骗的蛊惑者的愿景能量。今天也和以往一样，这些人是靠他们的行动——无论对错——以及他们的追随者而生存。他们那种强大的自我陶醉的天赋，让这些天生有着实践偏好的人总能不断地在自己的周围营造起一个有着中长期的成功愿景的帝国。

因为船长们的实践不仅靠疯狂和鼓动的魔力，还要依靠坚实的航海地理能力以及真实的航海旅行经验，因此新欧洲以来的疯狂的航海行动也时常有成功的典范。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海洋上的恐惧才有时会变成胜利的狂喜。也正是这样，狂喜的记录能成为航海的指南，而船舱里也会满载财宝。大洋上的每艘船都代表着一个精神极度不稳定的人，他扬帆前进，每艘船都是个流动着的资本，并参与到现代性的伟大创作中去。

第 15 章

根本运动：金钱回流

每艘刚刚造好，从船台下水的船只都把资本带到了运动之中，这种运动标记了近代以来的空间“革命”：投入的金钱围绕着地球转一圈，然后成功地回到起始的账户中去。资本的回归，这是一切运动的听从风险贸易的一切行为的运动。只要每个投资的金额通过从货物的形式转换成资金的形式回流——人们还可以说是从记账的形式到旅行的形式，有所增值的回流，那么它就给所有资本的运作，甚至也包括那些不断横穿整个大洋的，都带去了一丝航海的特色。资金变成货物，离开仓库，通过船只到达海外的市场后，就像驶离

港口的船只必须热望着要能驶回港口一样，投资人也希望资金能够尽快回笼；而商品形式的转换中，环球绕行是潜在的被一并考虑在内的，因为只要当用来交换的商品在遥远的市场，在东方的药店里有着销路，那么商品的转换就显然是环球的运动。

当运动着的资本在远程旅行回归后，扩张的狂迷就演变成了利润的理性。哥伦布的舰队和他后来的航海者们就由原来的愚蠢的家伙变成了理性的船队。其中最理性的船队当然就是要能够最值得信赖地驶回港口——以“一个回归的幸运女神”的姿态（*Fortuna redux*）船队要能节约开支并定期归来。^①也正是由于人们期待这笔投入到风险贸易中的资金能够给投资人带来非常有力的回报，这笔回报真正的名字叫做盈余（*Revenuen*）——它指流动的资金回归，经历形态转换以及航海的风险后的投资人财富的增值。^②

说到这些港口城市的理性而又疯狂的远洋贸易商人们——所有这些新的冒险家们，他们有葡萄牙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英国人、荷兰人、法国人、德国人，他们纷

① 奥古斯都于公元前19世纪，赴东方考察后胜利归来，在罗马树立起关于“回归的幸运女神”的偶像。

② 马克思也把“回到出发点本身”看成是开始的资本运动的一种标志性特征：“第一眼看来，这种循环是一个永远无法停止的过程。商品被换成货币，货币再被交换成商品，如此这般，不断循环往复。”《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957/1958），法兰克福/维也纳，第111页。对于马克思来说，重要的在于展现两方面问题，一来货币—商品—货币的这种形式变化中可以产生出神秘的增值现象，这给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带来动力；另外一方面，在资本的竞争中，会产生贬值的风险，同时就必然会出现经济危机的现象，从而阻止了资本最后再以货币的形式返回投资者手中。

纷在海洋上竖起自己的旗帜——最迟到 1600 年前后，开始通过多样化的方法来分摊可能发生的风险。新兴的保险业开始为商人们提供服务，来克服海洋以及其他障碍的经济风险。普通人和财产的所有人会处于某种危险之下，然而货物在海上，就面临着一种风险，这是一个可以用数学方法计算出来的失败的概率。为了抵御这种概率事件的发生，就可以结成核算的团结社。这样就产生了作为想规避风险而寻求收益的商人的同盟的风险公司。它把一切在行事之前都仔细考虑清楚的疯狂者联合了起来。

与哲学思想的发展不同，在做生意上，孤注一掷的人是不理性的。所以每个聪明人都会想得很远，也会像每个精于计算的资产者一样，把鸡蛋分放在不同的篮子里。所以人们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安东尼奥——莎翁笔下的威尼斯商人——能那么令人信服地说出，他的惆怅完全不是来自他的生意：

我的生意不可能全部依赖于一条船，

也不只靠一个货仓，我的富裕也非建立在当年的收益之上。

因此，我的货物不会让我悲伤。^①

安东尼奥的生意经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平均智慧。流动的资本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虑后经由艺术和风险，精减成为理性的可承载性。所以说欧洲保险业的发端及其数学的基础可

^① 《威尼斯商人》，第一幕，第一场景。

追溯至17世纪早期是不无道理的。^① 在航海全球化的第一波冒险阶段，保险理念的繁荣和兴盛证明了，大的风险投资人希望减少风险，成为严肃的理性主体。对他们来说，一切最关键的事情在于，把自己同一般意义上讲的疯子严格地区分开来。把理性和疯狂明确的区分开来的严格律令之下，保险业同新时代哲学一样，获得了其发展的契机。两者之间的亲缘关系越来越深，就像迄今为止的思想史所能展现的那样。两者都与安全和确信的技术有关，两者也都密切关注对流动过程（货物和货币的流动，意识的状态，符号的流动）的控制，并且最终都与专制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社会”惩戒体系——福柯对此有着秩序史方面的研究——意义相近。

^① 参阅彼得·L. 伯恩斯坦《以上帝为对手——风险传奇》，纽约，1996，德语译本，1997；弗朗索瓦·埃瓦特《预防性国家》，法兰克福，1993，第二章“关于风险”，第171-275页。

第 16 章

理由和保证之间：论陆地思维和海洋思维

只要我们把现代化定义为一种不断替换旧有结构的过程，早期的保险业就属于现代性体系的先行者。对于人生中不可预知的风险用宗教的方式进行最终的阐释，是典型的旧时代的免疫结构，而现代性则是以通过精确的社会和技术的方式来保障安全。从各个本质的要点上来看，保险公司所做的事情，就是把原来决定权在上帝手上的事情给接管了过来。这首先就在于给不可知的命运打击造成的后果提供保障。祈祷是好的，但保险则更优：基于这个认识，现代意义上的实用的植入型免疫科技便应运而生了；19 世纪，它表

现为社会保障体系和福利国家的医疗卫生机构。现代性为可保障性所付出的非物质代价是巨大的，从象征意义上说，甚至是颠覆性的，因为它意味着要不断放弃命运，即所谓与作为不可减少的危险的绝对性间的直接关联。它变成了统计意义上的平均出现的事件，只是可能会出现在某个个人的身上。而存在的意义也缩减到了仅为在有了一个符合规定的损失事件当中，拥有赔偿请求的权利。

相反，近代的哲学首先带来了一个象征免疫性的重组。已知，这处在“确信”的预兆之下。如果说存在着一个现代性特征的哲学——笛卡儿的现象和它的后果已经说明这一预设——那么特别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即现代哲学成功实现了证据的现代化。随之得以呈现的是有关确信的内部原因，可以以此为出发点——确信的內因即是当下直接的对怀疑清楚而明确的自我直觉进行照本宣科。极有可能的是，近代世俗的、非僧侣的哲学奠基于资产阶级日益增长的寻找不疯狂的证据的需要。他们的当事人不再是宫廷、主教管区、寺院和大学神学系，而是世俗的领主待若上宾的能人或是大众当中特别出类拔萃的有着实干精神的人士。当然，这里最终还聚集着在图书出版界看来可以被称作“科学公众”的人们。也许与笛卡儿的流亡者保持一致的大陆哲学理性主义思潮正是尝试过为那些新兴的、借贷款、用流动资金投机并时刻把还款日期铭记在心的风险市民们的脚下开辟一块稳定的、逻辑的陆地——对于这样的一种努力，更善于在海上活动的不列颠人从长远来看比欧洲其他国家的人更少受到它的影响。而后者几乎毫不掩饰他们对于水的恐惧，此外，在他们的思

想交易中也更多地纳入国家份额予以考量。^①

当我们在培根的《新工具》一书封面铜版画上看到一艘归程的船时，这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里面的寓意是：“很多人能够活到回来，科学将会增长。”^②在实用主义的预兆下，新的经验思想同大西洋上的船队得以联姻，就如同在神话式的预示下，威尼斯国王作为地中海航行的主人一年一度的与亚得里亚海进行联姻的仪式一样。还是这位培根，就像上升的资本主义时期的老普林尼（Plinius）一样撰写了一部“风的历史”，它以这样的句子开始：风好像给人类插上了翅膀，在它的帮助下他们学着飞翔，即使不是飞到空中，也是让他们在海面上游荡。^③风的总体构成了人们后来称之为大气层的東西。麦哲伦航行的海员是世界上的第一批见证者，他们深信陆地和海洋的整体是处于人们可呼吸的大气的包围之中。海员的呼吸赢得了进入真正的大气整体性的机会，它将欧洲人带入了根本的近代。在这里，人的条件（*conditio humana*）和尚未充分考虑的作为开创性的大师思想的大气之间的关联获得了效力。

如果新的知识中心并不是直接地定位于船上，那么它们未来也必然呈现出港口城市的特质。经验只有通过进口才能

① 在政治和社会角度来看，英国的常识哲学反映出了比其他欧陆国家较早达成资产阶级商业和贵族基本财产之间的历史妥协以及这种形式更加稳定的状况。这有利于形成一种欢乐的哲学繁荣的氛围，相反，在欧陆国家，特别在德国的诸邦中则笼罩着一种悲剧式的、权威的国家哲学。

② “Multi pertransibunt et augebitur scientia.” 也有一些哲学史书将培根的书封面的船描述成起航的船只。

③ “*Historia ventorum*” 1622年出版，培根《自然及实验史》的第一章节。该书又归入《诸学科的伟大复兴》的第三部分。

获得，而在概念中对它们的进一步加工则是哲学家的事务：启蒙开始于码头。近代的经验的真正的基底是船的基底，而不是所谓的“地面”。20 世纪时，将近晚年的胡塞尔还以极度保守的说辞试图确立土地作为“原初避难所”或“原初故乡”的地位。人们甚至可以说这是一种重农主义思想的回归，农业和土地束缚的一切价值和效力均来源于此。胡塞尔的尝试，即将一切认识最终地放置到一个共同的世界基础（Welt - Boden），或叫做“万有的被动存在信仰基础”（Boden universalen passiven Seinsglaubens）之上，就总是与一个前现代主义类型的大地主义密切相连，它的基础在于必须要有一个基础，这是无法被问倒的。^① 这发生在一个海上霸权主义早就已经存在，尽管不是更优的，但至少是从实用角度更明智的回答；海洋理性知道，人们要谨防沉底毁灭；只有在表面导航，才能获得成功。航海精神不需要基础，而需要转运地、外国的交易伙伴、即兴创造的航海路线、远方的目标和一定剂量的民事化了的犯罪能量。

按这种形式，听从召唤而要精确表述近代世界概念的哲学必然应该作为一种飘移的学科，至少是作为古代欧洲的港口权威而自我构建。直到 20 世纪都还束缚在小的诸侯国的氛围和伦理之上的状态曾是欧陆，或者说德国哲学的痛苦，因此，其哲学研究就只能是用其他方式来培训低级神职人

^① 埃特蒙德·胡塞尔：《经验与判断——逻辑谱系学研究》，汉堡，1972，第 24 页。胡塞尔 1934 年的文存——关于自然的空间性现象学起源根本研究中，有这样一句做说明的句子：“作为原初避难所的大地是不动的。”

员的一种延续。即使是最好的图宾根的爱琴海梦想——也是德国知识界能够到达的最高峰——也无法强求唯心主义思想去往大海的通途。

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在他早期的一篇大胆的游记中，用非常贴切的语言将一直到最近还左右着德国思想的小国束缚性表达了出来：“在地球上，人们被钉在一个死的点上，被禁闭在一个情境的狭窄的范围里”；这种自我感觉为哲学的幽居爱好（Klaustrosophie），赫尔德试图用跳跃进另外一种元素来加以反驳：

噢，灵魂，你会如何，若你从这世界当中跳出来？
狭窄的、固定的、限制的中点已经消失，你在风中摆动
或是在海中游泳——世界对你来说消失了……这新的思想方式。^①

这段话人们可以这样去解读，似乎德意志性情（das deutsche Gemüt）只有在死亡之时才愿意看到它自身全球化的机会。

然而从绝大多数的欧洲大陆的都市和都会来看，无论是维也纳、柏林、德累斯顿或是魏玛，近代世界格局中的海洋维度都显而易见地被低估了。欧陆哲学超前地将自己安插到大地的反革命运动的行动当中，并下意识地拒绝新的世界形式。人们决心在一般意义上继续从安全的国家领土出发蔓延

① J. G. 赫尔德：《1769年游记》，载《赫尔德选集》，慕尼黑，1960，第27页及其后。

到整体，并将固定的基础推到前面以对抗航海的移动性的挑畔。这不仅对封建领主，对国家的思想者同样有效。康德将主体提升为一切观念的立足点，以此来重复思想上的哥白尼式革命，然而即使是康德也从来没有弄清楚，最重要的不是哥白尼革命，而是麦哲伦革命。像每个既往的大地精神一样，康德也始终绑缚在一个固定立足点的思想之上，尽管他的故乡是个港口城市。对于这些智者来说，即使让现象围绕着他们循环往复的运动，然而他们若无自己环游世界的愿意，又有什么用处？作为智识的拥有者，如果内心囿于某个固定位置，那么康德一定会错过由波动构成的世界的基本特征。《纯粹理性批判》中诗歌般的，关于面对大海屹立着的纯粹理解力的岛屿——“真的国”（Land der Wahrheit）的著名段落——这里是“现象的最根本的驻地”，“在这里，海上的浓雾……欺骗着新的国度”——极有可能更多地透露出了德国风格的近代思想中防御和保守的动机，尽管作者试图表达这一意图的时候，在全体的面前宣读反海洋誓言，通过这一宣言使得理性同根植于陆地地区的自我表达的观点牢牢地绑缚在了一起。它只横渡了唯一的一次，完全感到生厌，人们也可以说：以批判的目的来看，为了更加明确，这奸诈的大洋，对于理性的兴趣来说，在那里根本完全无所获得。^① 因此，同样是康德，在1788年出版了《实践理性批判》，其中也无法找到对于他那个时代的实践之事，如航海

^① J. 康德：《所有一般对象区分为现象和本体的根据》（*Von dem Grunde der Unterscheidung aller Gegenstände überhaupt in Phaenomena und Noumena*），开头。

事业的绝对可参照之准绳，因为在远洋航海中，船长们的行事准则是无法援引一个一般性的立法作为参考的。

海德格尔对于乡土的辩护就格外不能使情况变得更好。他的辩护旨在说出：柏林不是为了某个通过他，就像通过某个岩洞预言家一样，在哥伦布之后 450 年或是在康德之后 150 年，去说出存在的真理。他也把真理看成一个地下的功能（chthonische Funktion）——从地球、山峦和洞穴中可撤回的出现——并批准从远处而来之物一个时间上的，而非空间上的意义。全体的思想最后一个登上了船。

这时，歌德在 1787 年 4 月 3 日的意大利游记的日记中写道：

若不是在这里见到四周的大海，根本不会有对这个世界的概念，也无法想象与这世界的关系。^①

——中部欧洲的学者，他们生活在内陆的国家，又屈从于封建领主，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的生活领域也都是学校的围墙之内，图书馆中，或者是城市的氛围。即使是黑格尔在其《法哲学原理》（*Rechtsphilosophie*）著名的第 247 节貌似将大海极度赞美为连接各民族的自然元素——“最伟大的媒介”，“最伟大的构成的方法”——其实事实上也不过是个行政笔记，对于惯常正襟危坐的哲学家们的概念文化来说，却

① 歌德：《意大利之旅》，法兰克福，1976，第 302 页。

意义全无。^① 说出真相，这在不出意外的情况下是一种在固定陆地基础上的端坐的行为（*sitzende Tätigkeit*）。罗马人坐着不动就能胜利（*Der Römer siegt durch Sitzen.*）。^②

只有离群独居的舒本华，远离大学和教堂，首先从思想上完成了突破，他将具有流动性的基础设置在一切之初：舒本华的意志（*Wille*）就是一个哲学家的海洋的一份声明——在这片大海上，主体按照个性化的原则（*principium individuationis*）隐藏在对空间、时间和自我性（*Ichheit*）拯救的幻想中引导自己的行为。尼采及后来的活力论者也都承袭这一发现，并宣称未来哲学的根本任务就是将固化了的主体流体化。在他们的著作中表达出了适宜远洋的主体性思想的新特色。

表达动员时代（*Mobilisierungszeitalter*）主体的野心的

① 这段话同样也因为卡尔·施密特而著名。施密特援引了它的思想，去构建自己的地缘政治准则：如同施密特所阐述的那样，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只不过是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243-246节在世界历史方面的发挥的话，那么施密特主义也应该作为对其第247节的发挥而形成著作。然而这一要求始终未能成形的原因不仅在于黑格尔的作品中关于政治的海洋学的欠缺，也在于施密特地缘政治上的基本定理——对土地、海洋、空气和火的统治的权力构建角色的教条——由于其基本理论的限制性而无法达到现代权力学说决定性的维度，也即媒体理论的维度。

② 原文：“*Romanus sedendo vincit*”“罗马人坐着不动就能胜利”，这是农业帝国时代的主要陈述：在这一时代中，命令、行政以及资源的开发利用相对于河流、循环以及投资拥有着优先地位。人们必须承认，17世纪和18世纪的欧陆国家所追求的现代化很大程度上首先还是和内部的开发有关；建立基础设施以及为物品和信息交流的内部市场（水渠、街道、桥梁、土地登记册、出版社、邮局、远程通信、度量衡标准、正字法、语法、学校教育体系、银行体系、法院、货币、税收、统计等）已经消耗了国家绝大部分的精力。因此，与外界建立联系的问题就退居次要地位。这在几乎所有的以陆地的实体不动产为导向的，因此也囿于农业智慧眼界的哲学话语中都有体现。

真正概念，其实并不是一个哲学家乐于做的事情，相反，小说家凡尔纳在尼摩船长的名言“动中之动”（*Mobilis in Mobili*）中找到了时代的方程式。这句动中之动的箴言以无法超越的清晰和普遍性解释了现代化的主体性想做和应该做什么。伟大的灵活性的意义在于，自身能不被他者的把握手段确定，并在一切可以到达的地点和客体的集合之中导航的权力。在流动的元素中自我实现：纯粹的行动自由权，完成了的混乱状态。^①显然，舒本华在其主要著作中简洁而明了地宣称“认出一切，而又不为任何所认出，是为主体”^②，便首先靠近了这一理论。

舒本华的同时代人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以他1841年的杂文引入了哲学的“美国逃遁”和航海重述——这也是为什么尼采在青年时代读爱默生的时候就已经从中看到了相类似的灵魂。^③在他那里，欧洲早期去边境时代在横渡大西洋中的进攻声调再次出现。

几个世纪以前，吉奥达诺·布鲁诺（*Giordano Bruno*），作为那个时代的一个独行侠式的人物，在他的《论无限宇宙和世界》（1583年，于威尼斯）中庆祝了人类精神从“孕育很少的继母自然”的贫瘠中以及一个吝啬的、局限于很小世界的上帝中解放出来：

① “自由意味着估算竞争对手的每个运动，并且同时自身对于对方来说完全无法估算。”泰瑞·依格顿（*Terry Eagleton*）：《美学及其意识形态史》（*Ästhetik, Die Geschichte ihrer Ideologie*），斯图加特/魏玛，1994，第77页。

② 《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一部分，第二条。

③ 参阅韦斯特（*Cornel West*）《哲学的美国逃遁——实用主义哲学谱系》，威斯康星，1989。

在无穷尽的大量的物的周围，并非如我们所想，实际是无边无垠，无界无疆……令人永恒生惧的是大地和它的海洋。^①

在布鲁诺看来，他自己的角色就是一个外部空间的哥伦布的角色，他应该赋予地球上的人冲破穿过幻象的果壳的洞察力。就像哥伦布在横渡大西洋回归后带来了大洋彼岸的信息一样，布鲁诺也想在他进入无穷尽空间的旅行回归之时把上方其实根本就没有边界的信息带回来。从世界出发，向各个方向延伸出去都是无边无垠的：这是布鲁诺的近代关于空间理论的核心观点，它与哥伦布带回的消息相比毫不逊色。^②

250年后，美国智者爱默生在其关于圆（Kreise）的缺乏怜悯的，乐观主义尝试中用下面的话回应了布鲁诺：

穷其一生，我们都在这样的真相旁边探寻着学说，围绕着一个圆可以再画另外一个圆，而本来就不存在着终点，因为每个终点都是一个开始……不存在外部，没有包围在外面的墙，没有对我们说的范围。有一个人喜欢把他的故事结束：完美而又终极！他将地平线一直填充到最外部的界线为止。但是请看，在另外一边又站

① 参阅布鲁诺《论无限宇宙和世界》对话，路德维希·库伦贝格译，达姆施塔特，1983，第23页和22页。此外，布鲁诺将他在精神上横渡宇宙，并突破“苍穹的最顶端”，进入无穷尽的宇宙之中的思考类比为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航海。这是能给人们带来无比欣快感的一种破除边界的思索。参阅《灰烬星期三的饭食》，法兰克福，1981，第89~90页。

② 布鲁诺：《灰烬星期三的饭食》，对话1。

起来了一个人，他又在原来的圆外面新画了一个圆，尽管一开始的圆曾经被宣称为是球面的外部边界……^①

19世纪末开始，欧陆哲学——就连所有的现象学、新唯心主义、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复辟——的专制主义、领土性的确证要塞逐步崩塌，这一过程只能延缓，却无法阻止。虽然晚了一百多年，但还是有德国教授们开始表达出讨论欧陆唯心主义哲学思想的问题的欲望。他们在考虑，欧陆唯心主义思想方法是否还适合人们从思想上去认识和理解真正的全球化关系。最近，他们还出于自己利益的考虑，更多地以英国的常识思维为指引。从这种思维出发，从古代的不可再批判的标准（Inconcusum - Standard）过渡到全球化了的概率文化要显得更容易一些，更不用说在理论上去迫近一个由波动组成的宇宙就显得更易于接受。这其中隐含着一种从“天主教”道路向加尔文宗的新教改弦更张的过程，前者将贫困和绝对的安全绑在一起，而后者则让富裕和风险对立并存。^② 作为对形而上学存有怨念的批判者，尼采首先指出，哲学思考，在查拉图斯特拉之后，必须从根本上与在神化了的的存在球体上理性虔诚的坚持并四下张望有所不同。

在近代的免疫技术市场上，保险业以其概念和具体的实施过程完全战胜了哲学的确信技术，并得以实现。控制风险

① 爱默生：《圆》（Circles），载《爱默生便携读本》（The Portable Emerson），新版，卡尔·博得与马尔科尔姆·考利，纽约，1981，第228、230页。

② 参阅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载《国家利益》，1989年夏，第7页。

的逻辑也比形而上学的追根问底显示出其良好的收益和可操作性。鉴于这个选项的出现，现代社会的绝大多数人都知道该如何抉择。保险打击显见——在这句话中，一切在技术世界中的哲学的命运就已经决定了。

美国是唯一一个没有走上保险和预防性措施道路的现代化国家，原因在于宗教，说得更宽泛一些就是“原教旨主义的倾向”，对于一个现代社会来说，保有了一种非典型性的重要性。美国如同排斥一切禁枪的尝试那样，也排斥了消解宗教存在的启蒙；对美国人来说，保险和安全首先还是必须是在个体的想象中实施的结构（基于一个相似的原因，好莱坞总是把英雄人物的形象，尽管他们与现代性的社会已经格格不入，时常搬上荧屏。当国家权力在持续存在的道德的荒野中无法做主的时候，那里的人们就需要有英雄的出现^①）。其他保险思想通行无阻的地方，人的个性倾向也有了变化，趋向于后现代主义的“无聊”社会：在这种状态中，很难再会有不安全的情形出现——于是影响和打扰便成为一种值得享受的例外情况。当事件本身是积极的，那么在市场上便充斥着对不一样的体验的诉求。只有过度保险了的社会才会产生出对不安全和悬崖边的风险的审美倾向。这种

① 参阅博利斯·格罗依：《等待大蚂蚁——和芭芭拉·库恩的谈话》（*Warten auf die großen Ameisen, Gespräch mit Barbara Kuon*），载《精神是块骨头——当下黑格尔美学》，斯图加特文化局档案馆编，1997，第8~39页。

审美倾向也构成了后现代的生活形式和哲学的标准。^①

保险事业的精神如此影响了所谓的风险“社会”中的行为，使得人们的心理准备如其名字一样：一个风险“社会”其实是这样一个社会，它事实上禁止一切真正有风险的东西，这意味着在出现损失的情形下，风险会由补偿措施加以规避。现代状态的反讽之处在于，人们必须反过来禁止一切曾经大胆的、为了达到现代的行为。从中可以得出结论，后历史（Posthistoire）只是一个表象上的历史哲学，而真实情况却是一个保险技术上的概念。后历史就意味着历史的行动（宗教创教、十字军东征、革命、解放战争、涵盖相应的承诺的阶级斗争）都不再被允许的状态。

① 参阅盖尔哈德·伽姆（Gerhard Gamm）《从范畴中逃逸——现代性终结中不确定性的积极化》（*Die Flucht aus der Kategorie. Die Positivierung des Unbestimmten im Ausgang der Moderne*），法兰克福，1994。

第 17 章

探险与真相

第一批航海冒险家之后的几百年，人们自然而然地遵循了把外部世界变得对欧洲人来说通行更加安全的节拍——既可以通过保险公司的行为，也可以通过有着最终解释作用的哲学科学。对这一计划，欧洲的经验科学作出了它的贡献。随着航海技术日益程序化和最优化，真实的航海之旅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它本来所具有的那种令人产生癫狂喜悦的作用，当冒险的成分缩减到了有限的范围，这就更接近于一种常规的交通行为——或者叫做通俗化了的往来航行的游戏，当然其中包含着一定的对于 20 世纪的物流业务使用者来说不能

接受的物损比例。还要在这里限定的是，完美的来往行程的对称性（这也是交通这个概念的精确的定义）只能在陆地上实现。直到建立起了轨道交通，才真正实现了对可逆运动的完全的控制。现代化的航空运输也在追求这种理想的模式，并力图使飞行器沿着准确定义的空中路线行驶。也就是在航海当中，还或多或少的保留着航海英雄时代探险发现和经商航行中去程多于归程的情形。

描述欧洲特殊版本特性的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冒险尝试总是带有出埃及记式的风采，尽管没有哪个朝圣的先驱在大西洋上模仿出埃及的旅行。^①近代的志愿者中不乏精挑细选的出走的民众的角色。而将要到达的圣地，也可以毫不费力地在其他的地方寻求投射。

于是乎，赋予这个时代名字的发现旅程构成了冒险事业的认识形式，它的行为举止仿佛是关乎事实的一项工作。如果说旅程中的去程具有明确的优先地位，那么这种长途跋涉就成了“探险”。所谓探险，进入未知世界并不是商事的、传教的和军事行动的附属产品，它实质上是整个行动的直接目的。我们距离近代运动的灼热的核心越近，驶向外部空间的探险特征就彰显得越发明显。尽管当时的很多发现之旅要被算到无名氏船长（Kapitän Niemand）或是冒险海军司令（Admiral Hazard）的头上，但是发现时代的实质仍然是探险这种行动方式。人们发现了，因为人们在寻找，人们在寻找，因为人们知道在哪个地方有可能会有所发现。到了19

^① 参阅米歇埃尔·瓦尔泽《出埃及记和革命》，柏林，1988。

世纪时，对于欧洲人来说已经几乎不可能不是在探险的情形下处于“外部”。

探险是一种重复进行的，以行动为形式的寻找和发现。因此，真正的全球化的决定性的运动并不是简单的一个空间扩张的情形，它属于近代的真相历史的核心过程。如果扩张没有在真相的技术球面，简言之，即在技术球面被预先规定为对隐藏事物的展现，那么它是不可能得以进行的。海德格尔也关注到了这一问题，于是在他 1938 年的那篇强大而暴力的文章《世界图像的时代》中，他相信，可以在把世界作为图像的占领中去认识近代的基本进程。

世界成为图像的时候……。世界图像，究其本质来理解，并不是简单的一个世界的图像，而是把世界作为图像来把握。整体中的存在物现在被这样理解，它只有通过一个有想象和构造能力的人将之竖立起来，才是存在着的。在形成世界图像的时候，同时进行着关于整体中的本质的决断。人们在存在物的想象之中寻找并发现存在物的存在性……

世界图像不是说从一个过去的中世纪的过渡到一个近代的，而是这样一个世界成为图像，这描绘了近代的本质……

那么，人本主义兴起于世界成为图像的时候就不足为奇了……人本主义指一种人的哲学阐释，它从人出发，并回归到人的方法来解释和评估整体中的存在物……

成为新的属于变成了图像了的世界。^①

近代的主导词汇“发现”（*Entdeckungen*），虽然它以复数的形式出现，但实际上标记了一个单数性质的过程。它可信地描述了历史超事件环球旅行和掌握地球——指的却是一切实践活动，借助于这些实践活动，人们使未知变成已知，不可想象成为习以为常。对于绝大部分还未去过的、未加以描述的以及未开垦的土地来说，这意味着，必须找到程序和媒体，全面和具体地将它们变成图像。“发现的时代”也就顺理成章地包含着由推动大地全球化的先驱者们推动起来的把图像放置到迄今为止非图像的位置或是把“照片”放置到幻象的位置的行动。因此，一切对土地、海洋和世界的获得都是从获得图像开始。发现者带回家乡的这些图像中的每一张都能否定外部世界的外部特征，并使其回溯到一个对于一般的欧洲人来说能够满意的、可以忍受的标准。同时，进行研究的主体也会将自身置于这些图像的对面，并退回到图像世界的边界——什么都看见，自身未见，一切皆标记，只是通过一个匿名的“角度”预先规定自身。

因此，按照海德格尔路线的指引，近代也是一个“真相”的时代——一个真相史的时代，由于一种在产生显而易见性时特定的风格而区别于其他。真相于是最终不再被理解成由自身而展示出来的东西，大概就是所谓希腊语 *physis*

^① 参阅，《林中路》（*Holzwege*），同上，第 87-88、91、90 页。

（作为“现象的种子的萌发”）意义上，又或是在基督教的上帝的启示的意义上的，在这里，无穷超验的上帝通过宽恕而发出宣告，人类完全凭借自身的认知手段则绝无可能明白其中的奥义。这种古代的和中世纪时期关于真相的理解和人们在科学研究的新纪元时代对真相的理解则有着鲜明的区别，因为后者把真相理解成一种由自身出发，而首先是人的介入使之进入一个不加遮蔽的状态，在希腊语 *alétheia* 的意义上，这大约相当于一种“不加掩饰的宣告”——对于这一概念，海德格尔终其一生都以狂热崇拜的接受姿态倾力倾听。随着近代的发端，真相似乎也过渡到了一个具有人为可揭示性的时代。从这个时候起，科学研究将成为，也必然成为对于隐秘性有组织的劫掠。当人们把文艺复兴展现为一个“发现世界和人”的时代的时候，其意图是再明确不过了的。

“发现”首先是一个集地学、水文、民族学和生物学技术于一身的把握各种信息的过程的总称，即使在开始的时候，这些行为都显得很原始，抑或是很偶然的情形下才出现的。当西班牙女王在派遣哥伦布出海时，曾下手谕，命令他要尽可能地将外部世界不知名的鸟类样本带回来，于是乎，科学和技术对自然的认识和干预已经隐藏在封建王侯的个人喜好的面纱下存在了。这样的干预史最终可以形成一个动物和植物园，其中按照现代化的展示方式将动物世界和植物世界分门别类。当学富五车的航海家，诸如教士汤执中把亚洲或南部海域的开花植物移栽到欧洲人的园林中时，毋庸置疑，这里面包含了技术的因素，如移栽种植和苗木培育。很

少有人会想到，并计算出人为控制的植物引种给我们的近代打下多么深的烙印，并为实现近代的更替作出了多大的贡献。^① 甚至那些在其过程历史上还时常被看做是纯粹冒险的事情或者是混乱无序的即兴发挥——如横渡波涛汹涌的大洋，给海岸线匆匆拍上一张照片又或是定义一个新的民族，究其本质，就已经是一个技术性的过程。对于所有的这些事情都可以无条件地适用海德格尔的那句话：“技术是一种去除遮蔽的方式。”

① 参阅亨利·霍普豪斯（Henry Hobhouse）《五种植物改变世界——金鸡纳树皮、糖、茶、棉花和土豆》斯图加特，1987；希特尼·W. 明茨（Sidney W. Mintz）《甜的力量——糖的文化史》，法兰克福/纽约，1992；阿尔福雷德·W. 克罗斯比（Alfred W. Crosby）《白人的果实——900到1900年的生态帝国主义》，法兰克福/纽约，1991；关于温室在移栽中的作用，参阅《球面学Ⅲ—泡沫》，大气层的岛屿，第338页及其后。

第 18 章

发现者的标志 论制图学和 帝国的名字魔力

如果说科学研究是有组织的去除对遮蔽之物的掩盖的话，人类知识扩张的历史中没有哪个过程比 16 ~ 19 世纪的对地球的全球化发现更能迅速而全面地完成上述历史任务。对于上述略显粗暴的冒险活动，早期极端右翼，后来渐渐偏保守主义的文化哲学家汉斯·弗莱尔（Hans Freyer）说得不无道理：

去谈人们行动时使用的技术是原始的还是现代性的，足够的还是有所欠缺的，这其实是个伪问题。每一

个技术都只不过是意志的武装，并且直到那个关键的节点，人们正好可以有所行动。^①

人们只要去搞清楚早期发现之旅当中，到过的新空间是如何受委托被绘制成图像的问题，那么那个时代的技术列车，就会很明晰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当中了。在最早的出海之行当中，船长及其随行的科学家、绘画师、书记员和天文学家们就毫不怀疑地认为，收集和汇报关于发现物的有说服力的标志是他们的一项使命，甚至他们还不满足于商品、试样和猎物，还要包括档案、绘图和合同。当航行通过一个未知的水体，只有把远处的眺望变成一种开发，把观察变成记录，再把占有用图像加以说明的时候，航行的功绩才具备应有的效力。发现了一个未知的事物——一个新的大陆、一座岛屿、一个民族、一种植物、一种动物、一片海湾或是一支洋流——的前提都必须是要能够提供重复该发现的方法和途径。被发现的事物，如果它应该成为掌握知识的人们安全而固有的东西，那么它就不能重新归于遗忘，永远和人们失之交臂。因此，发现的行动中必然就包含获得方法来保证它能够保障遮蔽物上面的掩盖能够永久地处于一种去除了的状态。理所当然的，文艺复兴时代的欧洲人谈及发现这个词

① 汉斯·弗莱尔：《欧洲世界史》（*Weltgeschichte Europas*），斯图加特，第3版，1969，第480页；弗莱尔隐约地知道，正是这种“正好可以行动的能力”是历史上的行动的根本标志。很显然，在后历史的视角来看，人们正是要避免这种事情的出现。（技术上原始，物流上冒险并且法理上尚不明确的）“伪问题”总是在人们在历史后（保险时代 *Assekuranz-Zeit*）的范畴重新投射回历史（前保险时代 *Prä-Assekuranz-Zeit*）的时候才产生的。

(Entdeckung, découverte, descubrimiento, discovery) 的时候既可以指那个找到东西的过程本身, 又可以指被找寻到的事物, 当然首先还是找到并保有的方法。

就近代对于开放的地球空间中的绝大多数发现来看, 起到遮蔽作用的只是距离。而当人们可以通过现代化的交通手段来克服这种距离, 并能够建立起横跨大洋的交通联系的时候, 这种遮蔽就显得微不足道了。作为动词的“发现”(entdecken) 直到 16 世纪的时候还有去除对象上面的遮蔽物的意思, 也即是指去除一个已知的东西。后来才有了找寻到未知的东西的意思。在第一个意思和第二个意思之间, 交通起到了中介的作用, 它克服了远距离, 能够揭开未知对象上面的遮蔽物。从这个视角看来, 人们可以说, 具有发现作用的交通的本质就是让世界“去远距离化”(Ent-Fernung)。全球化也就是指拥有技术的手段来克服远距离。

当人们抓取的胜利不断积累, 那么渐渐的没有被发现之物就显然成为一种稀缺的资源。1600 年前后, 世界仅有不到一半的地方被欧洲人模糊地认识了, 然而到了 1800 年前后, 人们就已经开发了全部地球的五分之四。人们感觉到未知事物作为一种储备将要枯竭, 属于一种 20 世纪末期启蒙的氛围效应。同时, 哥伦布关于可导航的行星很“小”的论点很实用地达到了目的。发现了的世界在开始时似乎要增长到无法测量的巨大, 到了我们这个时代结束之时, 已经收缩成一个小球, 一个点。

发现的目的是抓住: 制图学体现出了其世界历史的作用。图是保障被发现物的最普遍的方法, 只要它们被登记到

“地球仪”上，并作为确证了的发现物而存在。对于整个时代来说——同地球仪一起——二维的图像，无论是地图还是海图都是对地球的地点空间中的任何一个点人为进行定位，并摒除未知事物之上的遮蔽的最重要的手段。按照该行业的语言规则，“拍摄”照片，“收集”资料，并绘制出一张地图，由此，人们使得知识便于携带。而地图逐步取代地球仪而兴起也意味着，即使在最遥远的地方，人们的认识也已经深入了最细节的地方。

当地球仪——哥伦布时代的主要媒介——到后来越来越多的只具有集中呈现的意义，而最终只拥有一种装饰性功能，越来越精细的地图就有了越来越大的操作意义。地图单独就能够胜任描述土地的需要，有时甚至具有政治上的土地登记簿的功能。新出现的地图册就是把世界各个地方用合适的比例以一个地图集的形式装订成册（自19世纪晚期，地理学成为学校教育的一门课程后之后，欧洲的小学生们就已经被教育辨认地图。而这些地图的集合则是几百年来封建领主和权贵们从回到欧洲的参加航海和探险的地理学者、外交官和神职人员那里获得的资料的集中）。地图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是创造出平面投影的世界地图——这是一种把球面投射到平面上来展示地球的各个部分的方法。无论早期的心形的世界地图，还是像现在大多数新闻演播厅背景的展开大陆和海洋的地图，又或是传统的两个半球形的地图，右侧是陆地众多的托勒密式的古代世界，而由水占主导地位的美洲和太平洋则在左侧。

地图不可逆转的前进在全球化的呈现媒体上重复了海德

格尔强调的作为图像世界的占领的过程。当平面世界地图不断挤占了地球仪后，地图不再是以球形，而是以装订的图册的形式出现——这个角色的调换首先是受到了近代影响最大的地图册《墨卡托地图册》（*Atlas sive Cosmographicae Meditationes de Fabrica Mundi et Fabricati Figura*，阿姆斯特丹，1608/1609年）^①的带动，于是二维的媒体就走上了战胜三维媒体的胜利之途，理所当然的，图像也就战胜了形体。因此，20世纪的语义学家有很好的理由唤起人们的记忆，地图并不是土地——这一警告先认识到了“空间的回归”（*Wiederkehr des Raums*），行将结束的20世纪的对历史厌倦了的思想开始谈论这一话题。出于相似的原因，在进入21世纪的转型之时，被排挤了的旨在重新发现的读图和地缘政治的估算被推荐了出来。^②名如其物，铺平的球面（*Planisphäre*）——从其字面来看指平面的球体——必然要排除空间的深度，即对想象不能控制的第三维度的回忆。减去了深度，就将手放在了现实之上。绘画艺术史上关于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透视问题上能够说的东西，还完全没有触及争夺第三维度领导权的世界大战的表面。能成功地将球面画在纸上，或是将空间深度模拟在屏幕上，就能开启占领作为图像世界的无穷无尽的新的机会。帝国主义是应用平面几何学，是将球体在平面上，世界在表格上再现的艺术。主人决

① 参阅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不是全球化，而是大量的日志》，载《*Domus*杂志》，2004年4月。

② 参阅卡尔·施略格（Karl Schlögel）《我们在空间中阅读时间——关于文明史和地缘政治》，慕尼黑/维也纳，2003。

定了标准。主权也就意味着，谁能决定平坦化。能被占领的前提是能够成功的缩减一个维度。

通过航海和制图实现的土地的获得发生在世界体系的形成之前。喜欢自我呈现为欧洲世界庄严性的最后一个正统主义者的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在他的《大地之法》（*Der Nomos der Erde*）中毫不犹豫地声称，欧洲人的扩张仅仅依据发现能够命名的合法头衔。倚靠在发现之上的还有虚构的“寻得权”（Finderecht），同样还有突破单纯访问权的“交际权”（Kommunikationsrecht，弗朗西斯科·德·维托利亚在他的名著《关于印第安人》中捍卫的权利）的虚构。只有作为陌生的海岸和文化的发现者，欧洲人才有能力，以合法的主人的身份拥有世界的绝大部分。仅仅是这种做主人的意愿就赋予他们力量，让他们显示出能够胜任因其优势而向着开放的世界移动而分摊到的责任。发现者责任在施密特看来首先是为了欧洲的主人，首先是委托航海的国王们，用严格按照规定的姿态宣布占领新的土地。属于这种权利的法律仪式除了立起十字架、石制徽章、旗帜和王朝的标志外，还包括绘制地图和给土地命名。^① 在欧洲人的理解看来，土地只有先被定位，绘成图像，标记边界再加以命名，才能在法理上成为新主人的领地。

远处眺望、上岸、占有、命名、测绘再加上出具法律文书，这一连串的行为从法律上构成一个完整的、有意义的发

^① 卡尔·施密特：《大地之法》（1950），第三版，柏林，1988，第96～109页。

现行为。^① 在施密特看来，这与真正地把一块土地纳入一个发现占领者的领土中的手段密切相连。他把发现行为的后果赠予被发现者，当然以一种仅仅受到自己，而不是其他任何主人的庇佑的优先权的名义，这种优先权同时还可以因为有关远方的主权主人的剥削而分摊了各种风险。

如果海事的自然法的动机没有进入这种行为当中去的话，发现作为所有权法上重要的“找到”貌似是或者真的是无主物是不可能被固化为一种物权上的行为模式的。这种自古而来的把捕获和取得等同的原则来源于一种古代的习惯法，新土地的发现者类似渔夫，他无须任何争议就有权取得合法占有的捕捞物。麦尔维尔在捕鲸小说中就提到了“牢固的”鱼（Fast - Fish）和“松散的”鱼（Loose - Fish）之间的区别，这是新时代的猎手在海上捕捞时必须遵循的规则。所谓牢固的鱼，就是指已经被牢牢地抓在手中的；而松散的鱼则是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可公平竞争”（fair game）的，谁先到就先得。那么对于土地的获取也可以遵循麦尔维尔提到的这种区分。

① 关于哥伦布的占领者言语行为在法理上的形式主义以及话语理论的可质疑性，参阅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美妙的占有——新世界的发明：旅行者和发现者》（*Wunderbare Besitztümer. Die Erfindung des Fremden - Reisende und Entdecker*）柏林，1998，第87~132页。非洲研究者、记者亨利·摩顿·史丹利（Henry Morton Stanley）为比利时利奥波德二世在短短几年之间就和非洲的首长们签订了400份“条约”，它们中的绝大多数是以友好同盟的形式签署的，但从欧洲的方面来看则属于不平等条约和让步条款。与之相媲美的则是德国人卡尔·彼德斯（Carl Peters, 1856-1918），他以120项“条约”奠定了德国和东非关系的基础。

1492年时的美国，哥伦布将西班牙的标准植入这里，为的是在这里插上王室的旗帜，这和一条松散的鱼有何区别？波兰之于沙皇？希腊之于土耳其？印度之于不列颠？还有墨西哥对于美利坚？所有这些都不过是松散的鱼！

人权和世界的自由和松散的鱼又有什么不同？……如果不是松散的鱼，地球自己又算是什么呢？^①

不可否认的是，在法理上如此敏感，但在伦理上却又显得麻木不仁的施密特的关于来自发现的合法头衔而取得的欧洲统治的合法性定理是与前文描述的哥伦布式使命的模式抱有同感的，按照这种模式，索取者反而把自己想象成为带来好东西的奉献者。如果哥伦布从自己身上认识到是将基督教的解脱带到新的世界中去的话，那么施密特所捍卫的发现占领者也就能够心安理得地认为自己是给外部世界带去欧洲法律和文明的人。

不过，所有这些合法性的幻想不过是迟到的致歉或是法律上的毫无顾忌的事后应用。它们从一开始就已经同事件本身交织在一起。在诗人路易·德·卡蒙斯（Luis de Camões）的获取世界的叙事诗《路济塔尼亚人之歌》第四部分中，葡萄牙国王在梦中见到了印度河和恒河的河神，他们都是白人男子的样子，并要求他去引导那里的人民——于是，诗中的国王便决定派遣达·伽玛带领一支舰队去往印度。近代的

^① 麦尔维尔：《白鲸记》，第485页。

诗就是成功的诗艺。^① 曼努埃尔一世，又被称作好运国王，把地球仪放在他的徽章上是不无道理的——这是一个图像意象，今天众多的公司都会在其商标或者广告中使用这一图像。在他的那个时代，这还是一个完完全全的特权符号。在曼努埃尔之后，只有唯一一个私人被特许拥有这个权利：塞巴斯蒂安·德尔·卡诺（Sebastian del Cano），他在麦哲伦死后，于1522年将维多利亚号重新带回了西班牙，从而完成了环球航行。作为奖励，他也有权把地球标志放到盾牌上面，上面还写着这样的话：“你是第一个环绕我一圈的人”（*primus me circumdedisti*）。^② 他同时获得了一块葡萄牙王室的世袭领地巴西，直到今天，巴西的国旗上还有曼努埃尔地球仪。

看地球仪和占领之间的联想在此后不久的欧洲文学家那里就成了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意象。比如莎士比亚在一首大约出自1594年的诗《鲁克莉丝受辱记》（*The Rape of Lucrece*）的一些诗行中就体现出了上述象征意象：奸污者塞克斯图斯·塔克文（*Sextus Tarquinius*）打量着脱光了衣服的受

① 参阅 P. Sl. 《百慕大的露水——论想象力的几个秩序》，法兰克福，2001，第27-40页。

② “你是第一个环绕我一圈的人”这句话当中，具有决定意义，表示全球化的动词环绕（*circumdare*）最早的意义更接近于“包围”（*umgeben*）而不是“环绕”（*umfahren*）；这提示我们，地球在当时还被设想成一个可以被包围着的东西，比如人们把苍穹设想得像果壳一样包裹在外围，那么环绕地球在当时的设想中其实是不可想象的。而当人们成功地环游了世界之后，包围就被环绕渐渐代替；这种趋势最终就形成环绕作为一个新的包裹出现；现代化的环绕地球的交通替代了包裹地球的壳的地位，行动着的主体成为了真正的“围绕者”（*Umgreifende*）。

受害者：

她的胸部，就像象牙白的地球仪，围绕着蓝
一对未被征服的处女地带……
它又引发了塔克文的新的占有野心。

在近代的象征幻想的组织中很明显，一个圆的、值得追求的，看起来宛若在睡梦中平躺着的对象就可以被描述成为一个可占领的“世界”。

就像葡萄牙民族叙事诗宣扬伊比利亚的扩张民族为在少数值得尊敬的基督教民族中被遴选出的优秀者^①，从而为事实上的占领提供英雄式的合法性一样，地图和海图在占领中所起的作用就如同叙事体的法律手段和公证的文书，它以某种程度的格式性来证明新的占有和拥有关系。谁拥有了地图，谁就决定这块土地（*Cuius Carta, eius regio*）。这句话的意思是，绘制了地图，就能以一个文化、历史、法理和政治上拥有着决定权的人的形象出现。

关于欧洲扩张的标志，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一种发现者与被发现土地上的居民之间的不平等性。只要发现者们自己这样认为，无论远洋外的领土上有没有居民，它们都被看成是无主的领土。绝大多数情况下，新发现土地上的居民并不被认为是这些土地的主人，而是作为附属物，连同这些土地一

^① 欧洲近代缺少一个民族的、文化国家的和宗教集体的选择理念综览的表达。参阅埃里克·弗格林（Eric Voegelin）《上帝的民众——教派运动和近代的精神》（*Das Volk des Gottes. Sektenbewegungen und der Geist der Neuzeit*），慕尼黑，1994。

起被发现者划为自己殖民活动的发现物——可以说是“人类的动物种群”（anthropische Fauna），他们看起来是被捕杀和猎取的对象（其实在封建时代，欧洲领土上大多数人的命运也是如此）。所谓的未开化的人首先并不能了解，欧洲人决心对他们和他们所居住的土地形成图像究竟意味着什么。而当发现者在与土著居民接触的过程中意识到自己在技术和心理上的优势时——当然亚洲和伊斯兰教的帝国相对较少地能给欧洲人这样的机会——他们就理所应当地直接觉得有权去占领这些土地，并让当地的人们屈从于欧洲的政权。对于这种如此命中注定，以致充满了暴力的事件，卡尔·施密特在回顾它们的时候，仍然采取了毫无保留的肯定态度：

就像西班牙人能发现阿茨特肯人（Azteken）和印加人一样，相反他们也完全可以反过来发现欧洲的存在。这样说是完全错误的。印第安人完全没有基督教欧洲的理性知识能力，认为他们能够像欧洲人绘制美洲大陆地图一样绘制出欧洲的地图，不过是一种可笑的平行历史观（Uchronie）。精神上的优势完全在欧洲人这一方，并且它是如此之强，以至于新世界只能是一种“被拿取”的状态……

发现的行为是不需要被发现者的准许的。因此，它的合法名义处在一个更高级的合法化状态。发现行为只能是由在精神和历史发展上都具有足够优势的一方做出，也只有这样才能应用自身的知识和意识去理解被发

现者。用布鲁诺·鲍尔（Bruno Bauer）的一段颇有黑格尔意味的话来说就是：发现行为只能由那些比被发现者更懂得自己的人做出，基于这种教育和知识上的优势，被发现者能够屈服于他。^①

按此说法，地图——至少是在发现史的早期——是文明的主权请求直接的证据。“一个科学的制图事实上是一份真实的关于一个未认识领地（terra incognita）的合法名义。”^②必须要说的是，这就是一种地图主权，它对于被发现的世界来说，决定了例外的情形——这种情形会在发现者同新的主人给被发现和测绘了的土地标记上一个新的名字的时候出现。

如果我们对于近五百年以来地理上的命名政治的详细历史有所掌握的话，对于陆地全球化理论来说，其意义是不可估量的。在这段历史中不仅折射出了发现和占有的本初景象，同时也反映了相竞争的发现者和占领者之间的纷争。它还能像世界名称历史那样去展现由欧洲人的直觉推动的“世界去远距离化”（Welt - Ent - Fernung）发展的语义学方面。只有少数地区的文化有足够的力量对抗发现者并保留自己原来的名字。如果真能做到这一点，就说明其文化自身有着足够强大的抵抗力。总的来说，在欧洲人的理解中，地球的整个表面就如同一堆无名的发现物，他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些东西纳入他们的命名体系中去，并把他们的词汇系统投射

① 卡尔·施密特：《大地之法》，第103页和102页。

② 卡尔·施密特：《大地之法》，第103页和102页。

到整个开放的世界中去。伟大的人类地图（The Great Map of Mankind）——这句经典之语出自白埃德蒙·伯克——被欧洲人展开，然后按他们命名的喜好填写出来。给海洋，大江，河流，通道，海角，海湾和浅滩，岛屿和列岛，海岸线，山地，平原和国家命名，持续几个世纪地引发了欧洲地图学家们的热情，当然这其中还不乏他们的同行者航海家、商人和教士。只要他们出现的地方，无不如雨后春笋般的在这个迄今为止看起来还未命名的世界上产生出新的名字。

可是起了名字的地方还完全有可能改名。比如巴哈马群岛中的瓜纳哈尼（Guanahani），在1492年10月12日，哥伦布首次登岛后，显然是由他来给小岛命名，便给了它圣撒尔瓦多的名字，这从发现者意识形态来讲当然是占领者能够带来的最好的名字。早期的发现者们登上一片岛屿或是陆地的时候坚信，是由于他们的到来，才让欧洲的上帝给这片土地以启示。按这种习惯的话，如果占领者信奉了佛教，那么一定会把这座小岛命名为“乔达摩”或者是“菩萨”，而伊斯兰占领者就极有可能把它叫做“先知”。英国海盗约翰·沃特林（John Watlin）1680年占领了这座当时无人定居的荒岛，并把它作为基地。他就把这座小岛改名为沃特林岛，直到20世纪初。这似乎是海盜理所当然的权利，占领发现者的遗产，并给小岛改名。直到1926年，该岛才重新获得了哥伦布开始赋予的名字，而那个时候却又是无争议的。因为在巴哈马有五座其他的岛屿声称自己才是历史上哥伦布命名的瓜纳哈尼岛。今天的古巴岛被哥伦布叫做圣玛莉娅

(Santa Maria de la Concepción)，神圣的家族在加勒比地区得以确立。后来的海地有一段时间也享有被称作“小西班牙”的优先权。按这种方式，哥伦布把大量的岛屿和海岸地区都用基督教封建的欧洲的地名加以命名，它们中的绝大多数毫无历史渊源。

显然，哥伦布发现的这块新大陆——中南美洲——不是像当时全球化游戏的惯例那样，以他自己的名字命名，而是和他在开发新世界中处于竞争地位的对手的名字。根据德国地图学家马丁·瓦尔德瑟米勒（Martin Waldseemüller）1507年的一个不无问题的命名推测，这片大陆的名字最终按照商人、探险发现者亚美利哥·韦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的名字的阴性化方式命名（大陆作为承载生命的地方，所以必须是阴性的）。按照一些不是很确切的记载，韦斯普奇应该于1500年前后在佛罗里达东海岸以及亚马孙河口处进行了探险考察。为美洲大陆命名的胜利也反映了瓦尔德瑟米勒出版发行的，近似于一个心形的平面世界地图的成功。同时，这也是（与1506年以铜版画的形式问世的康达里尼地图一起）^①世界上最早的木刻雕版方式印刷的世界地图。这份地图——它当时的发行量应该有1000份，然而至今只有一份存世——旁边还有文字的说明，按这个说明，在出版发行的当年至少又加印过三次。产生于同一时期的瓦尔德瑟米勒地球仪同样按这个命名原则建议把美洲的南半部分也同样

^① 参阅约翰·高斯（John Goss）《地图艺术——绘图学史》，布劳恩施维格，1994，第73页。

叫做“亚美利加”。当然，我们仍然需要权衡的就是，瓦氏地图的巨大成功是不是更多的得益于他把世界图画成一个心的形状——尽管他的地图的心形还不如之后的欧龙斯·费内（Oronce Finé）以及吉奥瓦尼·齐墨里诺（Giovanni Cimerlino）的地图那么完美。^① 试问，有什么样的想象力能够比把世界设想成为一个心脏的形状更能打动人呢？尽管瓦尔德瑟米勒后来认识到基于韦斯普奇的推测而命名亚美利加的错误，但他本人已经无法阻止由于地图的推广而日益为人们所接受的名字。^② 在这个基础上，新世界的这些土地发展成为了被错误命名的美利坚合众国。

1515年的巴黎的绿色地球仪可能是第一个将亚美利加这个名字延伸到大陆的北半边去的地球仪。长时间以来，对这片新大陆不同的命名之间相互竞争着。1595年，墨卡托的一张地图上，还出现过“亚美利加或新印度”（*America sive Nova India*）的名字；1511年的一张威尼斯地图上把哥伦布发现的大陆叫做“神圣十字架的地方”（*Terra sanctae crucis*）；而在一张1543年的热那亚世界地图上，北美大陆是没有名字的，而南美则标记为“新世界”（*Mundus Novus*）。另外，在好几百年间，北美洲的东北部地区被称为“新法兰西”（*Nova Francia*），而西部和中西部地区则叫作“新阿尔比恩”（*Neu - Albion*），从这个名字就能看出是

① 参阅高斯《地图艺术——绘图学史》，第123、124、133页。瓦尔德瑟米勒的地图介于新的心形地图和更早期的大衣形的地图之间。

② 罗德尼·布鲁姆（Rodney Broome）：《未知地带——美洲是如何得到它的名字的真实故事》，西雅图，2001。

英国人给命的名。后来的美国东海岸叫做新英格兰，有一段时间叫做新比利时。而澳大利亚在 17 世纪时被叫做新荷兰。

在这种令人目不暇接的民族主义命名时代的早期，人们看到的是在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基础上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表达。一个时期，“新”作为一个地名前缀具有无比的创造力，与之相比，似乎只有在发现南半球的澳大利亚大陆的竞争中，“南”这个前缀能稍稍与之媲美。通过给新的城市（新阿姆斯特丹），还有新的国家（新海尔维地），南方的国家（南格鲁吉亚，新南威尔士），神圣的岛屿（圣撒尔瓦多），君主国的群岛（菲律宾）以及占领者国家〔玻利维亚，罗得尼亚（今津巴布韦——译者注）〕的命名，欧洲人享有了从语义上去克隆自己世界的特权，并且通过重现词汇上的相同之物来占有远方未知的点。

由于其影响力之大，制图学在全球化中的地位从来没有能够得到足够的重视。看地图和地球仪不仅是发现时代对人们的一种巨大诱惑，同时，它们也还作为采取占有行为的土地登记和证据，作为几个世纪以来累积的地理知识的档案，还作为航海的路线图而存在。除此之外，它们还作为发现时代的记忆媒体出现，其中记录了无数发现世界上新的地方的航海英雄和发现者的名字，他们的足迹遍布各地，从最南端的麦哲伦海峡到加拿大北部的哈得孙湾，从南部大海中的塔斯马尼亚岛到西伯利亚的切柳斯金角（Kap Tscheljuskin），从刚果的大瀑布到南极的罗斯冰障。与在同一时期逐渐勾勒出轮廓的艺术史相平行，发现史也在地图上创造出了自己的荣誉大厅。此后绝大多数的行动都已经成为测绘了的历史中

改变状态的挑战者。早在艺术和艺术史从先锋这个概念中收益良多之前，探索地球的先头部队早就在未来的地图荣耀的各条战线上奔忙了。他们常常会从欧洲的某个港口出发，然后力争成功地成为第一个去到地球上某个地点的人。

特别是剧情化的“占领”北极和南极的项目特别吸引那些意图流芳千古的人们，这一行动历来作为发现史上各种行动的顶峰。包括登山运动也是这种先锋人士们的一种疯狂的游戏形式。他们不能让地球上任何一个点处于未征服的状态。猎取首先到达极点的荣誉长期以来被人们看成是纯粹的神志不清的体现。对航空航天时代的人来说，已经不太能理解，在1900年前后，进入南北两极点的探险对于人们的吸引力和科学研究上的优先意义何在。极点不仅体现了无人定居的极远和极难到达之地，同时它还是一个对绝对中点的梦想，一个坐标轴上的零点，它完全就是在地理元素中寻找上帝的延续。

在这个语境下确实有必要提一提，作为无意识的发现者而闻名于世的弗洛伊德，正是处在这个人们竞相向极地进发的高潮以及欧洲人纷纷联合起来消灭非洲大陆上少数还未涉足的几个空白地带的时代。按其开发和建立的特征来看，心理分析属于亨利·摩顿·史丹利和塞西尔·罗德斯（Cecil Rhodes）型的远程火车（empire builders）时代。同时还要提及卡尔·彼德斯，后来德国和东非关系的缔造者，他在其哲学著作《意志世界和世界意志》（1883）中已经预先将非理性生活基础的帝国主义化概念化了。弗洛伊德的野心不过是以类比的方式去阐释这些人所做的项目。无意识难道不是

年轻的舍林的日子以来以模糊的轮廓登记在反思的精神的图像上的吗？难道没有足够的理由说，它黑暗的内部对于“文明的镰刀”终于成熟了吗？若接受了非洲占领者史丹利和贝克尔的著作的弗洛伊德在通往他自己的荣誉的道路上选择了每个人的心理中的“真正的内在的非洲”^①，那么他便以选择这一研究方向来证明了他在科研上的帝国主义直觉。

1872 ~ 1874 年，奥匈帝国的北极探险考察队在卡尔·魏普莱锡特（Karl Weyprecht）和尤利乌斯·派耶尔（Julius Payer）的带领下尽管发现了弗朗茨 - 约瑟夫 - 皇帝之地和鲁道夫王子岛，但他们的成果从其整体来看意义却是有局限的。弗洛伊德取得巨大影响的学说表明，他发现的并不是一个处在大地边缘的岛屿，而是一块炽热的、居于中央的“元大陆”（Meta - Kontinent），他的智力贡献的特殊性在于，用拓扑学的图像成功地取得了在事实上将人类的无意识命名为西格蒙特 - 弗洛伊德地（Sigmund - Freud - Land）的权利。而且他用直尺标记出不同地带间的分界，这一点恰好也和理性的领地规划的时代理念相一致。弗洛伊德将白人的精神负担以斯多葛式的方式背负在自己的肩头，并在他的著作中提纲挈领地记录道：“精神分析是一种为自我实现对本

^① 参阅《深度哲学——弗洛伊德之前发现无意识的文集》（*Tiefenphilosophie. Texte zur Entdeckung des Unbewussten vor Freud*）出版人，鲁德格·吕特克豪斯（Ludger Lütkehaus），汉堡，1995。其中关于弗洛伊德和“黑暗大陆”的关系，第2~7页。真正的内在的非洲的表达要追溯到让·保罗1827年的小说《赛琳娜》。

我不断占领的工具”^① 当本我悲伤的热带渐渐越来越多地被占领者经营，并且不可分析的卡里本们（Kalibane）宣称去殖民化，旧的弗洛伊德式的地面标志在很多地方仍然清晰可见。不过它们日子一长是不是更多的只能满足旅游者的兴趣，就不清楚了。

① 弗洛伊德：《自我与本我》（1923），载《弗洛伊德全集》，第XIII卷，第6版，法兰克福，1969，第286页。这片土地上已然人口稠密的事实同对其他帝国时代的占领者一样，几乎完全不能打扰占领者弗洛伊德；19世纪的磁疗者对于他来说成了无意识的印第安人，催眠者则成了巴勒斯坦人。

第 19 章

纯粹外部

如同弗洛伊德将无意识影射成为“黑暗的大陆”^①一样，指出极地探险人员遇到的“冰川与黑暗的恐惧”^②也是很能恰如其分地揭示出全球化时代具有发现意义的项目所具有的球面学的意义。当欧洲的商人和英雄们从欧洲出发，为了去获取远方的某个点的时候，那么他们只能是在把全球化了的地点空间已经设想成为一个均质的、开放的以及可以行

① 弗洛伊德：《弗洛伊德选集》，第 XIV 卷，法兰克福，1969，第 241 页。

② 克里斯托福·兰斯迈尔（Christoph Ransmayr）：《冰川的恐惧与黑暗》，小说，法兰克福，1997。

走的外部空间以后才能下定决心。欧洲人的一切获取土地和海洋的探险^①都以外部的球面空间为目标，这些外部空间与他们本身习以为常的生活世界是断然不同的。在这里就不能再适用海德格尔的那句存在拓扑学名言：“在此在之中有一种求近的本质倾向。”^② 外部性强大的特征在于，外部并不“总是已经”在居住的模式中被开发——开发的可能性更多的居于项目式的抢先行动之下，这就会导致居住和剥削之间的区别完全无法非常清晰地表现出来。随着发现和占领，生活的模式就以一种全球露营的方式实现了。梅洛庞蒂（Merleau Ponty）微妙的定理——“身体并不是存在于空间中，它是其固有。”^③——在这里便失去支撑。同样，梅洛庞蒂还声称，科学左右物品，并放弃“去居住它”^④。这同样也能应用到海盗及世界贸易当中；和自然科学一样，这两者与世界之间没有居住关系。对于海盗或是自由主义者的眼睛来说，在存在中“居住，就如同人居住在房子中一样”^⑤已经不再是真理。事实上，航海家和殖民者们，不要说是旧世界

① 这些已经由生态学的环境考虑而演变成最一般的形式。

② 原文：“Im Dasein liegt eine wesenhafte Tendenz auf Nähe.” 《存在与时间》，第105页。参阅《球面学 I》，法兰克福，1998，第336页及其后。

③ 原文：“Der Leib ist nicht im Raume, er wohnt ihm ein.” 梅洛庞蒂：《感知现象学》（*Phänomenologie der Wahrnehmung*），鲁道夫·贝姆译，柏林，1966，第20章，169页及其后。

④ 梅洛庞蒂：《眼睛与精神——哲学随笔》，在汉斯·维尔纳·阿伦特翻译的基础上，由克里斯蒂安·贝尔那斯整理出版，汉堡，1984，第13页。

⑤ 梅洛庞蒂：《眼睛与精神——哲学随笔》，在汉斯·维尔纳·阿伦特翻译的基础上，由克里斯蒂安·贝尔那斯整理出版，汉堡，1984，第19页。

的一切排水沟中的叛逆和邪恶，在外部更像是无人居住的空间中分散的疯狂的身体。只有很少的情况下他们能通过把所谓家的东西的迁移而能找到所谓的第二故乡。他们并不是生活在自家的热灶头上，而是依赖于在海事的行动空间中，由于不断前进而产生的摩擦热。他们变硬了的身体，（几乎）可以用德勒兹的话来说，是朝着道德去领土化^①的从未生活过的状态的方向“演变的温度计”。在外部空间，有一种类型的人是会受益的，他们由于较少受到外部事物的牵绊，而处处都能以受内部控制，敢于投机，无牵无挂，长袖善舞的形态出现。^②

也许这也可以解释男人在外部世界遇到陌生人的时候的那种令人不可思议的轻率性，他们会因为非常偶发的因素而相互消灭对方。他者，即外部空间中的一个主体，不是共同处在生活世界的球面中的共同居住者，也不是属于一个文化的或是共同生活的具有感官道德共鸣的主体，而是组成全部外部状况的或受欢迎，或不受欢迎的一个任意部分。如果说被过度保护的居住于某地的人在心理活动上具有容器受虐问题的话，那么肆无忌惮的人生的心理问题就在于消灭主义上，这是一种虐待狂的心理现象，这在12世纪基督教十字军身上已经能观察出来。这种心理倾向出现的原因是一种空间的错乱：在地球无边无际的茫茫大海上和在新的土地

① 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弗里克斯·迦塔利（Félix Guattari）：《哲学是什么？》，第212页。

② 参阅格尔特·拉艾特勒（Gert Raeithel）《向西去：关于美国人的心理历史试验》，法兰克福，1981。

上，全球化的执行者们从来不是作为在自己的土地上居住着的人而活动，他们总是作为被解除了束缚的个体，他们处处能找到行动的契机，也完全不可能去遵守任何的定居规则。作为离家出走的人，占领者们横渡冷漠的空间，并未走过一个在佛教意义上讲的“道路”。当他们从古代欧洲的世界内部空间共同的屋子中走出来，便会唤起我们关于飞弹的印象。它剥去一切支架，为了能在一般的非球面（Nicht - Sphäre）和非近处（Nicht - Nähe），在平滑的、冷漠的资源外部世界中游走，只接受委托人和欲望的指引，并且通过近乎残忍的手段保持形态。从地面上被发射出去后降落成功——狭义和广义上的理解——终有一天会决定，他们是否成为内部离心力的牺牲品，成为探险的心理理疗师，消失在虚无之中，或者是否能够成功地通过“新的客体关系”，重新建立陆地的关系，在远方的或是重新找寻到的旧的世界中重新定居。

达·伽玛在他第一次的印度航海（1497 年）时，曾经掠夺过一艘阿拉伯商船的财物，之后，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就将该商船连同船上 200 多个去朝圣的人，其中还有妇孺，烧毁弄沉。这便是发生在世界史外部的罪行的序曲。除了少数揭发殖民主义罪行的书籍，上述行为从未真正进入欧洲人历史意识关于近代的图像中，从而也未能让人感受到其过度的暴力。^① 全球化中消灭对手的行为突破了借口，创造出一

① 参阅罗莎·阿梅利亚·普鲁迈勒 - 乌里伯（Rosa Amelia Plumelle - Uribe）《白种野蛮人——从殖民主义到纳粹的种族政策》，苏黎世，2004。

种作为单纯消灭的超越于战争和占领之外的状态。水面的无边无垠唤起了航海家们道德的荒漠——“我消灭，故我存在”，于是每一个“任意的行为”（*acte gratuit*）背后都有着海盗式的情绪。在殖民地和国境线之外，就可以推行清剿行为，这到了20世纪成为欧洲人的一种全面战争的风格。在外部空间中，对抗敌人和消灭一个事物之间很难清楚地界定。因此，卡尔·施密特当然也有足够的权利指出欧洲海上霸权国家划出的所谓“友谊线”的历史意义。它的意义在于，构建一个文明的空间，在这个边界之外的外部便可开始成为一个无法可依的空间。^①

① 《大地之法》，同前，第54~69页。也请参阅雅克·德里达《友谊政治学》（*Politiques de l'amitié*），巴黎，1994，德语版，法兰克福，2000年。此外，尼采第一个发展出了道德上的代偿失调（*Dekompensation*）的理论：“人们更多的在自问，谁才是‘恶’的人……最严格的回答：正是别的道德的‘善’的人，正是优雅的、强权的、统治的人，只是被换了颜色，做了另外的解读，通过仇恨的怨毒的眼睛重新审视……同样的那些人，严格地以道德、崇拜、习俗、感激，更多的通过相互的警卫、同类人间的嫉妒而不越雷池，另一方面却在相互行为上独创性地表现出关怀、自我控制、好心、忠诚、自豪和友谊——他们向着外部的時候，即遇到陌生人的时候，便不会比脱缰的野兽好多少。他们享受着从一切社会的强制要求中解放出来的自由。在野外，他们通过这种紧张的报复来取得心理的补偿，以保证共同体内部长期的保持和平……”（《道德谱系学》，第1篇论文，II，KSA5，第274页。）

第 20 章

海盗理论 白色恐怖

在这样的语境下，除了奴隶贩卖（人们也把这个叫做流放工业）以外，海盗作为幼稚的全球化罪行的顶峰现象获得了历史哲学上丰富的内涵。它是无神论的第一个行动形式：在上帝死了的地方，或是上帝看不到的地方，在没有国家的地方，在没有神职人员的船上，在没有律法的大海上超出约定的尊重区域，在没有证人的空间中，在底线以外的道德空白地，实际上那里真的有可能发现不可想象之事。在开放的大海上也确实曾经发生了人类历史上能够出现的最极端的悲惨情况。

同时，海盗作为一个经济分支（这和 20 世纪的绑架业

有一定可比性) 已经很坚韧地在 16 ~ 19 世纪安全市场的空白处不受欢迎地待了下来 (20 世纪和 21 世纪之交, 人们还能经历到不快的后继结果: 出于一定的原因, 人们今天还会说“海盗的回归”, 特别是在猎物丰厚的马六甲海峡一带以及其他部分地区, 这里由于是海事警察系统的真空, 因此就给了一些海上进攻者们生存的机会; 在 2002 年, 共发生过 340 场劫掠案件, 呈上升趋势。^① 此外, 混乱的海事法也给恐怖分子提供了理想的条件。人们说本·拉登和他的同党们转行经营船务生意的流言也是不无几分道理的, 据说他拥有为数不少的货轮组成的船队, 悬挂外国的国旗)。海盗如果是一个行业的话, 那么它曾经和正常的商事行动紧密联系, 以至歌德令他笔下的人物梅菲斯托弗勒斯 (Mephistopheles) 说出了一段不仅能证明人物本身能说会道, 而且还有关生态全球化的理论的话:

人们问是什么? 却不问怎么样?

我不必知道航海。

战争、贸易和海盗,

三位集一体, 实在难分清。^②

战利品资本主义 (Prisen - Kapitalismus) 的教训还长时
间地回响: 从海盗无神论为源头开始, 现代社会思考极端自

① 参阅查利斯·格拉斯 (Charles Glass), 《新海盗》载《伦敦书评》2003 年第 24 期。同见, 威廉·兰格威胥 (William Langewiesche) 《亡命之徒的海——自由、混乱和犯罪的世界》, 纽约, 2004。

② 《浮士德》, 第二部分, 第 11185 ~ 11188 行。

由主义的和无政府主义的摆脱束缚的危险，这里是保守主义的党派恐惧症的源头。从古代以来，体制的维护者对于革新者的担忧和惧怕在近代转换成为住在陆地上的人对于在海洋上有所行动的人的惧怕。虽然这些人现在也同样戴着礼帽，端坐在桌旁，熟练使用鱼刀，但外露出来的仍然是海盗。因此，没有一个陆地居民能够毫无恐惧地想象一个不存在政治——在这里其实应该叫做陆地——优先的世界形势。因为设想一下，如果一个海盗上了岸，他心里有什么犯罪计划呢？他的武器隐藏在哪里呢？他用什么花言巧语来诱骗别人上当呢？他又用什么样的人道主义假面具隐藏自己真实的意图呢？当海盗出现在上流社会的社交圈子中时，为他们文过饰非的舌辩之士也必然在场。200 年来，资产阶级将他们的恐惧做了分类：无政府的航海者到了陆地上，最好的情况是变成一个拉斯科尔尼科夫（他做他要做的，但又会后悔做了）；较差的情况是变成个德·撒德（他做他要做的，并且不会后悔）；最差的情况是变成一个新自由主义者（他做他要做的，然后又引用安·兰德的话宣称自己就是那个代表未来的人）。

海上劫掠也会以别的方式进入资产阶级的思维当中：很早的时候，海盗世界就被在陆地生活着的人们想象成为一个极端自由化的反世界，在那里一切皆有可能，只是没有无聊。在艺术家的放荡不羁的群体出现前的好几百年，海上的海盗群体作为放荡生活的人群就已经给想过一些稍微不一样的生活、追寻不尽的刺激的人们带去了逃避世俗的梦想。从 18 世纪开始，零星地出现了女海盗——她们佩带宝剑，敞开衣衫，挺起胸脯——就如同为了证明新的女性也可以在海

上以海盗的角色而生存一样。直到布莱希特的《三分钱歌剧》（1928年）以及帕索里尼的《非法文件》（1973~1975年）都可以追述人们对于犯罪浪漫化的渴求，人们看到伟大的自由是从海上而来。席勒在他关于大海的剧作的草稿中也构思了如何勾勒一幅“海盗的飘移的国度”出来。剧作《强盗》的作者席勒不得不承认，海盗构成了能给人留下更深刻印象的反文化。

赫曼·麦尔维尔的亚哈船长的人物形象就是个一去不回头的航海者的形象，他在外部空间度过“无情的旧日子”，立起一座丰碑，像一座自由纪念碑一样耸立在高而昏暗的天空下。亚哈船长体现的是欧美航海妖魔的失败的一面——就是现代性殖民项目的黑暗一面。在心理学或是微观球面学方面有着强有力的证据，发了狂的航海者内在和外在的面貌极其相似，却并不是人的形象。亚哈船长的天赋不是近场的精神也不是高处的主宰，而是下部和外部的上帝，从对一切占有都不屑一顾的深处出来，是一个动物性的主权，就像那个白鲸一样，作者在书的开头对辞源做了解释：

“这种动物的名字来源于曲线或卷曲，因为丹麦语中的 *hvalt* 就表示弯折的或曲面的。”——韦氏词典

“鲸——更直接的是从荷兰语或是德语的 *wallen* 而来，盎格鲁撒克逊语中 *walwian*，卷，滚的意思”理查德森词典^①

^① 麦尔维尔：《白鲸记》，第8页。

由于鲸的那种“曲面”的身体，无论是欣赏还是憎恨它都会觉得它象征着一种权力，在无边无垠的深海底部自己旋转着。白鲸的雄伟代表着无法测量的生命对于猎人估算的永恒抵抗。它身上的白色同时代表了非球面的、同质的、非标记了的空间，在这里，旅游者感到被一切的亲密感，一切关于到达和返乡的感觉所欺骗。白色也是制图学家们用来标记未曾探索的地带的颜色。麦尔维尔将白色命名为“令我们退缩的无神主义的颜色”。^① 因为白色，如同深邃的白色的银河一样，会唤起我们对“没有心灵的空虚和宇宙的无限性”的记忆，还会令人心中浸透在冷漠的外部空间中消灭的想法。亚哈船长的鲸也就必须是这种颜色，因为它是外部性的象征，除此之外，它既不需要，也无力承担别的现象。如果说外部空间是给人这样的印象的话：

世界便像得了麻风病一样瘫痪在我们的面前，就如同一个固执的拉普兰旅人，他拒绝戴上有颜色的眼镜。值得同情的无信仰者盲目地盯着无穷无尽的白色的尸布，他周围的整个世界都包裹在其中。^②

大约在萨特让一个戏剧中的角色说出“他者即地狱”的话之前一个世纪，麦尔维尔就触及了更深层的本质：“外部即地狱”。在这样的恐怖景象中，不存在居住，而现代的点个体（Punkt - Individuen）相互间毫无联系地分散在空间

① 麦尔维尔：《白鲸记》，252页。（原文：“a colorless all-color of atheism from which we shrink.”）

② 麦尔维尔：《白鲸记》，第8页。

的冷漠性中。因此，关键问题不仅仅如同存在主义者所说的那样，在无意义中寻找到一个自由选择义务的方向，更重要的在于，当把人一般性的放置到了大地或者系统的表面时，在冷漠的外部定居，似乎他们能够通过赋予灵魂的吹气（beseelte Blasen）而使自己长久地稳定下来。人们必须敢于打赌，他们能够成功地面对着超越一切外部而不断扩张的尸布，在人为可创造的内部空间中，如此严肃地对待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就好像不存在外部的的事实一样。伴侣、同志、乐队、团队、民众和教会，它们无一例外的试图营造易碎的空间来对抗白色地狱的优势地位。只有在这样的自己产生出来的容器中才如同团结这个词在它最激进的意义球面所指的那样：现代生活的艺术目的在于，在不冷漠中触及冷漠。这就提出了一个把看起来有限的世界投射到无穷尽的视阈之中。^①

19世纪时说“自由的人民”时，并未理解，这其实对于现代化的强迫症群体——造成大量伤亡的祖国——的出现大有裨益。也许他们作为鉴于真实的一般化了的冷漠，以一种迄今为止前所未见的，只是被教会和学院模糊的预测到的方式进行结盟的人们的联想才会存在。

^① 参阅费勒姆·弗鲁瑟（Vilém Flusser）《从主体到项目》，载《弗鲁瑟文集》第三卷，本斯海姆/杜塞尔多夫，1994。

第 21 章

现代和新大陆症候群——美国学之一

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新楼的阅读大厅里镌刻着一段托马斯·杰斐逊的名言，它以无法超越的清楚和明了揭示出领土扩张时代的精神：

我们说，地球以其丰富授权我们这一代进行开发利用。

尽管这个论点源于 18 世纪末，但是却综述了一股从哥伦布时代起就一直贯穿于欧洲人扩张历史始终的潮流——这是一个把地球当做发现物和资源观点。在杰斐逊的名言

中，很难忽视其旧约式的殖民主义腔调，就像现在律师的惺惺作态一样：被赋予权利开发利用的一代人理所当然的就是被英国所抛弃，人们称其为新英格兰美国人的那批人，他们认为自己在北大西洋的海岸发现了新的圣地。对于18世纪的北方佬（Yankees，据说是按照印第安方言中“英格兰”一词的发音）来说，清教徒前辈移民们通过犹太化了的语言游戏，并自以为漂洋过海，重复了以色列人出埃及历史的行为已经很小儿科了。他们在宣称自己就是被选出来的优秀民族，并且拥有一块适宜自己的土地时已经完全不必咬住舌头，显得底气不足。如果真是如此的话，就意味着是对自己的历史使命的背叛，从而无法毅然地占有它。

从自然法的术语“授权当前的一代人对地球的开发利用”中，可以毫无疑问地听出，15世纪末以及麦哲伦航行以来，横渡大西洋的发现行动引发的世界形式的震动还余音绕梁。当太平洋“革命”——它令人们认识到了地球上相互交际的水面的世界的海洋特性——对于绝大多数的欧洲人几个世纪以来都不过只是一个抽象的、不受欢迎的，甚至引发乌托邦想象的“信息”的同时，发现第四大洲——南北美洲——的意义不仅限于地理上的一大轰动。为数众多的表达中还反映了新的神学和商事方面对于新大陆的兴趣。美国主义者们多方面将发现美洲大陆时的同时代人或是他们的后辈提出的神圣历史的阐释加以改写。占领者中的圣经主义者看来，美洲毫无疑问是上帝的一张王牌，它被藏在衣袖中几千年无人知晓，而到了最大的匮乏时代，西方国家宗教政治垂死挣扎的时候才打了出来。上帝还巧妙地让他的天主

教仆从哥伦布及时地发现了这片大陆，却又天命所归地给新教教徒们如同出埃及记一样的展示了二次出逃的方向。

在这里，我们试图忽略历史神学的神志不清（*Delirium*），尽管由于移民们笃信宗教而真的成为影响历史的一个因素。如果对北美上帝喜剧严肃的追随者感兴趣的话，可以阅读一下波士顿的科顿·马瑟（*Cotton Mather*）牧师 1698 年出版的著作《基督在新世界中的壮举》（*Magnalia Christi Americana*）。从那以后，每个世纪都有大量新的美国政治神学的示范性剧作——直到 2000 年小布什在总统选举中的所谓上帝意愿的竞选丑闻。让美国效应超越其地理的轰动性以及神学意义之上，成为近代的政治心理主要事件的是它对于后哥伦布时代的欧洲人空间、土地以及机会意识的照射。而美国人正是从这批欧洲人中而来。

美洲在大西洋的那一边，就如同一个储备的世界，在那里上帝同人类的试验可以从头再来一次——一个在那里到达、看见和获得几乎成了同义词的国家。欧洲大陆已经完全分封而建，每一寸土地几千年来都有其主人，每条森林中的小路，每块铺路石子，每座桥的通行权都规定了有利于领主的优先特权。相反，美国对于无数新移民来说则提供了完全相反的体验。这里几乎就是一个无主的国家，广袤无垠的土地你只要占有并建设，然后它就属于了作为占有者和建设者的你。这是一片定居者先于土地登记来到的新世界——一个对于白手起家的强者来说理想的天堂。因此，近代对于广阔世界的感觉是由美国的基本体验，占有土地和资源的随意性而决定的。除了为数众多的其他的社会特征以外，这里产生

了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一种农民，他们不再依附于地主阶级，而是拥有自己的武装，获取拥有自主权利的土地，在上帝之下，新占有的土地上生产经营的农场主。^① 每个一心想在远洋的新联邦遍地是机遇的地方寻求他的幸福的人，都会尽可能多的有所行动，这种行动（Unternehmertum）其实就是获取（Nehmertum）。也许神学家和法学家们所说的自然法不过就是新的获取者主体性形式上的展开。主体性给自己提出的任务就是，在水上或者陆地上取得自己本身。人的权利是生命的法理灵魂，而生命也是在可能的情况下获得其本身。仍然引自麦尔维尔：

这难道不是众所周知的话，占有是一半的法律，这意味着不用去管人们是如何占有的？不过时常占有就是整个法律。^②

尽管如此，殖民阵线上的获取行动者（Nehmer - Unternehmer）总是把自己的行为置于一条准则之下——为了把话说得更像康德那样——它似乎更适用于用来定义犯罪，而不是认识世界过程中的行动。因为当他们想通过单纯的获取而成为物品的占有者和所有人时，就完全忘记了公平的交换原则。而他们的良心却从来未曾有过一丝一毫的不安，就

① 亚当·斯密可以在他的《国富论》中这样说，在英属北美的殖民地，即使是一名手艺人，只要他略有盈余，便欲置地，成为定居之人或是种植园主：“他感到，一个手工匠人是他的顾客们的仆从，他的收入要依赖于客户，但是，拥有土地定居下来就不同了……真正的是自己的主人，不依赖于任何其他。”亚当·斯密：《国富论》，第313页。

② 麦尔维尔：《白鲸记》，第484页。

如同历史教导的那样，因为他们可以援引绝妙瞬间的权利（*das Recht des ausgezeichneten Augenblicks*）：在这一瞬间，公平性存在于采取占有行动本身之中，而不在于公平的交换和相互的认可。扩张的行动主体，无论是美国西部还是世界其他地方，都通过一种隐晦的理论来填补自己获取和掠夺过程中的道德空缺：历史上看起来有着这样的阶段，这时候行为必须走在立法准许的前面，那么我们现在正处在这样的时刻！用这样的理论，他们为自己寻求特殊情况而免除责任的权利。在规范性的时代被看成犯罪的事情，在历史的空白点上可能就是先锋行为。而在完善法律化的、充满束缚的后历史岁月中必须被当成罪犯，提起诉讼的人，在动荡的年代就极有可能成为冒险家、英雄和文明的传播者。不可忽视的是，今天的犯罪电影产业还在继续梦想着这块空白。人们可以把它定义成一个特区，在这里，还适用着不通过交换而直接获取的权利。

不可否认的还有，在获取的英雄时代，行动者们感兴趣的除了获取土地之外，还包括获取自身。他们把自身看成是离得最近的无主物，只需伸手抓取，便可获得，并创造成为一个机会。这一思想的代表人物就是丹尼尔·笛福，他不仅用笔下的鲁宾孙·克鲁索表达了一个攫取土地和自我的形象，还刻画了一个因其幸运和不幸闻名于世的女主人公摩尔·弗兰德斯。弗兰德斯从任何意义上讲都是个索取者，自我养成的窃贼（全部拿走，要快，就在这个时候动手），向生活中随机遇到的男人和财产下手。然而最终她自己的亲哥哥也成了这些男人中的一员。这在乱世中有什么好奇怪

的呢？

最近一段时间，越来越多的现象表明似乎要追溯历史重新法理化。这就导致获取世界时代的行动者们，从哥伦布到德·布拉扎，从弗朗西斯科·皮萨罗到塞西尔·罗德斯都要被事后追诉进入监狱——一个无穷无尽的，在程序上不确定的诉讼过程，其中有罪的判决和重审的申请相互交替。对近代的贩卖黑奴（只要是由白人商人，而不是阿拉伯人或者甚至是黑人自己进行的），屠杀印第安人，殖民掠夺行为的重新定罪实际上已经充分结束，却没有如同过去的诉讼那样，并不敢于宣称因为历史的状况而宣判无罪的辩护。即使是最坚决的立法者也很难面对如此之多的档案和调查结果宣布获取世界行为的无罪。

谁会去为以种族灭绝的目的将沾染了天花病毒的被子送到敌对的印第安人营地的美国士兵辩护呢？谁又会为那些人口贩子辩护？他们把人口当做牲畜一样卖到大洋的彼岸，仅仅运输途中就使得三分之一的人毙命！谁又会为比利时利奥波德二世辩护？他在刚果建立的私人殖民领地建立起了近代以来最残暴的强迫劳作集中营，集中屠杀了1000万人之多。由于这些史实，历史学家必然会转变成为本国文化的控诉者。从他们的卷宗中也可以看出，司法和历史的关系事后可以如何相互变化。^①

对过去的裁判已经渐渐把大地全球化的英雄时代全部涵

^① 以色列在南非多哈殖民主义大会上的谴责只是提供了对发生过的和正在发生的历史的一个当下阶段性的裁判。

盖了进去。近代的一切卷宗都如同一份长长的控诉书，控诉帝国的不正当性，非法入侵和罪行，研读这些卷宗唯一的安慰则是可以想到，这些行为以及野蛮的行径已经不会重来。也许大地的全球化和世界历史一样，都是一次性而不重复的罪行。

第 22 章

全球化的五顶华盖 欧洲空间输出面面观

如果人们想要理解高级大地全球化的球面学秘密，就一方面必须要试图回到在 20 世纪交通技术和暴风雨般的图片使得空间同质化之前，另一方面则必须要重新获得标准，去评价欧洲人以及他们的合作者在世界各个地方，共同参与到在新的舞台创造新的条件的不可估量的工作。如若起表达功能的风险承担者没有成功地在途中或是在对岸保持或是重建起微小的内部球面的关系，那么这种向地球空白地带的渗透就绝无可能发展成为一段对于欧洲人及其后代无论从地缘政治还是从科学技术角度来看的“成功史”。因此，一部大地

的全球化历史首先就必须被讲述成被随之带来的遮蔽物的历史以及看得见的或是看不见的起遮蔽作用的外壳的渡口。

人们完全有很好的理由来说，欧洲人的一项特别的技艺就是输出华盖——便携的天空象征。对于旅行者来说，它就是所谓的“头上的一片天空”。欧洲人在几个世纪以来的向外扩张中居于领先地位往往并非得益于他们的灭绝政策，更多的原因在于他们那种无论在哪个偏僻的角落都能够保留一个微小的自我空间的能力。当海岛居民移居欧洲后，在那里会很快失去其参照，而欧洲人总是试图从他们的船上、从使命中以及他们的自我技术中竭尽全力地将自己带到各个地方去。可以说，欧洲移民发明了“世界露营”。无论他们走到哪里，都会使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观察者：这个观察者是一个通过某种理论窗口去窥视他者的人，但反过来却逃避相反方向的观察。因为他们拥有一个随身携带的精神窗口，因此那些主导业务的欧洲人较之被他们发现的他者，一般都要在描写、分析和行动能力上占据优势地位。根本上说，进攻者之于空白空间的关系有着以下五种球面学上的解决形式：

- 船的神话；
- 基督教信仰；
- 对祖国领主的忠诚；
- 对外部空间科学的领会；
- 语言的翻译。

每个这种实践活动都产生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诗学，它们分别对阶段任务作出贡献，要么为去的人以及入侵者使外部空间变得可以生存，要么就迷惑它的集中和掌控。

第 23 章

船舱的诗学

对于当代人来说，船舱空间内心理体验的多样性是最容易被接受的，因为房车内部或是小轿车车厢内已经给了人们某种相联系的经验。如果这些交通工具不是以它们的内部形式在小空间维度上着眼球面构建的基础结构的话，对于现代的个体来说，拥有这些“交通”工具则并不能成为一种不可替代的并且通常情况下令人轻松愉快的运动实践。轮船，在适当的比例上如同汽车或房车，是一个动员起来的窝或是一个绝对的房子。^① 从存在的角度来看，任务就意味着：内

① 参阅《球面学Ⅱ—全球》（*Sphären II, Globen*）第三章，方舟、城垣、世界极限、免疫系统。关于围墙内空间的本体学。

部空间的动员——这和把生活范围累加起来相似。因为轮船同时实现了“在自己旁边”和逃避的双重要求，所以它——特别是以其早期的远洋轮船的样式——成为一个消除矛盾的原型。它将两个极端对立的追求——居住和冒险——统一在了一起。随之而来的则是给共生关系带来了可能性——感觉上就如同一艘驶向未知领域的飞船。轮船就如同一个肚腹，庇佑着一胎幼崽；他们要到他们能到的岸上去，在无语境依附的房门外做他们想做的事情。

同时，轮船也是团队神秘的技术球面的自我扩张——它是一个，如同一切现代化的容器状交通工具一样，是一个自我保持初始平衡状态的像地母（Große Mutter）一样，由外部因素操控的梦幻机器（那就留下了书写用心理史学方法来论证的关于交通工具迷信的历史）。因此，轮船对于船员来说就成为移动的故乡。海洋法认可了轮船为悬挂该国国旗的延伸国土，其实是追寻着一种本初的球面学的直觉：处在陆地上（An - Land - Sein）在这里从空间逻辑上和民权上过渡到了处在船上（An - Bord - Sein）；即是陆上的规则和自我空间的“和平”的本质特征被迁移到了漂移着的内部空间上来。

轮船最重要的功能当然还在于其排挤的能力，这一方面是从物理上讲，另外一方面当然是一种象征意义：因为轮船在流动的元素上漂浮，首先就要排开等体积的水，从而受到水的浮力漂浮起来。在社会球面上，这也符合人们能够通过成功地堵住漏洞，巩固在无法生存的元素中内部的优先地位从而紧密的结群向外扩张的规则。就像以前教堂的船

资本的内部

只为了成为基督徒灵魂在尘世的生活汪洋中的交通工具，而将排开水的能力迁移到陆地上，那么探险船只则必须在外部空间中完全信赖自己随时带在身边的自我营救的形式排开空间。

第 24 章

船上的牧师 宗教之网

从这里开始一切显而易见：如果船上没有宗教信仰，大航海时代的探险考察将是不可想象的，而这不仅是一个宗教的传统习俗的原因，也不仅仅说明了只有宗教信仰愿望的满足，才能通过精神的控制而吸引船员们出海的事实。早期航海中，宗教因素的无所不在（只是哥伦布第一次航海的随船人员中没有宗教人士，但却有西班牙王室派来的监军）更多地表明了一个第二性的、极其强大的球面诗学的机制的存在。首批航海家们的探险旅行能够如愿以偿，他们的团队依靠的不仅是航海的技术，同时其一贯培养起来的形而上学的例行

程序也起了一定作用。因为航海是一项时常受到极端情形挑战的实践活动，因此船上也要尽可能的有能在极端情况下提供帮助的专业人士。船会面临沉船的风险，同样，大海上也常常会遇到灾害，对于后者来说，船上需要有能够在危难中提供帮助的圣徒及其专业人士教士，他们能提供象征意义的安全。欧洲的航海也可以被说成是基督教的航海，并且在海洋时代到来的很久以前就已经是这样。这便意味着其向着不可或缺的形而上的保险体系的导向。空白的外部看起来是充满着恐惧的，也是因为它对于无数人来说蕴藏着死亡的日期，并且看起来人要被葬在一个欠缺着任何可以容忍的特质的元素中。^① 如果失去古代欧洲的殡葬和彼世思想的联系的话，腐烂在异地他乡就更是一个双倍令人无法忍受的事实。

但若我们没有从一开始就从两方面来看待航海的神职人员的话，是根本无法理解他们当时的职责的。一方面对于船上的船员，要用仪式去使他们保持稳定，要从动机上去控制他们，另一方面也对于外部世界的新人，他们将是对基督的福音感兴趣的人。

对于船员们这方面来说，基督教既是动力又是避难所——后者首先是天主教国家航海时的庇护者，保护人们的圣女玛丽娅，在勒班陀海战胜利后又被设想成为胜利之后圣

① 梅尔维尔在《白鲸记》中也抓住了这一点。在新贝福德港捕鲸者小教堂里，出海前，叙述者提到了一排黑框框起来的大理石石碑，为了纪念在外面遇难的海员：“……怎样死一般的空洞和怎样不愿意的怀疑来自这些字句，它腐蚀一切信仰，看起来阻止在不知道什么地方没有埋葬就毁灭的重生！”（《白鲸记》，第66页）

母玛丽娅 (Santa Maria della Vittoria) ——她是航海者们伟大的母亲，是在一切生命的危险和海上困境中的守护神。海上遇险时玛丽娅会保护我们 (In periculis maris esto nobis protection)。领主、商人、船长、水手和受洗之人皆处在她的庇护之下——装饰起来的船只如果处在玛丽娅的衣襟之下，沿途就会一路顺风。所有海员们的偶像，把整个大海包裹在她的裙下，世界之母的身体包罗万象（这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女性服饰具有宽大的衣襟，以及近代为何仍对将生命遮蔽在生命之中的形态学梦想做出妥协，并且是最终的几个妥协之一。这里，天空中的大衣球面 (Mantelsphäre) 再一次被拔高成为一个紧密的、具有人格性特征的、包裹的象征，尽管这个时期已经有宇宙学家开始从形而上学意义上把天空搞得令人绝望。

另外，对于新国家来说，基督教在发现时代的传教使命 (Mission) 就迎来了它发展的第二纪元——并且具有其双重功能，一方面作为新的使徒作用，使教会的势力不断扩大，另外一方面则是给殖民主义以宗教上的保驾护航。远洋传教的实践活动中，教会的武装殖民倾向和“阵线教会的” (frontkirchlich) 倾向，究其主要原因还是在于教皇对于葡萄牙和西班牙早期航海家出海几乎无条件的给予祝福。因为教廷一开始也在“伊比利亚半岛国家的泛化的传教使命委托中看到了天意所归的力量”。^① 由于罗马广博的胃口，教

^① 霍尔斯特·葛伦德 (Horst Gründer):《占领世界和基督教——近代历史手册》，古特斯洛，1992，第 87 页。

廷授予占领者如此之多的优先权，以至于天主教会相对于事实上自主实施殖民的国家来说，就快要沦为一个被剥夺了权力的副手的地位。尽管如此，教皇还是不单纯以最高的当事人，还是以全球化的公证人的身份踏上了近代的舞台，这一点在扩张活动的初期尤为明显。早期，教廷的这种杰出的作用首先表现在教皇对葡萄牙发现非洲的确认（于1455年和1456年分别发两道敕令 *Romanus Pontifex* 和 *Inter ceatera*），然后就是在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扩张野心出现摩擦，并争夺世界霸权时，起到了调解的作用：1494年签订的调停两国的《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当中，当然少不了教廷方面的参与。

哥伦布之后，天主教廷对于权势追求最明确的表达在于，教皇基于其职位的来源，从而宣称他是全球世界的至高无上的主宰。^① 在当前的形式下，欧洲各民族的君主国，即使他们笃信天主教，也必然会越来越猛烈地抗拒教皇对于更多优先权的要求。类似这种民族帝国的叛逆的声音可以从弗朗索瓦一世那里听到。1540年时，他要求皇帝的遣使给他指明，亚当新约（为圣经的一份伪书。——译者注）和教皇条款中哪些地方规定了法国皇帝被排除在世界分裂之外。

有关新教使命方面，它从一开始就比天主教有了更多的民族殖民功能。荷兰殖民帝国的传教士集体在莱顿参加联合

① 这种自我拔高落实到仪式上的象征就是教皇的三重冕，虽然说三重冕的基本形式自14世纪就已经基本形成，然而16世纪又在三重冕最上方加上了一个圆球，用以象征全球化的新世界形式。参阅《球面学Ⅱ—全球》，按语6，欧洲的除冕——关于三重冕的逸事。第788页及其后。

东印度公司的培训，就好像教会拥有传播福音的任务不是根据马太福音，而是受到了北大西洋自由贸易公司的委托。显然，基督教的传教使命，说得更宽泛一些——将宗教输出，是社会球面的连续体原则在从旧世界向新世界过渡过程中最重要的施动者，因为人们在同陌生人接触中可以把发现者和被发现者在类型和偶像崇拜方面的相似性的动机尽可能地移到前面来。

天主教教士的传教活动在将近 400 年的时间里究竟有多大成就，可以从 1962 年 10 月 11 日的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开幕式上窥见一斑，当来自不少于 133 个国家的大主教来到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里时——这是一个无比伟大的集会，如果不是有了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开幕式，那么这一盛况将是空前的，也是无与伦比的。大公会议和奥运会——两者都是欧洲集会项目成果的展示——直观地表达了，普遍主义的大伞所具有的遮盖能力。也正是这样的能够伸出去很远的大伞，才更加暴露出其无法克服的排他性。为了实际上构建一个宗教的或者是体育运动的人类内部空间，真正在现实当中聚首的只能是代表，“看守人”或是“精选”。而虚拟的一统则要以同时的媒体转播将事件的注意力转达到关注者公众那里才可以实现。因此，类似集会所能表达出来的大一统的质量不是由谁出场集会决定，而是由全体人员聚齐的建筑容器作为一统的象征来决定的。那些都是宏观球面学上积极的建筑艺术典型的最高形式：无论它是一座天主教主教堂，还是一座巨大的体育竞技场。在主教教堂里，宗教之船和穹顶意味着在罗马天主教信仰下把人们凝聚在一起的强大

力量。而在体育场中，新宿命论式的竞技场动机作为封闭的世界球面的象征出现。^①

以其日常的存在方式来看，教会以一个不集会的“神圣共同体”（*communio sanctorum*）存在，在地方上却又要通过聚到一起来保持自我，因此它总是面临着这样的任务，要把自身的活动组织得既不引起轰动，又要能符合传统的使之具有恒久的可操作性。此外，在基督教新教的单元中，离心力的作用更加明显。特别是清教徒的新英格兰牧区依靠的是通过自身恪守宗教仪式的实践来保持稳定的能力。为了理解在何种条件下这种向心的凝聚力是如何保持的，就有必要在眼前重构原始的木结构小教堂的样子。早期移民前辈和他们的家属于1620年11月19日来到马塞诸塞湾的新普利茅斯（New Plymouth，这里作者意指今天美国的马塞诸塞州。——译者注），然后大家就在那样的小教堂里集会。没有什么其他的例子能够比这个匆忙之中组织起来的礼拜活动更好的证明仪式的构架比实体的建筑具有优先地位。不仅仅在海德格尔所说的偏僻乡村（*Provinz*）中，人们定居在作为存在的屋子的语言中，在新开发的全球空间中散落的各点上，人们也在他们带来的传统和习俗的帐篷顶下装扮着自我。

① 关于体育竞技和其他的“集会性活动”在大众文化中起到的把人聚集在一起的能力，请参见《球面学Ⅲ—泡沫》，第二章：室内：泡沫的建筑学，第626页及其后，在那里强调了完全集中的效应只有通过将集会性活动（大空间）和人与人的衔接手段（大众传媒）有效的联系起来才会有效果。

第 25 章

总督之书

全球化探险的统帅，总督、海军上将和他们的军官们，除了宗教观念外，还要把他们所代表的王朝的主流形象带到海外去。派遣他们出海的国王的内在化了的形象——这和他们的画像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差异——具有这样的作用，即可以帮助他们在向外扩张活动中，无论是遇到艰难时刻还是在享受胜利的喜悦之时都能体会到个人化了的权力中心向外散射。无论是发现活动的载体亲身回到故乡，还是在精神上回思故土，他们都会摆出外在的或是内心的姿势，用以证明自身之于欧洲权力来源的归属感。这个起作用的方式和柏拉图

的光线的行为类似，光线从中心点发射出，为的就是在到达了反射点之后折返回去，回到光线始发的原点。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忠诚于国王的欧洲占领者和发现者都是欧洲太阳王散发出的具有执行力的走到半途的光点。19世纪的帝国派出的即使是最恶劣的使臣，也都会觉得自己是在履行国家赋予的一项把光明带出去的任务。欧洲诸国的特使们将帝国的荣光带到别处，他们将自己表现为伟大的使者的同时，也要学习如何成为一个收获外部世界财富的助手。他们在宗主国光明辐射的范围系统内移动，所有的发掘物也要首先归于故国的王庭。人们称为剥削殖民地的东西，证明的不过是殖民者们最为强烈的故土情怀。当然这方面西班牙人做得最为彻底，他们甚至发展出一整套复杂的政府体系来从事殖民掠夺行径。而所有这些人物与事件的遗迹，我们今天仍然能在塞维利亚的印第安综合档案馆（Archivo de las Indias）中看到。可以说猎取这门技艺的历史同大地的全球化一样古老：在16世纪初，在比利时安特卫普就展出过阿茨特肯（Azteken）帝国的金器，却没有任何人提出过这些金器财宝从法律上讲究竟属于谁的问题。阿尔布莱锡特·丢勒（Albrecht Dürer）以自己的眼睛来仔细打量这些属于完全不同的地方的一种艺术的作品。

如果内心没有国王的圣像存在，绝大多数早期全球化时代的探险者们也不知道，他们取得成就究竟是为了谁——为他们自己除外——，或者说，他们无从得知是谁的认可让他们的行为具有合法性并获得人们的尊重。西班牙殖民者在中南美洲的暴行也最终转化为对宗主国君主的忠诚，只是它的

表现形式有所不同罢了。总督（斯洛特戴克使用了 *Vizekönig* 这个词，它也有“副王”的意思。——译者注）这个头衔不仅有法理和记录的意义，同时也是一个殖民者心理政治的基础。总督之书还需要书写。由于总督们的存在，欧洲的国王们尽管从来没有去过他们的殖民地，但却始终在扩张了的地盘上始终并到处存在着。^① 在陛下想象的华盖之上，殖民占领者们和领主的海盗大肆搜罗着他们的猎物——他们运输回国的财富则被国王作为一种外来税源放入自己的藏宝室。在全球化的这段美好的日子里，财富源源不断地从海外而来，广袤的世界看起来只有向欧洲的王室履行纳贡的义务。

这在某种方式上讲也适用于精神世界的国王——教皇。他头戴三层的冠冕，试图将他的超越统治扩张到全球各个地方。而他的精英团队——耶稣会士，他们通过第四条戒律效忠于天主教教皇——（参阅本书第 11 章），从 16 世纪中期开始，用一个教皇的虔信者和向往罗马的信徒的大网来覆盖全球——这是张由忠于中心的各个部分组成的最为热忱的恭顺的遍及全世界的大网。可以说，现代化的世界范围的远程通信社会的模式就已经基本定型了。在遥远的地方教皇祈祷构成了今天人们远程通话的雏形。耶稣会士就是新闻组（*news group*）的原型，他们可以通过他自己的有着特殊组织的网络来相互传递消息。其他的修教会，方济各、多明

^① 当然，有的威尔士王子去过印度殖民地，但是总是在他们当上不列颠正式的统治者之前。

我、铁阿提那、奥古斯提那、圣洁受孕会、澄清会、希罗尼穆斯会、圣像会、赤脚僧会、加尔默罗会以及其他为数众多的修教会，都通过他们与罗马教廷的关联而忙碌于他们的事业，并将之视为教皇精神上的派遣者的成就。他们的雄心壮志就是要在全世界各个地方建立起忠于教皇的联邦。直到20世纪后期，教皇才适应了新的大众传媒的方式，亲自成为作为他的王国的使者去视察精神帝国的各个省份——这也意味着天主教过渡到了人格魅力统治的时代：这是罗马走向现代化的路径。

天主教的远程通信在教皇亲临现场时代之前，没有魔力的远程心灵感应式的机制是不可行的。这也同大的社会团体中形而上学的交际的规律相适应。第一位伟大的耶稣会士——在亚洲为罗马教廷开辟了印度和日本的传教士沙勿略（Franz Xaver）的遗体最后被葬在了印度的果阿（Goa）。而他的右臂则被带回了欧洲，“为成千上万人洗礼非常操劳”；这条臂膀迄今为止仍然作为全球化重要的圣人遗骨保留在罗马的耶稣教堂之中。

第 26 章

全球化的图书馆

如果早期大地全球化的发号施令的行动参与者既不是对国王忠诚的船长，又不是隶属于教皇或教会的传教士，那又如何呢？他们不必感到自己似乎被排斥在了更优越的机会或是欧洲扩张活动之外。对于有着世俗意识的开发世界的先锋者来说，有着足够的方法和途径，出现在全球化的诸多特殊华盖之一的下面。即使没有宗教信仰的精神也有着很好的前景，能够在探索大地的项目上拥有满意的收获。如果不能为身处欧洲的国王取得域外的新领土，也没有为教宗赢得更多的信徒，那么当他明白了自己对于欧洲

经验科学所作出的贡献，就可以作为一个征服者或是一个带回财富的人而回到欧洲的港口。这一开放式的学科由地理以及人类学组成，由最初狂热的扩张主义者作为一个新的学科建立起来；它是各种认识的积累，而其方法上的现代性以及欧洲认识世界的时代特征的归属感则像写到了它的额头之上一样不言自明。

这些认识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它们像另外一种资本一样聚集起来——当然是一种资本，它属于一个启蒙了的人类的群体，而不再是为某些神秘的理论家、知识的私有者、地方上的魔法师以及封建领主和他们的机要人员为了公开的抑或是民用的用途而被抽走。在关于外部的人们、有益的自然以及人们定居的地球的新的科学背景之前，一个识文断字的欧洲人即使是在最边远的孤岛或是在大陆最荒僻的地方都不会觉得自己与故乡的意义系统的渗透完全隔绝。外部阵线上的每个生命都潜在地承担着积累的经验的气息，并以写作记录的形式投射出来。无数船员和研究者为地图和海图的绘制作出的贡献在前面的文字中就已经提及。地图学上的贡献实质上只是整个过程中一个非常特殊的形式，人们把这个称为全球化进程中的欧洲经验科学的华盖效应。这座华盖现实地以及潜在地保护着处在外部边缘的行动者不至于堕入毫无意义的空白中去，也不至于在与无法同化的新奇、异样、陌生和孤寂碰撞而产生的抑郁中消沉下去。

经验科学以及它们在文学上的附产物，游记、乌托邦小说、异域小说将一切外部的状态转换成观察，再把一切的观

察转换成最终被写成新欧洲理论的伟大书本的消息——“观察者”总是作为主体而存在，他们将会把自己“所见”和“所得”记录下来。建构主义的观点认为，观察是一种借助于核心判断对事态进行描写的行为。这用来理解早期的远行者是相当恰当的，因为他们无论走到哪里都在做着“带走还是不带走”的基本判断。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所谓黄金年代的发现者作家群：布甘维尔（Louis Antoine de Bougainville）、阿拉戈（Jacques - Etienne - Victor Arago）、福斯特父子（Reinhold und Georg Forster）、索伊默（Johann Gottfried Seume）、达尔文（Charles Darwin）、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和亨利·摩顿·史丹利（Henry Morton Stanley）。首先至少由于其读者群的庞大，而使他们有机会栖身于世界级文坛。理解、带走、贡献、合作、向前和系统化等诸行为的新时代特征就是一切重要的研究活动都体现出竞争性的形式。在科学荣誉的领域里，人人争相书写符合了向着需要达到的目的而前进的竞争心态——特别是对于极地考察来说，探险者们绝大多数同时也是在叙述着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将他们在探险过程中的苦痛公之于众。于是乎，在科学研究和表演结合在一起的时候，终于从通俗的水平上使人们认识到，任何一种科学的探险式考察都有可能成为一个媒体的素材——今天，我们也可以在很神秘化的活动，诸如基因研究、人脑研究、癌症研究上观察到类似的情形。对于全球化的伟大的日子来说，若无媒体对其拔高，或许他的主人公根本不能足够地认识到他们的目标在哪里。

探险活动在大众传媒的观察下起程了，然而此时大众传媒的作用还并不突出。所有有着写作话语权的参与者在向着未知领域起航时都把目光聚集到一个想象的超媒体之上，它能仅仅记录在外孤单的成就的故事，并把这些故事带回来：当所有的研究者的孤独被聚集在这座华盖下面以后，必然能形成一本梦幻般的、集众家之大成的书——这是一本记载了认识的书，它也不会忘记任何一个把经验带回来，并为这本关于开发世界的巨制作出过贡献的人。当然并不能排除，这样的一本想象中的关于欧洲经验知识的书或早或晚的成为一本真实的出版物。法国启蒙运动者的实践天才在这里得到了彰显，早在18世纪中叶，也就是大地全球化才进行到大约一半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开始致力于实施编写有价值的知识的百科全书的计划。它让一直以来非正式的以理论形式存在着的华盖形成了一个可以构筑的能安排和包罗各种知识的圆圈形状，这同时也是个能占据书架的很大一块地方的知识领域，一共17册文字本，11册图片本。其中来自远方的知识条目被上升为有认识价值的形式。这可以说是人们用文字的记录来欢庆对于先前一无所知的空白领域的认识。

收集经验，并将之带回家乡的行为有时候也有它颠覆的和有失礼貌的一面。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定然从和航海家以及自然科学研究者莱因侯德·福斯特（Reinhold Forster）的接触中体会到一二。据说，后者在获得哈雷自然科学教席后，一次觐见国王时，用比一般在宫廷中更为大胆的方式向腓特烈二世说，他一生中迄今为止见过五位国王，其中三个

人很野蛮，两个人很谦和，“但没有人像陛下您这样”。腓特烈当然把这样的话看成是“无状之人”的妄言。但是这个时候还能对国王说些什么别的呢？若是能像他们观察异域的酋长那样去观察封建时代的国王们的话（欧洲的国家仅仅作为领主们的领地来观察），不久以后便无法再向国王以及大臣们隐瞒，其实他们已经来日无多了。^①

^① 参阅福斯特《塔希提的发现之旅》，第 419 页。

第 27 章

译者

当参与到欧洲经验科学——在超级华盖的作用下有可能产生百科全书的同时，语言研究者和民族学者们遇到了一项艰巨的任务：在与各种不同的外语接触的时候，他们要能在语言上掌控整个外部世界。此时的欧洲占领者语言就面临着无比多样化的多种符号系统。它应该由超过 5000 种（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数字有 6700 种）的语言以及完全不可忽视的大量方言以及亚方言共同组成，而每种语言也都有着自己的神话、“宗教”、仪式、艺术和手势。鉴于语言数量如此庞大，试图通晓所有，不过是痴心妄想，于是乎幻想能

出现一种统一一切的超语言的理想便理所当然了。无论对于欧洲的发现者，还是当地的被发现者，存在着两种应对新巴比伦的语言混乱的策略：一方面可以通过强制措施在殖民地推行殖民统治者语言作为日常通用交际语，比如只要看一下英语、西班牙语以及法语在世界各地各不相同的推广与发展史便可知晓。另一种策略就是殖民者通过翻译来与各种语言的人群进行交流。两种策略同时并行，无论是哪种策略，语言学习——同时语言的翻译——可作为当地球面诗学过程的钥匙。无论人们是倾向于悲观还是乐观的翻译理论都无关紧要，双语性和多语性都在大地全球化的进程中行使了最为重要的一种华盖功能。还是要强调的事实是，一般总是欧洲殖民者的语言更多地把当地的语言拉向自己一方，而反过来，当地语言设法清除殖民者语言中的惯用语的例子则相对鲜见。^①这就应验了政治家同时也是史学家的温斯顿·丘吉尔的一个聪明的直觉，英国的历史不应该仅仅写成一部帝国史，而是一部英语区的历史：《说英语的人的历史》（*History of the English - Speaking Peoples*）共四卷，于 1956 年到 1958 年出版。显然，他预见到，语言上的英联邦要比政治上的英联邦更为耐久。这种组织不仅满足了英国人把英美的分野表现为一个单纯的发音上的问题的需要，同时还使新的

① 关于克里奥语言世界，参阅约亨·施特里希（Jochen Störig）《语言冒险——世界语言概述》（*Abenteuer Sprache. Ein Streifzug durch die Sprachen der Erde*），慕尼黑，1992，第 345 页及其后；关于语言的数量，参阅戴维德·克里斯塔（David Crystal）《剑桥语言百科全书》，法兰克福/纽约，1995，第 248 页。

政治团体和文化圈子在进入以英语为母语的人群俱乐部时有着开放的选项。从语言的角度去衡量，当今确实所有的科学家、飞行员、外交官和商界精英以及新新人类都不可避免地归入到英语为主的语言网络之中；这其中当然还要包括美妙的流行音乐世界。确实，在英语世界——就如同在宗教以及在轻消遣文化中一样，媒介即是信息。

谈到基督福音，在福音的传递过程中，并不能等待着那说着 5000 种各自不同外语的人们自动向它走来，提出需求。基督教必须自己将福音翻译成人们能够理解的语言，并向他们阐释上帝谕旨的重要性。为了用别的语言来传播他们的信仰，基督教翻译家们的工作，从质上讲或许还并不一定，但从量上讲毫无疑问是最近 500 年来人类历史上最杰出的文化功绩！——单就新时代的基督教自我翻译成为无数单个的文化的事实就是迄今为止具体的跨文化的基督教界在运行上的可能性和复杂性的最强有力证据（它大约可以和荷马史诗的译本在欧洲以及欧洲以外的语言中的数量一较高下）。新约全书到了 20 世纪末为止，已经被翻译成了 1800 种语言——了解世界语言地图的人应该知道，基督教的福音已经可以传递到世界上三分之一的语言群体当中。而且还要知道，在很多这些语言群体当中，《圣经》的译本甚至是该语言的第一部书面文献。

这种情况在教会内部的话语中被看成是圣灵降临奇迹（Pfingstwunder）以古腾堡方式的延续，它又同时揭示出一个无法回避的特殊性问题：尚未到达的所谓小语言给福音的普遍而有效的传播设置了界限。由此，圣徒传播福音的实践

行动，尽管非常具有渗透性，仍然不能使在地中海的传播者和世界范围的内容提供者的基础上，渗透到最细微球面而建立起福音帝国的梦想成真。这一论断仅在人们将自然科学在现代化国家的胜利进军阐释为古希腊文化在近代阶段的传播成就时不成立。雅典的传播者似乎毫不费力地就到达了读不懂罗马或是耶路撒冷的信息的地方。

近半个世纪以来，太平洋畔的电影制片中心好莱坞取代了地中海附近的罗马和耶路撒冷作为伦理与奥秘的信息发射中心的地位。好莱坞的信息从一开始就没有准备面向那些小的文化圈，因为它们的市场对于新的娱乐帝国的产品来说过于狭窄。它的电影只要有 20 多种语言的同期配音，就已经能够带来足够的利润。(214)

第二部分

大内部

“就像在地球上到处都是上面一样，所有生命的形式都是当下……”

亚瑟·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第 28 章

同步世界

摩登时代：哥伦布四次航海的五百年后，地球被环游了，遮蔽被完全揭开，一切得以充分展示，人们占据并使用了它。现代化的交通和远程通信往来犹如密集的蜘蛛网遍布。虚拟的外壳取代了想象中的苍穹天，随着电子通信系统的发展，距离的去除已经有效地植入了权力和消费的中心。全球的游戏者（globe players）生活在一个没有距离的世界。从航空的角度来看，乘坐喷气式客机，整个地球都可以被缩减到最多 50 个小时；而卫星环绕地球，俄罗斯米尔空间站，以及新近的国际空间站（ISS）环绕地球一圈的单位时间则

缩减到了只需要大约 90 分钟；而对于无线电和光信号的传播来说，地球已经成了一个几乎不动的点——信号在不停地旋转，几乎不需要时间，形成了一个电子信号的垫子，地球的表面宛若有了第二个大气层。

大地的全球化因而被推进到这样的程度，让它看起来如此异乎寻常，以至于人们意欲再次让它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就如同直到 19 世纪时，事实上的占领一块土地就成为欧洲民族国家实现其殖民要求的最终论据一样，有效地执行大地全球化也成为该过程本身自我形成的论据。在经历了大约几百年的助跑阶段后，世界体系日益稳定下来，成为一个由自我促进的旋转和振动的运动构成的综合体。在循环的资本帝国中，动量超越了所有的动因（Grund）。执行代替了合法化，事实成为不可抗力。谈及全球化，就如同在谈“命运”一样。

16 世纪开始的事情，在 20 世纪得到了完善：地球表面已经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只要货币在那里经过并停留，能够幸免成为一个场所（Standort）——场所并不是场（Feld）其中的一个盲点，它更多的是一个地点，在这里人们能够看到自己被看到。液化的革命还在继续，洪流在往塔尖攀升。所有的城市在此期间，如其所表现的，都成了港口城市，因为有些城市即使没有靠近大海，大海也会涌向它们。作为超级商品的信息并不是通过所谓的高速公路——就如同在网络话语早期形成的一个象征性表达那样——到达每个人那里，而是有更好的理由被认为是随着信息海洋的洪流涌过来。通过其旧的和新的媒体，“全球化”持久的宣布，它发生并继

续着，藐视一切替代的可能性。因此，它也特立独行地不依赖于哲学以及其他有反思理论的烙印。全球化只进行着欢庆自我为主题的自我的对话。对形势的谈论取代了批评的位置。诚然，世界的进程可以注解为借助于人的行动而实施的上帝的行为最全面的形式。没有什么一般的忽略意志能够影响它的继续。没有任何理论的和实践的当下的研究能够躲藏到地球被环绕，而地球上的民族和文化都处在调和的强迫之中的事实。所谓的反全球化者世界范围内的运动以其单纯的存在提供了新的保持现状（*status quo*）的不可欺骗性的证明。反对者在指出世界体系的不正常功能时，恰恰就是在证明其运转正常。这就如同反对地球自转的人根本无法摆脱随着他们脚下的地球一起跟着运动的命运一样。

所以说，大地的全球化可以比作一个公理，第一也是唯一的前提，当前时代理论必然的出发点。尽管分散在各地的民众到最近一段时间之前仍然处在他们的内部层面之中，就如同处在分离开来的星球上一样，他们在语言的封闭中同外界隔绝，对他者的无知形成自身的免疫，着迷于自身的痛苦和光荣——他们在现代消灭“远”的革命的强制下，不得不承认，从现在开始，他们由于自身对于具有运动性的他者的可及性，而生活在了同一个星球上，一个没有遮蔽的星球。

因为大地的全球化是个单纯的、后来在独一无二的情况下出现的事件，因此，它不能被解读为一个永恒真理或是不可避免的必要性的宣告。在全球化中看到生物学的定理，认为地球上的一切人类都共同构成一个种属，则显得绷得过

紧。同样，尽管有人相信，或是假装相信，人作为一个种属共同拥有不可分割的真理的同一份财富，但是全球化并不能为此作证。全球化其实并不能反映出道德的法则，按照它的要求人应该尽可能友好和同情地去想他们余下的同类。关于为了所有人的潜在的开放性的幼稚想法已经被全球化的事实证明为谬误。相反，不可避免地人对于人的兴趣在世界网络化的进程中越来越明显——改变的只是道德的重心，尽管神经麻木不断增加，却还向要求更多承受性的方向发展。人们不必惊讶于，当世界网络化不断发展之时，却显露出更多的厌世的症状。如果说自然而产生的对人的恐惧是对于不受欢迎的邻人的回答，那么因为强制而导致远方成为近邻的事实必然会让人们预见到一种传染性的厌世情绪。它将只会使那些人大感惊讶，他们忘记了“邻居”（Nachbar）和“敌人”（Feind）这两个表达从来源上看几乎就是同义词。在这样的背景下，诸如“教育”（Bildung）或者是“世界公民”（Weltbürgertum）这样的概念就有了不一样的意思：它们未来标记了弥散着厌世情绪的标准的视阈。

直到最近以来，无一例外地刻画了“所有的人”“与生俱来的”特征的东西，就是他们共同忽略了自身族群容器之外的大量的人的倾向。人类的这种互相忽视的精神情绪状态在一开始的时候是毫无过错可言的。作为分散居住的一个种属的成员——他们事实上的散居在外世界交通的“革命”之后也仍然没有克服——，人在其宗族、民族、街区、俱乐部以及利益集团当中理所当然地避免从属于其他的认同性单位或混合场景——即使是共性论者俱乐部也不例外。用人类

学的话来讲，人们可以说：在所有生物当中，理智的人（*homo sapiens*）有着最宽阔的后背——他需要用它来朝着周围的世界。处在世界之中（*In - der - Welt - sein*）总是带有压倒性的对于所有当前不能被关联的事物漠不关心的特征。在“全球化”的精神效应当中，一个事实凸显出来：它总是把人类学最难以置信的事情，不断计算远处的他者、看不见的竞争者和容器外的陌生人上升为规范。

全球化了的世界是同时了的世界；它的形式是制造出来的时间公平；它的一致性就是在当前性中显现。^① 虽然未来始终还会有国家和人们处在黑夜中，处在地球的阴影中；但是世界却成了没有黑夜的地方，对于未来，它始终沉溺于一个贯穿始终的白天律令（*Tag - Imperativ*）当中。在开发了的和被呈现出来的全球空间中再也没有暂停时间。特别是世界市场以及刚刚起步的世界内部政策的思想逐步将习惯上的对永远也不可能相遇的遥远和陌生的无视排挤到了防御之

① 参阅斯洛特戴克《庞然大物的行动时间——文艺性的本性论误读》（*Tatzeit des Ungeheuren. Zur ontologischen Missdeutung des Künstlichen*），载斯洛特戴克《不拯救——海德格尔之后的尝试》（*Nicht gerettet. Versuche nach Heidegger*），法兰克福，2001。在这一语境下，前面提到的马丁·阿尔布洛（*Martin Albrow*）的建议就很有趣，1492~1945年（或者是到里约热内卢的环境会议）这段时间可以被同义的称为“现代”或者“全球化时代”，开始的跨国世界形式的全球时代（*Global Age*）从中沉积出来。全球化的英雄时代已经为这一时代创造了前提条件。如果把全球性以这种方式理解成全球化的结果和充分完成的事实，那么在这个我们已经进入了的“全球的时代”的身上，后历史的结构就凸显了出来——这意味着重点从历史向新闻，从地区的过去指向向跨地区的未来指向的转移。只有这样，阿尔布洛卖弄风情的格言“忘记现代！”（*Vergesst die Moderne*）虽然还难以接受，却也容易理解了。参阅马丁·阿尔布洛《告别民族国家》（*Abschied vom Nationalstaat*）。

中，并将一切参与者挤压到一个有着现实的相遇机会和同时的接触必要性的平台之上。全体人类逻辑的综合在一个充满强权的种属概念之中，并将他们纳入一个便捷的交通世界中来，全球化的结果是强制性的具体化和创造强制的探险而来的产物。

在前文中谈及的关于往来交通中，去程的优先问题（参阅本书第 17 章，第 146 页及其后），在这里终于到了关键的地方：通过几个世纪漫长的由欧洲人单方面到别的地方去的去程，当人类学的视阈作为各民族和文化的全体大会而开发出来的时候，才开始有“人”或者说“人类”——这是一个运动，它直到最近才被越来越蓬勃的逆向交通（Gegenverkehr）加以平衡，变得越来越复杂。这种逆向交通和欧洲人回到自身的姿态相混合——这种混合的产物称为多元文化（Multikulturalismus）；它的运行模式就是象征世界的杂交。^①“人类”——它以不断向前的自我发现和网络化作为偶然世界史^②中的模糊的和分裂的副主体（Para - Subjekt）踏上了同时代思想的舞台，一个迟到者，它的出现，虽然不是其特征，却始终完全屈从于它的发现的偶然状况之下。

① 福朗索瓦·拉普拉汀/阿莱西斯·弩斯：《杂交——从阿西钦博尔托到宗比》（*Métissages. D'Arcimboldo à Zombi*），巴黎，2001。

② 吉尔·德勒兹/弗里克斯·迦塔利：《一千个柏拉图》，柏林，1992，第 11 页：“存在着一个世界历史，但是它是一个偶然性的历史……”

第 29 章

第二地球

“人类”绝对不是通过性的欲望（Libido）构建起来，组成一个总体的协会，并为此创造出必要的媒体。更多的说来，人类学上的集团首先是通过殖民主义的强制联系而产生，然而在其消亡后，又继续通过实体的商品交通、信贷系统、投资、旅游业、文化输出、学术交流、国际警备干涉以及生态学标准扩张生产效力的网络结构存在着。当下第二地球（Zweite Ökumene）的无理要求并不特别显现在，无论哪里的人们都必须承认，任何别的一个地方的人和他们是同样的（尽管公开或者私下里否认这一点的人仍然不在少数），

而更多的在于，他们必须能够忍受不断增长的合作压力。鉴于共同的风险和跨国家的威胁，在合作压力的挤压下，人们成为一个自我逼迫的公社。对民族国家分析的结果——按此结果，民族国家只有通过令自我更加紧张的持续交际来保持自身的形状——也在越来越多的程序上证明其是适用于尚没有完全聚合了的地球上的“国家共同体”（*Staatengemeinschaft*）。自我生成的紧张是一切大型的共识和合作机制的基础。^①

鉴于世界行动者之间相遇压力的不断增长，国际政治以一种显著的方式演变着：它在我们的眼前看起来已经从伟大行动的年代走了下来，过渡到一个伟大话题的时代——这意味着一般化了的风险，最终凝结成语义的机构，随之成为新型的共性。这些需要在持续谈论中的琐碎工作，话题政治和相应的大肆操办的大会只能作为自我生成的全球紧张的生产而向前迈进。它们的承载者为了日益成为由相互走近的紧张社区组成的整个人类而行动。

现实网络化的、被话题移动的交通人类从近代的大地全球化中通过殖民帝国的作用被提升进入世界市场的关系（并且是潜在的新殖民主义的联盟）之中。他们的这种虚拟集合并不能表现出人类学的社区在人类自我发现和自我组织

① 参阅斯洛特戴克《共同存在的强大理由——回忆人民的发明》（*Der starke Grund, zusammen zu sein. Erinnerung an die Erfindung des Volkes*），法兰克福，1998。从紧张的和后紧张的机制中派生出一般性的文化理论的令人振奋的尝试由海因内·米尔曼（Heiner Mühlmann）呈现出来：《文化的天性》（*Die Natur der Kulturen*）。

的历史中形成的最初形态。哥伦布以前的欧洲人已经设计了一个“同一种属”（*Gattungseinheit*）的思想，包装在希腊语概念 *oikumene* 当中，意思是“居住了的世界”。人作为生物的这些殖民地的核心还是局限于罗马的地中海文化区域，而在它的边缘只有托勒密大地观的三块大陆：余下的欧洲—西亚—北非，是被照亮了的，那么这样的同一种属思想就很难有什么大方慷慨可言。古代世界概念的要点并不在于人必须要以任何一个地方为家的观念。对于古代人来说，并不在意宣讲所有族群的人都是经济的动物（*oikein*，居住）或是依赖于家的有缺憾的生物，不能放弃头顶上的屋顶以及其他属于基本需求的東西。对于古代的世界大同（*Ökumenismus*）思想来说，人不是那样一种因为他们生理上都或多或少有着相同的需要，并能够因此相互认识对方而有权利的生物。人更多的是在早期哲学家的思想中就本体的统一成了同一种属的成员，他们超越了地区的象征性而共同拥有统一的世界秘密。他们共同望向同一片光，需要仰视同样的问题。共同拥有显而易见又隐藏着的现实的超越的基础的观念建立起了埃里克·弗格林所谓的西方第一世界（除此之外，在中国也有一个关于开化了的统一体的思想，中国人把它叫做“天下”，即天空下面的所有的东西——人们在翻译这个概念时常用“帝国”）。^① 弗格林回顾了古代西方最初的人类统一思想的形而上的结构，并精辟地表述如下：

^① 参阅埃里克·弗格林《秩序和历史》，第四卷《天下时代》，第六章，第 272 ~ 299 页。

普遍的人类并不是在世界中存在的一个社会，而是一个象征，它指向了人的意识。在他尘世的存在中共同拥有努力改变形态的现实的神秘性。普遍的人类是一个末世论的目录。

没有普遍性就没有人类，除非是作为一个生活种属的成员的集合；也将没有人类历史，就像猫也没有猫的历史，马也没有马的历史一样。若人类需要有历史，则他们的成员们必须回答灵魂当中神性的当下的冲动。如果这是条件的话，那么人类就通过他回答的神被构建起来。以这样的方式，人们发现，同一生物种类的诸社会随机累加起来，构成了唯一的人类，拥有着唯一的历史，而且是受到了共同拥有神性当下的共同洪流的影响……^①

按这样的方式投射的“人类”的统一基础（Einheitsgrund）从这个角度来看，既不是地中海的商品交通，也不是罗马帝国统治时期的民族聚合。依照对他们的自我解释最严格的重构，古代人更多的建立起的是一个“问题共同体”；他们受到共同拥有同种的迹象的启发，又因为对于大家来说，同样存在谜一样的结构而变得异常团结。它构成了包含人类本质的人性尊严，而这种本质又从同样的不可测量的“基础”上突显出来。尽管制造战争机器和交通工具，以占领地中海周边地区成为罗马人专属的本领；但是当他们向四

^① 参阅埃里克·弗格林《秩序和历史》，第四卷《天下时代》，第六章，305页（斯洛特戴克译）。

面八方扩张之后，作为占领者，却又在精神上为被占领者所征服。就像贺瑞斯的诗中所说，当“被屈服的希腊迫使野蛮的占领者”，这就是因为希腊的哲学神学已经揭示出普遍可以倾听到的理性声音的结构——人们毋宁说它是一种具有强大的出口能力的确信技术——，以至于它潜在的可以在纯的思想展示给所有人，无论你属于哪个民族。弗格林认为这是一种“认识的显灵”（noetische Epiphanie），它是希腊哲学对于世界结构有着重要意义的永恒哲学（*philosophia perennis*）的一大贡献。^①此后，耶路撒冷以基督教的先兆，而取得了和罗马分庭抗礼的资格，这也是通过私密的和公开的上帝共同体的福音连同教会集会中的信徒们的灵魂一起：正是基于上述情形，“圣灵的神迹”同样被发展成为一个普遍的、不再受到民族制约的东西。

罗马上升为永恒之城并不首先以本地的诸神灵的名义，朱庇特、玛尔斯、维纳斯、维尔图斯（*Virtus*）、维多利亚（*Victoria*），而是因为它成功的转型成为第二个耶路撒冷，在狭义的范围，也可以说成了第二个雅典。因为它的同化和迁移能力，作为帝国皇帝和教皇的城市具有成为第一地球的首都的能力。在大学和近代的科研院所建立起来的很久之前，永恒的罗马（*Roma aeterna*）以其古欧洲形而上学力量

① 参阅弗格林《秩序与历史》第三卷，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Baton Rouge*，伦敦，1957，1990年新印刷。我们在这里提及弗格林的巨著，因为它，尽管对于今天已经几乎不存在什么影响力，也可以被看成是哲学的天主教教义典范式的自我穿透。这部作品中还特别能看出，对永恒哲学的捍卫在 20 世纪时常不情愿地成为了对被捍卫者的追悼。

的点作为显见（Evidenz）在尘世上的表现：它要在雅典和耶路撒冷之后，成为存在即自我展现的城市。它要求所有的来访者都要把去罗马的旅途看成是一次通往显见，同时也是通向神秘的朝圣之旅。

在此期间，大地的全球化也使得罗马这座万城之城去中心化了。它从古代欧洲的全球范围向四方辐射的形而上的中心成为一个众多场所中的一个。下面的情况绝对不容小觑，1776年7月4日，签署美国独立宣言的56个人，几乎无一例外的是共济会成员以及业余形而上学家，他们宣称自己的合法性首先来源于显见，然后才是人权——就好像他们直觉上明白，如果不先取得真理上的跨越大西洋，摆脱欧洲也是不可能成功的：

我们认为这是显而易见的真理，即人生来平等……

（We hold these truths to be self evident…）

对于全球时代的人类学公社来说，处在每个灵魂中的，弗格林所言的“神性的当下”式的形而上的统一基础已经再也看不到了。因此，人们必须找到所有人共同存在的另外一个媒介。

第二地球已经从各个方向突破了第一地球的共相。它将基督教和希腊的世界概念及其假设的逻辑都给配上了一个乡村的（provinziell）修饰语——只是它还继续宣扬着自身的共性。基督教也必须来验证其特殊性，它是否可以通过突进成为一种世界伦理而获得扩展了的权威——这个项目，汉

斯·昆（Hans Küng）和其他一些人以后来的基督教神学家的热情在研究探讨着，将证明较远的未来。

可以肯定的是，没有哪个所谓的世界宗教能够成为作为全人类的大乘教法（Großes Fahrzeug）。每一个宗教从长期来看，都需要努力地保持其在世界市场中迎合人们形而上的需要的份额。正是这时，对于综合的万有宗教来说，不再拥有为人类学公社植入一个统一语言或是一个封闭隔绝的词汇。^① 在这个形势下，降低对种属的统一基础的要求就显得格外有说服力了。

第二地球可以从第一地球那里学到的东西正是在于，展现人类的统一基础时依据所谓的“生物基础”是没有用处的——尽管新近的、政治正确的基因科学证明了所有人类同属于一个同质的基因组。这种亚当式的种族主义是一种与一切之前的生物集体主义有着相似结构的狂迷体系，尽管基因方面的论据不再被用来歧视某个种族，而是用在了种族的联合统一之上。

所以说，第二地球可以宣称“人类的统一”——为了暂时让我们的表述听起来像 18 世纪的语言——并不是通过共同的自然基础（*physis*），而是因为共同的形势。这个形势是单纯的生态学和免疫学确定的，并处处指出文化的文明化的强制。这意味着，没有一个地域的传统生活形式能够以其单纯自身的方式适应新的情况。在其高度分散的种属当中的人类

^① 参阅约翰·费格尔（Johann Figl）《宗教的中间——普世宗教运动的思想与实践》，达姆施塔特，1993。

的统一现在依赖于，所有各自处在其地区和历史中的他们，都成为被共时化了的、远方被涉及的、感到羞愧的、被撕裂的、被链接上的和被过分要求了的人——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幻象的诸场所、资本的地址、均质空间的各点，人们回到这些地方，这些地方也可以回到自身——看到的比去看的多，抓到的比去抓的多，达到的比朝目标迈进的多。每个人，无论男女，都必须从现在开始，从回归自我中去理解做他们自己的好处与坏处。全球化后的“人类”——绝大多数成了在自我的皮囊中的落后者，是场所劣势的牺牲者自我（Ich）。

世界进程本身，完全没有哲学的情况下，也把人以无法预料的方式从中间移开。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他们经历的不仅是如某些异化理论家抱怨的所谓成为过时的和陈旧的人，他们对于自身来说还成了外部的人——成为从外部望向自身，而意欲返回到内部的自身近旁时无法确定是不是在家的人。

如果说在第一地球当中，典型的人是冥想与绝对之间断裂了的关系的智者和通过宽恕而可以觉得与凡夫俗子相比距离上帝更近的圣徒的话，那么，第二地球中典型的人则是那些世界明星，然而他们却永远也不明白为何他们会取得比其他人以及匿名的思考者更多的成功。匿名的思考者在时代的两个核心体验面前打开自我：一方面是不不断突破的“革命”作为“无穷尽在这里和当下（Hier - und Jetzt）的体现”^①，另一方面比原罪更能刺激今天的清醒的生命的是：永远无法

^① 参阅吉尔·德勒兹/弗里克斯·迦塔利《哲学是什么？》，同前，第116页。

抗拒对于一切活着的人普遍存在的屈辱感。

在最后的球面，第二地球的场所上，不会再有众层面的层面——既没有信息构建起来的，也没有世界国家的，也完全没有宗教的 [因为如果谁还和哈贝马斯或拉辛格 (Ratzinger, 教皇本笃十六世。——译者注) 一起乞灵于宗教的统一力量，那么就需要一个比今天的人们实际拥有的更加不怕失望的性情]。包括有着多样化的潜力的互连网络，作为一个超级的包含系统，产生了一个补足的超级排他性地带。仅由表面构成的球不是为了所有人而存在的家，而是所有市场的总体，在这些市场上，没有人能够处在自己的近旁；没有人应该试图以那些货币、商品和虚构交易主人的地方为家。所有的供货商和顾客都在一个普遍的外部相遇，世界市场的概念既是对这个事实的认定，同时必然提出这样的要求。只要还存在着作为整体概念的世界市场或是诸市场的集合，在集成的人类内部空间 (Menschheits - Innenraum) 中的放到家或者是首都中心的深谋远虑的再生的一切思辨都将失败。

如果说在中世纪都没有能够成功地将上帝的球和地球集中合成到一起^①，那么现代若要开展这项杂交的项目，把多样化的作为下级层面的文化和行动的场所集合成一个集中的单一层面的话，就只不过是做疯狂的事情。这一点是马歇

① 从深层结构角度来说，这是永恒哲学为自己拟定的思考任务，而因为它无法实施，因此便只得归于失败。参阅《球面学 II—全球》，第 5 章，《神还是球？或者：爆炸性的万物为一》(Deus sive sphaera oder: Das explodierende All - Eine)，第 465 ~ 581 页。

尔·麦克卢汉看起来没有足够重视的东西，他有段时间还没有完全失望，并倡导他所谓的全球村：“人类媒体的扩张导致整个星球的类人化（*Menschwerdung*）。”^① 同样的东西，今天或许在基督教的异端教派传教中都不一定会重复。媒体理论家的期待是如此的气度宏大——帝国中心主义的世界构成形式的渐渐死去也使电子的天主教教义失去了基础（信息发出者的中心地位）。

最后的球面只允许水平方向上的宽广的结构——当然它也不会完全排除个别的高层建筑的存在。它刺激了在人造的，并不崎岖的天空下的邻居、合资企业、跨文化的交易；它需要论坛、讲坛、华盖、伞形统治、联盟、捐助者；它为不同规格的桌子旁的以及不同规格的会议大厅里的利益团体带来了好处。但是，它不会支持建立超级单一层面（*Super - Monosphäre*）或是拥有强权的众中心之中心的想法。

^① 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布鲁斯·R. 鲍威尔（*Bruce R. Powers*）：《全球村——进入 21 世纪的媒体社会之途》，帕德博恩，1995，第 127 页。

第 30 章

免疫学的变形：走向薄墙“社会”途中

在当前社会学和政治学关于全球化的喧闹却单调的文献中，我们可以抽象出一些有着很好的前景，在将来的几十年甚至是几个世纪的时间里可以成为类似新闻学的共相的模式。这些几乎是永恒的话题包括：首先声称，在地区性和全球性之间，渐渐可以通过协商产生出新的相互理解的妥协的共同生活模式（*modus vivendi*）；其次，政治共同体在“现代之后”进入了一个新的“超越民族国家”的局面之中；^①

^① 参阅马丁·阿尔布洛《告别民族国家》；尤尔根·哈贝马斯《后民族结构》（*Die postnationale Konstellation*），法兰克福，1998。

再次，全球化了的世界由于不断加剧的贫富差异而陷入了政治和伦理上的紧张；最后，由于对生物圈的破坏和对水体、空气和土壤污染的不断加剧，无论“人类”是否愿意，都必然会转变成为一个生态利益的共同体，从他们的反思和对话中，必然产生出一个新的、有远见的理性文化。在所有这些话题中，不难感觉到一种倾向：传统的关于政治主体和社会统一体的观念变得模糊不清。到处都可以说，最重要的走势已经脱离了既往的有能力解决问题的人，今天的问题和解决昨天问题的人（其实实际上是明天的问题和解决今天问题的人）无法契合。

我们要把这种感觉从社会学的争论中翻译到我们的语境中来：政治的空间诗学的或是一个“宏观球面学”的语境。^① 在这个外观改变之后，一切社会的和个人的认同性的问题都在形态学和免疫学的方面下表现出来，即在这样的观点下，在被历史推动的大世界（Großwelten）中，诸如“居住”或者“处在自身及他的近旁”的可操作形式是如何构筑起来的。当前的全球化紧张情绪反映出了如下的现实：随着民族国家，迄今为止的尽最大可能的政治居住条件（Wohnverhältnis）——似乎是民主的民族（或是想象中的民族）的起居室和会议室——都将暂时停歇，并且在这个民族国家的起居室内已经到处都有着令人不快的穿堂风——特

① 在这个概念下，我们综述了那些将关于私人层面（微观球面学）的理论上升到一个宏大免疫结构（国家、帝国以及“世界”）理论层面的思考。比如，《球面学 I—气泡》，法兰克福，1998，以及《球面学 II—全球》，法兰克福，1999。

别是那些高失业率和不断升级的抱怨情绪共同滋长的地方。如我们回顾的时候可以认识得更清楚的那样，这曾经是民族国家了不起的功绩，为其中绝大多数的居民提供一种家的感觉，它同时是想象中的或者现实的免疫结构。它可以被体验为作为地点（Ort）和自我（Selbst）的趋同，从更好的意义上是地区性认同性的体现。这种国家的功绩在福利国家体制对于国家强制力施以最成功限制的地方达到了最令人瞩目的成就。

政治和族群认同性的免疫学的结构陷入了运动之中，在它身上表现出了地点和自我的联系不再在任何场合中都像领土主义（从古代的农耕文化到现代的福利国家）的政治创造所要求和预先反映的那样稳定。若地点和自我之间的交织有所松动，抑或是消解，就会产生出两种极端的情形，从中可以解读出社会场域结构同样试验性的解体：一个无地点的自我和一个无自我的地点。显而易见，一切现实存在着的社会都曾经必须面临着寻找在这两个极端当中某个达成共识的位置点——理想的状态当然是与极端保持着理想的距离。人们也很容易理解，即使是未来，每个现实的政治共同体也必须要对自我和地点的决定的双重律令（Doppel - Imperativ）给出一个回答。

最靠近第一个消解的极端，即没有地点的自我的群体应该是过去的两千年中的犹太教信徒。说他们是一个没有土地的民族是不无道理的。针对这一事实情况，海因里希·海涅用非常精当的语言表述了出来：犹太人的故乡不是任何一片土地，而是存在于书里。旧约全书对于犹太人来说就如同

“提在手里的祖国”。^① 这样一个深刻而漂亮的表达点明了一个经常为人们所忽略的事实：“过着游牧生活的”或者“去领土化了的”集团在构建他们象征式的免疫性和他们的族群内部关联性的时候，不会基于承载的土地，或者说土地只能起到非常边缘的作用；更多的则是他们相互之间的交际直接作为一个“自我生成的容器”^②，各参与者在外部地带移动的同时，自身被包容其中，并保持形状。一个没有土地的民族，却又与一个文字的传统密切地绑定在了一起，不会因此屈从于某种贯穿于人类历史长河，迫使几乎所有的定居生活的民族必须接受的谬论：应该把土地本身理解为族群的容器，自己的土地也应该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生命的意义和认同性的体现。这个关于领土的错误见解（territorial fallacy）属于到今天为止定居的世界时代最有效的，同时也是最成问题的遗产，因为一切看似合法的使用暴力的政策，即所谓的“国防”的基本反射均与此相关。它以对地点和自我偏执的等量齐观为基础——是领土化理性的公理式的思想谬误（1948年后的绝大多数以色列人看起来非常热衷于犯这个错误）。当历史的跨国移动性的洪流无一例外地使得各个地方的人民和他们的领土的密切联系越来越淡后，这种错误时常就会丑态百出。对于有着先锋精神的现代来说，自我越来越具有多地域性的趋势——同样的，地点也渐成多民族融合的，去国家化了的地点。

① 关于“提在手中的上帝”的想象综合体，参阅雷吉斯·德布雷《上帝，一段历程》，巴黎，2003，第123页及其后。

② 关于这个表达，参见《球面学 I—气泡》，第60页及其后。

鉴于这个事实情况，印美人类学家阿尔君·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以他发明的概念“族群风貌”（ethnoscape）赢得了学术声誉。在这个概念下，可以看到诸如继续进行着的族群联系的去空间化（Enträumlichung, deterritorialization），民族国家之外形成“想象的共同体”以及无数个体在想象中共同分享其他文化的生活形式的图像。^①至于说到犹太人在其流亡生涯中的遭遇，他的挑衅之处就在于总是把一个实际存在的没有地点的自我作为一个表象的矛盾，但实际的丑闻持续地清楚展现在西半球的居民们面前。

在另外一个极端上，没有自我的地点的现象却表现得愈发明显。不可居住的地区——白色的荒漠（两极地带）、灰色的（高山）、绿色的（原始森林）、黄色的（沙漠地带）和蓝色的（海洋）——对于“没有自我”的极端是有着示范效应的；因为人们亦可以把人为原因而造成次元的荒漠也归入那一边去。在我们的球面关系研究的语境中，后者的意义在于作为一种对比现象而存在，因为它们构筑起了人们一般来说不会发展文明的社会关系的地点，更不要说试图与之建立起某种认同性的关系。这适用于一切过境空间（Transit-Räume），无论是广义还是狭义，无论是交通当中的某个地理节点，如车站、机场、港口、街道、广场以及购物中心，

① 阿尔君·阿帕杜莱：《全球族群空间——发展跨民族国家人类学的探讨与问题》（*Globale ethnische Räume. Bemerkungen und Fragen zur Entwicklung einer transnationalen Anthropologie*），载《世界社会面面观》（*Perspektiven der Weltgesellschaft*），乌尔里希·贝克出版社，1998，第 11～40 页。

还是只是为了有限的停留而设计的场所，诸如度假村、旅游小镇、工厂厂区或是流浪者的过夜处。这样的地点或许有它们的氛围——但这种氛围又并不依赖于一定的居民或是集体的在上述地点中似乎处在自身近旁的“自我”而存在。不使从这里经过的路人停下脚步是对它们的最好的定义，同时，它们也是一种处在人满为患和空无一人的状态中交替的“无人地”（Niemandsort）和在当代社会去核心的中心以及杂合的边缘蔓生着的“过境的荒漠”（Transit - Wüsten）。

在这样的“社会”身上，人们无须过多的分析就能认识到，迄今为止的正常状态，即生活在一个稳固的、种族或族群的容器关系（连同它们特有的关于来源和使命的幻想）中以及毫无风险的可以将国家和自我混为一谈的许可，由于全球化的趋势以决定的方式遭到了侵犯。因为一方面，这样的社会里，大量的居民无一例外地获得了较强的流动性，而令其地点的束缚变得松散；另外一方面，过境地点也大大增加，在这些地点上面，频繁光顾的人们却不可能有一种居住的关系。所以说，“全球化的”以及“动员性的”社会同时在向上述的两个极端靠近：既有游牧式的极端，没有地点的自我；也有荒漠的极端，没有自我的地点——由地区文化和安守本土的满足感构建起来的中间地点在不断缩减。

现代化的“大众社会”的形式危机当下通常被当做民族国家性的意义减退话题被讨论着，但其出发点却是族群的容器功能不断侵蚀的结果。迄今为止，人们关于“社会”的理解以及联想的内容一般来说无外乎是有着强大墙体的、有着固有领地的、有着严格保护着的象征，通常是单一语种

的容器——因此，它是一个在某种意义上讲的民族密封容器当中寻求自我的确信，并且在完全自我（对于外来人而言往往是完全不同理解的）的冗余方式摇摆的集体中。^① 这样的存在于地点和自我之间的某个节点上的历史共同体，即所谓的民族，曾经因为他们的自我容器特质而呈现出一种内部和外部极大的反差——这种事实状况在前政治的文化中人们归结为幼稚的群族中心主义，而到了政治阶段后，则习惯于归结为内政与外交的本质不同。这种差异和反差则由于全球化的效应而日益迅速地被逐渐抹平。民族国家作为容器的免疫作用在它们的受益者眼里却越来越成为有威胁性的东西。尽管那些已经尝试过跨国间自由迁徙的好处的人当中几乎没有人是认真地希望回到过去的用武力维系的国与国之间封闭的状态中去，更不要说是典型部落式生活的完全的自我催眠状态，但是当下却仍有为数众多的人对于薄墙世界和相互渗透的“社会”潮流的意义和风险表现出了既不理解也不欢迎的态度。关于全球化，罗兰特·罗伯森（Roland Robertson）说得非常有道理，是一个伴随着抗议的过程（a basically contested process）。^② 对于全球化的抗议就是全球化本身——它属于各地区作为器官对于更大的外部世界的介入的一种不可避免的必然免疫反应。

① 关于借助于“Uterotop”（优选的球面）和“Thermotop”（娇纵的球面）的概念建立起来的归属感的更深层次的人类学证明，参阅《球面学Ⅲ—泡沫》，第386-405页。

② 罗兰特·罗伯森：《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伦敦/纽伯里公园/新德里，1992，第182页。

按马丁·阿尔布洛夫的观点，全球时代作为近代固执己见的一个必然发展结果，其心理政治挑战在于，容器免疫性的削弱并不能简单地被理解成一种形式的损失和颓废，这意味着作为对于自我毁灭进退维谷、玩世不恭的襄助。对于后现代来说，还放在赌桌上的东西是对于可操作的免疫关系成功的新设计：并且正是这些可以也将会以多样化的方式在有着通透的墙体的社会中重新构建起来——即使一如既往的并不是在所有的情况下对于每个个案都能成功。

在这样的语境下，奔向个体化的生活形式的时代潮流暴露出了它免疫学的意义：今天，在先锋的“社会”中的个体——也许是历史上第一次原始人式的共同生活——，他们作为免疫能力的承载者从（迄今为止优先的一种保护性的）群体中松脱出来，并且试图群体性的将幸福和不幸同政治公社的保持形态脱钩。当下，我们经历的极有可能是政治安全集体在个性化免疫设计群体中的不可逆转的转型（并且这个潮流在当基于战争在想象中或者现实的回归，而导致了政治的优先的时候仍然有效——回归的战争拥有一种治愈的、防御以及免疫的特征；而重新军事化的个性化集团只能附带地回归到集体主义的氛围中去）。

这种趋势在西方世界的领军人物美国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谋求幸福”（pursuit of happiness）自独立宣言开始起就已经明确地被固定在了社会契约的内容当中。个人以幸福为导向的离心作用的影响使得迄今为止的社群的以及市民社会的能量很有效的得到了平衡，以至于传统上群体相对于其成员的免疫学优先地位也在美国人民的群体中看似得到了体

现。渐渐的，出现了相反的预兆：没有哪个国家、没有哪个民众，也没有哪种文化当中，人们在日益增长的对政治的不热衷的同时，还能经营起如此众多的生物、心理技术和宗教的自发民间组织。1996 年，美国总统大选（克林顿连任），第一次出现了参选率低于 50% 的情况；1998 年 11 月，众议院和参议院大选，毛估下来，三分之二的选民没有去投票站投票（专家甚至还认为 38% 左右的投票率并不是一个很坏的结果）。^① 只有 2004 年 11 月，小布什竞选连任的选战是一个激烈的竞选，当时的选举人达到了将近 60%。这就说明了一种多数人确信自己被允许在很大程度上从政治公社的命运中脱离出来的状况——并且这种确信建立在一种非常顺理成章的观念的印象之上：个体的免疫学最优方案在未来不能（或者只是在极少数条件下）在民族的集体中寻求到，最多不过是在自己的团体的团结系统中，具体地说是在受害者研究的集体中，最清楚则在私人的保险组织中。

个性化的免疫秩序的公理在由自我为中心的个体的民众中抓到了一个新的有活力的显见：最终当它不为自己工作的话，没有任何人会为了它做些什么。新的免疫技术（在其机构的中心：私立保险和养老基金，在其个人的边缘：营养学和生物技术）将自己推荐成为由个体组成的“社会”的存在策略。在这样的情况下，通往灵活性，“客体关系”弱化以及不忠诚的、可逆转的人际关系的一般性肯定的长征到

^① 显然早在 1927 年，瓦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就在他的著作《幻影公众》（*The Phantom Public*）表达了他对民主制度的怀疑，并指出了大量消极和无能的（非）选民公众的存在。

达了“终点”——到达了由斯宾格勒正确预言的每个文化的最终阶段，即那样一种再也无法确定每个个体是勤勉还是颓废的状态（勤勉，是在什么方面，而颓废则又是什么样的高度？）。这是一种个体失去了示范性构成世界图像（*Weltbildung*）能力的状态。个性化了的个人的行为方式就好像他们认识到了，只要把“世界”作为一个多元化的东西来接受，就无法寻找到免疫的最优方案，相反则更应该狭义地来定义同世界的接触。相应的，由尼采所捍卫的关于对高雅和下流的区分的最后一个形而上的差异，也就失去了它的意义。随着英雄的发现和创造时代，属于它的那些有着统驭能力，可以驾驭时代和集体的伟人们的繁荣也一去不复返了。他们之后紧随而至的则是个性化的节奏，每个个体都自我选择成一个特殊的领域。它的后果是明显的，其中一个就是人类学近代的魅影（*l'homme monde*），微观宇宙的、多方面接受和表达的、完整的人如同海岸边沙滩上的面孔一样消失了的事实。

第 31 章

信仰与知识——以此标志 (全球标志) 你将胜利

马丁·阿尔布洛夫的概念全球时代 (Globe Age) 非常迎合一个不封闭的序列中按照阶段划分的叙述理论的需求。他提出了全球化 (globalization) 时代——在我们的术语中叫做大地全球化 (terrestrische Globalisierung) ——需当看成封闭的纪元。它处在一个向成为历史而过渡的但尚未确定长度的尾声时间之中, 尽管是一个尾声时间, 但却仍然意味着是一段有着自身权利的纪元。如前所述, 一些学者将过去的

时间纪元称作“欧洲的千年”^①，甚至叫做“欧洲的世界史”（*Weltgeschichte Europas*）——所有那些尽管不合时代甚至疑问重重却能脱颖而出的表达不过是突出地彰显了欧洲的行动者与非欧洲的行动者在行动上的不对称性（*Asymmetrie*）。

在系统角度上称之为不对称性的，在政治的视角上看就叫做统治。殖民主义这个概念综述了“欧洲扩张”^②的过程和成果，只是这个表述本身已经普遍为人们所憎恶。即使这个命名拒绝时代的方法，它仍然也不能无视其结果以及构建起来的世界联系。殖民主义的实践活动是以对欧洲“伟大的国家”的信念为基础的——伟大使得他们自我感觉到在攻击的时代无一例外地认为自己是正当的——，单边主义也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利。但是若单边性的时代终结了的时候，并且为数众多的其他方面的时代到来的时候该如何呢？新近的关于对称性的世界图像的理论研究，就如同后殖民主义研究中经常发出的声音那样，不仅以欧洲中心权力的内源性的终结为出发点，同时也以向作用和反作用的变化了的理解的过渡为前提。对称性的思考导致相异性理所应当拥有优先。人们也已经能够如此自由的确定，1492年10月，是加勒比的土著人发现了欧洲人。对于悲伤的发现者来说，出于研究目的收集来访者的数据信息看来是非常必要的，而这

① 参阅奥斯卡·哈雷基（Oskar Halecki）《欧洲千年》（*Das europäische Jahrtausend*），萨尔茨堡，1966。

② 参阅沃尔夫冈·莱茵哈特（Wolfgang Reinhard）《欧洲扩张史》，四卷本，斯图加特，1983-1990。

些档案今天还可供评估研究。

欧洲进攻的时代的结果是（人们必须要像后现代的吠陀咒语那样重复它）：世界体系的展开和加固。这间接地表明了全球参与者相互之间在多个层次的网络联系——这涵盖了国家、经济企业、银行和交易所，从事科学、艺术、体育甚至是色情的机构，以及毒品和军火贩卖，等等。这种富于反馈的系统，即使它看起来似乎非常不稳定，也构成了暂时的无数例行公事的最终工作水平，通过这种例行公事，对空间上远离，实质上邻近的对手的考虑成为存在于世界之中（In - der - Welt - sein）的占统治地位的风格。因此，从当下的定义来讲，文明这个概念其实就是指远程现实主义（Telerealismus）。

“大地全球化的终结”——意味着：人们终于明白，你不可能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点作为第一个到达的人；同时你也必须非常明确地考虑到，你不可能就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话题脱离某个话语体系来表达。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存在着发现者以及先前的发表观点的人留下的痕迹。现实的条件本身反对了无论在什么样情况下都要尝试新的东西的雄心壮志——尽管从形式上总是并且到处都在要求所谓的创新（更具体地说：不断提升了的不确定性）。不断被采用的线路证明了昔日的发现旅途已经转变成了规则的交通线；各个专业都在努力将每个突然产生的念头和假说纳入成熟的知识体系中。如果说全球化的时代是以探寻和开创为特点的话，那么全球时代的标志则是时刻表和不断增长的交通的繁荣——其

中也包括各种流言的兴盛。全球化当中包含冒险，而全球性当中则包含着预定和保留。手持滑膛枪、大砍刀和模糊不清的地图，全球化时代的发现者就敢于登上驶离港口的船，而全球时代的演说者们，则是手持机票，带着准备好的演讲稿，登上飞机。

用城市文化的饱和可以最优地类比解释连续的以及新式的全球化时代和全球时代的要素。当代的大都市一般都有着几百年的居住、规划和建筑的历史。甚至有的城市诸如吉隆坡、上海或者柏林因为当地的经济的高速发展还经历了建筑上的狂热建设时期，其结果可以部分地展现出未来的剪影。城市构成当中的建设阶段在一些传统的大都市中都已经过去了——接下来的就是一个所谓的结晶阶段，在这一阶段，就是在现有的基础上做一些改建、安装和扩建；这里的核心理念就是网络、优化和美化。在人们没有新建更多东西的可能性的地方，就必然会慢慢过渡到对现有的东西做深入的改建的阶段。对于这个阶段来说，交通政策和文化城市市场宣传的结合尤有代表性——成功的城市意欲成为事件的发生地（Eventstandort），提供生活质量的地方以及都市长廊的节点，这就是为什么建设都市之间的高速通道和设立必要的城市收集器（Kollektoren），如会展中心、体育场馆、现代艺术博物馆或是国际连锁酒店^①一样都能很恰当地彰显出结晶析出的城市文化的野心。

^① 关于“收集器”的概念，参阅《球面学Ⅲ—泡沫》，第2章，室内：泡沫的建筑学，段落C：泡沫城市。宏观内部和城市的集会建筑明确地表达了人群会集情况的象征，第604页及其后。

如同当前在世界上所有的焦点位置都有析出的城市文化一样，在世界体系中也打上了成为常规的国际化 and 跨文化性的烙印，这些无不体现在外交、市场、学术组织以及专业音乐人的身上。相应的，医疗机构、警察、博物馆甚至是国家安全部门也要追求跨国的对接合作。从富裕地区来看，世界总体来讲给人留有一个充分殖民化了的空间的印象——或者说，因为殖民这个词在一般的语用中已经完全贬义：一个空间编织成的网，在族群的基础之上强制实施一个自主确定的民事秩序体系，一般情况下是民族国家已经将权能上交至超越国家的权力级（如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盟）的宪法。随着建立起这种政治文化的网络结构，全球化的时代也就自行结束了。

我们在此持有这样的论点：只有全球化的历史时期才能被称为“世界历史”或者说是“历史”而不加任何其他定语。它的内容就是开发地球作为地域文化的载体以及将彼此联网像泡沫般膨胀的世界关系压缩起来的戏剧。如果人们是严肃地对待“历史”这个限定语的话，那么应该只有1492~1945年这个时间段的事件可以被确定为历史，因为无论是之前还是之后的民众又或是文化的存在都不具备“历史的”特征——同时一些重要数据也有待商榷。当然，所有的团体、机构和实践活动总是要遵从事物形成与发展的法则；它们在变换着的重复的平静步伐中穿越时代；它们还经历了使得较长的序列被打断的跳跃和灾难。然而，这些保持原样和促进发生与在“历史”中发生的事情是毫无关系的。唯一的历史以叙事的手法回答了本体论的问题：如何能够形

成全球时代的社会关系？对地球的开发是如何成为文化关联的载体的？欧洲人当时如何有能力绘制出他们的地图，并扩展他们在可居住的地球上的网络结构的？现代化的货币以其三种形态：贸易资本、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在这里面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历史”就是世界体系诞生的神话。^① 它只允许以大地全球化的英雄史诗的方式被叙述着——作为获胜的那一方的，即欧洲人用自己的行动展示，而编年史作者们一一记录成长篇小说。这种英雄赞歌已经大大超越了传统意义上英雄和歌手之间那种相互的关系。它发挥成为无法叙述的人类自我挑衅的宏大叙事，使得它被歌唱出来。每逢它要变化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版本能够充分地达到事件本身的高度。

这种杂合的，时常是尝试性的，却又从未在所有细节上恰如其分地朗诵出来的赞歌构成了普遍随机历史^②杰出的章节，尽管有着巨大的随机性，却又显示出内部的目的性贯穿于始终。关于全球化的报告是一段狭义上的历史，不仅因为它有着开始、中间和结尾，它也是一个目的论意义上的历史，因为它承载着自身中孕育着的终结的标准。

对于它的发端，我们拥有着极具象征意义的场景：1492

① 这种认识为 J. R. 麦克尼尔以及威廉·H. 麦克尼尔最新的普遍历史学新的尝试《人的网络：世界历史鸟瞰》（纽约，2003）打下了基础，它把整个世界历史描述为一种网络结构不断变得更稠密的过程。遗憾的是，麦克尼尔们的鸟飞得太高了，以致它无法意识到自己受到了视觉的欺骗，从而误将 1492-1974 年这个有效的形成网络稠密化的唯一世界构成性阶段放大到了整个人类学冒险的进程中去了。

② 吉尔·德勒兹/费里克斯·迦塔利：《一千个柏拉图》，第 11 页。

年 8 月 3 日，那是个星期五，早上 8 点，哥伦布带着三支三桅帆船于帕洛斯港扬帆出海，^① 他们走了加那利岛的路线——带来的我们今天在这里讨论的后果是：69 天后，看到了大陆，在第 70 天的时候，又是一个周五，他们踏上了新的世界。^② 在同年的秋天，马丁·贝海姆向纽伦堡的市政议员们介绍了他制作的地球仪——他把大地的事实情况带到了法兰克的商贸城市。而这段历史的终结也有着非常清楚的图像：1937 年，希特勒在纽伦堡召开帝国党大会期间，让人把贝海姆地球仪拿到他下榻的德意志庭院（Deutscher Hof）宾馆的房间里，一方面，他要时不时地看到自己斥资修复的已经严重发黑的地球仪；另一方面，他要通过不断看到这样的一个物件来激发自己的帝国梦想。在 1944 年，布雷顿森林会议上，签订美元与英镑和黄金挂钩的协议，奠定了全球时代的有约束力的世界货币；1969 年，美国太空人从他们的登月之旅中带回了升起的地球的照片。在此期间，几百万个场景总是不断地再三提醒了一条颠扑不破的理论：谁不认真对待地球，谁就会受到生活的惩罚。

地球是球体，因此用球形的地球仪配以各块陆地及海洋的平面图能很合适的展现地球风貌的学理假说在中世纪行将结束之时只有不超过几个神学家、制图学家以及对远方有着浓厚兴趣的商人在探讨着。对于绝大多数 16 世纪并且直到美国发表独立宣言时的欧洲人来说，地球是球体的假设不过

① 哥伦布：《航海日记》，莱比锡，1989 年，第 7 页。

② 关于为里斯本的辩护，参阅雨果《海上劳工》，第 249 页。

是个没有什么约束力的思辨层面的东西，它不会对自己的生活产生什么重大的影响。甚至当哥伦布、达·伽玛以及麦哲伦在完成了他们的航行后，经验已经对于既往的认识发出了强有力的否定。地图越来越精细，图册、地球仪还有平面展开图出现在了封建领主们的图书馆里，而关于地球的知识新的媒体也进入了资产阶级的书房——尽管如此，地球作为一个球体的图像的实际内容对于绝大多数欧洲人来说，还是个不太确定且无关紧要的东西。地球是圆的这个事实在它发表出来以后，还需要几个世纪的时间慢慢让乡村语境中的接受者真正了解。

对于一些行动者来说，这个假说早就成为一种信仰，它足够强大，以致能用自己的生命和一辈子去做赌注。哥伦布、麦哲伦以及德·卡诺这些人身上正是配合了寻找智识的信仰。为了他的信仰，他需要能在远洋航行的船只和船员队伍，他们会在金钱和好话的作用下追随船长的疯狂。归功于一个很偶然的机会，这支队伍的薪水单终于可以给付了；照此清单，船长达·伽玛（Sancho Ruiz de Gama）参与这次航行得到了20杜卡特（Dukaten，当时的一种金币。——译者注），水手胡安·德·莫奎尔（Juan de Moguer）得到了4000马拉维迪（Maravedi，当时的一种硬币。——译者注）。^①这种隐含表达的早期环球航行对信仰的承认只有从这些人的行为以及他们遗留的东西来加以重构。比如可以

^① 哥伦布（Cristóbal Colón）：《哥伦布文集》，孔苏埃洛·瓦莱拉作序并注释，马德里，1982，第230~234页。

如下面这段文字所述：

我相信地球是圆的，是生命之母体，财富之来源，民众之住房；相信海洋，肥沃而处处皆可通航，风的宫殿，舵手和乘客的女友；相信自由的空气，处处都可呼吸，它是快速让帆船动起来的力量，一切自由的厅堂。^①

哥伦布当时就寄希望于能在西方寻找到足够的黄金，然后用这些钱去资助建造远洋大船以解放穆斯林统治者的神圣陵墓——那么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向西的道路为向东的道路打开了大门：这个哥伦布也不是最后一个在近代还这么全身心地投入到中世纪任务中的人。^② 尽管如此：在麦哲伦和德·卡诺之后，在弗朗西斯·德拉克和亨利·哈德逊之后，对于地球全球性的信奉已经每十年都会比以往更加强烈地成为一种教条，它甚至可以与一切宗教的正统观的虔信程度相媲美。如同基督教信仰一样，对于我们生活、纺织和存在的地球是圆的这一信仰不仅要被反复吟诵，还要在生活中加以保持。地球是个球体的说法不再是一种内部秘传的假说，而开始同现代人的引导生活的信念交融在了一起。信仰

① 原文如下：“Credo in unam terram rotundam, vitae matrem, fontem divitiarum, populorum domum, et in marem universalem, fecundam navigabilemque, palatium ventorem, amicam gubernatoris vectorisque, et in aera liberam, ubique respirabilem, velivolantium motricem velorum, libertatum omnium aulam。”

② 关于哥伦布这个角色，参阅《球面学Ⅱ—全球》，引言第三段：“承载上帝”，第 96～117 页。

包括本体“对一种想法认真”的功能；他意指采取强烈措施将观念投射到现实存在中去。

因此，发现和报告地球网络在讲述一个故事（story），它从头至尾都是一个信仰的故事。它的内容涉及发现者的信仰，对于能找到新的东西深信不疑；同时还有占领者的信仰，他们望向地平线，等待着猎物慢慢地出现；以及航海家的信仰，他们以完全严肃认真的态度相信，只要他们不在中途沉船葬身海底的话，一定可以围绕地球转一圈，然后回到故乡。为什么他们所信仰的找到、出现和回归最终能够成功，这些行动者们最终用他们是受到了上帝的谕旨而被召唤成为发现者、占领者和航海者的作为理由。

欧洲全球者（Globonaut）们的成就在回顾中得以在变化了的灯光下展现出来。我们今天的理解是，人们相信地球是个球体，并不曾认为某种幻觉为真。船员们的信仰受到了现实迎合的激励——他赋予一切与地球有关联的假说、图画、图像、历史、感知以及感觉本体的意义，直到对象本身把信徒们吸引到自己的一边的那一点。不断增长的关于圆的、完全以及可导航的确信自此以后决定了现实的品味。就像存在着真实的被迫害的被迫害狂一样，也存在着幻想存在着被水覆盖着的圆的地球，并真的环绕了它的航海家。

在我们的思考的这处地方升起了一座为了宏大话语出场的大幕：泥土占卜者在15~16世纪转折时的信仰曾是真的信仰——先被遮蔽起来，再被去除遮蔽，先远离，再慢慢靠近的真。因为对地球连同其财富去除遮蔽、靠近和开发需要历经几个世纪的时间，就产生了作为行动及作为伟大冒

险同时和事后的文字记录的世界史。又因为对地球去遮蔽及其靠近是相对有穷尽的任务，因此我们这里所谈的历史从部分事实来看也就是具有了开始、中间和终结。更多的在于，世界史的进程是如此能够施以强烈影响，以至于人们作为启蒙了的读者更多的更愿意以一个回顾式的外观的欺骗出发，而非通过真实的事件。我们难道不是在和一个常见的神学的偷换概念打交道吗？它对着我们轻声耳语：人们可以用后来偶然的结果来说明开始的目的。

这里所讨论的历史中，关系是不一样的：事实上，关于地球是圆的这个设想就如同一个自我完成的预言一样，进入了西方人和媒体的意识当中盘踞了 500 多年了。它将他们中很小的、积极的少数派牵扯到了没有先例的觉醒之中——一个实用主义的由占领战役、使徒历史和研究项目共同构成的杂合。但是，地球是圆的这一观念不仅是一个象征的形体。地球是球体的信念（*Monogeismus*）不仅是美好物理学的假设。这个真的但却未经证实的理念的载体，他们是那些坚忍不拔的船员、耐心的制图学家以及嗜好金属的君主和慷慨的香料商人，不断堆砌大量的证据，直到有一天，最后一个反对者、无视者和冷漠者也不得不屈从于强大的事实。关于近代的叙述就如同下面这句话的一条长长的评论：以此标志你将胜利（*In hoc signo vinces*）——只是这里的是全球标志（*signum globi*），而非十字标志（*signum crucis*）。全球标志战胜并取代了十字标志——这句话也包含在了历史当中。只要当全球和十字并存，那么历史的终结就还未到来。当全球标志胜利超过的过程结束时，十字标志终于降格到了第二

位，而后面接着的就是作为对全球信仰的胜利报告的历史现象上演的时代。

全球使命对于今天的人来说，仅仅是基于它的贯穿始终的成功而得以完成。从再也没有半吊子的理性同时代人考虑着去质疑地球是圆的这个信仰的时候以来，新的标志也就同老的标志一样失去了其鲜活的象征意义，也便奠定了它的冗余。对于洞见的不可逆转性可能的怀疑者也不得不容忍，被称为修正主义者。航海家们的信仰转变成了知识；知识世俗化、专业化；从16世纪的全球信仰者发展成了后现代的地球科学家——他们中的1.1万人于2003年4月在尼斯（Nizza）的欧美工作会议上集中。^①与会者中的绝大多数在乘飞机到来时，只能从空中对下面他们的研究对象匆匆一瞥。

所有哥伦布以及哥白尼之前的关于地球的形式和位置的观念都因为新的知识结构而不得不承认，它们已经沦为了被超越了的“关于世界的图像”。因此海德格尔在他对近代的阐述中指出这是一个“世界图像的时代”（参阅本书第4章及第17章）未必切中了问题的要害。如果说欧洲人从不能够有足够勇气乘船环游地球的话，那么他就在全部种属上保持正确。因为地球被环绕过了，因为从那个时候开始，基于这个原因有了关于地球的有效力的全新的知识——尽管人们只是坐在家中，看着地图，听着帝国主义者胡言乱语的回

^① 奥利弗·莫顿（Oliver Morton）：“地球科学在游行”，载于：*prospect magazine*，2004年1月。

响——，所有没有环游世界的人，定居在一处的叙事诗人和萨满教巫师们的关于世界的陈述就可以也必然会在他们可见的以及不可见的风景中被解释成为“关于世界的图像”。他们确实不过是过时的关于世界的想象，缺少正确知识和发展了的知识的人物以及环游世界之前的地区的诗。尽管现代的世界知识以一种未知的程度依赖于绘图，但它究其最终效力等级——这一点海德格尔有着错误的认识——还是没有以图的形式呈现，而是在海员们的身体中的海洋的水声。谁如果试着把耳朵贴到地球仪上去，必然能够在里面听到拍打浪花的声音。

叔本华在其《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的导论中谈及超验哲学转向之后的审慎的人时这样写道：

对他来说……清楚而确定的是，他并不认识太阳也不认识地球，而是有一只看太阳的眼和一只感觉地球的手，世界在其周围，不过是个表象在那里罢了……^①

于是从航海家以及所有余下的全球化积极分子的视角来看应该加上这样的话，未来的地球并不仅仅是为了给一只感觉它的手。麦哲伦和麦卡托之后就变得清楚而确定：我们只认识那些环绕了地球的船只和那些将伟大的行程的真理表达出来的地图和地球仪。在此期间，我们也慢慢习惯了电话和显示屏，它们能通过声音和图像给我们传送世界那一端的表象。

^① 参阅亚瑟·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一卷，第一章。

地球球面使命的成功是如此的贯穿始终，以至于今天的人们不再认为它有什么特别了不起的地方。如同后君士坦丁时代的基督徒们鉴于他们的信仰已经从加利利海传播到了米尔文桥的事实，便可召唤决定了教会在帝国取得巨大胜利的圣灵。而后现代时代的人们也乐于保有这样的观点，即地球一直都是圆的，并且这个事实或早或迟总会浮出水面。若是本身就蕴涵着浅显的事情，即使神圣的精神也无法有任何成果。也许若是这方面帮助的缺乏，而我们则可以足够深入地去当下化地球是如何成为大地的球体的这个问题。一个这样的叙述或可顺便证明：每个单个的场景完全会有可能不同，但所有的场景在一起时，无论如何随机改变单个的样子，任意地重新排序组合，却必然会最终到达实现全球性的形态。当时间到了的时候，事实就在航海家的生命中以及船长的航海日志中显现出来了。

有些全球化的反对者们毫不掩饰他们的这种信念：也许人们永远达不到全球化的阶段会更好——或者说人们获得了全球化的洞见，却仍然回避远洋，躲在他们的村庄和小城市里。鉴于地球构成了一个可通行的整体的信息，如果说这不是一种迟到的不相信的形式——伴随着对于人们可以就关于脚下的地球的真相开始些有意义的事情的怀疑，还能是什么。不相信的人更愿意继续做一个托勒密主义者。他们给予人们乡村的和植物式的存在方式更优先的地位，因为他们把真相的代价看得太大了——谁能以足够的理由来反驳他们呢？伊曼纽尔·沃勒斯坦鉴于欧洲人的愿意为革新付出代价的决心于是解释道：

它的发生给了欧洲人荣誉，因为没有 16 世纪的推动力量，现代的世界根本是不可能产生的，并且，无论其多么残酷，它的产生总是好的。^①

如果哲学也能够忏悔的话，那么这里便是一个。若每个存在者（das Seiende）究其根本是善的，那么这种善也必然会延伸至成为者（das Werdende）中。地球成为世界（Weltwerden）难道会成为一个例外吗？

如前面所指出的，这个思考的逻辑的推理在于其将“历史”这个概念放在世界历史的意义中，未来则要局限在一个各事件的相对短小的序列中的要求：在 1492 年——哥伦布第一次出海的日子——到 1945 年或者说 1974 年（在这一年里，葡萄牙最后的殖民地作为所谓的康乃馨革命的后果而脱离宗主国）之间。这样的还原反应拥有两个迷人的美德。其一，在它的帮助下，可以阻止各种进化论形式上的副产物，它会迫使所有的民族和文化都沿着唯一的欧洲模式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前进——按照某个教条：“就像西方一样，便存在于地球上”；其二，由于这种限制的作用，迄今为止的关于“历史的终结”的有意义的内容都在最简方案上得以保存。至于“终结”指的是这样一种对于绝大多数地球上的居民来说，地球仪的地理的图像就表达了他们形势的真相的状态。“历史的终结”可以用一个近乎于同义反复的话语来表达：当世界图像发展的历史或多或少的完成并可

① 参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 530 页。

资本的内部

以递交的时候，世界的历史就到达了它的终点。谁最先画了这幅图像，鉴于它的自我实现来说反而显得并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绝大多数人要能认可它为全球大地语境中对自身情境的有效的描写。

第 32 章

后历史

随着进入全球时代的过渡——通过在结晶析出的世界体系的框架中确定不可简化的，然而在文明进程中又需要驯服的文化多样性标记出来——开始了正式的近代的补时阶段。自 1945 年以来就已经明确，构成历史的欧洲扩张载体的潜在能力已经灭绝。旧世界已经在对星球本身的开发当中将初始的潜能消耗殆尽，它剩余的能量也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被挥霍一空。第二次世界大战可以说是本来可以避免的一次大战的一次不可避免的后果。战后局势下的各个行动者就必须为他们的互动书写将重心放在欧洲之外的脚本——这样的也许

还隐秘地以世界体系是以人们所知的方式得以构建的为前提的脚本其实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值得关心。^① 望一眼欧洲的去，总的来说对于世界的未来的投射没有意义。欧洲的当下则是以另外一种方式成为范例，因为它当中存在着一个几乎完全成熟了的后帝国时代的政治纲领——这样的政治纲领甚至已经开始诱惑对美国产生厌倦的美国人。^② 作为软世界权力的典范，它对于别的地方，特别有可能在亚洲或者南美洲将要崛起的国家是个很好的模仿对象。关于历史对于生活来说的用处，在 1945 年之后首先在于，将可能的伤害行为的文件放在一起。伦理化了的历史说出被害人回到行凶地点的地址——他们希望，能在那里重新遇到施加伤害的人，却并未考虑，凶手其实只有在童话里才会重来到他们犯下过罪行的地方。历史形成了一个世界罪行的机构，它保障了人们可以看到人类对于人类施加的折磨的各种文件。

此外，“历史”就完全是民间说法中所谓的“昨天的雪”。它化得有多快，这可以从 1945 年以后的情况以及冷战

① 对于历史概念做这样的限定，在我们看来是唯一的能够告别欧洲中心主义、进化主义和帝国普遍主义，但又不否认和缩减欧洲的角色和功能的方法；想实行“欧洲地方化”（Europa provinzialisieren），就必须充分测量欧洲在世界产生过程的所谓“欧洲阶段”（1492 ~ 1945）的真实维度。参阅迪佩什·查克拉巴提（Dipesh Chakrabarty）《欧洲地方化——后殖民思想与历史差异》（*Provincializing Europe: Postcolonial Thought and Historical Difference*），普林斯顿及牛津，2000。

② 参阅杰里米·李夫金（Jeremy Rifkin）《欧洲梦——安静的超级强权的未来景象》（*Der europäische Traum. Die Vision einer leisen Supermacht*），法兰克福，2004；以及，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埃德加·葛兰德（Edgar Grande）《世界主义的欧洲》（*Das kosmopolitische Europa*），法兰克福，2004。

中，双方达成的军事和局中看出来。1947 年，印度和巴基斯坦从英联邦成员中分离出来；1953 年，法国人从印度支那撤出；绝大多数的非洲国家在 50 年代和 60 年代实现了独立；1974 年，如同前面所说，葡萄牙帝国最后的一些残余也土崩瓦解；1990 年，苏联解体，使得传统的欧洲超级大国退出舞台，它的解体也使得最后一批附属国家不是转变为资本主义制度，就是陷入了混乱。有关中国人建立的国家共产主义制度需要说的是，它自身并非世界项目——但是它的意义却在于，它以宏大的风格证明了资本主义和民主的分离——这样一种把全世界的法律和秩序的政治家（Law - and - Order - Politiker）带到梦想中的事实状态。因此，它可以成为已经显现出来的 21 世纪基本方针的一个示范：世界体系向权威资本主义转型。

然而如果真的相信，这里推荐的视角可以在史学家以及公众当中轻松地得以实现，那就太幼稚了。行业的抵抗力量将会传染性地使得人们总保有幻想，觉得自己还生活在“历史”当中。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逃避全球时代世纪体系的后历史特征的洞见，从而继续，包括将来也一直可以，把事件的每一段进程，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的范围都称作历史。由于这个术语的使用，使得任何一个对象都可以被历史化地对待——在宏大的历史之夜中，一头灰色的母牛就或多或少不怎么重要了。天地间任何一个只要是能构成差异的东西，不倦的历史学家们都不会放过它们。什么东西在什么时候出现，他们都会作为历史的材料记录下来，并坚信他们的行为对于大众的福祉是有着意义和用处的。

他们书写中世纪月经史；他们书写古代狩猎用的飞弹到洲际导弹的发展史；他们书写墙体喷字艺术和说唱乐史；世界十大个人财富史；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盗版史；他们书写绍尔兰地区身体心理理疗史。他们书写塑料制品史；非洲及加勒比地区知识分子对于欧洲中心主义话语贡献史；他们书写9·11之前美国家庭宠物肥胖史；诺贝尔奖史以及糖的替代物史。他们面对有特殊能力人士体育运动、非洲人的坐椅以及通货膨胀都不会放过。当然一部愿望机器的历史对于史学家的书架来说也是绝对不可或缺的。该行业的成员们如此行事，好像他们已经神志不清地以为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门科学，那就是历史科学。拥有更高级一点的看法的人则书写书写历史的历史，同时，他们坚信历史并没有到头——尽管多嘴多舌的哲学家笔下对此已有相应的观点。

然而用历史学家的大量涌现的事实推理“历史”的继续发展则显得有些过于仓促。今天事件洪流的后历史情态性最强的标志正是可以从分散在各个国家的史学研究会的动作中找到，它们寻找话题的政策总是能启发出新的领域。它们的存在也证明了各种类型的过去成为一切事物的历史（*history of everything*）的原浆的结晶。至于事件刚刚过去几个星期还是成百上千年，对于研究过去的人来说，一般不怎么重要了。

中立化的历史，像一切的学术界的迈达斯国王（*Midas*）一样，把它接触的任何东西都变成一本本专著。除了这些历史，在民族国家和机构中，有关过去和未来的伦理导向的话语正前所未有的兴盛起来。这种历史意识塑造了史学团队和机构中有效的神话动力功能，它作为集体的生存斗争的心理

工具发挥作用。在媒体影响学理论的启蒙下，今天人们日益理解，世界舞台上的成功集体，无论他们被叫做民族、国家、人民、文化又或是企业，多么大程度地受到自体成型的交际的控制——在这种交际之下，自我建成的历史固守着卓越的一席之地。神话动力学生命的延续在长期的团体中丝毫不能说明“历史”的持续发展，这就不需要再单独进行证明了。

在这个背景下，我们说年轻的尼采出于对时间错序的英雄主义的思索而与之斗争的欧洲历史主义，不过是大地全球化时代的一抹残阳就显得很好理解了。今天我们知道，这个“黄昏”持续了超过一百年，并且在它的最后的争夺“世界霸权”的交战中带来了对古代欧洲的破坏。在这个时代中，精准意义上的历史学家其实是作家，他们在自己的文字中描写了历史的综合本身以及地域的层面本身：世界体系形成五百年的戏剧，包括决赛般的“极端时代”（*Zeitalter der Extreme*），其中还包括后历史阶段文明单边突破的两个巨大尝试——美国和苏联。^① 在绝大多数古典历史学家那里，都可

① 一系列本真的历史学家（首先是伏尔泰、赫尔德、孔多塞以及黑格尔进行了哲学方面的铺垫）由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正式开始在他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1860）中把欧洲开始对世界的占领以及向外部世界的辐射构建成为一个光辉的形象。而至于它的没落和终结，斯宾格勒以他的著作《西方世界的没落》（*Untergang des Abendlands*）作为对“浮士德式”文化历史形态学的终曲，也是唯一能够对历史思考进行思考，并产生、体验以及反思作为唯一的狭义的历史。居于布克哈特和斯宾格勒中间的则是年轻的尼采，他（以历史对于生命的弊端“*Nachteil der Historie für das Leben*”这一关键词）提出了反对变得愚蠢的历史主义的观点。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则在其晚年著作《人类和大地母亲》（*Menschheit und Mutter Erde*）中开创了后历史主义的视角。

以发现他们有着很强烈的民族视角的局限，那么在这个背景下就不奇怪了。关于现代民族国家以及它们在世界上的角色的宏大叙事一般情况下并不仅仅作为集体主体的自我暗示的构成以及自由历史；它们常常直接支持叙事者民族的帝国主义的过分要求。单单是艺术、哲学和经济史学家们能够更自由地以民族国家之外以及跨民族的视角观察；学术上的和平主义精神在他们身上最能从高尚的谎言的襟带中脱落，为他们自己的权力集体服务。

转向欧洲中心主义批评者的所在，在这个背景前面就能指出一个重要的事实：从来没有哪个时间点上有过一个欧洲人获取世界的共同计划，于是乎，事实上也就从来没有要求需要有关于占领世界的集体行为的叙事。除了地球仪和地图以外，殖民者们没有更高级的合作的权力机关——除了某些无力的共通的圣座姿势。没有合作，总的来说就只有一系列民族的投射——西班牙的世界史、英格兰的世界史、法兰西的世界史、葡萄牙的世界史，或许还有荷兰的世界史。若谈及德国人的世界史，出于史学家的礼貌则可以保持沉默。政治扩张的分裂在基督教使命的层次上重复了。并未按照教会制定的某个统一的行动计划，耶稣会士、方济各会士、多明我会士、亨胡特兄弟会以及为数众多的派别在他们的自己的新教徒的世界帝国内各自为政。^① 所有这些向被居住的地球传播福音的历史首先都被以极大的行动热情和对它们的反思

^① 参阅霍尔斯特·葛伦德《占领世界和基督教》；卡尔·哈默（Karl Hammer）《世界使命和殖民主义》，慕尼黑，1981。参阅本书前文第24章，193页及其后。

记录在了国家或者教会的记忆中。人们是不是还需要强调，对于它们来说到更大的档案馆里的存放处的时间已经到了。因为从来就没有过欧洲这个行动者，而是只有相互竞争的殖民国家的帝国主义以及相互仇视的宗教派别之间的单独行动构成的网络，广为传播的欧洲中心主义批评就显得空泛乏力。该批评真正切中的行动者其实是一个后殖民时代的虚构：直到后来，欧洲才作为一个自我批评的主体和一个外部批评的对象而存在。欧盟诞生的背景在于，它所有的成员国都已经进入了后帝国主义的情境中。

第 33 章

水晶宫

在 19 世纪的一批在“迟缓的”东欧边缘地带用批评性的保留意见看待侵略性的世界开发游戏的作家当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无疑是最具慧眼的预言者。在他 1864 年的小说《地下室手记》中——如果时间追溯可信的话，它不仅为现代怨念心理学（*Ressentiment - Psychologie*）奠定了开创的基础，同时也是全球化反对派的第一次表达——就能看到一种措辞，以不可超越的象征力量总结了世界自成为世界到全球化时代即将到来的终结的情形：我指的是关于西方文明作为“水晶宫”的话语。陀思妥耶夫斯基 1862 年去了英国首

都伦敦，在那里他观看了南肯辛顿的世界博览会场（据说它的规模还超过了 1851 年的水晶宫），并立刻抓住了这座杂合式建筑物无法测量的、象征式的和纲领性的维度。因为这座世博建筑没有自己的名字，所以极有可能的情况就是，作家把水晶宫这个称谓迁移到了它的头上。^①

按照园艺设计专家约瑟夫·帕克斯顿（Joseph Paxton）的计划于 1850 年秋在伦敦海德公园用预制构件法建成，1851 年 5 月 1 日，年轻的女王维多利亚亲自主持对外开放的巨大建筑的原品，于 1854 年移至伦敦南部的锡德纳姆，并以扩大的规模重新对外开放。一直到它于 1936 年因一场大火付之一炬，它一直是人类工艺的奇迹——一次统一标准，序列化生产的胜利。^② 随着它的建成，也开始了一种新的向现代性胜利进军的浸润美学。今天叫做冲昏头脑的资本主义的东西，在那个当时非物质化了的人工控制温度的建筑中都已经是一个达到完美的事实。第一次世界博览会共有 17000 位展出者在里面设置了展位，其中 7200 位展出者来自英国及其海外的 32 个殖民地。随着水晶宫的建成，内部这一原则（das Prinzip Interieur）迈过了一个临界状态的门

① 更多见《球面学Ⅲ—泡沫》，第 344～350 页。陀思妥耶夫斯基伦敦之行的文学反思可见他于 1863 年出版的游记副刊《冬天记的夏天印象》，在这篇文本中，作家嘲笑了“文明的中士”（Feldweibel der Zivilisation）以及“橘园进步人士”（Orangerie - Progressisten）的温室性，并表达了对世博会宫殿天王般必胜信念的担忧。从法国的资产阶级身上，陀思妥耶夫斯基读到了做人 and 拥有购买力的后历史性的方程式：“拥有货币就是最高的美德和人的义务。”

② 关于建造史，参阅库普·弗里默（Chup Friemert）《玻璃方舟——伦敦水晶宫 1851 和 1854》，慕尼黑，1984。

槛：从那个时候起，它意味着既非资产阶级抑或是贵族的居所，又不是前者在城市购物走廊球面上的投影——它更多的是把作为整体的外部世界移动到一个神奇的、由于奢侈和宇宙政治主义而变得容光焕发的内部性当中去了。当它被改建成为一个巨大的温室和一个帝国的文化博物馆后，透露出了与时代相适应的趋势，将自然和文化共同做成一个室内的事件。尽管水晶宫一开始不是为了音乐活动设计的，但却仍然发展成为一个音乐会的演出场地，以古典音乐的节目单，面对着无与伦比的观众数量，可以说它走在了巨型场馆流行音乐时代的前面。^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久以后还从对伦敦之行的怀疑印象中联想到了特别令人讨厌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正是他在读车尔尼雪夫斯基 1863 年的小说《怎么办》时感受到的，于是他从这种思想的联系当中发展出了 19 世纪对于文明最强有力的批评。在这本当时就已经闻名于世，并且一直影响到列宁的书（有着鲜明的前西方趋势）中，宣告了一种“新人”（*der Neue Mensch*）的出现，他们在社会问题上执行技术解决方案后，将生活在一起玻璃和钢铁建起来的共同的宫殿中——这是东西方共同生活的原型。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设计的文化宫殿是一个恒温的奢华外壳，里面四季如春。这里无论白天黑夜都只闪烁着善的阳光，所有人都和平共处，相互理解。无边的多愁善感决定了整个内部的氛围，泛人道主义

^① 参阅迈克·慕斯格拉夫（Michael Musgrave）《水晶宫的音乐生活》，剑桥出版社，1995。

的内部伦理也必然会导致里面的每个人都会自发地去关心他人的命运。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整个社会搬迁到这样的文明宫殿里面去的图像象征着西方人想完成由他们发起的世界幸福和人们相互理解的梦想的愿望。当作家在西伯利亚流放时，了解到了“死屋”当中的生存状态后，展现在他面前的出路就是生活的关上了的房子：生物政治就是建立禁猎区。

从这里开始，“历史的终结”的动机开始了它的胜利进程。19 世纪的预言家——同样包括 20 世纪的共产主义者们——都洞悉到，社会生活在经历了动荡的历史之后，只能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大内部中，即一个有着像家那样的秩序，人为调节气候的内部空间中，才能得以进行。人们一般理解的真实的历史——它必然，如同其长枪、航海和扩张战争一样，是一个处在外部进行的各种行为的总和。若历史上的抗争都能最终汇集成永恒的和平，那么整个社会生活就可以集中纳入一个有着保护功能的外壳里面去。在这样的条件下，也就不可能再出现所谓的历史事件，而都成为家庭内的意外事故。同理，也就不会再有政治和选民，而只有党派的选举竞争以及在他们的消费者中的起伏波动。谁能否认，今天的西方世界——特别是相对建立健全后并于 2004 年 10 月签署了共同宪法后的欧盟——在他们西方的特质中正好体现了这样一个大内部的特征？

这座巨大的放松的温室是基于开朗而狂热的巴力神（Baal）崇拜而设立的，20 世纪人们专门为此引入了消费主义的表达。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在世界博览会场馆令人震惊

的外观和伦敦市内如织的观光客身上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巴力神，这种联想一方面是因为外壳在形体上的相似，另外就是场馆内呈现出享乐主义的纷乱景象。这里表述出了作为消费的教义的最终之事（die Letzten Dinge）的学说。水晶宫的建立，就只有社会关系的“结晶”能够从总体上跟随其后——以这个带有宿命意义的表达，阿诺德·盖伦直接引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结晶描绘了用规范的方式一般化无聊（Langweile）并且阻止“历史”再次侵入后历史世界的意图。促成好的凝结并对其加以保护是未来一切国家强权的目标。究其自然，宪法保障的无聊将会以项目的形式伪装自己：它的社会心理学认识旋律是觉醒的氛围，而它的基本声调则是乐观主义。事实上，后历史世界中，一切符号都应该面向未来，因为在其中有着唯一的一定要交给消费者的联想的期许：舒适不会停止流动和增长。于是乎，人权的方案和趋向舒适的伟大觉醒密不可分，只要他们所指的自由在为消费者的自我实现做着准备。他们顺理成章的只可能在消费主义的机构的、法理的和心理动力的下层建筑应当建立起来的地方才会广为人知。

此外，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坚信，水晶宫内永恒的和平一定会带来其中居民们心理上弱点的暴露。这位信奉基督教的心理大师认为，放松不可避免会导致人们释放出心中的恶。所谓与生俱来的原罪的东西，在一个普遍很舒适的环境中就会以通俗的趋向恶的自由表现出来。更多的还在于，去掉史学的借口和功利主义的外衣的恶，只有在后历史的无聊中以一种核心本质的形式结晶析出：一切借口清洗过后，也许对

于纯朴的人来说还是很令人惊讶的，但是已经非常清楚，恶拥有了单纯的情绪的质。恶以无基础的铺设，以任意的忍受和让人忍受的口味，以没有特别原因的到处破坏的形式出现。现代的恶是一个无所事事的消极性——一个后历史形势下独特的产物。它的一个大众简装版本就是中产阶级家庭中常见的性变态，平日里很正常的人们会把对方绑在床上，体验新的东西；它的精装版本则是一种附庸风雅的矫情，它坚信偶然的优待的优先权。在青年人世界中，人们争相做一个有叛逆精神的人（*Pret à revolter*），恶在这里就是以酷的形式表现。有价值或者没有价值——两者都取决于摇骰子的结果，在无聊当中，不需要太特殊的理由，人们会珍惜其中的一个而抛弃另外一个。至于人们是否随着康德那样把这种恶视作极端的東西（*radikal*），实际上却又无关紧要。因为它的根并不能比情绪达到更深的层次，所以说，用“极端”这个描述根本一无所得——它构成了本体论的隐喻，用以解释人们无从知晓恶最终是从什么地方而来。

是否还有必要说，海德格尔 1929 ~ 1930 年间的伟大的无聊现象学（*Phänomenologie der Langweile*）可以被理解成为从欧洲范围内普遍建立起来的（尽管也是由于战争而严重损坏的）水晶宫中突围出去，它道德上和认知上的内部气候——每个有效力的信念不可避免的缺位以及每个个人的决定的多余——在这里得到了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清楚而明晰的把握？海德格尔在 1927 年的《存在与时间》中，以对非本真的生存（*uneigentliche Existenz*）的描写，特别是在臭名昭著的关于“常人”（*das Man*）（有可能是受了齐克果在

《文学评论一篇》中对于“公众”的挖苦和嘲弄的影响)的段落中,为他关于无聊的人的基本情态(Grundbefindlichkeit)的研究做出了准备。在这里,现象学针对逗留在技术外壳的无理要求的叛逆成形了。后来海德格尔称为座架(Gestell)的东西,在这里第一次非常详细的被澄清——特别是鉴于非本真的、失去自我的生存。当每个人都成为他者,而没有人是自我的时候,人就被骗去了他的癫狂、他的寂寞、他自主的决策以及他与纯粹外部乃至死亡的直接联系。大众文化、人本主义、生物主义是生动的假面,按照海德格尔的洞见,在这假面之后隐藏着人没有挑战的深度的无聊。那么,哲学的任务即是:冲破罩在自身头顶上的玻璃罩,将个体重新直接变成可怕的巨物(Ungeheuer)。

如果回忆一下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朋克”(Punk)现象在青年文化中的高潮,这是第二个用来很好地说明无所不在的无聊的影响和一般化了的侵略之间的关联。在某种程度上说,海德格尔是个20年代哲学家中的朋克,一个愤怒的、在传统哲学的铁栏上振动着翅膀的年轻知识分子——不仅是在传统哲学,而且还是在城市的舒适生活以及社会国家的生存剥夺体系的桎梏之中。要能正确评价他的哲学动机——他的反思中的时间逻辑的核心成分,人们必须认识到他尝试着故意为后历史的无聊世界重新戏剧化而努力——它的代价则是,灾难成为生活中最好的导师。在这个意义上,短暂地把自己归入“民族革命”中的海德格尔几乎可以说,从这里也从今天开始,一个重新历史化(Rehistorisierung)的纪元开始了,并且他不仅仅是见证者,而且还预见到了它

的发生，并如同英雄一样的推算出了它的意义。作为要重新发生一次的存在（*Sein*）的戏剧顾问，海德格尔提出了这样的假设：从思索的中心德国开始，逃离后历史的平淡，为了如同在最后一刻那样再一次让历史发生；按这个逻辑，必须要说明，“历史”不是被制造出来的，而是在遭遇中的。德国人应该是唯一有能力忍受敞开和阴森，以宏大的风格行动起来呼唤世界产生它的激情的民族。按海德格尔的观点，证明在悠闲和任意之间总还存在着一个向历史发号施令的“直观自明性”（*Evidenz*）是他们应有的权利。这种直观自明性却更多地表现在听从的耳朵里，而不是在怀疑的目光中。因为没有人往外看，但有一些人在外部呼喊。如果德国人做到了海德格尔为他们杜撰的要求，那他们就向朋友以及敌人们清楚地表明了，必要性的光就如同最后那次那样为他们照亮了道路。^① 形势的反讽则在于，直观自明性改换阵营，投入到了敌人那方：反法西斯同盟就是时代给我们带来的最清楚不过的例子。此外，它还和美国人结成了同盟。他们是那些从“历史”中移民出去的人，他们在水晶宫的总体内部之外，又另外发明了开放天空下的后历史的国家公园和娱乐公园。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水晶宫隐喻的历史哲学的强大之处，最好还要和瓦尔特·本雅明关于巴黎拱廊街的研究结合起来

^① 关于海德格尔的无聊理论在现代反讽和放松理论的发展语境中的更多论述，参阅《球面学Ⅲ—泡沫》，同上，第 728 页及其后。

看。将两者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的原因在于，它们都是用建筑的外在形式作为钥匙去解释资本主义的世界状态。在同时观察中，能够一下子就清楚地发现，为什么本雅明远不及陀思妥耶夫斯基，虽然他们一个人使用了一个言简意赅的诗学的景色，另一个人长年沉浸在自己的对象的研究之中。本雅明关于处在世界之中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闪耀的研究，由于选择的对象而被认为是不可信的，特别是它从一开始就冒着巨大的用打乱了时序的客体来解释当前性的事物的风险：他的研究定位于一个在建筑上、经济上、城市规划以及审美上都过时的建筑类型之上，以期令其承载所有对于资本主义的阐释的重任；那句著名的话语，当他看到了拱廊街后曾想写一部“19世纪的前历史”，透露出本雅明尚不太清楚的狂妄想法，即在过时的东西当中寻求超越时代的东西。本雅明试图从全部现代货币关系的话语构形中读出异化的密码，好像不仅如同斯宾诺莎派^①以及瓦尔堡学派相信的那样，隐藏于细节之中的不仅有亲爱的上帝，还有仇敌。细节的意识形态逼近一种假设，交换价值，此外还被称为现代世界看不见的“邪恶精灵”（genius malignus），在商品的装饰中成形，并显现于拱廊街的阿拉伯式花纹中。按照这样的一种细节迷信，本雅明的研究就会陷入一种地下的图书馆工作而不能自拔，从一个不自由的创造力被迫走向一个没有出路的方向。他收集到的材料越多，滤除的有用的思想就越多。而这些思

^① 参阅斯宾诺莎《伦理学》第5部分，定理24：“我们认识到的细节越多，也就越了解上帝。”

想正是能够展现资本主义相互理解的生活模式中创造内部和语境的力量的思想。本雅明指出拱廊街的象征受到了现实主义的，甚至是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认识的启发，即在绚丽的商品世界表面下，隐藏着一个近乎于不愉快的，甚至时常是绝望的劳动世界。资本主义的世界关系中究其本质是个地狱，而居住在里面的都是该死的家伙。这些家伙被诅咒，政治上很遗憾地不可能学到任何东西，在这样一种心理影响下，本雅明的理论扭曲了。在昏暗的暗示中指出，玻璃下面美丽的世界不过是但丁的地狱的变形。拱廊街的民主改建有可能发生的设想，更多的则是澄清“大众”从资本主义的矩阵或者“场域”中爆发出来是否可能，换言之，是否能够寄予这样的期望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是无法获胜的。总的来看，本雅明的研究证明了多愁善感的人强烈的报复心理的幸福，他建立起了一个世界弊端的证据的档案馆。

如果人们想为 20 世纪以及 21 世纪早期续写本雅明的重要思想的话，除了不可或缺的在方法论上加以矫正以外，还需要在事实上重新定位；人们需要按当下的建筑模式来设定大致的标准——首先要以大型购物中心 [美国明尼苏达南谷购物中心 1954 年 10 月对外开放，这座由维克多·格鲁恩 (Victor Gruen) 设计的中心属于第一个类似的建筑群，此后它的这种设计像疫病一样的在全美以及整个世界传播开来]，会展中心、大酒店、体育综合场馆以及室内体验公园为标准。类似的研究也可以冠以如下标题：“水晶宫作品”

或是“温室作品”，甚至是“空间站作品”。^① 毫无争议的则是，本雅明的拱廊街象征着消费主义之初的一种空间思想——拱廊街实施了在他看来非常令人兴奋的沙龙和宇宙在公共的内部的交融；它们在本雅明的眼中是“商品资本主义的庙宇”“棒极了的商业街道”^②。这是将东方的集市投影到了资产阶级世界，并且是一切在可购买的光照耀下的物品变形的象征——这是个魔幻世界（*féerie*）的展示场所。在这里，每个顾客在他进入其间的那个瞬间有种好像成了世界虚拟主宰的感觉。然而伦敦郊外的水晶宫，首先承办了世博会，后来又作为（为“构建民众”作贡献的）休闲公园。更多的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水晶宫，它将“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变成一个内部的展品；本雅明尽管时不时地谈及建筑，但他始终认为那不过是个扩大了拱廊街（就像傅立叶的乌托邦式的社群在他看来不过就是个“由拱廊街组成的城市”）——这里，他完全丧失了他作为一个相面大师的眼力。他还藐视一切媒体分析的基本规则，按照这些规则，格式也是一种信息。因为精英的拱廊街从未超越小型或者中型的维度，它可作为一条上面封顶的大道，其中营造舒适感^③并将商品世界琳琅满目地呈现出来。相反，巨大的水晶宫——19世纪有着巨大的前瞻性的建筑样式（它很快在

① 参阅《纯粹岛屿》，载《球面学Ⅲ—泡沫》，第317~338页。

② 瓦尔特·本雅明：《本雅明全集》第V卷，I，法兰克福，1989，第86、93页。

③ 关于“舒适的”和“不舒服的”资本主义的动机，参阅迪特和卡琳·克莱森斯《作为文化的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社会的产生和基础》，法兰克福，1979。

世界范围内被不断复制)——已经为集中的、体验为导向的、大众化的资本主义做好了物质准备,广泛地将外部世界吸收到一个完全精确计算的内部空间里来。拱廊街构成了广场和街道之间的一个上部封顶的中间停顿;水晶宫则已经代表了一种外壳的理念,它的维度足够大,以至于也许人们根本不用再离开它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死屋手记》中还以进行“围着篱笆的宫殿”的思想实验来仔细推算了一种可能性)。作家不断将外部因素纳入其中,显然并不是像本雅明在早期的一份笔记中猜测的那样^①,要把资本主义上升到一个将罪责和债务普遍化的宗教的地位;相反,它会导致人们将传统宗教提供给人们的心理语义防护盾牌替换成积极的个人保障体系。这种更抽象、更大的内部,如果用本雅明式的在图书馆里面挖故纸堆寻宝的方法是不可能看得清楚的。^②

当人们已经接受了水晶宫的隐喻作为现代性的最终野心的标志的时候,经常被提及而又经常被否认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对立就应当重新定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曾经就是另外一个水晶宫项目的建筑工地。在它关门停业之后,显而易见的是共产主义是通向消费主义道路上的一个阶段。在对它的资本主义阐释中,渴望的洪流不同程度的得以

① 《作为宗教的资本主义》(1921),全集,第VI卷,法兰克福,1985,第100-103页。

② 关于资本主义的生活关系在总体上带来的感知和呈现的问题,参阅《球面学Ⅲ—泡沫》,第3章,第9节:“帝国——或是:舒适温室;向上开放的溺爱之阶”,第803-833页。

资本的内部

发挥——这一点甚至是那些在幻想的交易所购买了社会主义股票的人也渐渐承认了。这些股票人们就像 1923 年时的现在有些发黄了的 10 亿帝国马克纸币一样被保存起来。关于资本主义，人们直到现在才可以说，它总不止是一种生产关系；它的塑造力量一直以来都波及了比“世界市场”这个概念所能及的更远的地方。它蕴涵着将它所涵盖的人的所有劳动、愿望和表达的生活全部置于购买力的内在固有之中的项目。

第 34 章

密集的世界和二次摆脱束缚：恐怖 主义作为纯粹攻击的浪漫派

全球性得以建立的显著标志就是被迫与无数偶然共同存在者成为邻居。这一事实情况最适合用拓扑学上的密集概念来确定。通过密集概念，人们可以来描写微小粒子和作用者之间共存压力的程度。使用这个概念，就等于是手中握有了一个不仅可以和传统的异化的神话（好像所有的作者用一开始都构成了一个家庭，然后由于一次灾难而相互远离）保持距离的仪器；此外，它还能够克服近处的空想（*Romantik der Nähe*），现代伦理哲学家们试图以此超过适度的

普遍化为了他者的主体自愿的或是被迫的开放性。^①

密集性提升隐含着行动中心之间更加频繁的相遇可能性，即可能是在交易，也可能是以撞击或者是准撞击的意义上。密集关系占主导的地方，商品和信息交通的框架条件就会变化，这种变化也会需要人们的伦理广泛的调整：单方面的口授变得和持续的不沟通状态一样不靠谱。同时，高密集性也保障了环境慢性的对于单边膨胀的抵抗——这种抵抗从认识角度来看，可以评价是一种对于学习过程来说温度变化很大的气候。足够强的行动者会相互间保持友好、聪明和合作^②——自然的也会相互保持陈腐的老一套。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知道相互都在成功地制约着对方，同时也学会了如何去相互计算双方的利益。鉴于他们都会在利益划分的情况下合作，那么以下假设就显得很可信了：交互性游戏规则为双方同样理解和掌握。这一原则不仅适用于互动的国与国之间，也适用于个体的行动者之间。

长期地逗留在密集环境之中，被束缚状态就成为我们的第二本质。如果它在伦理上和生理上得到足够的实践演习，那么单方面采取行动发起的实践活动将如同乌托邦一样不合时宜。行动的自由，如人们严肃认真的理解的那样，渐渐地已经如同一个童话中的动机，来自那个进攻还奏效的时代。

① 伊曼纽尔·列维纳斯 (Emmanuel Lévinas), 《超越存在：在本质之外》(Autrement qu'être ou au delà de l'essence), 1978, 巴黎, 2004。第六章, 邻近 (La proximité), 第 129 ~ 155 页。

② 参阅诺伯特·博尔茨 (Norbert Bolz) 《为何友善即是智慧》; 博尔茨《和观众夜航》, 慕尼黑, 2005, 第 59 ~ 68 页。

如果人们在某时某地还观察到了单边扩张，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据，说明在那里还存在着他们始终认为，他们面临着一个前密集（*vordicht*）的，促进摆脱束缚的社会关系。总的来说，人们可以说，所有的“处女地”，无论哪里，都已经找到了开垦它们的主人。高密集性的过程理论意义在于：单边实践的胜利阶段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不过也不排除在个别时候还会时不时产生一些强劲的余波。行动者被从历史的单边主义的伊甸园中驱赶了出来。

如果说远程通信表示了一个有着本体论的严肃性的概念，那是因为它描述了变得更为密集的实践操作过程。通过当今风格的远程通信，产生出了当前每分钟发送一千万封电子邮件，每天转账达万亿美元电子货币的世界。这个太过流行的概念因此也不能被正确的理解，如同它不是以高度的明晰性强调建立交互式的，在合作基础上，也就是说在相互束缚之上建筑的世界关系。它还包括了一切远程业务、远程帮助、远程强制、远程冲突。只有这个强的远程通信概念是适合远程影响（*actio in distans*）的资本主义形式，用以描写玻璃宫殿中的存在调式和方法。远程通信还在实践操作上支持了伦理家们关于束缚的能量可以制约摆脱束缚的力量的世界的旧梦。

按照这个道理，希望不是一种原则——埃恩斯特·布洛赫也许会宽恕——而是一种效应。每个具体的事件中可以希望什么（也许适合过程理论的普遍化），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一个事实情况，即人们间或会有新的思想，它们能在从模型到应用的过渡中使得宏观又或是微观领域内的生活发生

变化——偶尔其中会有副作用小而且有着巨大的传播潜力的发明；另外一方面则是一种观察，即在各种急于被实现的想法汇成的洪流在足够的密集的条件下，一般来说都会过滤最后剩下一些有着可操作性的，即使不是对于所有人，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更优的方案。密集理性具有一系列过滤器的作用，它能滤除单边性的进攻和直接产生损害性结果的创新——大约就是那种只能一次性或者以简短的系列犯下的暴力罪行。以这个方式，人们比如可以在研发阶段就将能带来事故的工艺先行排除，或者在工艺不可或缺的情况下，尽可能的优化高度，使其风险在可能承受的范围之内。

人们可以把密集的作用方式称为交际性方式，但只是在人们把相互限制自由空间称作交际的意义上时。这种现象，在能见度差的时候叫做交际能力，但在雾气散去后就是一种交互的束缚。备受称赞的达成的理性的一致见解是相互阻碍单方面行动的能力的外在。包括被伦理哲学捧得略有些高的概念“认可”所指的也更多是一个作用者的力量，他作为外来的推动力量潜在或者当前的阻止者但又能对其给予尊重。认识到“引进他者”作为束缚机制效力范围的扩大的过程的功绩落到了尤尔根·哈贝马斯的肩上，尽管他，出于一个唯心主义的学术传统，对话式地曲解了这个过程：“引入他者”并不是行动球面向着相似性的方向扩张，而是正好相反的结束行动的趋势的痕迹——以及用集体项目中的角度扮演来替换它。越多的他者被引入进去，自我行动的可能性的消灭就越强烈。“行为入”的群体性失业是这个时代的标签。当然重要的还在于，要把它解释成一个好的标志：人

们必须表扬对作为最有效的文明化机制的交互束缚容量的建设——尽管不能忘记的是，在滤除单边实践中的不受欢迎以及不能忍受的成分的同时，也会把一些好的东西一并摒弃掉了。

在这个背景下，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犯罪的全球化对于后历史的形势极具启发意义：犯罪分子在水晶宫内部及其边缘地带的惯例显示，行动着的摆脱束缚的力量——曾经被美化为“实践活动”——总是不断在束缚力量前面重新争得地区性的领先优势。有组织的犯罪活动依托于对摆脱束缚力量专业的改进，使它在封锁状况的空白中总是能想出新的办法。然而自发的犯罪行为则说明，人们不能再把它看成意识混乱的个体一时失去自我控制，这些人还始终被法学的术语固执地称为“案犯”。持续性的犯罪则主要是对于市场和法律的空白有着敏感的辨别力，同时还应该具有胆大妄为的行动力量。这样，犯罪分子的事实情况就被赋予了不仅是法理上，同时也在哲学上重要的意义。成功组织起来的犯罪分子不是他们的神经的牺牲品，相反，他们是行动自由的见证者，尽管他们处在一个被普遍束缚了的关系中。

这一情形特别说明了近段时间以来所谓的“全球恐怖主义”，对于这种现象，虽然有个别的分析很说明问题，但总体仍然缺乏对这种现象令人满意的解释。理论层面上，人们对于恐怖主义的强烈表现形式，特别是 2001 年 9 月 11 日的行动，所能做出的最合适的评价，必须建立在当人们把它当成一种象征来解读，即在后历史的背景下，非西方阵营的

积极失败者们掌握了摆脱束缚的动机。这不能证明——伦理副刊上说的那样——恶一直延伸到了曼哈顿。它更多地表明了，一个新的浪潮出现了，行动者为自己发现了单边性的狂喜。他们并不去模仿 1789 年以来的失败者运动，即所谓的“革命”模式；而是直接取法 1492 年以来，欧洲扩张之初的做法：扬弃惰性，采取行动突然开火，纯粹进攻所能满足的令人狂喜的非对称性，以及它曾经及时出现并在其他之前指明道路，并带来的无法超越的领先。进攻力量的这种领先可以再次获取效力——这次却是来自一直以来处于弱势的那一边。但是因为对于伊斯兰教的袭击者来说，修正他们对于地球上的事物和领土的防卫已经为时过晚，于是他们就将广阔而开放的世界新闻空间的巨大场域据为己有。在这里面，他们树立起自己的火焰型标志，就像当年葡萄牙人在登上非洲大陆后竖起他们的石头标志一样。

如果人们懂得了为什么这种情况会有利于恐怖分子，那么就能够同时赢得自己形势的一个更加精确的图像：放置炸弹的人比很多生产产品的公司更加懂得，线的主人（Herren der Kabel，源于 1996 年第 20 期《明镜》周刊一篇文章的标题，指通信运营商通过通信线路来实现控制。——译者注）并不能在工作室内生产出所有的内容，他们还处在依赖外部事件输入的状态。渐渐的，他们凭经验知道：他们自己带来了最受欢迎的事件，因为他们作为真实暴力业界的内容提供商（content provider）拥有着绝对的垄断地位。他们此外还以自己的市场商机为前提：宏大装配（die Große Installation）的信息空间对于入侵的行为来说，就如同 19 世纪还

未完全定形的非洲大陆对于欧洲的入侵者一样敞开大门，毫不设防。这意味着：进攻总是有着很好的销路，而且它越是毫无顾忌，就越受嘉许。恶意的进攻者欣喜地发现了它的原因：水晶宫内的居民的神经系统对于任意的外来侵略都是可以占领的，因为水晶宫的性质决定了他们总是等待着外部来的消息。富裕生活的市民头脑中既无所事事，又妄想狂的思维模式促使他们对于哪怕是最微小的信号，但凡能够证明外部敌人的存在，都会接受并强化。这样的信号放大在疯狂的信息球面空间中被作为形势的图像分配给恐怖行为的消费者，最终这种间接的受到威胁的感觉作为他们物质交换中的刺激被吸收。

上述准理论洞见的集合形成了关于恐怖分子的连贯实践：当他们在合适的地方定位一次可以被搬上银幕的爆炸，实际上已经在直觉上充分利用了西方信息世界过度亢进的交际撰写。通过极其微小的入侵活动，他们就影响了整个系统，如果可以使用这个表达的话，他们不过是引发了一次指压按摩。^① 其实您完全可以相信，唯一的肯定能保障成效的反恐措施就是媒体对接下来的恐怖袭击集体保持沉默（或者说，在新闻报道中引入对于恐怖袭击和轰动性反馈之间的信息封锁机制），实际上媒体总是坚持着自己报道的义务。

① 保罗·贝尔曼（Paul Bermann）使用了“跳蚤刺了一下”这个比喻；很遗憾的是，作者的反应如此强烈，以致过度诠释伊斯兰教恐怖主义从而使得新的极权主义形成；参阅贝尔曼《恐怖和自由主义》，汉堡，2004，第 32 页；并不担心产生错误的图像，他还补充说道，这些跳蚤的针刺是“战争的一部分”：最终，防治害虫又成了大的政治。

因此，我们的刺激传输管道就几乎是全自动地将地区性的恐怖打击的刺激向水晶宫中的每一个成熟的需要惊悚信息的消费者继续传递。新闻报道的强迫症把恐怖主义在不可预见的时间中，变成了一种能够吸引别人来谈论自己的艺术。因为事情是这样了，恐怖袭击的指挥者就如同一切他们之前的占领者那样，把成功和真相等同起来。无论是否正确，结果在事实中彰显出来，人们确实开始谈论他们——而且总是和天气、女性的秘密、股市的最新动向放在一起讨论。尽管是个几乎从来没有物质化的魅影，却享受到了本体性的威望，通常情况下，这是只有客观实在的东西才应有的待遇。至于说这些恐怖袭击者在西方世界不能控制的广阔的地区被人们当作英雄看待，相比之下，则是他们巨大成功的一个附带的方面。

恐怖主义作为单边扩张的策略在后历史的大陆上保证了赢得“关注”：它穿越过大众的大脑，而没有碰到值得一提的抵抗，并且在引发话题的世界市场中保有了重要的一席之地。因此，它就如同博里斯·格罗伊斯（Boris Groys）足够冷血的分析中展示的那样，同行动和媒体的艺术有着很密切的亲缘关系，也许它只是从浪漫派的易犯罪的艺术传统中导出激化了的消极后果。^① 早在很久之前，艺术过程就在于通过侵略的传播而迫使其赢得意义以及引人注目。从这些技术在 20 世纪的发展过程来看，人们认识到，使用惊悚并不是

^① 鲍里斯·格罗伊斯：《作为职业的恐怖活动》，载卡尔·黑格曼编《艺术的爆发——政治和罪行 II》，柏林，2003，第 125 ~ 148 页。

作品伟大的证据，而这只是一个市场营销机制。斯托克豪森对于“9·11”这个发生在纽约的戏剧化事件的始作俑者爆发出世界知名的嫉妒理所应当，同时，他说出的关于这个日子的真相比整个关于九月事件的文学工业还要多。^①

在这个视角下，就显得非常清楚，为什么说新自由主义和恐怖主义就如同同一张纸的正反两面一样浑然一体。在这张纸的两面上，人们可以读到同样清楚表达的同一段文字：

对于下定了决心的人，历史并没有结束。单边性对于那些敢于发动进攻的人来说一如既往的值得。被上帝选出的人仍然把世界看成是无主的物品，并且只要有打破僵局的意志，对于纯粹的进攻，佩剑的尖端上就会有猎物。向前推进的自由是真的本质（*das Wesen der Wahrheit*）。

人们应当承认，这是塞壬的歌声——只是没有足够数量的桅杆，不能把所有听到歌声的人都绑起来。这样的促使人们摆脱束缚采取行动的音乐对于更强的人来说是非常受欢迎的，他们需要发泄多余的力量，至于是从事有意义的事情还是采取报复行为则并不重要。

表面上看，世界舞台上上演了一幕剧，在善意的人的联盟那里，这被称为“原教旨主义者的袭击”；但在深层次上讲，原教旨主义带来了不安。尽管它属于一个已经过时的了

① 参阅弗兰克·兰特里夏（Frank Lentricchia）/朱迪·麦克奥克利夫（Jody McAuliff）《艺术的犯罪+恐怖》（*Crimes of Art + Terror*），芝加哥和伦敦，2003，第6-17页。

时代，但它的残余却在后历史的世界中仍然余音不绝。最关键的进攻者们，无论他们是恐怖袭击者、投机商、罪犯、企业家、艺术家还是当选者，加速推动的东西是要求变成纯粹的发起动机的一束光线——并且这发生在一种提供一切手段来消弭进攻、减退发起动机勇气的世界形势当中。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当前被认为是无意义的自由进攻的顶点，它之所以有趣，其实不过是一个心理上的组织，从而使理论到实践、仇恨到实践以及食欲到实践的不稳定过渡变得更安全（参阅前文，第 11 章第 93 页及其后）：我们被允许提醒，“原教旨”的认知功能从此以后就是扬弃阻挠行动者行为的束缚。今天的反原教旨主义者有着很好的理由在理论范围内坦率地否认他们的当事人的权力，期待他们发出哪怕是任何一种行动的指令——这显然是一个保护性的陈述：必须要指出，理论家们，在 20 世纪凶手大量出现的情况下——也已经懂得，作为一些宽泛的道理的知识产权人，陷入共同过错之中有多么迅速。

人们会在回顾中问自己，为什么直到把陈述行为的理由的实践意义隐藏起来，需要经历这么长时间：有一个理由的产生影响的理由就是对一个动机的需求，此时一个即将成为行为的人下定决心让自己被“引导”。能量难道不是一直在寻找着借口，为他们提供自由的通道吗？自笛卡儿以来人们就已经知道，要求高的行为人在向他们摆脱束缚的理由要求着什么：在普遍感到不确信的时代，想要让周围世界感到震惊，如果少于一个坚实的基础（*fundamentum inconcussum*），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每个想做点难以想象的大事的

人都要通过的墙由于强大的摆脱束缚力量的作用而变得可以穿过——因为当今世界在孤傲的和被侮辱的人眼中完全就是由墙构成的，它让人们不要变得积极，但对于最终日子的行为人——最强劲的穿墙者来说，却是恰恰足够好。如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说的那样，激进主义是一种现代的方法，正好能够把不可信的东西表现为似乎唯一可信的东西。

对于当前针对大的结构的恐怖袭击，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情况证明了一个后历史的激进主义存在的事实——这就如同发现了黑天鹅这个物种一样。这将会带来很多沮丧和失望，直到新自由主义者和伊斯兰激进分子——两者都是后历史的牺牲者——理解到，积极的非对称性生活的幸福和快乐本体上属于旧政权（ancien régime）——至于这些天鹅是不是能再变回白色，就只能耐心等待了。

两种类型的行动者都是不合时宜的，无论在哪种意义上讲。一种就像 1492 年的嗜金的航海家那样，妄图再次扬帆出海，另外一种则梦想着像 7 世纪时沙漠中的独神主义信仰的氏族那样无所顾忌。可是两者都必须结合时代的状况来进行自我组织，于是他们假托感觉到现代化的网络是他们巨大的机会，而非各种阻碍状况的集合。凭借迟到的行动哲学，他们在人类刚刚进入 21 世纪时，提供了进攻的梦想癖的两个主要观点。这种不安分的梦想癖把空白地带错当成了自由的空间。他们的行动者要把发泄中的不对称性从使命、项目以及让自己高兴的第一击特征的姿势中解救出来，这是一个友善、对称、束缚、交互作用、合作的时代，东西方皆是如

此——只有在空白地带不是这样，系统决定了有大量空白地带，但它们又异常狭窄。

从行为理论视角上看，“历史的存在”就应该可以被定义成共享一个行动空间，在这个行动空间中，内心多余的能量发泄出来以及造就世界历史结果总是导致相同的东西。航海家哥伦布，据说是个爱说大话的自闭症患者，就确立了一个旧式的历史英雄应该能够有什么样的影响作用。与他之后无数的行动一样，他从神经官能症突破到了一般共同。按照“历史”，就只有那些人不能或者不愿洞察到它消逝了的人才在制造着“历史”。这会得出世界舞台上不能消解的自闭——但是却伴随着媒体大声的反响。“9·11”事件是迄今为止后历史得以完成最清晰的标志，尽管很多人在震惊之余把它看成是历史的标志——甚至是看成“历史的重新发端”^①的开始信号。它将一个多余的日期带给世界，这个日子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只是这一天发生了这件事情——以及促使事件发生的莽撞的计划。“9·11”的犯罪分子证明了一种单边的暴力，它不雪藏任何与一个项目相似的东西，除了模糊的指示要求重复——被坏的谋略家刚愎自用地误解为威胁的指示。一个真正的威胁具有一个“武装了的劝说”^②的形式，而如同策略理论家们所说，“9·11”行动根本没有

① 参阅拉尔夫·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历史的重新发端——从柏林墙倒塌到伊拉克战争：演讲和杂文》，慕尼黑，2004。

② 爱德华·N·鲁瓦克（Edward N. Luttwak）：《策略——战争与和平的逻辑》（*Strategy. The Logik of War and Peace*），剑桥/伦敦，1987，第13章，武装了的劝说（Armed suasion）。

任何的建议，它只是单纯的实施了一次针对水晶宫的定点的攻击。它是一个仅限于实施的“措施”。向上帝国家发起的“圣战”不是一个项目，而是一种男性的姿态，用以捍卫进攻的尊严。谁能说，他是否就多于武装起来的自卑感呢？伟大的行刺行动没有像 19 世纪以来的革命性的元伦理训诫的那样，透露出很令人遗憾，但却必要的恶的手段来对善的最终目标的追求。那不过是在一个被束缚和反馈机制所控制了的时代里，单纯的进攻方式的指责。无论如何，“9·11”事件中的行动人和背后的委托人都如同他们之前的破坏圣像运动者一样，从打破心目中的那个所谓的“圣像”而获得一种满足的体验。

“9·11”事件中，人们可以解读出后历史的内容在其戏剧性的方面将会保持被失去理智的人所控制。这不是个与每个其他的判断都一样的判断。在黑格尔所说的不可能（*Unmöglichkeit*）从历史中学到什么东西之外，又增添了新的在后历史的进程中，也完全不可能学到任何东西。只有提供安全技术的人能够从后历史的行动主义当中找到结论——其余的观察者们则因为刺激被扔到了情绪的潮汐之中，再算上国际化的警察的紧张忙碌，利用公众日益增长的紧张，使得他们自身的扩张变得合理合法。在巨大的玻璃房子中的人经历了系列的突发事件，没有说法和姿态，没有负责人。那些都是特别焦点。但是新闻和它的素材，真实的暴力行为以及“当地的”戏剧——就像阴郁的、伪矿业的专业术语关于发生事故和事件的地方的说法那样——，只是密集空间的规则程序表面起的皱纹。

无论如何，恐怖主义的针刺都不可能是西方政治文化倒退到“霍布斯式的状态”的理由：西方国家是否能够为他们的公民提供足够的生命保障的问题，可以非常清楚地用事实来回答，声称这个问题是认真地被重新提出本身就是很愚蠢的行为。把恐怖主义描述成当前整个自由世界的“致命危险”只是个修辞手法，内政部长和紧张情绪的捐客们需要借此来获得大众的认可。心理上吸附恐怖主义对于“社会”的影响的管辖权限早就过渡了——就如同恐怖主义的刺激已经单纯地通过它的媒体传递给接受者，而不再是通过国家的动员令。今天的国家政权已经和其他的主体一样成为恐怖的消费者，尽管他本来负有打击恐怖主义的使命，但这却丝毫不能改变它完全和“社会”一样被动以及遥不可及。(289) 因此，国家既不能直接被攻击，也不可能直接反应。所谓的“打击恐怖主义的战争”的言论只是要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对于攻击只依赖于媒体的次元的过程而存在的洞见上转移开来。人们称之为恐怖主义的东西，实际上是在完全去帝国直辖化（*Mediatisierung*）的时代，是公众结构变迁的一部分。如果想真正去打击它，就应该把恐怖行为表演者的死亡诱惑和他们的观众们当中的根剪断——并且这是与全球化了的娱乐法则相违背的。

此外，表明国家政治的存在正确性也不再从霍布斯式的功能派生而来，它更多的是作为生存机会和各种舒适的通道的分配者而组建起来。他证明自己有用的方式是作为全体公民的想象的总体心理治疗师以及保障多数公民在物质和想

象上的溺爱。^① 甚至它的军事功能在此期间也慢慢顺应治愈的风格。当下相当一部分“安全的”战争的推动力来自清教徒式理解的免疫动机。

较大规模的非自由反应因此对于恐怖活动来说总是不合适的，一方面，因为它们总是故意对于被攻击者对于攻击者来说无法估量的优势地位避而不谈，另外一方面，则是因为他们总是给单点式的攻击赋予象征性的意义，而这种意义在任何一种社会关系中都不可能与它实体的内容相符。于是乎，大量的评论员令基地组织的迷雾，这样一种由仇恨、失业和可兰经的引用交织而成的东西，上升为一种有着自我风格的极权主义，有些人甚至认为，从中可以解读出伊斯兰法西斯主义来。并且它能够有能力，不过天知道它是通过什么样幻想的方式，整体性地威胁“自由世界”，并且破坏它的系统中不可缺少的消费快乐的整体氛围。有些西方的学者甚至发展到，把看不到未来出路的伊斯兰青年们宣扬及传播的反美的圣战浪漫主义思潮风格化为第四次世界大战。^② 出于何种原因会有这样的扭曲和夸张，在这里并不想逐一去展开论述。当然，这里面始终有分析家们的利益在起作用（关于这一实践详细的阐述则需要包含一个章节关于修辞的控制体系，它专门讲述作为后现代达成一致的技术的歇斯底

① 参阅《球面学Ⅲ—泡沫》，第3章，第9节，帝国—或者：舒适温室；向上方开放的溺爱阶，第801页及其后；以及詹姆斯·L·诺兰（James L. Nolan）《治愈的国家：世纪末政府之合法性》。

② 诺曼·波德霍雷茨（Norman Podhoretz）：《第四次世界大战：如何开始，有何意义及我们为什么要赢》，《评论》，2004年9月。

里)。然而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新现实主义者重新觉得处在他们的元素之中；他们终于又面对了一个有利的形势。在这里，他们可以把自己当作犹豫不决者们的领袖——眼睛死死地盯住强劲对手的形体，放在老的和新的真实度量上，那么对手的强大，完全是一个符合利益的夸张的产物。对于提供咨询意见的人来说，“战争”就是他们自身意义的源泉。在安全的借口下，执掌话语权的好战分子们强化了他们的权威，这是从其他的来源获得的推动力量。在媒体空间中细心维系的恐惧气氛保证了多数的被惯坏了的西方安全消费者屈从并顺应了不可避免的喜剧。这将何去何从呢？出行的人们自“9·11”事件后已经能有所体会。乘客们手提行李中的指甲刀也都需要没收，从而减少对航空安全的威胁。

第 35 章

凶手不明和责任伦理 控制论的复仇女神

如果说从正在发生的“历史”中无法分离出行动的伦理，那么责任伦理在 20 世纪不可阻挡的上升势头就证明了水晶宫中的后历史形势。其中还包括一个几乎不可消解的伦理道德的使用者假想，从而欺骗每个个体，似乎他们不仅能够对于自身的直接的行为，而且能够对于地区的行动的副作用负责，即使它们是那么遥远。在大内部的个体存在有利于远程因果和心灵感应的思考方式，当地的行动往往和远处的作用联想在一起。以这种方式，责任概念就讨得了所有那些相信在绝大多数的事务中，尽管不可否认地漠视了每个个

体，但自身做什么、放弃什么仍然非常重要的人的欢心；同时，要求没有责任的人负起责任也帮助了无数被事物的进程弄得灰心丧气的人。

然而，如果人们想在普遍存在的对于责任的号召以及自愿报名接管的人流涌入当中认识到妄自尊大的症状以及对于复杂性狂躁的抗拒的话，这就可以说是对于心理学至上主义的一种未经证成的妥协。事实上，如同较为深刻的思想家揭示的那样，责任并不特别是一个伦理的、本体论的或是关系理论的概念——它意欲自己将责任的联系性固定在主体性结构中的真实的他者之上（如同第三者以及多样化的他者）。这其中涉及了如同对于“我向对面的你的渗透”的束缚一样的，对于总的来说贯穿于后果的回顾与前瞻的耦合的行为的束缚，如果说这些在距离行为发生地很遥远的地方显现出来。它表明了将行动者从天堂中驱赶出去，而在天堂里，成功是不会询问你是如何达到成功的。

在最近一百年的进程中，从过热的神学动机中发展而来的责任伦理^①，不仅可以用于潜在的行动者的自我拔高或者自我束缚，而且还更能让现实的行动者甩掉他们的行动带来的意外的后果和副作用。在其最当前的形态中，责任伦理为行动者准备好了建议，只承担在功能的例行公事的框架中的潜在责任。“定然律令”的后现代化的版本是：“在任何时候只实施那些在考虑了出于你个人观点和你的功能位置的视

^① 库尔特·拜耳茨（Kurt Bayertz）：《责任伦理来源简史》，载库尔特·拜耳茨编《责任：原则还是问题？》，达姆施塔特，1995，第3～71页。

角一切明智的被忽略动机后仍然不能不执行的行为。”在渐渐被普遍赞誉的谨慎原则的面具之下，产生了一种回顾它的野蛮年代的实用主义。关于这种实用主义，人们可以说，它跑完了现代性的态度转移的从歇斯底里到装酷的完整的循环。

如果我们稍许回顾一下行动精神，在它责任伦理方面陷入疲劳之前，看它是如何向公众展示自我的：年轻的歌德，也就是《浮士德》的作者，在书的第一部分中，最初的存在还能毫不复杂地为“行动”而被追诉——伴随着副开始（Vizeanfäng）力量一起，没有它的话，行动只不过是宣告而已；“浮士德式的”将行动置于初始反映了近代的基本洞见，即没有能量的理念（Logos）和没有精神的能量一样，都不能作为世界的基础；单单在一个将力量和知识（新近以来又称作信息）容纳在自身的平均值中，才能找到真正的和实际的初始量（参阅本书第 12 章，第 107 页）。行动如何移转到人们的身上的问题在此后不再为了现代的人而提出，因为他们总是以自己为知情了的能量为出发点；不清楚的只是，这种能量是如何从犹豫不决的状态摆脱束缚从而变成实施行动的。自 16 世纪晚期，关于浮士德博士的民间故事以来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和魔鬼签订一份咨询合同保障了当时的学者能够以最有效的途径获取摆脱束缚的方法。

在这样的状况下，歌德可以以此为出发点：众所周知的是，他的我们在从理论到魔法过渡的瞬间结识的浮士德起先只是寻求单方面自我扩张的口令和方法——同时他在尝试的

精神当中寻求支持，尝试的精神相当于副上帝，它帮助他摆脱束缚的方法和规则——而且不仅是帮助，甚至还将他像另外一个自我（alter ego）那样作为观察者添加了进去。^①显而易见的是，在浮士德身上燃起了形而上学的非对称性烈火，被赋予了灵魂的行动者在一边，而原料以及空的空间在另外一边。而且，所有的扩张的方向也都已经事先预设了：行动在这里叫做表达行为，它证实了主体对于一个“自我世界”的要求。通过行动来放置世界从这个时候开始命名为不及物意义上的“工作”（Werk）或者是及物意义上的“生活”（Leben），两者合并就得到了终生的成就（Lebenswerk）。为此，他者（das Andere），可选择的情况下，男性或女性，提供了经历的、建筑的和诗艺的素材。“艺术”就是对于每个个体的单边主义的媒介。

随着资产阶级时代的审美扩张主义，关于创作、原创和放置自我的世界的梦想已经过渡到了一个流行的阶段——在这样的形势下，没有什么人会反对人们间或回顾16世纪时的情形，为渗透入19世纪增添信心。在歌德时代现实的舞台上，当然没有想作为发明家、企业家或是艺术怪兽而收获成就的人会去把自己完全托付给魔鬼。每个近来的流行的文化史都足够为了突然触发而进入氛围——伟大人物的历史去完成余下的东西。人们信仰单方面进攻的自然法则，当这种信仰得到一定程度的传播时，它也带来了最粗犷的庸俗化。

^① 比较，克劳斯·比尔格莱普《梅菲斯托的〈浮士德〉》，汉堡德意志现代剧院，1999。

从战争、航海、科学以及艺术方面传来的各种成功的信息在 19 世纪以来的野心勃勃的人们看来都可以被解读成可模仿的行动。谁如果有能力去做，一定会尽可能地让自己的名字载入那个发现、占领、艺术和犯罪的史册。

实际上，在成熟的歌德那里已经出现了凶手不明问题。受伤的世界开始回溯追究行动主体的责任；甚至是对于一切的诱拐历史中最平淡无味的那个“格雷卿”事件，教授在情绪致命发泄的关头，也还不无悔恨。稍稍注意一点的读者是不可能感觉不到，《浮士德》并不是关于悲剧式的伟大思想家行动者的一部德意志英雄戏剧，而是一部听天由命的戏剧。它以一种几乎不可混淆的方式谈及了将英雄驳回到人们常常乐于称作人性的条条框框之中的话题。它的内容涉及了从各个角度反思的断念（*Entsagung*），由于有了它，现代的智慧形式采取了在扩展了的能力中间的自我撤回轮廓。并且也因此幼稚性情的前亵渎（*Prähybris*）和世界及自我经验的个体的后亵渎（*Posthybris*）结合在了一起；第二个谦卑，当它环绕了地球一圈以后，回到了第一个那里。而进攻方式所蕴涵的强大的犯罪能量所剩余的，不过就是已经没有客体的拼命努力，它虽然一直在追求，但却无法取得成功。《浮士德》第二部就给我们带来了关于这样的一个行动者的故事，他努力地将他的扩张向着各个方向推动，最终却在他的游历以及狂喜的尽头认识到，他依赖于无法掌握的他者的拯救。在谐音共振的世界关系中单边主义的圣像不明，作为责任的可怕的巨物（*Ungeheuer*）显现出来。这便是浮士德的

后现代性。^①

这一切都可以用很清楚的过程逻辑的概念加以总结：如果“历史”随着单边性的闪耀，并对着周围的世界用方言谈及初次击打、出海以及入侵，赢得了它的动量的话，那么后历史则必须将自己转向反馈的发现和忍受。当然，每个开始中都潜藏着一种魔力，但是当副作用的时钟已经敲响了，该怎么办呢？于是乎一个第二阶段的获取世界就开始了，作为一种自我撤回——受到我们这个时代的新厄里倪厄斯女神的掌控。古代，将阿勒克托（不安女神）、墨该拉（忌恨女神）和提西福涅（报施女神）更名为欧墨尼得斯（仁慈之意）之后，现在将其顺应世界系统的精神而重新命名就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他们今后应该叫做回馈、多边主义和责任。这些都是后历史密集当中审慎的女主人，总是能够把事情的发端和结局用线牵连起来，从施加的影响到产生的原因向回梳理，用计算深入，在成本分析中发白，在多元素的并列中迷失，沉湎于因果报应和统计学计算的相互对抗的深渊中；详细列出造成的损失并预估案件还可能带来的损失，就如同它开始并一直延续下去。

后现代的人们有他们面临着新情况的理由，于是他们相信没有开始（*das Anfangslose*）：他们渐渐已经到处都能够以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情况为出发点，而这些情况则无法再去查证清楚，谁，什么东西，使用了什么方法或者出于什

^① 参阅乌尔里希·盖尔（Ulrich Gaier）《浮士德的现代性》，《论说文集》，斯图加特，2000，第7~56页。

么目的将事情开始了。绝大多数人不明原因，但或多或少地会感觉到，通过封锁人们其实还是能捕获到的发起人，一般来说会产生出更多纠结的冲突——这不能排除，人们必须反复的向被证实了的骗子展示边界；同时也没有任何反对在艺术领域内，为嘉许他的终生成就，而给一个顽固的累犯颁发一个奖项的理由。对于作家的地位来说，这是一个用作品来骚扰世界的大的单方面力量，人们在他们身上也看不到正确的使用，因为一切都被纳入了后单边主义时代的行动和思维模式中去了。在这中间，同原创相比，共振是作为一种更深刻的现象而被体验——人们此外还可以从以下方面看出，当下的创造力的更富有精神的人要么是作为单纯的手工艺人，要么作为交互文本中的控制中枢来表现自我。原创性就和单一原因性一样，是个属于过去的人们的概念；它如昨天的诚实者今天仍然想说的纯粹真实那样，如此真诚，应当获得我们的微笑。

在这种情形下，那些束缚的阻力看起来就和“原来的”推动力来源相同，具体地说：束缚力总是优先于推动力，就如同评论超越了原来的文本，而演出则将原来的剧作撕扯成多部作品——这样亦是有道理的，因为每个作者都要满足其自身单方面的而不需要任何许可而写作的故意。后现代推动对于历史的反作用的禁止，出于如我们现在见到的，指明了对抗历史的行动的保险技术方面的考虑（参阅本书第 16 章，第 143 页）。此外，这一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具效力。

只要“历史”还能按照它过去的条件发展，它还会到

处将进攻的特权彰显出来。对此，暂时没有什么比臭名昭著的“人员、船只、金钱”的三位一体更需要，再者就是进攻的武器、书写的工具和植入的历史学家。从这些前提中，自然能知道可推导的后果是什么：在宽松的环境中，行动的矢量会向着开放奔跑，能量的流动是表现式的，很少有回流的情况。世界还像一张白纸，还在等待着鹅毛笔的进攻，行动不会回馈到行为者自身来，如果一旦还是有这种情况发生，这个封闭起来的循环就被看成是需要庆祝的庆典或是需要沉思的悲剧结局。悲剧的回馈还是在回忆的彩带花环中的行动总结都标志了例外状况。资产阶级是使用悲剧来准备对行动者进行束缚，通常情况下原因就像离弦之箭一样射向外部不再回来——这是个先锋派艺术家们、革新性的罪犯们以及初次征服某个从未攀登过的高峰的人们很欣赏的态势。

相反，在后历史的密集状态下，发出的每个脉冲都能截获反馈的信号，甚至经常会在这种脉冲完全发展起来之前。一切向前挤，向外扩张，想有所建树的意志，很久以来在开始做出第一个挖掘动作之前就已经在抗议、反驳、相反建议以及终曲中映射出了自身；一切的所谓欲采取的措施都会被相对抗的措施超越——对于绝大多数的改进建议，实际花费在重新表述、加水冲淡以及暂时不去理会它的能量极大，然而真正实现它们只需要其中二十分之一的能量即可。钉一个钉子需要一个委员会的许可，然而该委员会在慢慢逼近问题的本质之前，选举出主席、副主席、财务专员、书记员、妇女委员以及一个委员会外部成员，他们共同决议，该事件应该由地方技术应用后果评估及环境保护伦理委员会负责解

决。今天，政府中就充斥着这样一群人，他们浸淫的专业技能在于，做出貌似可以在普遍束缚了的视域中有力地推动事物前进的表面。与之相类比，艺术家一般来说就只是在从事着保持革新的表象的事情。不被许可的原创性将会导致写入个人档案。至于罪犯，人们在事实上理解的通常是那些最后一次做出任意性的行为并被当场抓获的人。这样的关系，尽管它首先异化了我们，但几乎毫无限制的受到了欢迎，是否还有必要强调指出这一点呢？

鉴于这样的状况，治疗小组能够作为后历史真正的培训地点。每个人都可以在那里学习着说，当另外的人在那里做出了这样或者那样的事情又或是表达了些什么东西时，我感觉如何，最好还是在对方确实表达了些什么东西之前。在这里，人们学着在过度反馈的世界中生活。伟大的无所顾忌必须躲到国外去，在任何一个地方去寻找着需要它的地方，用以享受单边性的狂喜。也许这种逃逸是逃往巴西，在那里，相对立的不是国家和社会，而是国家和森林。但是，即使是“森林”渐渐的也不代表是无反馈的空间；它马上就代表有着如此多反馈的问题，以至于它不可能再成为避难者逃避副作用的避难所。

第 36 章

资本主义的世界内部空间 里尔克

几乎遇到了亚当·斯密

鉴于由资本传递过程而形成的世界，人们可以确定，当下事情的进展证实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水晶宫中的存在氛围的预测。今天发生在购买力帝国中的事情——这发生在一个泛化了的室内现实性的框架之中。无论你逗留在何处——在任何地方都必须考虑到场景上方的玻璃顶。例外情况对于这个观察来说也不能例外；纽约双塔在这个水晶宫中坍塌了，柏林的爱的大游行曾经是一个宽广的室内壁球厅中的宫殿娱乐，镶金的天使胜利女神意味深长地审视着大游行，倒

错时间地通报着德意志在西方的胜利——日期必须在如此久远的过去，以至于即使是那些一直清醒的、政治正确的人都忘记了提出拆除胜利柱的要求。

资本主义的世界宫殿——超晚期马克思主义者纳格里（Negri）和哈特（Hardt）新近以《帝国》的名字重新对它加以度量，当然也故意对于外部的边界未加标记，也许是为了更好地召唤将外部与内部的反对派之间的有机联盟的喷火怪物——没有构成连贯着的建筑结构；它不是一个可居住的房子，而是一个温室式质量的舒适配置或是一个形成了人造大陆的自命不凡的飞地上以及软物填充了的外壳中生长出来的根状茎。它的复杂性几乎完全是在水平方向上发展，因为它是一个没有高度与深度的形成物——因此，在它身上，旧式的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隐喻就失效了。而且对于一个平坦的巴别尔塔来说，也根本无法谈及“底基”（Untergund）——我们来到一个没有鼯鼠的世界。^① 如果人们要求世界宫殿在数字上完全将全部“人类”囊括其间，那么这就如同所说的那样，是一种误读。巨大的舒适结构虽然在较长的时间内还会通过将半边缘地带的人们变成完全的成员的方式，将为数众多的人纳入体系中；然而它也会触及以前的成员，并且以社会上的隔离威胁在地域上涵盖了的人们，这意味着从舒适语境的优先内部形势中被放逐出去。半边缘地带首先分布在那些，“社会”还拥有很大部分的由传统

① 纳格里和哈特因此有理由放弃鼯鼠作为左翼激进人派的图腾动物，并宣扬蛇作为新的图腾——一个喜悦地被选出来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梦想失败后的运用诺斯替教义阐释的左派的象征。

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组成的社会关系——最戏剧性的表现是在中国，那里农业帝国的统治（涵盖了将近9亿人口）和工业化社会的生活模式（大约超过4亿人口）之间的鸿沟与日俱增。^① 类似的还有半现代化的国家——如印度和土耳其——在那里相对富裕的西方消费主义的城市地区和农村大多数晚期中世纪的贫困人口相共存（这是众多原因中的一条，为什么对于接受半边缘地带国家土耳其进入布鲁塞尔水晶宫是一个难以预计的冒险行为）。

尽管被设置为“室内宇宙”（Indoors - Universum），但大温室并不需要固定的外皮——在这个意义上讲，水晶宫的意象某种程度上说是个过时的象征。只有在个别情况下，它的外部界限物质化为硬的材料，如墨西哥和美国之间的封锁线或者如以色列和约旦河西岸地区之间的安全区。舒适配置设置的最有效的隔墙是以歧视为形态的——这是将有产者与无产者分离开来的财富能力的墙；是极不对等的分配生存机遇和行动选项而竖起的隔墙：在里面，拥有购买力的人的社群将广泛免疫的白日梦布置成稳定的、增长的舒适；而在墙外，或多或少地被遗忘了的多数人试图在他们的传统、假想和即兴创作中求得生存。人们可以有很好的理由声称，南非的种族隔离（apartheid）政策在取消之后仍然在资本主义的范围内到处普遍化了，它虽然去掉了自身的种族主义的表述，但却过渡到了一种难以表述的经济文化状态中。在这种

^① 参阅吴春桃/陈桂棣《中国农民调查》，2004，德国尤利西斯报告文学奖。

状态中，耸人听闻之事大规模地进行着。^① 普遍化的种族隔离政策的行为模式包括一方面在富裕地区让贫困不可见，而另一方面在零希望地区将富裕的人析出。

21 世纪初的水晶宫，按照最有利的计算标准，涵盖了全部人类的将近三分之一，当然也许只有四分之一或者更少的成员的事实，可以用将人类所有成员都纳入一个均质的福利体系中，按今天的技术、能源政策以及经济条件从物质上加以组织是一个系统性的不能完成的任务。人类作为人权载体的集体的语义的免费构建，出于不可逾越的结构性的原因不可转移成作为购买力和舒适机遇拥有者的人类集体在操作上的昂贵构建。这里就奠定了全球化“批评”的困境，它虽然是评价各处困苦的标准，但却不能作为克服这一问题的方法而输出。在这一背景下，人们可以把互联网——在这之前是电视——刻画为一种悲剧式的仪器，因为它作为一种便捷的以及全球民主交际的媒体支持不能实现的结论：物质的排除在外的物资也必须能够共相化。

当然，全球的资本主义内部空间，惯常被称作西方或者叫做西化了的球面，或多或少地拥有充满艺术感的建筑结构：它从作为由舒适的长廊结成的网的地面上拔地而起，从策略和文化上生动的结点扩建成为密集的工作和消费的绿洲——通常情况下是以开放的大都市以及风格统一的郊区为形态，但却越来越多地以乡村驻地、度假村、电子化乡村和

^① 巴勃罗·加伊坦·圣地亚哥：《零希望城市的社会种族隔离》，因特内尔内达/格洛卡尔，墨西哥，2004。

门禁社区的形式。群体交通半个世纪以来的一个史无前例的形式就是通过这些长廊和节点。居住和旅行在宏大装配中成为共生现象——它反应在话语中关于古老游牧生活方式的回归以及犹太人遗产的最新形式。^①大量的旅游组织者、歌唱家和按摩师提供他们的劳务作为液化生活的导游。如果说今天旅游业呈现出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的尖端现象的话——并且是世界范围内，除了一切皆可实现的石油贸易以外，营业额最大的经济领域——，那么正是如此，因为所有旅行活动的最大部分都在安静了的空间内进行。为了离开原地，人们不需要再跑到外面去。无论是空难事故还是沉船事故，也无论它们在哪里发生，都实际上总是宏大装配内部的偶发事件，并且作为地区新闻报道给各世界媒体使用者。如果是去到宏大装配之外的行程，则被看成是一次风险之旅：西方国家来的旅行者通过这样的旅行——警察和外交的经验可以证明这一点——总是更频繁的成为一个文明批评过度装饰的绑架行业的事实共犯。

资本主义的内部空间包括，如前所述，当前将近 70 亿人口的不到三分之一以及地理上陆地面积的十分之一不到。水世界不必考虑，因为到目前为止，所有的远洋航船以及可以住人的舰艇加起来的面积不到所有水面面积的百万分之一。单单是新的玛莉女王 2 号，最近建造运行的超级豪华游轮，2004 年 1 月的处女航程，满载 2600 名乘客驶向纽约。它值得一提的原因也许正是因为它作为飘逸的水晶宫证明

^① 参阅雅克·阿塔利《游牧的人》，巴黎，2003。

了，后现代化了的资本主义多么缺少自我表达的力量。挑战性的大游艇是刚到来的 21 世纪唯一存在的、有说服力的总体艺术品——还在斯托克豪森以七天为主题的系列歌剧《光》（2002 年完成）之前——，它整合了集中的象征力量的最新发展趋势。

使用全球化这个概念，实际上指的是在贫困的世界海洋上漂浮着的一个移动的、有着兴奋的舒适感的人造大陆。尽管占主导地位的肯定话语总喜欢唤起一种表象，似乎世界体系究其本质包含了一切。事实上却正好相反，出于经济以及系统的强制性原因。排他性正是水晶宫这类项目本身所固有的性质。一切自我溺爱的、在稳定的奢侈和长期的供应过剩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向心结构都是一个挑战概率的人造生成物。它的存在必须要以一个可被压迫，并且暂时或多或少的可以忽视的外部为前提——当然还要包括被几乎所有行动者当成全球垃圾场的大气圈。很显然，被外部化了的维度的反应尽管会相应的延后，但这并不代表它可以永久地被关闭。于是乎，“全球化了的世界”的表达仅指能够作为人类当中，拥有购买力的那批人的“生活世界”的移动设施。在他们的内部不断向稳定了的不可可能的新高度攀登，就好像强消费能力的少数人为赢得游戏要脱离平均水平而无穷无尽地玩下去。

因此，关于全球化的论争几乎完全只作为富裕地区的自我话语而进行就绝非偶然了；除此之外，世界上绝大部分地区要么就根本不清楚这个概念，要么就只是从随之而来的副作用中对它略有了解。无论如何，资本主义的巨大架构还是

资本的内部

为某种程度的世界主义浪漫情怀插上了翅膀——大型客机的机上杂志就属于这种情怀最有代表性的媒体，而国际男性媒体的其他产品暂且不提。世界主义，究其本质，人们可以说不过是被宠坏了的人的地方主义。世界公民的思考也可以被称为“旅行途中的狭隘主义”（*Parochialismus auf Reisen*）。它赋予了资本主义的世界内部空间中一切可以用钱换到的东西一种开放性的意韵。

“世界内部空间”是一个术语，大诗人里尔克在1914年晚夏时，在关于空间和共存的生活哲学和新柏拉图主义风格的诗学反思背景中使用了这个概念。当然，《几乎一切中都在向感觉招手》（*Es winkt zu Fühlung fast aus allen Dingen*）这首诗也成了他诗集中最为著名的代表性诗作；诗中有以下的诗行：

穿过一切本质，只有一个空间可及：
世界内部空间。鸟儿静静地飞翔
从我们中穿行。噢，愿生长的我啊，
我向外看去，在我之中在生长大树。

我担忧，我心中矗立着房子。

因为这里没有篇幅来阐释诗的内容，所以我们只需要说明，合成词“世界内部空间”（*Weltinnenraum*）显然更适合描绘世界经历的顾影自怜的典型方式。当这种情绪模式明确下来，周围的世界和它想象的延续就会被一种灵活的、情绪高昂的、不加区分的心理的温暖体验和意义猜测倾泻而出。

这种心理拥有一种原型的魔力，一切它所及的物体，皆被变为被赋予了灵魂的共同居住在同一空间内的人。在这种体验方式中，地平线也不再是之于外部的边界和过渡，而是内部世界的外部边框。灵魂流淌而出可以升华为海洋般的连贯感觉，这种感觉可以可信地解释为在外部场景中，胎儿的感觉的重复（“海洋感觉”的表达大约在里尔克提出“世界内部空间”的十多年后流传了开来^①）。如果我们坚持认为，诗人在诗中赋予了介词“在……之中”（in）不同寻常的任务，以证明“我”是一个集中的容器或是一个普遍意义的场所——这与海德格尔 1927 年的《存在与时间》中对于“在之中”（In - Sein）的分析直接对立。在海德格尔那里，介词“in”是个“脱出存在”（Ek - sistenz），即脱出到外部去的位置表达。这一对立可以用“半醒半睡之态”（Enttase）和“癫狂之态”（Ekstase）这一对表达来说明。

里尔克的基本态度可以归于巴谢拉（Bachelard）在其《空间诗学》（*Poetik des Raumes*）中描述的“内部无限性”体验。能有这样的感受，周边的空间就失去了陌生性的品质，从而整体地变成了“灵魂的房子”。从这样一个完全被赋予了灵魂的房子出发，人们完全可以顺理成章地说，它究

① 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致弗洛伊德的信，其中，他对于弗氏 1927 年的著作《幻相之未来》（*Zukunft der Illusion*）做出了回答。此外，“世界内部空间”这个概念时常作为一种地点状语被误读了：彼得·德麦茨（Peter Demetz）在一篇“世界内部空间和工艺”的文章中甚至指出，某些里尔克的读者，跟随着作者一起，“躲藏”到了世界内部空间当中，就似乎那是个避难所，而不是一个体验的模式；见彼得·德麦茨《关于里尔克和托马斯·曼的文章》，载《技术时代的语言》，1966 年 17 - 18 期，第 4 - 11 页。

其本质已经是“存在的朋友”（Freund des Seins）。^① 对于空间的氛围来说，这种品质的空间描绘了生活容器的核心概念，这种生活无论在突破边界的环境中，还是在宇宙的皮肤里，都感觉如同在家一样。

“资本的世界内部空间”则应该理解为一个社会拓扑学概念。它的使用就是为了同时代的交通和交际媒体的创造内部的强力：它转写了由货币开发出来的，进入到地点、人物、商品和数据的机会的视阈——机会无一例外从在大内部中，主体性主流的形式受制于是否拥有购买力的事实派生而来。在打下了购买力形体的烙印的地方，就产生了内部空间和自我形式的操作半径——这些是通道口走廊，一切形式的购买力在这里徜徉。过去把市场放到大厅中去的建筑直觉，在到来的“全球时代”必须转变成为世界形式的大厅——按水晶宫的模式。用大厅的形式来表达世界联系，总体上讲是个前后一致的结果。

在技术的苍穹下，亚当·斯密和莱纳·玛丽亚·里尔克相遇了。大内部空间的诗人遇见了世界市场的思想家——究竟是偶然，抑或是隐秘的安排并不重要。因为我们并不想赋予“相遇”（Begegnung）这个词过度的含义，因此，只要阐释为“几乎遇到”，就足够令我们满意。下面，我们将首

① 加斯通·巴谢拉（Gaston Bachelard），《空间诗学》，慕尼黑，1960，第213～241页；关于在场所性和空间性紧张历史的语境中，对于巴谢拉空间理论的论述。参阅爱德华·S. 凯西（Edward S. Casey）《场所的命运——哲学史》（*The Fate of Place. A Philosophical History*），勃克利/洛杉矶，1997，第287～296页。

先展示第一份伪书，这可能是亚当·斯密于 1778 年被任命为苏格兰税务专员之后，受到了英国财政大臣诺斯爵士的邀请，而做的一次餐桌演讲（亦被称为大头针演讲闻名于世）。接下来是一封出自里尔克笔下的、下落不明的信件。信是寄给一位不知名的贵族女性，从语言风格和书信的内容来看，它应该成文于 1922 年春；顺便提一下，这封信在里尔克的全集里也是难觅其踪的。

剩下的便是读者的想象力的事情，我们试图让两篇文档的线条无限延伸，在欧洲自我观察的语义空间中的某个虚拟的点上让它们相交到一点。而要到达这个虚拟的位置则需要我们借助于“没有泛灵论就没有资本主义”的密码，从绝大多数符合时间而装备起来的工作场地出发。

文档 I，亚当·斯密

我尊敬的先生们，我求助于您，我高贵的资助人，财政部长先生，以及所有的各位，科学界和艺术界的朋友们，在这样一个节日的夜晚，为了应主人的心愿，为在座的各位做一个简短的报告，向您简单地说明一下国家的财富的真实原因。啊，最尊贵的勋爵先生，我怎么会没有发现，我今天是您的幽默感的牺牲者？我真的被虚荣弄得晕头转向，从而无法理解，当您委托我用几分钟的时间来说清楚，几十年来我一直潜心研究的问题时，是如何给我设置了一个优雅的陷阱？先生们，我哪里又能有勇气执意逃避开来自我最珍贵的友谊设置下的陷阱呢？人为什么要朋友，不就是有朝一日为了他

们，而损害自己来博君一笑？于是我鼓足勇气，练习把一个漫长的艺术变成一次餐桌趣闻，从而给您提供问题的部分解答。如同您所理解的，我的先生们，这更多是为了让您展颜一笑，而非是有什么教育意义，并且更多是出于对热情好客规则的尊重，而非个人的大胆。

先生们，我现在手里抓着的是什么呢？您仔细看清楚了，并且不要着急。因为我拿在手里给您看的，并试图解释清楚国富论的关键所在的物品正是一枚大头针。是的，您既没有看错，也没有听错，一枚大头针，一枚再平凡、家常、卑微不过的物品。然而，我却还是要说，在这个细小的东西上，只要我们观察正确，隐藏着我们这个时代的全部经济学的智慧。您现在也许在想，有人在捉弄您？不，绝没有！我在这里给您以启示，如何来理解这个不太好理解的格言警句。您现在设想一个欠发达的国家，在那里没有劳动的分工，也没有频繁的商品交易，每个人都必须自己为自己提供一切：在这样的国家里也不要求积累任何的资本或是做任何储备。每个人满足自身需要的方式就是如他本来出现的形式。当他饿了的时候，就走进森林去狩猎。他的衣服破了，就会把下次捕获的大型动物的皮毛穿在身上。如果他的小屋要倒塌了，他就会尽可能地去修缮它，比如用附近能搞到的草或树枝。还有必要再解释，在这样的一个国家里人们是无法找到大头针的，当然还包括其他一万种有用的各种物品。这里不会有针，一方面因为没有人知道如何使用它们，另外一方面没有一个人想到要去生产类

似的東西，除非是進行一次燒烤，但這不會帶來定期的生產和貿易。然而在一個大多數人都已經放棄了舊式的自給自足的国家里，物品就完全不一樣了。當然，我的先生們，如果你允許我使用這個不列顛式的譬喻的話，那麼已經有一些國家，他們的國民已經幾乎無一例外地駛入了分工的開放大海之中。一個國家所有的企業家和商人都只出於與他人進行交換的目的進行生產，這難道不是一個巨大的冒險活動嗎？一種癡狂，確實如此，卻又是一種理性的癡狂和一種大膽的智慧！已經有無數人皈依了這樣的癡狂，並且只出於一個原因，一個不費力就能弄明白的原因，因為在這種大膽中蘊藏着比懶散的小心更多的理性！先生們，您要正確理解我的意思：在這樣的一種物品的秩序中，每個商品生產者都準備着把自己的幸福與不幸完全依附在他人的需求之上。這是一種癡狂，然而它也有其自己的方法。

紳士們，請大家看看這枚大頭針！我們有充分理由相信，它的生產者並不是出於自身的需要又或是某種古怪的癖好而將它生產出來。不必去進一步了解這個人的具體情況，我就敢在這裡和各位打個賭，生產大頭針即使不能使他成為一個富裕的公民，也至少可以很好地養活他。為什麼是這樣呢？因為下定決心把自己能否生活得更好孤注一擲在大頭針的尖端的話，必須會導致更多的聞所未聞的新的生產技藝的出現。一個不熟練的工人，儘管他可能嚴肅而勤奮的工作，也許一天也生產不了一個很好用的大頭針，最多也不過是生產少量的幾

个。但是现在，如果说大头针的生产成了一个自主的产业的话，就会通过工人的专业化达到生产力极限式的提升。这种变化不仅是量的提升，而且产品质量的提高也令人赞叹不已。一个工人拉住铁丝，另外一个工人使它伸长，第三个人负责剪断，第四个人负责磨尖，第五个人打磨上端，好在上端加一个头，于是这样下去，直到最后一个工人只把他所有的精力都用于把加工制成品包装起来。为了生产一枚大头针，需要18道工序。最近我刚刚参观了一家工厂，那里有10名工人，每天可以生产48000枚大头针，也就是说，平均每个人约能生产近5000枚大头针。而如我们前面所说，如果让一个工人来做这件事情的话，可能他一枚大头针都制造不出来。在这种意义深远的劳动分工和重新组合之中，先生们，您可以发现国家财富理论的终极原因，而且只可能在这里，而不可能是其他任何地方。

显然，单单这一点还不能构成用于交换的产品产量和质量大幅提高的原因。因为对于专业化商品生产来说，一个有着觉醒意识，从而向各个方面发展他们的需求的公民的社会也是必不可少的因素。您设想一下，我的先生们，在一个国家里有十家或者二十家生产能力不亚于我前面描述的大头针工厂的厂家：那么我们就同时需要有一个消费大头针的民众。这些人除了其他的成百上千种需要以外，还要能表达出对这种尖尖的产品的需求。所需要的数字还不能太小，您可以很容易计算出来，因为在那样一家工厂里每天就能生产出48000枚大

头针，而一年如果以 300 个工作日计算的话，那么一共就是 1500 万枚大头针。如果这样的生产能力在十家或二十家类似的工厂中都能达到的话，那么整个产能也可以相应计算出来。文明开化的民众，这在经济学者的眼中来看就是一群足够文明开化的人，他们每年有着消费 1.5 亿乃至 3 亿枚大头针能力。现在您理解了吗？您看到它的后果了吗？绅士们，我们看到的必然是各种各样无法计数的财富从我们眼前掠过，因为一个需要如此大量大头针的地方，那里必然有着堆积成山的毛巾、塞满厅堂的绸缎，宽阔的交易大厅里堆放着从全世界来的纺织产品，巨大的仓库中摆满了各式各样的衣物、床单、被套还有窗帘。对于每个观察者来说，显而易见的是，这就需要针和线以及成千上万的劳动力来缝制和订制。马上我们就仿佛可以在眼前看到无数打扮入时的女士，穿着漂亮的衣装，左右扭转着身子，对着镜子自我欣赏。而且还不仅仅是有钱的小姐、太太们，现在商店售货员、女仆也能加入锦衣华服的队伍中来。您要想到驶进港口的货船，还有在街道上行驶着的运输车辆，它们运载着财富在这个世界上四处移动！简言之，只要当所有这些需求都被唤起，并且发展到一定的高度，本国的制针业才能攀登到它产能的顶峰。最后，国外也注意到了我们的制针业，且产生了嫉妒。于是众多商人从其他国家造访英伦岛屿，为了将我们生产的剩余部分引导到他们那里去。不起眼的大头针成为不少人巨大财富的源泉，也成为很多人稳定收入的基础，这又有什么奇怪

的呢？

现在，我的先生们，是时候来揭示现代需求体系的全部真相了！无论是在这个，还是另外的国家，第一位生产者的心中，若不是有了成熟的计划，把他所有的未来都投注在生产这种实质性的产品之上，如此大量和优质的大头针的生产是不可能成型的。这是多少智慧的选择，当生产者首先洞悉正是在这里一个巨大的市场打开了！这又是多么大的勇气，仅仅因为这样的一种认识就从银行家那里贷款来购买设备和机器！这又是什么样的坚持，寻找合适的厂房，雇佣勤劳的工人，按照所有者以及他的下属的指令进行操作，把时间投入生产当中去！这又是什么样的巧妙的安排，选择商贩，运输者和代理商，没有他们的努力，大头针也不可能进入到广阔的世界中，其他的工厂中以及使用者的家中去！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斯多葛主义的力量，长年累月的同生产相同产品的生产者进行竞争，并且不失去勇气，是的，这就要始终去思考如何改进商品！为了让您正确理解我的意思：我在这里不仅要称赞这个能干的个人，只要外界愿意用自然的价格来交换产品，他便基于自己的大头针能够行销世界的行动信念提供这么有用的东西。此外，我还更想指出这背后的奥秘的神奇，在市场上物物交换的一切关联的背后隐藏着的神奇奥秘。我的先生们，我从内心深处并不是想，像我现在成功做到的这样，去点燃您关于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的日常生活中的奥妙惊讶的火种：您和我一起来感叹一下这个简单但却

又近乎不可理解的现象，成百上千万的大头针走着自己的道路，从铁矿坑到冶金厂，从冶金厂到作坊，从作坊到展销地，再从展销地到达车间以及千家万户。在那里，它们能够在多方面证明它们的用处，就是如此简单！若是带着种诗意化的心绪，人们甚至可以变得迷信一些，进而认为，一切事情都有着一个更高于我们的世界参与其中，并且存在着大头针的神灵，它们就如同带来好运的精灵一样，伴随着大头针的变化的各个环节。但是，我们要抛弃尝试用那些诗化的图像，从而客观冷静地来看待物品间的关联以及它是如何在世界市场上得以发展的！是不是我们用科学的眼光来审视的时候，一切就变得不再那么神奇了呢？显然并非如此，我的先生们！我们越用干涩的眼光来看待这些事实，就越感到惊讶：不仅是大头针，成千上万种各不相同的产品都在以令人惊讶的精确与守时在运行着，就如同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决定着它们去往何处。

尊敬的在座的各位，我担心您将不得不原谅我刚刚提出的大胆的图像，是的，您还得宽恕我将会走得更远，我会说，这只看不见的手不单把每个单个的商品带到它应该去的道路上，不是这样，还有更多，它以最罕见同时又是最安全的方式保障着被我们称之为世界市场的一切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的全部关联。我的天哪，您一定会大声地喊出来，我的先生们，这个讲演者难道疯了吗？当他提到所谓的天知道从哪里而来，却能够调节性地干预到市场中的看不见的手的时候，他的理智还正

常？当然，你有理由，也有动机提出这样的异议，我的先生们，然而这是我的义务，来反驳您，因为我对于市场详细的研究使我得出了以下假设并坚定地相信，在市场中必然存在着一个起平衡作用的更高的权力机制。我可以打个比方，让您比较容易理解我深刻的信念。您想一下当奥德修斯（Odysseus）已经不可能归来的情况下，那些无耻的追求者逼得潘尼洛普（Penelope）声称要织一件结婚用的衣裳！这些人如果知道有一只隐藏着的手在夜晚的时候总是把白天织就的部分再拆开的话，该有多么生气。我的先生们，今天我们则有了更有利的条件，因为我们有权利去观察，一只看不见的手是如何在白天乃至夜晚生产同一件东西的，一条头巾，比伊大卡岛的礼服大一千倍，使用的线和纹样要复杂得多——而且还要有用得多，因为如同您所知道的那样，这件礼服根本没有穿过，因为最终奥德修斯回到了故乡。我们会比那些为了赢得潘尼洛普芳心的那帮追求者们更惊讶多少！潘尼洛普用自己的手解开自己织就的东西，而世界市场则是在我们背后根据它的潜规则连接起我们解开的东西，这个时候我们正把我们的命运完全托付给劳动分工和贸易。聪明的潘尼洛普作为纺织女工比我们要领先，她从两个方向上纵观了她自己的行为。她自己一方面纺织，另一方面又拆开。相反，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生意则只知道一个方向。我们提供单个的线，然后不得不交托给市场，这个伟大的纺织工人以及她充满魔力的手，由它来决定是连接还是剪断。我的先生们，我现在

急切地建议您，在未来的任何时候都要坚持相信，市场永远在总体上比我们局限在单个线之上的眼界的理解能力更了解织物！

从所有这些为了控制大的集体的艺术中能得出什么结论呢？我的先生们，您当然会这样问，并且我还是想概要地回答一下。在一个统治得很好的国家里，人们会通过设置障碍以限制缺乏生产力的人浪费，从而达到比较普遍的富裕，即使是在社会的最低阶层的民众中也能够很清楚地感觉到它的存在。富裕必须在统治者能够遵守不阻碍纺织的进程，以及施加影响的看不见的手的情况下才能达到。一个富裕的国家是繁荣的城市的集合；城市是一个常设的会展地，周围的人们会纷至沓来，从事商业活动或研究革新。幸福的国家，它们今天成为常设的会展地！幸福的世界，它有一天会成为唯一的大会展地，在这里充满了商贩和买家的吆喝声！在那样的世界里，哲学家们会从大头针的生产者那里获得一个提示，它会将哲学家们的思想引导到一个新的道路上去。您有一天会承认，那个自远古岁月叫做人类自由的高尚的东西正是市场中移动的物品的反射，它们通过价格，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来达到自由。物的自由意味着它更换所有者的可能性，而人的自由则指的是它使自已从封建统治的服役中摆脱出来，成为自己的主人。摆脱意味着，我们不再为了一个我们认识的主人服务，而是服务于跟我们一样的人的需求，而这些人对我们而言通常是完全陌生的。

资本的内部

我的先生们，请您将我从义务中免除出来。我请求您，静静地花上一个小时的时间来思考我刚刚的演讲中提到的悖论。这确实是一个不可测量的悖论，对于我们来说非常珍贵的自由则应当归功于我们屈从于陌生人的需求。为了今天，我们要吓退超越正常人理解力极限的深刻思想的魔鬼。这些东西我们交给我们的德国同事们去做，下到存在的昏暗的深渊中去，带着假的黄金回归！现在我们为了我们今天的主人，英格兰财政大臣先生举杯！我亦知道，这份草案尚不够充分，我带着能带来尴尬的喜悦试图给您做这个演讲。同时我也意识到，我说的这些让我在科学上的过失一点也不比您的耐心要少。您对我匆匆的演讲给予了充分的宽容和谅解。您给了我这样的一个演说者感到很宽松的环境。然而我今天作为在英格兰绅士中的苏格兰人，我是很吝惜言语的，但我却显然不会略去我对于您这份通过您的关注，这个社交和男子气的严肃认真的美丽女儿向我表达的荣誉的谢意。

文档Ⅱ，里尔克

尊敬的伯爵夫人，您无比高尚的灵魂：

我这一刻是如此强烈地感觉到您当下的存在，就在这一刻，因为我做出了决定，使我的性情得以减轻，将一个秘密托付在一个不用限制它却能包裹住它的地方。因为在那里，今天早晨您的形象就如同牵着线的天使从昏暗的光线中升起来一样，进入我的脑海

里。在这一刻，您离我如此之近，就如同一所我这样的年轻人住过多日的房子一样。在我看来，仿佛我又可以重新穿过这座可信的生存外壳，直到其中，就是那个正确的地方展现在我的面前，好让我把带来的秘密放在那里，于是它便会在哪里平静地休憩、生活，得其所归。对我的让我再次作为入侵者而闯入的放肆，您只莞尔一笑，我高贵的夫人，也许这次这个入侵者又会带着某种禀赋而来。请使用您的优先权，您完全高于这诗人的秘密以及紧随其后的扇动着翅膀的影射。请您以慷慨的方式对我保持着友好，慷慨是您与生俱来的权利，它的存在亦会拓展我呼吸的空气，自从生命赐予我您显露在我面前之幸。

您也许能记起，我于数月前给您寄去了一封极为隆重的信件，人们甚至可以认为它是封正式的函件，这封信在慕佐的山上完成，里面我还谈到了挽歌已经创作完成的消息。我完全不怀疑您现在还能清楚这件事情的意义。我该是犯了多大的错误，我们的脉搏在彼时如此一致的跳动！也许在您的记忆中，上回我说的事情留下的反响再次泛起涟漪？噢，显然您回忆起了我出于感谢而不假思索的呼喊朋友：数字已经满了，正好达到了整数十，这是个多么神圣的数字，在它的包容之中，我曾经历了等待、成熟与沉默的多年岁月。

那么现在，我最尊贵以及高贵的太太啊。我斗胆将我刚刚说的那个秘密托付予您。我用一只瘦削而又筋疲

资本的内部

力尽的手写下了如下的自白。这是一只我连抽回来都觉得羞愧的手，尽管它在付出。我终将秘密说出，好让您在您的微笑中休憩：那不是十首挽歌，而是十一首。噢，我的天哪！那第十一首也被写了下来！

我无助地在我心中思忖着该如何解释这令人尴尬的过多。那时，当这些诗行油然而生发出来之时，我便如同一个灵魂出窍的人一样，疯狂地写下了那些仿佛是严肃的天使事先对我说出的话语。然而当那头脑发热的几个星期过去之后，我以冷峻了的目光去审视那个作品，而当我去清点神谕般的序列之时，总是会比天命所归的十篇多出一篇来。

高贵的太太，请您原谅我带着这样的暴露秘密侵袭您的内心深处。我完全无法承受这样的想法，您可能因为分享这个秘密而心情沉重。我向您保证，您绝对不会因我告诉您的事情而遭受苦痛！受到这种想法的安慰，我将那首多出来的诗，也就是那第十一首诗的抄本交给您，且只交给您一个人保管。在这个世界上我找不到第二个灵魂去将会看这寂寥的诗行。啊，什么是灵魂，什么是朋友，难道不是迷惘的诗的避难之所吗？您别把这些诗行给任何人看，即使要给，也只能是极少数那些能够完全亲近到您的心灵的人。若有孤单而独特的人遇到了您，一个渴望那种后来为我们所见证了的内部实在性的人，那么您便可理解，您该做点什么，而不至于慈善早已经是您安静的客人的良心与诗。

请在一些紫色的夜晚想起我，当您在障碍上漫步，

当天空中的漩涡令您脚步轻快。请您全身心感受在您的
近旁比以往都要安静的是

您的

RMM

总是在自己建起的屋顶之下，就是成为曾经的自由的
战俘。

撒满星星的天空，啊，我们送它回到远方的神那
里，他已经开始懊悔，曾经爱过我们。

在它的位置上，我们安置起苍穹，自豪而又小心。

曾经星星间支起撑架的地方，现在是胆大妄为的钢
铁艺术的纵横。

没有私密的玻璃代表的是高贵的湛蓝，自己用手搭
建的墙壁是地平线；人类建筑的边界所及，就好像宇宙
穷尽在那里。

现在人们就还只有木棍，数百万木棍后没有世界。

曾经，当然在外面，在古老的户外，几千年来包围
着我们，慢慢生长，

因为没有工程师像小动物那样拥有感受到外部过度
强大的力量，当它亦步亦趋地跟随着近旁的痕迹，

外面，我说，那时这是纯粹的真，当诗对着我说：
穿过一切本质，只有一个空间可及，

那里所有的东西，均在一起，

一切存在物都在它自己的位置上，以自己的气息悄
悄摆动。

资本的内部

像一阵风，离开了夏之屋，为了带来更富有的秋，
相互为了对方而存在从分开的物的身体里穿过。

空间，作为极好的召集人，以最爱说话的神，将灵魂分派给众人，就像君主大婚时将礼物分送给人民，即使最穷的也有其应得的一份。

像双胞胎般呼吸，农妇的鞋子放在昏暗的房间前面，

锤子上尚有辛勤劳作留下的余温，夜晚它躺在工具间里，便与镰刀一般无二，

收获后再也没有使用过，内心激动地渴望有用，直到冬季。

当劳作的清晨来临，工具中的灵魂就从把手流入到人的身上。

他们那样安静的使用家用工具，分享着住宅，被侵蚀了的男人和顺从的，飘着难以形容的芳香的女人同床共枕。

但是现在，命运却将我们从赋予灵魂中驱赶出来，
一切已经取得的东西，我在这里大声疾呼，都受到机器的威胁。

我们就生活在机器中，内部与外部没有不同。

灵魂如同一缕废气，从隆隆轰鸣的发动机后向外喷涌。

物品在自我中自转，能买得到，却无比冷冰。

像病了的女孩，忘记了什么是爱、花和季节。

灵魂生存的地方，搬进了乖戾。

预感到不祥的动物，失望地挂在陈列柜里，冷了的肉。

这些高级的生灵，曾经共同了解了我们的存在。

现在它们却不再注视着我们，于是我们缺乏了本可清醒宣誓的见证者。

我们如他们般活着，倾听着内里的声音。

一切物品都有价格，在明亮大厅中逐一放在那里。

每个都在丧失灵魂中安静沉默。

每个物品都向我们迈步走来，那么年轻而重要，价廉物美，非常好。

啊，物品今天也找不到它的主人。

可以购买就是：荒疏了所谓属于某个活着的人，购买就是轻易地把商品拿到自己身边。

像跟客人唯一的一次打招呼那样，

人们就用一次，然后便再也不会去看一眼。

如果说，购买、卖出、租用、出租、贷款以及借贷都是触及宏大装配的全部生活方面的操作的话，通过货币的传递而产生的物的可及性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一种连通的世界感觉。首先是可以体验到一种无法测量的可及客体的增长——最后则是世界内部空间和购买力空间极有可能的同时产生，后果则是为了日常生活中围绕我们的器具的地位。一俟曾经不可能获取到的物品进入了能买到的物品的行列，不可支配性渐渐为可支配性以及可替换性所取代，文化批评的夸张

便汹涌而来，一切既往的价值都屈服于贬值或价值的重估之下。然而，人们也必须清楚，扩展了的商品交通并不意味着一般意义上的腐败：用钱来获得商品、信息以及人员，是用可撤销的选项来代替原有的归属感。

这种松动需要理解也需要渐变而来。归属感世界中来的“物品”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过渡到选项的世界中去，这是一个在无数紧张的反射中不断彰显出来的事实。人们也理解，为什么这个事实也构成了在技术和货币的世界转型中，最令人们不安的体验之一：为数众多的时代观察家，其中包括被本雅明称之为主要见证人的波德莱尔（Baudelaire），都记录下了，物品冷却了，一个仿真的、极坏的方面却暴露了出来。就如同从邪恶的自身原动力中来的一样，它们突然之间似乎开始追寻起了人，而不再是坚持在一个固有的有机体的所有者那里。从那个时候起，空气中弥散着一种背叛的味道——就好像物品，当它们成为商品后，就开始了一种对忠诚的背叛。

受到了马克思和波德莱尔的激发，瓦尔特·本雅明建议，卖淫不仅应该看成是一种对于性幻想的商业化的剥削，同时应该阐释为在货币驱动的世界中人与物的一种普遍的存在方式，这个建议就很敏感地接受了这种社会关系，但以一种无法摆脱空想的方式将之颠倒。因为当他认为用货币作为取得渴求的客体的手段是非正义的同时，就等于支持了一个混乱的观点，即最好的东西必须从根本上是免费的；在此，他却并没有想到，通过归属感而取得物品——此时，乌托邦式的原则模式是完全免费——其实与

其他任何一种方式相比都是最昂贵的。本雅明主义提供了一个感伤主义男人们历史哲学版本的幻想：妓女和其他迷惑性的表面现象在救世主的时代都会重新回归成为纯的使用价值的存在方式。

我们总结一下，我们关于进入货币宇宙都知道了些什么，便可得出结论，一切重要的存在维度在多大程度上按照货币传递的方式进行了修改：我们首先作为交通工具的顾客便可到达要去的地方；作为媒体的使用者便可获取我们需要的数据信息；作为支付手段的所有者便可获取有形的物资；而我们接触到的人员则更多地在于，我们是否能够支付得起进入或许能够遇到他们的场所的门票。这些看起来太庸俗了；越来越少的，一切并不是如此的回忆那个金钱还没有能够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时代。在前货币时代的社会关系中，一切到达人员和物品的路径是由于归属于某个群体或是某个“产生环境”（Zeug - Umwelt）；归属感是现代之前的世界的价格。要想拥有一个世界，就必须先让自己为他的场所耗尽精力。没有对于（后来中性化所谓的）自己的文化的狂迷，就无法触及人与物品。

转型到金钱决定的社会关系之后，更多地表现为通过所谓“自我出售”以及连接到出价者或是公开的地址的行为。对于成功人士来说，今天的人们期待他们能够将他们的归属感搁置一边。附属性（belonging）话题首先只有在个人或者团体不去考虑经济利益问题，而转而思考认同性利益时才会被重新提出来。认同性利益则无须花费——诸如德国人、巴斯克人、塞尔维亚人或是一顶插着翎毛的帽子，人们可以就

这样把它戴在头上。归属感（Zugehörigkeit, belonging, appartenance）——这一类表达都很有机会成为 21 世纪失败者的关键字。附带说一句，它们也正因为如此，属于最有意思的未来的概念之一。

成功人士的心理社会特征在于从归属感到选项的转变。这个关乎物品和人的本体地位的改革从认知上借助于建构主义表达出来。人们必须不断地给自己打上记号，以示自己知道：总是作为被找到之物而介绍的不可避免的是制作出来的东西。任何一个虚有其表的物品或是自然的本性，人们都可以在短暂的说明后展示出它的“建构”、它的“发明”以及它的“政策”。当这种自然性的减退同时也迁移到人类的自我关系上时，不可避免的将会发生——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对于固定不变的认同性在建构主义的气候中不抱太好的预期。只有失败者才需要一成不变的自然本质。但这也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停止去说，我从哪里来，以及我们在一个较大的框架中居于何处。^①

人们现在可以理解，为什么说在西方以及西化了的舒适球面空间中，归属感是一个减弱的，而选项性则是一个增强的生活方式，而它又带来了全体当事人心理政治的转变——成为后独神主义新特色的宗教感受。也即是说：今天的基督教是个兼职的独神主义宗教，同样，伊斯兰教、犹太教也是

^① 参阅戴维德·辛普森（David Simpson）《情境，或为何我们总坚持说我们从哪里来》，杜伦/伦敦，2002；戴维德·W. 温尼柯特（David W. Winnicott）《家是我们开始的地方——心理分析散文》，纽约/伦敦，1986。

如此，尽管在这些发展停顿了的，重新重视自我管理和传统维护的宗教中都存在着急性的原教旨主义潮流，而且其开场演讲者们，通过是专职神职人员还特别喜欢做出上帝似乎还需要整个人类的姿态。真相却是，金钱已经在操作上证明自己是之于上帝的一个成功的替代选项。金钱对于今天的社会关系来说，比创造了天地的神祇裨益更大。

现代心理最重要的变化在于，利己主义的释放，整个物资短缺以及它的整体的补偿的世界时代，这是一个不可动摇的评判原则。对此，尼采，对于世界断裂的预言家，用他新玩世主义的信条说出了一切价值重新评估的最关键的东西。价值的重新评估首先涉及人本质的自我关涉，那个所谓的“弯曲到自我中”，人们在农业帝国伦理和形而上学时代总是将之看成对于主人的背叛，而又必然会诅咒集体以及事物的秩序。自从富裕国家的公民不再把自己看成是臣民，而是选民和自由的消费者以来，关心“整体”的义务就从有利于主人和神的规范的利他主义演变成为商品和公共话题的开放性——其不可避免的副作用就是，各个“主体”当中，弥漫着一种作为顾客、作为观点的拥有者以及个性载体的自以为是的倾向。首先是道德批评家们记录下了这些问题，18世纪开始，他们在“自爱”（*amour-propre*）以及“名利场”（*vanity fair*）中发现了可以无穷无尽阐述下去的东西。利己主义的现象学各个层面都在为它的伦理的中立化做着准备。这些文献的分析性内容在尼采的《快乐的科学》（*Fröhliche Wissenschaft*）中交汇起来，与此同时，它们中过剩的人的典型形象则要求

所谓超人（Übermensch），今天我们也许会表述成：世界主义的消费者。

此外，在资本主义的世界内部空间中缺乏内心想法的最终消费倾向也在激增，几百年前，人们称之为虚无主义。这个名字表达了一种观察结果，即消费和失礼（Respektlosigkeit）是一对相邻近的现象。事实上，主体的消费变形也把消灭消费品的权利变成意识。对一切价值重新进行价值评估的模式存在于有机体的物质交换当中。像一切符合情况的东西都通过消费者确定归并的范围那样，垃圾发展成为包含一切的“一切情势中生命的结果”——为了把话语权交给新玩世主义的开山鼻祖，拉摩的侄子。在这个框架中，重新评估价值总是无一例外的成了贬值。

在这样的趋势下，释放出了模糊的泛神论和多神主义的体验形式，因为全球体系让没有特别固定特征的人受益——能是什么别的样子呢，当在资本主义的宇宙空间中，个体的任何就是要适应不断增长的商品供给，适应越来越丰富的角色扮演，适应越来越有入侵性的抱怨以及越来越任意形成的人为环境。市场生活让人们随时随地地意识到存在着各种选择可能性以及替代的道路，从而取代了原有的信念、一元论和粗鲁的纯朴。用这样的方法，市场生活使这些慢慢消失。后果则是：人变得越来越单色调，而客体则是彩色的，无色的人却被要求在多彩的物中做出选择。伴随着关于“灵活化了的人”的话语，这种事实状况令人感到悲恸，而随着“新时代”（new age）、“网络时代”（net age）的话语，人们却又欢迎它的到来。属于明天的理想的拥有购买力的人应

该是“反巴特尔比者”（Anti - Bartleby）：他是一个在训练中学习如何面对长长的选项清单，而且对于绝大多数建议都抱以“为什么不？”的回答的人。^①他应该是个取得了教席的消费者。他应该可以像上面提到的麦尔维尔笔下的人物那样声称：世界市场曾经是我的耶鲁和我的哈佛。

^① 麦尔维尔笔下的巴特尔比以对任何一个建议都说“最好别这样”而著名。

第 37 章

矫纵空间的突变

风吹向先锋派，随之而来的是一大群。

拥有购买力的那批人的关键字，“无聊”“温室生存”“心理政治重建”需要额外的注释。它们的出发点则必然是舒适空间中生活的人们当前正经历着从思想上的一次有着深远影响的变迁，即从既往的困难和短缺思维进入一个还几乎不太能适应的选项思维中去。^① 这种过渡的意义远大于诸如

^① 这一论点在《球面学Ⅲ—泡沫》，第三章“鼓动与矫纵——纯粹的欲的批评”中详细地进行了证明，参见第 671～859 页。

“心理情绪类型的转变”（*Mentalitätswandel*）这种术语所能涵盖的东西。在这些集体中发生了一件有着如此大影响力的事情，以至于人们试图回过来用感情奔放的哲学概念来阐发它的意义：必然王国看起来让位于自由王国——尽管必然这方还拥有数量庞大的游击队员，他们来自或旧或新的保守主义游击队，面对变迁了的情况仍然做着殊死的抵抗。他们中有浪漫派的，也有宗教的人士，以愤怒直面新的发现，平淡与自由聚焦收敛——而人们设想中追求的目标却不应该是这样的。事实上，转型后诸如单纯的情绪或是个人的口味这样的弱理由已经取代了强理由，它们往日是以压倒性的匮乏，以及化身为基础的、超强的、壮丽的、不可接近之物。在打上了减轻负担（*Entlastung*）烙印的世界里，旧的必然性已经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必然曾经支配的领域，现在成了情绪的天下。

对于巨大骤变的理论回顾由于下面的事实而简化了，随着意识的后现代化，在整个现代化进程中对于工作的偶像崇拜——在经济、身体和心理学意义上——都得到了足够的弱化，这样在多方面减轻负担的“社会”中就能够更清晰地看到生活的条件。现在，后必然时代的空间中人们就能不受那些匮乏和严肃派对当前形势的误导，为存在的心理状态轻松地勾勒出轮廓。毋庸置疑，它打上了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娇纵推动力的标记。富裕地区内绝大多数人口关涉其中。

娇纵（*Verwöhnung*）这个概念当然不是对还不停地相信人们依赖于某个强有力的手的引导的保守教育学的妥协与退让。作为历史人类学术语的娇纵指的是减轻负担的过程在

心理、生理和语义学上的反射，而这一过程自人类文明进程的
开始就已经固有，然而要到物资极度不匮乏之时才会成熟
并为人们所知。这种推测 [基于对路易斯·博尔克 (Louis
Bolk) 和阿诺德·格伦 (Arnold Gehlen) 的观点的继续发
展] 的光线下，就可以理解，随着现代的经济和富裕国家
的试验，出现了人类在矫纵历史中的跳跃——这一跃为所有
同它一起的人开发出了一个无比开阔的生存机遇的空间。以
人类学为导向的矫纵理论——据说事先就已经声明了的——
对于文明实现的减轻负担效应的撤销没有概念；它要以对于
在高度减轻负担的情况下的生活提供概念优化的方式，对矫
纵主体文化在冒险的以及大部分还未理解的氛围内的导航能
力进行优化处理。

逗留在巨大温室的舒适苍穹下会带来什么样的心理语义
后果，已经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海德格尔提出的“无聊”
概念很言简意赅地表达了出来。在无聊混乱的无所不在之
中，反映出的是存在的氛围的反射，面对一个持续和平、保
障供应、持续娱乐的环境——尽管唱反调的那方持续的宣传
和鼓动使集体变得更加强大的紧张和竞争的话题，聊以作为
平衡。尽管在传统的社会批评激进主义的氛围中，一直起作
用的是把目光凝固在过去和当下的暴力以及短缺的场景上
的、哥特式的灾难理论：对于在有新的压力之前，矫纵倾向
的优先性不必怀疑。有效的矫纵力量构建起了一个浸渍空
间，它以基本上事先组织好的生存保障来调节其中的居民。

在这个普遍减轻负担的空间中，必须会出现“发现紧
张现象”，因为对于一般意义上的紧张概念的表述只有在和

它互补的减轻压力概念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得以确立才有可能。在减轻负担的背景下，紧张赢得了明显的程度，这对于发展出一个新的敏感性级别乃至构建起一个明确的理论都是不可或缺的。因为紧张表达了期待减轻负担的失望，所以它的推论也就属于理论上探讨水晶宫中的生存条件的必修课程。一方面是混乱的无聊，另外一方面则是普遍的紧张，两者共同构成了温室生存的球面共性。如同无聊就意味着减轻负担，即简而言之的减轻负担，那么紧张就意味着刺激，即简而言之的刺激。两种水晶宫中存在的基调产生了一种慢性的左右为难的氛围，警报和解除警报相互交替。刺激作为一种使人紧张的东西是先于减轻负担的原因而被感知的；它完全拥有再次施加负担的形式，因而是和减轻负担的趋势背道而驰的。反之，减轻负担则又作为一种降低紧张度的措施。如果认可这一点，那么不需太费力即可展示出，按照减轻负担系统中的设施，紧张是如何进入人为产生紧张的时代。

为了用一种建筑上的图像来把握新的关系：在后现代的水晶宫内部，安装了一辆矫纵的电梯，它把水晶宫内的居民输送到其中的五个扩建出来的减轻负担的楼层中去。依其自然天性，人们不能假设，所有的乘客都有可能去到任意的一层楼，并利用其特定的投标。然而因为在每一个水平上都有着相当可观数量的得益者在那里逗留，关于水晶宫内所有居民以外别的什么地方存在着可能的矫纵的知识就褪色不少。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居民已经跑遍了水晶宫中各个楼层，尽管他们对于所有楼层并非积累了相同的体验。在第一层上

下电梯的是那些人，他们成功地完全或部分地实现了无功而获取收入；第二层里徜徉着一批轻松的市民的公众，他们无须自己准备斗争就从政治安全中获益；第三层中，我们遇到的是参与到一般性的免疫功用中去，本身却从未经历过任何的苦痛；在第四层，遍布着知识的消费者，获取知识，经验并非必要；在第五层里面活动的都是名人，他们只需要直接公开他们的个人，而不必去证实他们作出了什么贡献或是出版一部著作。

如果我们致力于研究货币的价值方面——它在惯常的货币理论中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的话，那么我们就来到了矫纵空间的第一层次。我们把这个价值方面称作矫纵价值，并用它来描述两个既相互联系，然而又有着显著不同的现象。如果没有从刻板印象中抽象出来的能力，就会忽略这两者。货币从原则上讲是个稀缺的东西，缺少货币也即是困境的同义词。货币矫纵价值的第一个方面表现为客体世界中，只要用钱能够买得到商品，就到达了一种迄今为止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可及性和可支配性限度的事实。购买力便给获取各种以商品形式存在的东西提供了便利，同时就拥有了一种魔法般的美德，用一个很轻松的动作便可撞开通向世界的大门。我们称之为购买的行为，按其同时代的意义内涵看来的意义只能在人们计算了原则上获取对象变得更简单的矫纵价值后，才能正确地加以揭示。获取对象变得更容易还必须追溯到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在这里，石油作为万能的减轻负担和矫纵手段欢庆着它最重大的胜利。鉴于大大廉价了的运输成本，商品便无处不在地处在消费者的近旁。购买于是总

是意味着用金钱的方式变魔术；而变魔术则又——这在别的地方曾经展示过^①——意味着，在原因的关系中取得了剩余的效果。公众用对于这种不可解释而又突然的效应表示惊讶和错愕的方式对此做出了回应。然而当这种过剩可以预期，而又总是能再次产生出来的时候，惊讶和错愕也消失了——劳动分工和市场经济的聚合的秘密构成了上述效应的规律性。水晶宫中绝大部分居民都从货币层面的魔法关系中获益的。货币层面通过对可能的自身工作出不可测量的高估价，在自我供给时，就给每个行动者无一例外的配上了大量的可选项。简言之就是：购物（Shoppen）和性交（Ficken）——只要他还能满足待在富裕空间的条件，拥有购买力即可。

只要人们研究现代货币占有的最吸引人的观点，货币的娇纵价值就更加开放地体现出来：这一点还特别在人们完全偶然的取得一大笔财产的情况下。这一类型的财富典型的特征就是，人们在积聚财富时没有，或者没有做出与原始积累情况下相称的努力。最终，货币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成了减轻负担的方式而存在。那个听起来有些老旧意味的字眼“百万富翁”当中发展出了那种惊讶与错愕，一个人竟然可以拥有如此之多的财富，而一个普通人往往“根本”不可能挣到这么多钱——除非他能够用尽一切神奇的幸运的钱财来源，而这在近代的发端就被人们称为幸福女神（参阅本书第 8 章，第 72 页及其后）。于是乎，最高的娇纵价值是从不

^① 《球面学Ⅲ—泡沫》，第 398 页。

需要花费努力挣得的财富开始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自身的努力和拥有的财富完全分离，毫无关联。出现了这一现象的地方，从你做出了什么就能通往你将拥有什么的道路便不存在了。占有的主体，无论是作为遗产继承人^①、寻宝者、股市的风险投机者还是作为经理人，让自己带有公开掠夺性质的拿到大笔的遣散费，这些人都从不相称的减轻负担中得到好处：他们就是拥有了，但却不知道如何拥有的。

那么在资本主义经济学应用到西欧的时候，现代的经济童话，关于在钱袋创造出货币的神话也从人们的想象当中开始生发出来，并渐渐流行开来：这一点绝非偶然。福图纳图斯（Fortunatus）作为同名小说中的主人公——小说于1509年匿名在奥格斯堡出版，几个世纪以来再版无数——在一个至关重要的场景中得到了幸运女神赠予的一个钱袋，而当他每次打开钱袋的时候，里面就总有40个各个国家铸制的金币——这件赠品让福图纳图斯以及他的儿子获得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直到后来，他的儿子隐居到了一座寺庙中，由于洞悉了以这种方式获取的财富并不是好事，所以成为了一个智者。这则创造价值的童话处在一系列幻想的开始，它们的内容正是涉及了减轻负担自上而下、垂直地闯入人们努力奋斗的生活中去；而且它们也总是随着潮流、科技和时代精神的变化，改头换面地不断出现，直到现在，在强大的大众传媒的强化作用下，已经发展到一种无与伦比的繁

^① 参阅延思·贝克特（Jens Beckert）《“不劳而获的财产”——继承权社会学》，法兰克福/纽约，2004。

荣程度。对于每一代人，它们都以变化了的预兆宣告着一蹴而就的财富到来的好消息。一次有利的婚姻、一笔丰厚的遗产、一次幸运的交易、发现一个宝藏、接受一笔馈赠、通过一个骗人的诡计、一条有用的内部消息、不经意间出版了一本畅销书、一项成功的专利技术、一笔过高的赔偿金或是赌博赢得一大笔横财——这样那样的形式下，任何人都有可能暴富，然后脱离他原本负担重重的生存而进入一个负担减轻的环境中去。

现代的富裕国家就建立在这种效应之上，按照福图纳图斯的钱袋来构建国库，只是规模要大许多。不过对于国库来说，它的条件就要比童话故事中的主人公具体得多，不可能只是像故事里那样，主人公只是在正确的时间，迷失在一片正确的森林中。而且关于钱袋自动变得充盈的条件，现代国民经济学也非常冷峻地做了分析——亚当·斯密在 1776 年出版的第五本书《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直到今天都可以看成是国家财政理论的经典来源读物。以下这些总是确定的：国库要想履行它的基本职能，即为国家提供任何资金，同时保障对国民收入进行再次分配，就必须建立在一个成功组织的赢利的经济体系之上。当前宏大的舒适温室的情况中可以看出，资本经济和“公权力的手”之间有着一根固定的，甚至也是越来越紧张的纽带联系着——在国家份额超过社会总产品的 50% 时，人们就无须长时间地在游戏中——这个游戏又叫做资本主义——寻找主要的赢家。当这个纽带稳定下来以后，童话中的那个钱袋动机所表达的无须

劳作就获得的财富就会渗入财政预算中去然后作为形式上已经应诺的请求固定下来。如果不行，就需要有个法律的幸运女神来帮助；如果谁情况不坏，就可以自由的梦想更高级的幸运。恩斯特·布洛赫称作希望原则的东西，在现代化的社会国家中以这样的规模操作起来，使得减轻负担的原则系统地致力于关闭各种例外的状况。

随着“社会福利网络”的建立，矫纵空间的第一层赢得了一个坚实的基础。此外，绝大多数的居民形成了部分氛围的、部分实际的共同享有不劳而获的动机的任意现象的形式。在这种背景下，就要提及第二个普遍有效的矫纵维度了。接下来，还需要以福利体系是关闭经济上例外情况（具体一些说就是：暂时的贫困，或是由于事故而使生活受到威胁）的程序的命题为出发点。当拒绝例外情况的趋势扩展到了外交领域的时候，国家的行为就产生了从战备到冲突管理的转型。这一情况心理政治的后果就是舒适区域内在精神情绪类型上的“和平主义化”变形，在这样一种转型中，明确的，自19世纪以来人们普遍开始信奉的和平主义意味着一个变得近乎废弃不用的逐步升级。

人们的精神情绪类型变迁中最易观察到的痕迹就是历史的男子气概迅速解体。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对“男性”的社会设计在近来的半个世纪的富裕区域中是减轻了战争的负担的。尤其是传统上断然禁止男性胆小怕事，而现在他们也从这种要求中解放出来。因此，“新男性”（*der neue Mann*）

作为社会心理学的成功角色也在后征讨时代得以确立——仅仅排除军事浪漫主义的影响范围，特别是在军事上强大的帝国前沿国家，如美国，自上至下还出于上述已经解释过的原因从政策上支持，媒体宣传上鼓动这种情绪。新男性是一个在民事生活中放松的人，他意味着一个阳性的消费者。在放松中出现的任何不快，都可以通过象征性的手势加以平衡，这给创造出设计好的男子气概提供了大量的建议。幸好有这些产品，使得感兴趣的人可以重新回到一些强壮的男性特征上去。在这种背景下，不需要太费工夫就能认识到，和平派与好战派之间的摩擦最近又重新发出的声音在何种程度上成为一种文艺副刊现象。它获得了新男性姿态政治化的推动力——大约是鉴于反恐怖袭击和西方维和部队进驻国外的需要。事实真相却是，无论是好战派的作者，还是新保守主义的散文家，也无论他们自己是否真的愿意，都没有能力重新变回一个斗争者——传统意义上的斗争者是一个只能生活在舒适空间之外的人。新现实主义战争话语的作者们无论如何总还是能让我们回忆起，我们当下生活的和平环境来之不易。人们总是在理性地思考，中立的勇气并不能解决所有安全问题的时候，就会说出具有这种倾向的警告。

从普遍意义上来讲，宏大的减轻负担系统中的第二层次所能提供的东西丝毫不逊色于第一层次——不仅因为 20 世纪影响深刻的性别关系的转变，包括女权主义和同性恋，没有传统男性形象的瓦解是不可想象的。这应该归功于今天无论性别，对于无战争的安全的需要已经作为一种娇纵的特征

渗透到了每个个体之中。这类倾向当前决定了欧洲军事强制的减轻负担的水平，也应该在公共的话语体系中异常明确地表达出来——否则的话，可以预见到人们无力应对歇斯底里。只要回忆起某种不能完全转嫁掉的为了自身安全而做出的事情过于突然的重新回归到早就过度放松了的主体的意识当中，这种歇斯底里就会蔓延开来。

在减轻负担系统的第三层，人们普遍对于安全抱以高的期望值，此外，安全诉求也涵盖了私人生活中诸如事故、疾病、自然灾害或是类似的突发事件的影响和风险。个体安全期望的扩张中，可以解读出保险业的矫纵意义，关于它在近代的构建意义，我们在前文（参阅第 16 章，第 132 页及其后）中已经涉及：保险可以描述为实用主义的免疫系统，它的功能在于，将针对混乱而不受欢迎的负担的措施机构化。当包含风险的实践活动成为普遍现象的时候，用于补偿风险的机制也不可或缺——因此，这一领域（剔除极具讽刺意味的人寿保险不谈）首先是交通保险占绝对优势。这些系统必须要从它们的减轻负担的特征方面来理解，因为它们使保险人放弃通过个人行为来避免和应对不受欢迎的侵害的狂妄想法。保险业和团结体系充分广阔地扩建起来的地方，比如水晶宫内的欧洲地区，就能预见到一种很强的轻佻意味的推动，因为完全保险化了的民众会共同参与到由个人小心转向系统小心的转型中去——尽管改革政治家们不断循环往复地发出个体要有自我防御精神的呼吁。系统小心的结果就是，个体从膨胀了的免疫游戏空间中获益。那么，稳定

了的匿名的预防就会释放出个人的漫不经心——一个经典的矫纵效应。也许根本没有必要展示，这种倾向是多么紧密地和资本主义市场上物品的消费增长行为体验和有风险的消费主义联系在一起的。与之相互补的是解决事故和自我伤害的职业以如此多的变体膨胀肿大，这在以往任何一种社会形成物中都是不存在的。它们构成了一种奢侈产业，人们在这里比在别的任何地方都适合于学习宏大温室中富裕管理的基本原则：使必然屈从于多余之下。事故社会学和疾病统计暂时给人们提供了最好的关于当下时代理论的入门导论。对此关键的概念“病态奢侈”（Morbidityluxus）在别的地方已经解释过了。^①

减轻负担系统的第四层表现的是新媒体的矫纵意义。从中可以展示出，矫纵意义如何使减轻负担了的民众的认识经济学运动起来的。古登堡效应在他那个时代引发了新的浪潮，从而人们可以更容易地获取书写下来的知识，随着电子媒体在今天的普及则史无前例地推动了任意内容的可支配性。绝非偶然的还有，信息这个概念同时也随着新媒体而得以确立。在媒体抽象的时代，知识的同质化才可能在均质的信息形式性意义上达到其技术上的完成——超越了先验哲学把一切意识的内容都等同化地理解为“表象”。如同笛卡儿之后的哲学以印刷的书本和主体之间的共时代性为前提，同样的，当代的思想就当然的以信息和电子媒体的用户之间的

^① 参阅《球面学Ⅲ—泡沫》，第 838 页及其后。

共时性为前提。

新媒体闯进舒适空间是一个非常娇纵的现象，不仅因为所谓的全球联网由于它们的存在而对于每个使用者来说都以简单的技术重复而具有可实践性，而且更多的还在于，使用数字媒体从根本上说是一个使用者和内容之间的一种新的关系。这种趋势，人们大概可以用“表面化”（Veräußerlichung）这个概念最好的加以刻画，前提当然是，人们要先把对表面化这个概念的价值评判弃置一边。表面化意味着，一个关于主体性的更简单的形式，我们说后现代的“用户自我”（User - Selbst），它开始慢慢消解主体性更加庄严的形式，即近代的“受教育的自我”（gebildete Selbst）。

技术的转折使个体也从集成的个性塑造的苛刻要求中减轻了负担。这种个性塑造一度对于阅读的以及在自身的生活中获取的全部知识的存在具有典型意义。“教育”（Bildung）这个概念，人们一定不能只把它看成一个德国式的怪癖，它说出的是一个非政治的内心世界的奢侈形象，描述了在整个欧洲近代向个体提出的非分要求，即个体要体现为其自身生活和阅读史的一本活生生的书；他向他的受众发出呼唤，在自我的人格中所有那些人们不无激情的称之为经验的东西聚集起来。书籍本身是这样的一种表现为去语境化的手段（参阅本书第40章，第395页及其后），还剩下一个聚集形态的模式，用以体现作为读者和作为个体是如何在收敛中实现的。这种聚集形态对于资产阶级时代有知识的个体来说有着重要的存在意义，只要他们还把自己当成是个人经验历史的一个活生生的储蓄罐。

从新媒体出发的减轻负担的潮流则正是针对这种受教育人 (Bildungsperson) 的重视。它的矫纵意义在读者主体性消解,并向用户主体性过渡的过程中变得异常明确。用户是个不再必须是一个按照受教育人的原则而塑造的主体的行动者,因为他可以为自己赎身,从而减去收集经验的负担。“赎身”这个词意指同质的内容、信息,能保证给使用者带来的减轻负担的效应,只要信息内容通过快速的引入某个相关的技术就可轻松读出,而不是一定要通过耗时甚久的学习培训才能获取。虽然用户也没有停止收集活动——因为他也必然会依照他自己的方式应对接踵而来的认知事件——,但是他们所收集的并不是经验,而是个体式集成的、叙事性的、按概念组织的知识综合;这些是地址,通过这些地址,人们或许在出于任何一个原因而需要这些信息的时候,可以或多或少的触及成型的知识单元。

认识领域内,最重要的减轻负担效应便和人们可以称之为在途成本 (Wegekosten) 的东西相关。在古代,当所谓的人踏上求学之路,为了找到学习某种秘传技艺或是昂贵的知识来源的门径,那么对于今时今日的人来说,学习使用一些功能强大的数据库软件可能更有用处,因为你甚至可以站在原地不动,而获取到正好是你想要的信息。轻而易举地获得信息也慢慢发展成一种普遍可支配的反特殊版本处理方式,随之而来的就是经验原则被束之高阁了。^① 历史上的

^① 关于直接这样拿取取代了通过传统上的收集,参考曼福雷德·索默 (Manfred Sommer) 《收集——哲学的尝试》,法兰克福,1999,第 392 页及其后。

经验主体必然是一个寻找者，一个活的经验收集场，而今天的搜索引擎和存储技术给他们释放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终于可以从经验角色的负担中摆脱出来了。现下，以最完美的方式表达了向后经验时代转型的姿势就是下载。它直观化地表达了人们终于从收集经验的苛刻要求中解放了出来。当然，随着这种解放，后个体的、后文学的、后学院派的认知管理（Kognitionsregime）的影响却已经后发而先至了。

宏大舒适系统的第五层中，我们将关注媒体建立起来的巨大公众性的娇纵价值，它表现为产生出一种新的关于名望的范畴。比较有典型意义的是，人们实际上也无法回答他们为什么一下子就成为名流。传统意义上的“论功行赏”（Meritokratie）建立在历史的社会总是愿意把他们的成员按其功劳吸收到某个狭小的荣誉圈子里去，并用这样的方式对他们的功劳予以奖励。资本主义的公众认可做出成就的人，并给予他们名人的奖励，用这种方法，公众间接地也在对自己的功劳表示肯定。水晶宫内部建立起的与自己有关的媒体世界中，最近以来也在名流现象中出现了所谓的娇纵效应，这种效应使得固有的功劳和声望的关系被分割开了。这样一来，名望本身也可作为一种自我价值。无论是球面意义上，还是实用主义意义上，舒适系统中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处在媒体之中”（In - den - Medien - Sein）是一个传统上“基于功绩而享有名望”（Prominent - Sein - aufgrund - von - Leistung）的有效等值，于是乎他们把绕过论功行赏的传统通途而直接出现在媒体演播室中看成行之有效的方法是不

无道理的。媒体开辟了通往“容易得来的名望”的通道，并预备越来越多的主席台，让那些无功之人进入公共瞩目的视野中。这里就产生出一个不容忽视的走捷径程序的市场，而这种程序本身绝大多数情况下却极易在极短时间内专业化成为一种“第二功绩”。这种趋势的中心，一种角色渐渐明晰起来，他们就是主持人，通过介绍名流，他们本人也往往攀爬到了与名流相当的高度。当展示者在广大公众面前相互展示自己的时候，关于媒体的娇纵螺旋的真相时钟敲响了；他们在这一刻证明了，在名流交易所中，到达了一种衍生（Derivate）交易的阶段。从必须创作出作品的苛刻要求中减轻负担出来，对于这种倾向，后现代的艺术体系以它的方式做出了反应，并形成了一套无作品艺术家荣誉。而在大众文化领域，这种走捷径的过程则更加普遍化，直到一种单纯地为了出名而出名型的名人出现。在他们身上的那些眩目的事件使他们成名，然而他的成名的事件却是那些并无特殊之处的东西。顺便还要提一句的就是，后现代的幸福女神不再会送给她保护的宠儿一个可以产生无穷无尽的金币的钱袋，而是把一个选择放到他们的面前，是要做一个有功之人，还是要做一个无缘无故一夜成名的人。

在观察作为整体的宏大娇纵温室时，就会涌出一个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海德格尔有关无聊的诊断是否不仅表达了一个哲学以及心理学密码转写了的颓废预告。包括尼采勾勒出的关于最终的人的图像其实也不过是对这样一种消费者的预感，他们产生深渊般的无聊感，同时却能欢快的娱乐。最后，它还转向了“减轻负担而又感到无聊的”个体，

他们由于宏大的资本主义内部舒适物品的设置而拥有足够的资源，从而宣称到达了满足的状态。颓废概念在新的矫纵现象中显然就失去了它传统上的意义，因为当前被矫纵的个体同时也是不断提升的身体素质的参与者。貌似颓废也就体现在减轻负担的个体的能力之中。它的主导形象尤其体现在运动员身上，他们为取得顶尖的成绩，拼命训练——一般说来是以牺牲他作为人的“其他各个方面的潜力”为代价：为了成为最有能力的那个人，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服用兴奋剂。其他竞争对手也在服药，那么在机会均等的竞争中，服药就变得不可避免。这种形势下，以往在贵族文化没落时代所谓的“等待野蛮人”的提法就显得非常多余了。减轻负担了的新人，当他们从比他们更加文明的前辈手中接过舵的时候，和后来的野蛮人是一样的。鉴于这种情况，惯常的文化批评根本就是空洞无物。水晶宫中的人变得越来越老，但稚童化的症状却越来越泛滥，虽然人们不需要花费太大力气就能明确这种情况，但如何来评价这一现象，暂时却并不明确。总是能找到最终的人的聪明的代表，为了能够证明，他们不仅不野蛮，相反却高度的文明，然而只是在另外的排名体系中。

更加紧急而迫切的问题是，在集体不可避免地不断要求更程度的减轻负担的氛围中，周期状不断循环出现的重新增加负担的律令如何能在不经历政治倒退的情况下得以合适地处理。作为对这类问题思考的参照值，可以使用墨索里尼的那句话，法西斯主义是舒适生活的恐怖。这个从未被给予足够重视的话语却足够清楚地解释了施加负担浪漫主义的抗

议现象威胁了日益进步的舒适系统。20 世纪已经足够多地向人们展示了重新回到冷酷现实的品味能够做出多么残酷的事情来。如果说某种威胁高度减轻负担状态的享有者的情况存在，那么它就可能被认定为一种成为第二次残酷的倾向。在 1918 年以及后来在 1945 年以后才真正将其认定为一种令人难以理解的“堕落至野蛮”的公共话语中，也依照事实地涉及了这个问题，然而人们却很乐于忽视，这是一种“自甘堕落”。急性的、快速增长的对文明拘谨的厌倦慢慢聚集，就会发展成为文化中慢性的不快。如果想保护自身不受控制地增加负担运动，如新英雄主义、新简朴主义、新强硬政策的伤害^①，就要时不时地去考虑一些与民主政治相兼容的施加负担的草案。

^① 朱利安·邦达 (Julien Benda) 在他论战性的小册子《知识分子的背叛》(La trahison des clercs, 1927) 中就已经指出了“强硬浪漫派”的危险。

第 38 章

重估一切价值：过剩原则

相反的，谁想要了解技术进步时代中的减轻负担的一般性前提，应该最能在法国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那里找到答案，具体地说就是圣西门及其学派，他们的出版物中——他们的杂志的名字叫做《环球》也不是没有理由的——便可证明显性表达的矫纵政策的早期特征以其特有的形式表现出来。今天在理论和实践上行之有效的减轻负担的公式可以追溯到圣西门主义，按这个公式，随着 18 世纪伟大的工业的兴起，终于迎来了历史的时刻，人剥削人的时代结束了，取而代之的则是人类对于地球的开发利用。在既定的语境中，

人们可以赋予这一转变重大的划时代实质内容：由此，由他们中的先锋派，即所谓的企业家阶层，所代表的人类被认定为广泛的减轻负担运动的受益者——或者用个那个时代的术语叫做：作为解放的主体。生时的肉身复活，这个世俗和基督教的字眼标记了它的目标。

农业帝国的阶级社会中典型的利益分配，即通过对为少数人服务的大多数人的剥削来实现那一小部分居于统治地位的人的减轻负担和个性释放，可能地改变则是基于一个新的一般性的服务者——人们使用技术而控制了提供资源的地球——而使得人类的所有阶级都减轻负担。圣西门的关键词，剥削（*exploitation*，在中文语境中，如果对象是人，则一般使用“剥削”，而如果对象是物或者是大自然，则使用“开发”“利用”较多，但在外语中同一个词具有多重含义，本章翻译中考虑到中文习惯，有时译作剥削，有时译作开发、利用。——译者注），在过程逻辑意义上的含义，在 20 世纪的哲学人类学，特别是因为阿诺德·盖伦的作用，发展出了一个足够抽象的“减轻负担”的概念之后，^①才真正明确的被表达了出来。自从这一概念为文化学服务以来，人们就能够就高度工艺化的社会综合体的进化的方向做出一般性的陈述，它们听起来比 19 世纪的那些让人感觉到有些幼稚的解放和进步的论点从体系上和心理学理论上都要高明不少。如果人们把诸如减轻负担概念的现象重新联系到圣西门

① 关于这个概念的详细论述，参阅《球面学Ⅲ—泡沫》，第 3 章，第 2 节，第 699 页及其后。在那里指出了，盖伦基于他的兴趣，只发展出了关于这个概念非自由的那条线索。

式的剥削上去的话，就能非常清楚，如果没有把剥削移到新的下层的话，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上述所描述的效果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在这个背景下，人们可以试着提出这样的论点：一切关于人类生存条件变迁的叙述都不过是关于对变化了的能源源的利用（*Ausbeutung von Energiequellen*）的叙述——以及对物质和能量循环管理的描写。^① 这句话不仅比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那句教条“一切历史都不过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更大维度上具有普遍性，经过经验的检验，它还更加适用。由于它把自然以及人的能源（“劳动力”）都涵盖了进来，因此也就更具有普遍意义；对于历史事实，它的适用性还在于，因为他拒绝了教条的坏的历史观，即一切人类文化的情况的关系性都只存在于一个唯一的由冲突组成的进化进程中；此外，尽管它的抽象化程度很高，却也仍然没有对历史的数据进行任何歪曲。类似的歪曲却可见于《共产党宣言》中引发争端的教育剧本之中，对于大量的阶级妥协的现象视而不见，却将相对来说以公开的阶级斗争形式出现的罕见现象普遍化了——这还带来一种危险，即把旧历史中带有绝望的、缺乏有效政治主张的，甚至带有肆意破坏性质的奴隶、农民运动和后期的工人要求重新分配社会利益的运动等量齐观，赋予前者不相称的典范意义。

关于利用能源的叙述，达到了它当前的热点，一俟它

① 参阅罗尔夫·彼德·希弗勒（Rolf Peter Sieferle）《过渡中的社会》，载迪克·贝克尔主编《工作考古学》，柏林，2002，第117~154页。

接近那些早期和新近的社会历史笼统地称作“工业革命”的集中发生重大标志性事件的阶段。如我们现在所知，这种革命完全不是一个上和下调换位置的“变革”的过程，而是明确了在产品生产过程中，借助于机器来替换人的力量。从人工到机器（或者是新式的人机结合的合作形式）过渡的钥匙在于借助于某种制造方式的体系而形成的动力系统的耦合。这种耦合在人力工作时代是隐形存在的，因为那时的工人自身，作为能量转换的生物学个体，构成了力量和生产制造的整体。机械的动力系统的出现，就带来了巨大的飞跃，也给生产过程带来了质的影响，而一直隐逸着的耦合过渡到了显性制定的阶段。

随之开始的就是机器时代的史诗：设计机器让新一代英雄登上了文明进程的舞台，由于它们的出现，也使得传统文化中能量的游戏规则发生了极其迅猛的变化。当机器融入我们的生活中后，即使是物理和哲学的概念，诸如力、能、表达、行动和自由都被大量赋予了新的内涵。尽管一般情况下在机器身上都是被束缚的力，但资产阶级的神话体系却从忽视它们不可遏抑的，潜在的爆发性的一面，并通过前奥林匹亚时代的力大无穷的泰坦神的回忆来转写这种特性。因此就具有深刻的魅力，从爆发出巨力的机器中——其实就是一种爆炸——向四下放射出来。

自从新泰坦神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世界中以来，各个国家也就变成了机器迁入的移民国家。一台发动机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没有头脑的能量主体，它完全出于需要利用它的力量而被设计制造出来。机器只拥有行动者身上那种产生动

力的特性，却无须担心具体实施或是反思的负担。作为被砍去头脑的主体，发动机不是从理论过渡到实践，而是从静止状态过渡到工作状态。人作为主体，做出行动的时候需要摆脱束缚的力量，而机器则是启动装置的触发。发动机是个完美的奴隶，当人们不分白天黑夜的使用它的时候，也不会掺杂任何人权方面的思考。它们更不会去听从什么布道者的话，抱有梦想——梦想在不远的将来有一天，机器能够和机器的所有者拥有同等的权利，而人类的孩子和机器的孩子能够和谐地在一起玩耍。

为了将发动机作为文化行动者系统的进行一体化，具有完全不同属性的燃料就至关重要了，它就像在农业帝国时代作为力量载体的人和动物用肌肉的力量劳作所需要的食物一样。因此，在发动机的史诗中，对于能量的礼赞是最为关键的部分。人们甚至可以把这个问题上升到如此的高度、抽象、同质的能量概念的表述，由于现代物理学的作用，只是对于发动机化原则的科学的反思。其内容即是用燃料和动力机器之间精确的关系来代替食物和有机体之间笼统的关联。随着对有机体力量的放弃，人类迈出了关于能量源利用的过程和阶段宏大叙事的关键一步，它带来了一切的前提条件，同时又不断口授着最后的章节。

关于现代减轻负担的宏大叙事众所周知肇始于关于对第一批机械奴隶大量进入生产部门的报道，这些叫做“蒸汽机”的东西自18世纪以来，移民到了西欧，并定居在了正在形成的工业风景当中。看到这种新的行动者，不由引发了人们关于神话的联想，因为机器的作用原则是利用封闭在一

定空间中的蒸汽的膨胀力量，于是人们油然而生的联想就是被罚而束缚在地下的古希腊神话中的泰坦神。由于蒸汽的产生首先要依靠煤的燃烧（20 世纪核热能电厂则又是代表了一种全新的行动者），这种化石燃料就成了工业革命伊始的英雄能源载体。众多现代的辩证法就包括，开采煤这种强有力的娇纵动因（*Verwöhnungsagens*）通常要经过地狱式的艰辛，才能把它们从地下运送到地面上来。因此，19 世纪以及 20 世纪早期，大量需要煤的年代，煤矿工人就是马克思主义观点“工资合同不过是一种戴着法律面具的奴隶制度”的活见证人。19 世纪晚期，能量巨大的煤的地位也渐渐让位给另外两种化石能源载体——石油和天然气——它们也是最高级别的娇纵动因。开采它们需要克服与地下采煤不同的困难。间或在对它们的开采中人们可以观察到一种想称之为自然的屈从的效应，就好像这些东西自然而然地就要做这个属于它的事情，给打上农业时代烙印的资源短缺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短缺本体论和糟糕状况画上一个句号。

自然资源迎合人的需要的最初场景出现在 1859 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当在泰特斯维尔（Titusville）附近进行一次钻探的时候，发现了第一个石油的源头以及新世界的第一座大油田，并且是在非常平坦的平原上，几乎不到 20 米深的地层。从那以后，能够自己向外喷射石油的井口，专业人士们称为“喷油井”（*Springer, gusher*），就不仅是美国梦的原型代表，也是能够容易被人们所取得的能源开创的新生活方式的代表。在石油中洗浴是那个时代人的洗礼仪式——如

果好莱坞没有塑造出 20 世纪伟大英雄之一的詹姆斯·迪恩 (James Dean)，泰坦神电影 (1955) 的主角之一，在电影中，在自己发现的油井里洗澡，那么它也不可能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神话的集中发源地。持续增长的能源从原先从未开始的化石地层中源源不断地流出，不仅使持续的“经济增长”——这意味着工作、科学、技术和消费间超过 250 年时间的积极相互配合——成为可能，这包括了我们的描写为人们建立在持续的减轻负担和娇纵效应基础之上的心理语义学上的改弦更张的推论；此外，它还把古代欧洲的本体问题，如存在、实在和自由等令人充满敬畏的范畴纳入了一个急速的意义变迁中去了。

于是在实在性概念中渐渐注入了行动主义的“总是可以不一样” (Immer - auch - anders - sein - Können) 的言外之意 (迄今为止，只有艺术家作为可能性意义的地方长官对此有一些预测)，与提到实在性总是有着一种“不是别的就是如此”的昂扬情绪贯穿其中的传统相反：所以它要求在无穷、强硬以及短缺等强力面前卑躬屈膝。一个类似“歉收”这样的词汇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以经典学说警告性的严肃性，有着现实的意义。它以其独有的方式时刻提醒着人们，世界的主宰不是别人，而是死亡——它忠诚的追随者，各种大灾难无一不在支持着它。而在一个类似今天的，打上了能量剩余烙印的现实状况中，古代和中世纪的听天由命的信条已经失去了它们的效力——现在有了新的贯穿至存在氛围层面的自由程度。总是以前现代方式和悲惨的方式思考问题的天主教神学完全失去了和当下现实状况的联系，甚

至比半现代化的加尔文宗和路德宗教派还要糟糕是完全意料之中的事情。此外，自由这个概念在近来的一百年中，其本来的意义也顺理成章的消解了。当前的一串谐音基础上，它又开创出了新的意义维度，特别是把自由定义为突破界限的移动权以及隆重的挥霍能量的权利。^① 那么这样一来，两个曾经只有主人才拥有的权力，即想去哪里就去哪里的自由移动和情绪化的支出花费，就在牺牲自然的基础上民主地普遍化了——当然这只局限于那些宏大温室的气候条件产生作用的地方。由于总的来说，现代是一个建立在过剩的基础色调之上，于是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们始终受到一种突破边界感觉的挑战。他们可以也必须懂得，他们的生活坠入了一个没有正态的时代。被抛掷到一个剩余的世界中就必须以一种地平线在飘移的感觉作为代价。

现代存在氛围重构的敏感地带涉及了所谓的去匮乏体验，水晶宫里的居民早期就与之接触——但从来没有能够恰当地尊重这一体验。农业帝国时代人们对于现实的感受很能理解物品与资源的稀缺性，因为经验告诉他们，体现为辛苦的耕作劳动刚刚好够人类人为地在自然界中开辟特殊的可供生存的小岛。早在古代，理论家们就已经提到了这一点，并对于大帝国的衰亡，或是最傲慢的建筑塔楼也会因为强大的自然力而无须几代人的工夫就夷为平地的事实表达了一种听天由命的思想。农业的保守主义的经济道德原则是一种严格

^① 参阅斯洛特戴克/汉斯-尤尔根·海因里希《太阳和死亡——对话探索》（*Die Sonne und der Tod. Dialogische Untersuchungen*），法兰克福，2002，第 321 页及其后。

的对挥霍浪费的禁止。因为劳动生产力通常并不会提高，还需要通过捕获猎物来加以补充，所以对于古时候的人来说，在任何时候都必须明确，创造出来的价值是一个有限的、相对一致的而无论如何都必须重点保护的东西。在这种条件下，浪费者必然被人们看成是疯子。所以说贵族自恋式的过度靡费只能被看成傲慢的行为——后来，它被重新解释成为一种“文化”则是当时的人们始料未及的。

自从 200 多年前，随着化石能源的文化风格的根本变革，上述的观念都失效了，一种巨大的自由主义登上了舞台，并开始将既往的一切符号都反转过来。传统上，浪费毫无疑问是一种对存在物的精神犯下的罪行，因为它以游戏的方式对待稀缺而又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储备，而在化石能源时代，浪费经历了一个深远的意义转变——人们今天可以平心静气地把它称为一种公民义务。不是物资和能源一夜之间就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但是可能性的界限却一直持续地被拓宽：它给“存在的意义”一个从原则上改变了的色彩。只有斯多葛派才会计算库存量有多少。而对于宏大的舒适温室中惯常的伊壁鸠鲁派来说，所谓的库存正是那些人们可以获取的东西，它们原则上是会不断增多的。集体的愿意更多消费可以在很短的几代人以内上升到一种体系前提的地位：群体的轻浮态度是消费主义的心理语义动因。从它的繁荣，可以看出，轻率是如何占据到根本性的位置上来。取代禁止浪费的律令的是禁止简朴——这条禁令在今天反复地被以拉动内需的号召提了出来。现代文明并非完全建立在“从人类

自身导致的低下生产力中走出来”^①，而是建立在毫无道理的大量能源持续的流入企业和体验的空间中去。

在谈及浪费的起源与发展谱系时，必须指出，神学价值判断的传统对于奢侈、闲适和多余的判决有多么深刻。独神主义的经典观念认为，任何多余的东西都是上帝以及自然所不愿看到的东西——就好像它们总是在计算着存量有多少一样。^② 值得一提的还有，即使是自由主义最杰出的代表亚当·斯密，尽管他一再赞扬由奢侈而激发起来的市场需求，但仍然坚定地对浪费持非常否定的态度——这就是为什么浪费是对“眼前的享乐欲望”^③的一种妥协这句话在他的《国富论》中像口头禅一样贯穿其间。浪费是“不事生产的人”的独有姿态，教士、贵族和士兵们这样说，因为他们基于一种自古以来根植在内心深处的自大而坚信，他们天命神授，有特权挥霍有生产力的人们创造的财富。

马克思也不能回避农业帝国时代的浪费概念，于是他遵循着斯密的轨迹严格区分了劳动和挥霍的阶级时，当然他还从细节上加以完善。在他那里，资本的拥有者代替了封建时代的“寄生虫”，作为邪恶的浪费者的角色出现。当然，他和斯密一样，也承认在新的经济方式下产生出的价值增殖，远远超越了农耕时代的少量剩余产品。《资本论》的作者就

① 参阅乌尔里希·布洛克林（Ulrich Brückling）《企业家》，载乌尔里希·布洛克林/苏珊·克拉斯曼/托马斯·莱姆克主编《当代关键词释义》，法兰克福，2004，第 275 页。

② 原文：“cum...omne superfluum Deo et naturae displiceat... et omne quod Deo et naturae displicet sit malum”；但丁，《论世界帝国》I，第 14 页。

③ 亚当·斯密：《国富论》，第 282 页。

将资产阶级刻画成一些庸俗化的贵族，他们的贪婪和无耻根本无下限可言。将资本家刻画成不劳而获的形象，实际上没有考虑到在资本主义体系中，新出现的“勤劳致富”者开始他们的事业发展的现象，他们把眼前的享乐欲望和创造财富很好地平衡了起来。同样，马克思也没有注意到，在现代化的富裕国家，随着财富的重新分配，不事生产的行为出现了一种从社会顶层向底层的转移——以至于最终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寄生穷人现象。农业帝国时代，无财产的穷人往往是那些辛勤劳作的被剥削者，然而在水晶宫中，穷人——以失业工人的标签——往往游离于价值创造的体系之外（对他们的支持与其说是出于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公平合理”，毋宁说是出于国家或者人与人之间的团结需要）。^① 他们的代言人仍然可以不停地声称，他们是被剥削的人，因此鉴于他们的短缺，亦有权利申请补偿。

但愿自由派人士，如马克思主义者们，在 19 世纪做出了阐释工业社会现象影响深远的尝试：化石能源的应用事件没有在任何一个体系中被感知，更不用说从概念上渗透进来。19 世纪乃至 20 世纪早期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还教条地把劳动价值放在首位，用以解释一切财富产生的根源，因

^① 参阅罗尔夫·彼德·希弗勒《过渡中的社会》，同上，第 139 页及其后：“当下的‘社会公正’的要求在于，抽取具有生产能力的阶层的财产，以‘社会’的方式将之转而注入不具备生产性的阶层中去。因为无财产的人（也许甚至是没有劳动能力以及失业的人）渐渐会成为社会上的大多数，于是我们就有可能面临着一个重大的社会变迁：民主国家成为经济外强制力的执行者，并试图操纵生产性的资本主义经济，以期扶助不具备生产性的、寄生的穷人。”

此，它们也就不能够真正的理解，工业开采和利用的煤，不是和其他的东西一样是一种“原料”，它实际上是第一个伟大的减轻负担的动因。由于这个万能的“自然工人”（炼丹术士们苦寻了几个世纪无果），剩余的原则才正式地在文明的温室中登堂入室了。

尽管人们迫于新的证据的压力必须认可化石能源载体以及由此生发出来的三代发动机——蒸汽机、内燃机和电动机作为现代的减轻负担的基础动因，甚至人们还可以把它们看成是文明的传递的守护神（*genius benignus*），保护人们不再受短缺之苦，也不必再依靠对奴隶肌肉力量劳动的剥削——但不可回避的则是，化石能源时代的不避免的剥削转移创造了一个新的无产阶级，而对它的剥削使得富裕宫殿中的减轻负担的状态成为可能。当下开发利用的重心已经转移到了动物身上，由于农业生产方式的工业化，导致了一个批量生产的时代的开始。关于这个话题，数字比多愁善感的论理更具有说服力：根据联邦德国 2003 年动物保护报告显示，德国在 2002 年一年内杀了 4 亿只鸡，再加上 3100 万只火鸡和接近 1400 万只鸭子；大型哺乳动物方面，共屠宰 4430 万头猪、430 万头牛和 210 万只羊。类似的数字在绝大多数的市场社会中都差不多能够达到，不过所有这些国家内部统计数字都要算上数量可观的进口产品。动物蛋白构成了最大的合法药品市场。这些大到吓人的数字已经超过了任何感情上的评判——即使是用纳粹党人、布尔什维克发起的大屠杀来与之类比，亦不能尽显生产加工中屠宰动物时的这种程序化手段的可怕（不过，我们在此还是不想就对比大规模屠杀

人和动物伦理和形而上的推论发表任何观点)。人们只要关注到建立在农业化学技术实现的爆炸性的饲料生产的增产之上的大规模动物养殖，就可以明白，动物作为生物转换装置而生产出的肉食充斥市场也应追溯到 20 世纪石油应用普及的事实。“最终，我们是依靠煤和石油来养活我们自己——在工业化的农业生产中，它们变成了可以食用的产品。”^① 接下来的新世界，可以预见到，在巨大温室中的民众会面临着今天已经很大程度上成形，并国际化了的动物保护运动带来的日益增长的不安，该运动强调了人的权利和动物的痛苦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② 这一运动可能成为赋予非城市生活方式全新意义的发展的顶峰。

如果要搞清楚高度发展的舒适文明中重估一切价值围绕着的轴心，就只有剩余原则能给我们提供一个答案。毫无疑问，当下的始终在上升和突破边界的地平线上体验到的物质剩余还将是今后社会关系的一个特色特征，尽管可能一百年之后，或者更长的一段时间后，化石能源的循环到达它的终结。什么样的能源将来可以成为后化石能源时代的主角，今天已经初现端倪——已经有了一系列的太阳能技术和可再生性燃料。然而 21 世纪的开始，对于究竟将来会配备什么能源类型，还不能做出最后的决定。但肯定的是，新的系统——有的人已经很简明地提到了“即将到来的太阳能世界经济”——必须要能带离人们摆脱化石能源政策的强制

① 参阅罗尔夫·彼德·希弗勒，《过渡中的社会》，第 125 页。

② 关于一个代表性的动物保护运动阵线上的活动分子的生平，参阅彼德·辛格著《亨利·斯皮拉和运动保护运动》，埃尔朗根，2001。

和由此产生的病理特征。^①

谈及太阳能系统，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个对一切价值的重估的再重估——因为对当前太阳能的投入已经意味着过去太阳能消费的迷醉状态的终结，那么人们就可以说部分地回到了旧的价值——因为一切旧的价值都是律令的衍生物，使用当年循环的可再生性能源。因此就与稳定性、必要性和短缺等指标有着极深的关联。在第二次价值重估尚不明确的情况下，展现出了一个文明的世界气候形势，人们也许可以带着些许概率预言，它将具有后自由主义的特征——它将会把一个技术上超前，而在生态上保守的混合综合体带到政治中去（把它翻译成具有色彩象征的政治话语就是：黑绿联盟）。当下大众文化中那种向外漫溢的浪费表现主义倾向的前提条件未来将会渐渐失去。

只要在后化石时代，人们在工业时代的剩余原则中被唤起的需求还存在，不断发展的科技就会首先寻找满足人们靡费需求的替代来源。未来，人们的剩余体验的重点将会不可避免地向非物质潮流方向迁移，因为生态系统的原因限制了物质领域持续“增长”的可能。也许它还会导致物资流动的急剧减少——并且这将给地区经济的重新带来活力。基于上述提及的情况，对于那些今天来说有些操之过急的关于“全球的信息和知识社会”的言论，现在开始的则可能是一段缓冲期。彼时，决定性的剩余首先发生在非物质的数据领

^① 参阅赫曼·舍尔（Hermann Scheer）《太阳能世界经济——生态现代的策略》第 5 版，慕尼黑，2002。

域，也只有这里能够体现全球性本来的特征。

后化石时代将如何对现下的企业和表达自由的概念做出修改，目前只能很模糊地做出预测。很可能的是，人们将会把爆炸的浪漫主义（*Romantik der Explosion*）——说得更宽泛一些：突然的能量释放在心理、审美和政治上的衍生物——从未来的“平和的”太阳能技术出发，评价为一个大众文化方面全球化了的、能源的法西斯主义的表达世界。这是无助的活力论的一个反映，它源于基于化石能源的世界体系的视角贫乏。在这个背景下，人们理解了为什么水晶宫中的文化企业陷入了一种失去方向的迷惘状态——超越了已经的无聊和消遣的相互趋近的边界。最终消费者场景中的大众文化的、欢快的虚无主义和富裕的、强调个性的精英阶层的虚无主义表现得同样无计可施，前途渺茫。无论高下，如无意外，大家的生活都会按照如下的箴言：在我们之后的太阳（*Après nous le solaire*）。

化石能源的统治结束之后，事实上就会出现由当代地缘政治家们说的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空间的切换。这一转型首先当然是从化石能源爆炸的节奏向可再生型能源的节奏的转型。太平洋上的风平浪静必然能发展出太阳能技术下能源统治时代的文化衍生物。而这是否同时能够顺应我们的期望，促进世界范围的和平进程，促进全球物质的平衡分配以及克服全球种族隔离，这需要留待未来慢慢给我们答案。

第 39 章

例外：引诱的解剖——美国学之二

没有人会认真地去争辩，世界资本主义——如此多中心主义的结构——还是很优待某些国家和那里的居民。不可否认的是，美利坚合众国即使不是其主要的居住地，但显然应该算是其中的宠儿。美国是现代世界的国家，它给自己提供了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更多的宏大舒适空间的状态。人们甚至可以说：在这里，水晶宫表现为一个对外开放的移民国家。因此，美国的绝大多数民众发展出了一种不仅把自己看成某种经济形式的行动者，同时也是某种动机的载体的心理倾向——对于这一点，很长时间以来就产生了一个对很多人

来说心向往之的名字：美国梦。^① 它的基本假设包括，美国梦到底有多少种定义，应该正好和这个国家有多少居民完全一致。如果我们大大缩减归并所有在美国这片土地上的人关于生活在这个国家的意义的梦想，那么我们极有可能会得到不超过三个无法再精简的动机。

第一个动机存在于美国是一个究其本质和其他为数众多的昏昏欲睡的国家不同的，每个你想做出点新东西的人就能做出些新东西的国家的根本前提之上。美国公民按其宪法赋予的权利，必然会时刻期待存在一个能够有利于接纳他们的冒险和首创精神的空间。人们甚至可以把它称为西部权，并且是比单纯的地理含义要更丰富一些，因为“西部”——从前面的详细论述中我们知道——意味着单方面的突入未经开发的地方而豁免于处罚的象征，它们过去曾经是怀俄明和加利福尼亚，现在就应该是基因研究、纳米技术、火星移民和人工创造生命。

第二个特征则是和“选定”（Auserwählung）密切联系的——这一表达在很丰富多彩的意义层面上漂移，从理所当然的想象美国从各个角度来看，都是世界的顶端的认识开始，直到一个不经常被直接说出来，但在很多地方可以感受到的容留新教胜于犹太教例外的想法。被选定，是一个在欧

^① 对于这个又渐渐被称为美国信条的梦的解析，参见伊斯雷尔·赞格威尔（Israel Zangwill），熔炉隐喻的原创人，参阅亚瑟·M. 施莱辛格《美国的失合——对于一个多元文化社会的反思》（*The Disuniting of America. Reflections on a Multicultural Society*），纽约/伦敦（1991），增补版，1998，第38页及其后。

洲大陆发明的主体性思维在美国的变形版本，横跨大西洋以后的主体性使从普通的、平淡无奇的生活中私密地感受到使命召唤成为行动者成为可能。选定是摆脱束缚行为以及登上世界舞台的美国密码。按下来，任务宣言（mission statement）就为美国言语行为的列表作出了独特贡献。美国主义的语言表达层面不仅从常常被别人嘲弄的最高级（美国孩子就特别喜欢使用这样的字眼）中体现出来；同时，它还最密切地以美国公民宣誓的姿态出现。经常提及美国人虔诚的笃信前基督教时代的，被加尔文以高度的犯罪能量重新表述的上帝和胜利者同在的思想，根本不在乎新约全书中一直在谈万能的主对于弱者的同情，^① 这一点对于欧洲人来说也很诡异。

第三个也是最后的特征则涉及了美国心理动力的社会契约，狂躁比抑郁优先。这一事实状态体现在对于欧洲访客看来如此欢快，但却常常是有些误导作用的，扮演着这个国家根本的语言的乐观主义情绪（尽管在这个国家也并不缺乏自我批评的语汇，甚至也还有其独特形式的否定主义）。由此，一个普通的美国人都习惯于激情澎湃地把一般的问题表述为挑战。它自发的后果则是，人们对于阻力总是用将之清除的纲领来应对。在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的地方，能将一个

^① 美国占主导地位的已经是一个后基督教时代的各种宗教相融合的宗教信仰，哈罗德·布鲁姆试图在他的《美国宗教——后基督教国家的出现》一书中加以展示，纽约，1992年。另参阅克雷格·凡特/彼德·斯洛特戴克，“我们经历着交易所和生态幻想的合并”，载《法兰克福汇报》2001年2月21日，第51页及其后。

推动加强癌症研究或是其他的医学研究的项目伪装在呼吁增加国防开支的形式当中——从1998年5月3日的《纽约时报》上可以读到：由于屈服于未战胜的疾病从根本上说是非常不美国的，因此，向具有致死性的疾病宣战必然是调集了我们全民族的意志（人们可以猜测，这种文字游戏当中，当年的“向贫困宣战”还余音绕梁）。2001年9月11日之后，在对于看不见的敌人的战争中，开启了一个人们广泛关注，却又凌乱的第二阵线，因为那些无法追寻其踪迹的恐怖分子能够把美国作为攻击目标，也显得太不美国了。举国动员来针对疾病和隐藏着的敌人开战也是一种隐含的狂躁情绪直接的流淌。在这种情绪类型的支配下，任何一个美国公民无论内在还是外在都不可以有抑郁的理由。美国公民能从一种额外人权中得到好处，它要求把抑郁的情绪排在好心情的后面，并且允许使用一切方法来排除使人心情变坏的因素。生活在美国的人可以不断在文化氛围的掌声中去享受不去理会或是清除影响心情的元素的权利。这导致人们强制的集体在情感上做假账，因为没有人在平衡收支以后愿意亏损。了解安然丑闻以后的景象的人声称，丑闻不过是暴露出来的冰山一角，这可能对于美元交易领域来说是很有道理的；不可忽视的还有，美元现在已经很大程度的建立在一种感觉经济之上，只有不断地排挤抑郁情绪，不断通过假账的美化才能积极推进整个系统。

将三个基础特征加以综合，于是就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美利坚合众国按其心理政治的设计来说，是一个真实存在的

逃避现实的国度。^①它是各种各样逃避现实的人的故乡，它首先收容了那些在先前的生存状况中已经无路可走，不得不定居在一个新的能够带来第二次机会的空间中的人。作为无数绝望者和沉船幸存者的避难所，这里接纳了大量要在世界历史的洪流中拯救自我的难民。不受约束的剩余动力的移民国度，它给那些相信一定要摆脱束缚有所作为的人提供了施展的舞台。作为小山丘上闪耀的城市，它向那些从对面、从抑郁的地方来的人展示了一个足够宽广的平面。在这里所有人可以兴奋地在安全距离上定居、生活。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美国的魅力和矛盾，那必然是：它能够允许那些“历史”的力量，再从“历史”中退出去。另外一句话则解释了当下的引诱：那些从“历史”中逃逸出来的力量却又一直在为自己重新发现“历史”。

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魅力是与其“社会”的心理政治的情绪状态为出发点的。自 18 世纪以来，合众国的居民就已经成功地催生一种非莱布尼茨式的乐观主义情绪，它直到现在都还不断地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按这个模式，给定的世界，只要它从埃利斯岛的方面来看足够完美，能够吸收不穷尽的附加的改善，就是一个最优的世界。对于这种态度，人们在渐渐好的基础上会认为它有些幼稚；实际上，它

^① 段义孚：《逃避主义》（*Escapism*），巴尔的摩/伦敦，1998，第 9 页。对于逃避主义的概要，参阅《球面学Ⅲ—泡沫》，第 748 页及其后。

却是对于参与其改良的视角下的^①存在意义的一个重新表述。这并不意味着像一些对美国友好的欧洲人认为的那样，从乐观主义减缩至改良主义，而是在乐观主义之上又加盖了一层更亢进的乐观主义。它允许史无前例的将残酷的现实主义和无限度的失礼在现实面前结合起来——古代罗马人曾经将对于传统的多愁善感的虔诚同鉴于当前各种问题的残忍协调统一起来，或许可能早在当时的庸俗信仰中已经预示了今天的情况。古代罗马帝国的人们会在比他们更强大的人面前低头，是为了能够不费周章的就过渡到日常事务中去。所以圣本笃（Benedict von Nursia）在用基督教僧侣的祈祷并劳作的号召代替古罗马勇士的效忠并杀戮的时候，那么他为后罗马帝国时代的欧洲新人类找到了最有效的原则。

于是人们就能理解，为什么说美国人生活方式的哲学和心理政治的预定计划体现出最完美的后历史存在模式的烙印。当欧洲人（除了他们还有日本人、中国人、印度人、俄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还在最近五十年里逐步地作为后历史时代世界的新成员而慢慢涉足这片领域时，美国人因为他们独特的历史进程早已经是这里的老兵了。对于美国人来说，历史终结的新闻早就不是什么“新”闻。在他们那里，从建国开始就已经是对于旧历史剧本的改弦更张。美国

① 关于改良（improvement）的形而上学和伦理问题，部分地可追溯到英国的理论来源，尤其是在格莱斯顿的自由主义领域；参阅依恩·布拉德利（Ian Bradley）《乐观主义者——维多利亚时代自由主义的主题与个性》（*The Optimists. Themes and Personalities in Victorian Liberalism*），伦敦/波士顿，1980，第200-221页。

“革命”发生在发布独立宣言的同时，而宣告独立并不完全意味着是对于英格兰宗主国的脱离，而是将整个旧欧洲的规范、权重以及对世界负担的偏见的体系统统扔到身后。“革命”的概念，如果是从政治和未来的意义上理解，对于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来说，听起来像是无意义的激动——就好像你在要求他把早在 200 多年前已经赢得的对于英国的胜利重复一次一样。

对于美国人来说，唯一看起来还有意义的解放运动就是如果能够从个人的历史生活的遗风中摆脱出来的尝试，即从自己出生于什么样的家庭中摆脱出来：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解放自己的内心作为父母世界统治下的子女来获得个人的从历史中脱离出来的体验。美国无法估量的广大的心理治疗规模，可以证明美国人坚决地要从一切冰凉而抑郁的外部现实中脱离出来。同时也不要忘记，解放内心的美国孩童旨在成为时代之前创造的胜利者——这样一个今天带着牺牲者的特征走上舞台的胜利者。顺便还要说一下，美国心理治疗中无数个孩童自我（Kinder - Selbst）还一直体现着后历史最坚固的堡垒。就如同移民要通过同自己过往的认同性说再见为代价谋求成为真正的美国人，^① 他们的后代也粉碎了从昨天的内心世界带到新世界里的最后的心理瓦砾。美国人心理治疗就在于，把历史的破碎性转换成为后历史时代的自信（self reliance）。

^① 参阅亚瑟·M. 施莱辛格《美国的失合——对于一个多元文化社会的反思》，第 23 ~ 44 页。

资本的内部

按其本质，工作这个词在美国也失去了它在欧洲时的意义：它讲的不是单纯的参与到投入能量，将物质转换成为具有更高价值商品的生产过程——直到劳动者在创造价值的消失点上将自己从劳动中解放出来。美国式的劳动是一个表演，它的意义在于展示，主体是如何从一大堆机会中发展出更多的成就的过程。还在其他哪个国家能够想象人们到南方去，为了能在那里能比家乡更辛劳的干活？还有哪里的人们能够在一个讲求平等的社会中如此淡定地对待增大的贫富差距？美国政治寡头们平心静气、厚颜无耻地证明了，包围在任何一个成功周围的光环在绝大多数美国人看来，是一种他们信仰的散射。在精英阶层的气候中，甚至出现了一种倾向，他们把过度赞誉他人的成功看成是共同梦想具有效果的证明。因此，对于欧洲人来说，一个取得了成功的美国人不会招致周围人的怨念是件很值得羡慕的事情。

明白了这些背景，就能够理解，为什么有关美国的数据会有假。这个国家深层次的经济是不需要任何账目的。它生活在一个超越于账目之上的世界里，它所追求的不是一个低俗的数字上从一个数目向另一个更高数目的增长，而是处在一种从完美向超完美的运动之中。只有在表面观察时，美国才和其他资本主义体系的国家一样，依赖于其经济和人口的不断增长。因为不是经济数字证明其伟大，正相反，而是它的伟大散发出了数字。

诚然，逃避现实的大国的肉中之刺是美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开始就不再拥有今天的爱国者们所说的“能源独立”（energy independence）的事实。自从罗斯福总统和

沙特国王伊本·沙特在苏伊士运河附近的昆西号军舰上会晤（雅尔塔会议后几天，1945年2月），世界上的两大逃避现实的国家形成了战略的同盟，促成了近来世界政治的一个基本的稳定格局。从这一刻开始，一方面是自我欣赏的美国逃避主义和麻醉的阿拉伯海湾食利国家结合在了一起。由于美国高度依赖从海湾地区输送的石油资源，不得不非常例外的以卑躬屈节的方式依靠外部的情况——卡特教条，按照这项咨文，美国要以一切方法对于海湾资源的控制加以保留。历史世界的丑恶被用一根现实主义的带子渗入了美国人内心静化的层面里，就显得并不奇怪了。^①

从当前的一些契机来看，地球上最彻底的后历史国家正处在它尝试发挥权力的高峰，想再次以自己的力量去干涉“历史”——这次不再以裁判员的身份，曾经，美国短暂地扮演过这个角色，结束了几个历史强权之间毫无尊严的战争。而当前美国对于国际事务的干涉则明显带有复辟主义的特征：这意味着美国有可能从后历史国家倒退回一个历史的强权——不可想象的则是，这可以被理解成，世界作为一个舞台，而舞台上总是在或者重新走向历史。“历史”其实——我们在前文中已经阐述过——指的是单边主义行动风格取得成功的阶段。

^① 当前极端的美国的权利的标语是“让我们引爆中东”，它表达了在一种自我欣赏的国家的人们想尽办法排除受制于人的干扰因素。参阅罗伯特·贝尔（Robert Bear）《与魔鬼同眠——美国与伊斯兰教国家之间的微妙关系》，三河出版社，2004。显然“9·11”事件的首要任务在于打破政府间达成的友善和解。正是出于这个目的，本·拉登选择了很多沙特阿拉伯籍恐怖分子参与了袭击。

由布什政府挑起，并长期精心着手准备的，有着非常明显的单方主义行动标记的伊拉克战争风波就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很强的精神上的副作用，它比战争本身所造成的直接后果要大得多：突然之间，美国成为后历史的世界公社道德生态体系中的另类，因为它的政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让人们清楚地看到，它在行使着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仅存的历史强权的角度——而且不仅是这一次，今后一直都会这样。为了解释美国人在伊拉克究竟要干什么，乔治·W. 布什不得不又像以往一样从旧约全书中寻找理由，比如以赛亚书第61章：“……他派我来，我要将囚徒们释放，给被捆绑的人自由。”更明显的是他从“历史”当中找合理性，而他当前的闹剧本身在那个时代就是有意义的：

历史向正确的民族发出了召唤……^①

我们相遇在这个我们国家以及文明世界历史的决定性的时刻；这个历史的一部分已经被别人所书写；而余下的部分将由我们来写……^②

在这个事件中，必须赋予这些话语分析性的质量。布什领导的美国正以毫无歧义的方式，面对着世界国际公众主张历史的王权象征，从而从后历史中脱离出来，对自身进行历

① 转引自汉斯-埃克哈特·巴尔（Hans - Eckehard Bahr）《怜悯美国——德国的替代选择》（*Erbarmen mit Amerika. Deutsche Alternativen*）柏林，2003，第12页。

② 乔治·W. 布什，在2003年2月26日的一次演说；转引自福山《国家政权建设》，第101页，载《亚特兰大月刊》，2004年1/2月。

史化重塑。对于需要创造的历史有五个基本的权力象征：武力的领先，动机的优雅，单边性的特权，对于犯下的以及准备犯下的暴行的自我赦免，控制对于事件报道的文字（和图像）。对于这个单方面宣布的重新历史化，美国赌上了被欧洲以及其他地区的盟友们异化的风险，但最大的问题还在于美国同自身的良好传统决裂。此外，美国也担负得起这种挑衅的行为，从而完全藐视理性的阻碍者们异口同声的反对，这其中还有他的坚定盟友，大西洋彼岸的欧洲国家——美国一批意识形态主义者甚至还鄙夷地把这个团队称作欧洲的胆小鬼、半大孩子、吃软奶酪的家伙以及吃很可疑的动物内脏的家伙。法国人就被美国人以一种爱国主义的情绪指责为一帮爱打听女人的家伙。如果说文字就意味着战争，那么美国众多爱国主义情绪激昂的评论早就向其他国家的怀疑者解释得清清楚楚了。

如同欧洲历史时代的最具传染性的行动者文化那样，美国的政治也以昂扬的姿态，趾高气扬的态度登上讲台，极力宣传着自己的动力，竭力宣传着民族的苦难，行动之前便对于即将取得的胜利满怀信心，总是在执行的过程中不断自行修改成果的决算，单调发音且单方面列举发起的打击的正确性，另外，也总会把美国这一系列的牺牲者用很形成惯例的庄严仪式进行安葬，而对于另外一方面为数更多的牺牲者，则只是草草地形式化的表达出一些遗憾了事。就如同在近代一样，美国投入它的战舰，去推进自身海上霸权，巩固对世界的控制；像一个现代的殖民主义国家一样，美国在使用它们的空中和太空力量，以期在完全不对称的战争中，实现对

于完全无力与之抗衡的弱小力量的绝对打压；像一个修士一样的强权（参阅本书第10章，第84页及其后），主张自己的入侵权利，按其意识，把上帝赐予的礼物——在有些情况下，这个被叫做“民主”（democracy）——强制地塞到那些并不情愿的接受者手里，如果可能，也不惜动用武力。我们顺便记住一件事情，现代阿拉伯语中出现了一个词汇叫“damakrata”，它的意思大概相当于“西方以在这个国家建立起市场经济为目的入侵一个国家”。^①

伊拉克战争在历史哲学方面重要的动机在于从实践上再次显性地把单边主义的风格建立起来。这现在只能在行动理论的光芒中才能见到的，也是世界历史时代决定性的特征。在斯宾诺沙的角度来看，只有一种情况下，欧洲人当时的获取世界是具有正当性的，那就是获取世界的力量当时已经存在，而能力当中也都蕴藏着一个特殊的应当；在这样的情况下，那时的欧洲帝国除了沿着这种力量的道路前进，就根本无别的事情可做，这也是它们所具有的能力决定了的。相类似的，从美英对于伊拉克的武装干涉中也能看出：它们把自己扮演成地缘政治舞台上单纯的帝国主义地方武装队，从而证明自身的精神和力量。人们做他所做——为了把这句话给托尼·布莱尔——，“因为我们能做”。

当然，所有的旁观者，其中当然包括亲美人士，也意识到了，美国的军国主义自很久以来就已经决定了，它会在后

^① 我必须感谢吉勒斯·凯佩尔（Gilles Kepel）在这个问题上给我的提示。

历史时代看起来像个非常惹眼的昨日的寄生虫。它的本质和来源决定了，美国的军事力量就是“历史”的遗风，自 1916 年以来，美国就从某种程度上讲，如同一个拥有武装的主持人，被卷入其中。从他们自己的明星出发，美国人在不自由的灵魂在它们的战争的尘埃中翻滚的世界历史边缘画了一道有力的切线。后果则是，美国军队在欧洲以及世界其他地方参战后，成长为了一支强大的可怕的力量；在与苏联的竞争中，它实际上毫无控制地膨胀着，前后跨度达半个世纪之久，并以国防的名义，投入了不可估量的人力物力；最终，当“历史”形成了核竞争的均势时，它的发展才在一个无法逾越的水平上稍事停顿。

军备竞赛时代对于后历史阶段的学习循环意义在于，当人们回顾时，具有最高优先级的行动者相互的束缚成为世界政治最基本的显见之事。当元帅们也已经普遍认识到，进攻已经失去了历史时代武装强权的优先地位，作为历史机制的战争看起来对于后历史也已经成熟。如我们现在认识到的，核均势时代留下了一个有着双重意义的遗产，它黑暗的那一面今天在美国领导阶层看来已经重见光明，束缚的体验只是关涉到军事的层面，而在东西阵营对抗消失后，这种束缚也不复存在了。带着一种盲目性，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古代的英雄人物，美国的战略家以及他们的智囊们鉴于他们获得性的认识基本事实的能力缺失，忽略了相互构成了后现代的世界关系的行动模式，因为这不容置疑的建立在稠密、回馈以及——为了能用一个已经反复使用而疲劳不堪的字眼——联网之上。

自此，一个独一无二的诱惑在并不统一的西方世界中游荡——即是为了“唯一的世界强权”书写摆脱束缚的新的剧本。这意味着，知识分子的时代（参阅本书第11章，第97页）又一次的到来了？我们会再次经历，思想家们是如何加快速度的帮助那些愿意尝试进攻的人从幻想过渡到实践的脚步的事件吗？人们必须要做好思想准备，像布热津斯基（Brzezinski）、卡根（Kagan）、卡普兰（Kaplan）、鲁瓦克（Luttwak）、沃尔福威茨（Wolfowitz）、波德霍维茨（Podhoretz）、福山（Fukuyama）、莱斯（Rice）等咨询分析家和出版人能把他们涌向权力走廊比迄今为止已知的宏大政治做出更好的报告吗？实际上难道不是到处都是帝国主义的写手们在往前挤，意图占据新的语义市场的核心位置？

事实上，公共空间的重新意识形态化已经在前面展开，对于那些自封的所谓暴力专家来说，现在正值黄金时代。对于现实主义者来说也是如此，他们鼓吹着新的强硬，或者叫作重新回到过去现实政治的规则中去。这一刻，他们看起来似乎不像是学识的专家，而更像是伊斯兰世界的积极分子——并且他们在西方世界的阐释者，他们作为即将到来的暴力的释梦者意图让自己变得有用。^① 伊斯兰教徒对于美国重新历史化的意义在当下没有能够足够的评估出来。他们看

^① 这种症状最极端的情况，参阅保罗·贝尔曼（Paul Berman），《恐怖和自由主义》（*Terror und Liberalismus*），汉堡，2004。这本书中将汉娜·阿伦特时代就已经稍加解释的“极权主义”（*Totalitarismus*）概念再次提出，为了将当前伊斯兰教仇恨世界的图像和西方反现代主义做一个平行的对比；这是一个在一定程度上有意义的研究，然而贝尔曼对它的展开则在类比的建立上半途而废。

起来像是那些按时把“历史的呼唤”塞进总统的耳朵里面去的人——总统的耳朵，谁也没有料到会对敌人发出的召唤这么敏感与开放。来自中东的具有犯罪特征的新单边主义者是那些，比任何一个身边的智囊们都更加清楚地为西方权力中心的行动者提供摆脱由自身发起的单边行动的束缚的关键词。

渐渐地我们已经看到，美国的外交是怎样一步步的把美国式例外的矛盾展开在世人面前。它可以表述为众多意义上接近的表达：为了拯救美国梦，发出这些声音的行动者加速从这个梦里清醒过来；为了能够保持未逃避了历史的优先地位，政治上的领导人们要逐步地把这个国家重新带回到历史中去；为了能够保持在这个国家生存的容易，国家的领导团队要把它往困难重重的过度负担中引领；为了保持这个国家保持乐观态度的源泉，创造精神世界气候的人就要把它带到最黑暗的现实中去。

终极的矛盾以最清楚不过的方式在战争报导家和批评家罗伯特·D. 卡普兰的两本书中表达出来：《战士政治：为什么领导要求异教民族精神》（*Warrior Politics. Why Leadership Demands a Pagan Ethos*）（2002 年）和《无政府主义的到来——打碎后冷战时代的美国梦》（*The Coming Anarchy. Shattering the Dreams of the Post Cold War*）（1997/2001 年）。两本书的目的都在于让星条旗下的国家能够适应一个霍布斯主义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应该不按照文明世界的规则来行事，而是把人放逐到一个没有国家的空间中，放任撕咬。卡普兰则认为谁能在这样的一个场景中作为唯一的地

球上的怪兽巨蟒出现是毫无疑问的。

历史的移转在美国实施之时有着一切与这种典礼相关的排场和形式。该仪式的开启始于领土的零点，从这里开始，今后所有新历史行动的委托散发着光芒：2001年秋以来，就有了一座美国圣塚——归零地（Ground Zero），这是伊斯兰武装分子送给正在自我历史化的强权的一份礼物，而在这份礼物上正重新证明了美国的亚当式的力量，在实在之物上烙印上自己呼喊的名字。它不断继续着无辜、后现代和受害者伦理的中心角色的移转，没有它的话，新历史的剧本中不可能出现突然开火的情形——进攻将来必须是以受害者的名义发起的。它渐渐通过特殊情况的授权移转而变得完整，并且不是由把对于冲突过程中的对方称作敌人的政治统治者的声音发出来，而是由本体的统治者，他确定世界中敌对方的事实，并向他宣布展开不断的战争。

那么情况看起来就是完全再造（remake）“历史”的运动展开了。行动移转至美国——1945年，当欧洲辞职下野后的一个完结了的事实状况——还附加了一个激情的移转，它在“9·11”事件之后，在美国的旗帜上又表现出了一种新的颜色。自从潜在的超级行动者也可以把自己扮演成超越受害者起，动员整个国家一起建造所谓的“创造世界历史”已经不再面临任何阻力——除了这个国家自身的保持民主和逃避现实的传统。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只要它能被认识到，就可以用“后历史的复仇”（Rache der Nachgeschichte）的标题来概括。因为很大一部分剩下的民主世界的国家完全没有被历史

的强权所感染，相反它们离得远远的，好像要统一起来给地球上的最后的闪光的行动者增添难度。美国军队在伊拉克，从旁稍稍协助的英国、波兰、意大利还有一些其他的补位者当了服务生，因为新端上来的“历史”而分到了小费；几天后，当他们把萨达姆·侯赛因斗志全无的部队击溃后，全世界剩余的那一大堆非友邦则以新的意识来对待战争的行为，就好像他们通过这场演出才一下子弄明白了他们自己的价值一样。那些按其本质是同过去的后历史的美国一样的，并且自 1945 年以来，以直线的或是曲折的方式靠近彼时的美国。伊拉克战争的批评者们在反驳美国领导者时使用的并不是“反美主义”的声音——这是一种某些挑唆是非者惯用的表达，旨在把它理解成是另外一种和排犹主义（Anti-semitismus）相类似的东西，其用意不过是卖弄地表达矛盾的不得体。他们说，从他们的视角来看必须说的事情，不是出自一个不成熟的对差异性的兴趣，而是和后历史逻辑相一致，它从单边性的世界强权中能够看出对欧洲横行无忌的黄金时期的引用。而从多方面对于美国外交政策上的姿态有所保留的发出声音来看，不多不少，正是一个有涵养的反对单边主义的做法。在政治实践有着高度耦合性的场域中，这很久以来就表现为一种合作文化自然而然的模式——此外还包括，人们把必要的差异谨慎而小心地表现为“朋友间的批评”。此外，显而易见的还有，为什么与美国共存的盟友，对于国际社会的主张共同表示不满的以色列身上，也能感觉到很大一部分这种清楚呈现的单边行动精神。是不是要把它误解为“新排犹主义”，留待有兴趣的人自行判断。现

实中这种情况确实存在，以期将问题复杂化，尽管“排犹”这个政治种族主义、用来描述欧洲历史事件的概念对于以色列和周围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仇敌之间曾经以及今天的紧张局势就显得极不合适了。^①

但是为什么很多美国人，包括那些并不怀疑布什主义政策的人，会如此费力的从塞纳河一直到恒河的所有别人的对战争抱怀疑态度的声音中去重新发现原属于典型美国的东西？难道后历史生活的骑士不是正可以最好的和其他国家的新兵们更好的交谈吗？欢迎所有要放弃旧欧洲创造历史的负担的后来者，对于深谙此道的美国人来说不是最理所当然的反应吗？最成熟的后历史性文化，为什么会在政治层面上有意避开后历史世界最显而易见的东西：如交互作用，回到行动者的行动以及操作的系统反馈，甚至它是带着如此多的反感和藐视避开这些东西，这种藐视最明显的表达即是在美国对待联合国时——在美国人眼中，联合国不就是一个产生同声传译出来的麻痹的机器以及平庸的外交团体的温床吗？就算这些判断都是正确的，人们也必然会问：为什么政治上劳作不休的美国人会如此缺乏成为一个俱乐部成员的意志，毫

① 关于思想史上，伊斯兰教的排犹的历史传统，参阅让·拉加里埃（Jean Lacarrière）《东方和西方——冲突的起源》（*L' Orient et l' Occident. Les origines d' un conflit*）巴黎，2003；参阅多龙·拉宾诺维奇/乌尔里希·施佩克/纳坦·斯茨纳克编《新排犹主义？一个全球辩论》（*Neuer Antisemitismus? Eine globale Debatte*），法兰克福，2004；皮埃尔-安德烈·塔吉耶夫（Pierre - André Taguieff）《新犹太仇恨》（*La nouvelle judéophobie*），巴黎，2002——最后这本书尤为值得称道的是，把惯常使用的排犹主义（Antisemitismus）一词换成了犹太仇恨（Judenhaß）概念。

无阻力的接受像他们一样的会员？

对于这一系列问题道德的回答是，美国从对其自身的责任角度，把自己认同为世界上秩序政治的核心强权：这个大国当然也因此要不断发展它正义的单边主义力量，保持其阻止另外那些邪恶的、不遵教化的国家（带有各种各样红色标签的）的能力。而一个真实政治方面的回答却可能完全与之相反，美国不过是出于进攻性的地缘政治上的利益考量。在面对变得更加强大的全球玩家（global players）如中国、欧洲时，美国旨在地缘政治的棋盘上占据尽可能多的关键位置——此外当然也包括美国人乐见的土耳其进入欧盟，使欧洲形成死棋。接下来的心理政治（Noopolitik）——这是近来由网络战争专家阿奎拉（Arquilla）和龙菲尔德（Ronfeldt）共同提出的新理论——的解答则确定了，美国鉴于无法抑制其发展脚步的信息革命、动用其在理念和交际上的资源，用以行使其在 21 世纪心灵球面（Noosphäre）的领导地位。^① 最后，神话动力角度的答案则是从一般意义上美国梦的动机中解读出来：如果你把自己定义为一个美国梦的积极的承担者，那么就会不满于处在不是每个人想做某事，都能有足够的空间去施展他的全部所想的情境；他们显然完全对放弃已经无法消解地画到他们的身体和灵魂中的选择的印章表示不满；他们显然对接受情绪高涨的特权必须让位于感到抑郁的现实原因的事实感到不满。

^① 约翰·阿奎拉/戴维德·龙菲尔德：《通向美国信息战略心灵政治的兴起》（*The Emergence of Noopolitik. Towards an American Information Strategy*），圣莫尼卡，1999。

美国从历史中脱离出来付出的代价渐渐可以计算出来：为了在 200 多年前就能进入后历史时期，脱离主义者输出并保留了旧欧洲的主体形成，这到现在就阻止它对于已经普遍化的后历史性的学习。后历史的例外情况加上强大的行动者地位的结合等待着有朝一日的爆炸，最晚发生在美国潜力的剩余动力无法在国内的项目（以及在好莱坞剧本的英雄文化中^①）中全部得以发泄掉的时候。从那一刻开始，行动待命的行动者们就已经对真正的“历史”提出了反挑战，并且特别是“9·11”事件以来，美国人的心理已经完全无力遏制复仇的精神。尽管最迟自越战的失败以来，很多美国公民开始思考，他们的梦想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威胁——有的人通过外部世界的奔跑，而不少于前者的人则通过美国试验的内部通道——，但只有少数人今天还愿意继续走这条曾经在输掉了那场在东亚的非正义的战争后，把整个国家带入一个自我怀疑和重新思考的状态中去的道路。

1968 年之后，美国的第一次重新历史化贴上了失望、自怜的抑郁以及对在东亚犯下的战争罪行的自我批评的符号；那个时候，人们需要面对的事实是，这个国家失去了善良的特权地位。第一次重新回归历史（当然也同时是回到了丑恶）则是在来自德国及法国的过度的文化批评模式的帮助下完成的，并且过渡到了一个作为“自下而来的历史”

^① 参阅博里斯·格罗伊斯《等待大蚂蚁》。

而宣传的有着伦理和受害者特性的崇拜。^① 这时，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作为社会批评现成的东西（Ready-made），起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向我们展示了，批评是多么容易变成俗套（Kitsch）。因为当俗套在艺术体系中，作为宏大感觉的一条捷径存在，于是批判性的俗套变成通向愤怒的一条捷径。它会把善良思索之于邪恶现实的优越转变成一种批量生产的产品。当然顺便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美国必然要有这样的一个市场存在。

慢慢的，这个市场已经如此饱和，以至于无论是施虐性螺旋继续转动，还是额外的使已经过渡存在的对“体系”的怀疑更加激进，都不能再收获道德上的收益。^② 相反，自老布什时代开始的，美国的第二次重新历史化则在风格上表现出一种狂躁式的复辟。如同理所当然一样，这是一种上面的“历史”，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最上面的。如果说当前的“历史”直接从最高的来源处流淌出来，那么它必须是由某个备受上帝青睐的民族做出的显示它存在的行动。引导这个民族的人与新教的耶稣会士（参阅本书第 11 章，第 90 页及其后）具有很强的可比性，他们已经找到了自我摆脱束缚的最有效的策略。同样，这次回归历史的过程中也有一种俗套涌现出来，这次是作为政治神学上现成的东西。

① 关于对美国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意识形态的民族中心主义的尖锐的自由保守主义批评，参阅亚瑟·M. 施莱辛格《美国的失合》，同上；从左翼激进的视角看来不输尖锐的批评：林塞·沃特斯（Lindsay Waters），《不可比性的时代》（The Age of Incommensurability），载《边界 2》（boundary 2），第 28 期，2001 年，第 133~172 页。

② 参阅保罗·曼（Paul Mann）《施虐批评》，纽约，1999。

1993年，爱德华·N·鲁瓦克出版了一本带有纲领性标题的书——《受到威胁的美国梦——如何阻止美国沦为第三世界国家及如何赢得工业至高无上权力的地缘经济战》（*The Endangered American Dream. How to Stop the United States to Become a Third World Country and How to Win the Geo - Economic Struggle for Industrial Supremacy*）——这本书由一个市侩而又带有爱国主义施虐倾向的出版社，在一个合适的时机，作为人们恐惧体验的疗伤之作出版，因而备受这个面临衰落威胁的民族欢迎。此前，鲁瓦克已经成为当前同时代的最著名的策略科学的学者，而在此之后，他就以借助于自己异乎寻常的竞争社会学理论重新表述美国的精英律令，而成了这个国家潜在的政治神学聪明的注释者。作为全球发展趋势的观察家，鲁瓦克当然也认识到，美国作为一种例外情况，从长远上看是不能维系下去的；但是作为一个例外主义者，对于他以及他绝大多数的美国同胞来说，想要不加抵抗地接受这个事实是不可能的。鲁瓦克的干涉将两个要素结合成了一个“空想”的视角。在第一阶段，他提出了很多美国“颓废”的警告标志：日本和欧洲的国民经济已经早就慢慢追平了美国二战后的领先地位；全国范围的公立教育的体系一直以来处于落后地位；中产阶级自里根时代以来就饱受经济和文化的乏力之苦；资本主义缺乏货币，变得名不副实；大街上，光天化日之下，毒品贩子就能在华盛顿政府区附近活动；还不要忘了：在日本工作的美国妓女一段时间以来无权加收“美国姑娘附加费”：当一颗国家明星坠落的时候，那么它的肉体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也会相应贬值。

鉴于上述这些迹象，鲁瓦克试图挽回美国径直衰落成为一个无足轻重的国家的趋势。其他的评论家认为美国可能只是会衰落成为一个较为普通的国家，虽然还非常富裕，但仍然面临着很多问题的困扰，鲁瓦克却指出他的国家会堕落得一无是处，并且第三世界国家这个说法在读者的耳朵里听起来足够有自杀性，可以展示出美国绝对不可以变成那个样子。对于上帝青睐有加的民族来说，一定要拒绝平庸。因此，作者在第二步当中推荐了一个行动的纲领，用以动员迫在眉睫的地缘经济世界大战。通过这场战争，美国能够重新回到世界第一的位子上去——为了今后在成功的高处引入对于自身条件的军力裁减。

鲁瓦克这本具有典型症状的书透露出一个事实，即美国意识形态学者们并不阐释他们国家的梦，而是想拯救美国梦，然而却面临着不把它引入相反方向就无法拯救的窘境。在这个过程中，美国一直以来的争取国家灵魂的斗争项目表述行为的情绪状态，掉转成为一个可怕的，自我催眠的朝向新纳粹和极端自恋的目标的行动纲领。在美国的“美杜莎之筏”上，那批抑郁的人的存在一直都是简单的被否认掉的（参阅本书第 14 章，第 126 页）。按清教徒的规定，在这个国家是没有失败者的，有的只是那些陷入了自怜的人。不管怎么样，鲁瓦克在讲述美国梦的构成时矢口指出了美国爆炸性增长的毒品问题——单单是在主要城市就有 25000 名专业的或是业余从事贩毒的人员，并以此养活自己；他们的客户当然不是伍德斯托克一代人的子女，而是那些有着很强挫败感的大军，他们借助化学药品的作用来寻求对于美国现

实状况的解脱。

心理政治上的做假账，以此来支撑整个体系，首先就是要让人看不见社会上数量惊人的失败者。在一个追求幸福的活动空间里面，这个数字必须越小越好。尽管如此，这个数字还是如此显而易见，以至于一些欣赏美国的人士也无法忽视这个问题。在美国有比全部伊拉克人还多的毫无前途可言的穷人，有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的长期服用心理治疗药物的患者，有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多的体重超重的人^①，在这里还有比其他任何民主国家都多的未被代表的团体和没有选举资格的人，按人口比例，这里关押的刑事罪犯是欧洲的十倍，是其他国家的六至八倍。然而这一系列问题都与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有关，他们总是借助于用隐瞒抑郁情绪以及内心做假账的方法精心构筑起的体系来保持自己的地位。他们还回避向在这个国家的每个运气较差的寻求幸福的人脚下裂开的深渊里张望。从中飘出一阵熟悉的旋律，它的歌词需要仔细听才能听出来。听明白之后，就会让人有些不寒而栗：如果我不能在那里做成，我就不会在任何别的地方做。

然而，如果我们不能适当的对美国例外予以评价，那么美国自 1918 年以来在世界政坛上所扮演的角色也无法厘清。

① 关于这个还有个独一无二的肥胖论争，甚至一个深刻的肥胖阐释学给出了鉴定；参阅耶德迪亚·普尔迪（Jedediah Purdy）《每个人都是国王——美国人都肥胖，他们的政治有问题，这里面有关联》，载《时代》2004 年第 44 期，第 44 页。

在当前的语境下，人们越发明确了，世界政治这个表述并不意味着所谓的国际关系的一个维度。它是秩序政治任务的总体，和管理宏大温室的工作密切相连。因此，世界政治就是对水晶宫的管理——包括一切的警察、守卫和废物处理措施。当美国在其外交功能方面如此频繁地被冠以世界警察的名号，也是出于一个非常简单的原因，因为不可否认的是，现代的霸主的任务确实落在了美国人肩上：他们接受了这个角色，并且保障了舒适空间运行的整个政治和军事的框架条件。人们可以把这些努力在道义上的前提称为一种自我超越的个人主义：这建立在一个经常可以被证实的推测之上，即对于美国来说好的东西，对于其他大西洋乃至非大西洋伙伴国家同样有益。1945 年以来，西欧持续的亲美思潮是有着其实的原因的。无论如何，当前的世界体系——正如人们所见，还完全不是一个没有外部的球面——还是由建立在民族国家基础上或多或少的自由市场经济组合而成，而这个网络结构的外部边界到处有美国军队存在的身影。

如果了解了这个情况，那么经济优先的自由主义论点就处在变化了的光线下面：确实在资本主义的世界内部空间中必须以经济的事实优先的出发点——但是这些事实究其自身却总有着世界政治，确切地说是地缘政治的特性，因为如果没有资源供应的保障和外部皮肤的管理，宏大温室不可能很好的运行。美国外交的军国主义风格（特别是在能源政策上军国主义日益增长）因此必须放到整个西方消费结构的秩序政治要素来看待。在这样的观点下，从布什主义引发的大西洋共同体的分裂就有了很重要的文明政治的意义，因为

资本的内部

欧洲国家需要证明，他们是不是能从默默地分享美国强权政治带来的现状中将自己解放出来，而又不至于让自己重新走上军国主义化的道路，以谋求与能源和原材料供应国建立关系。

第 40 章

不可压缩或膨胀的再次发现

再一次：析出的世界体系中一切都处在运动之中。无论看向哪里，宏大的舒适结构中所有以及每个人都处在持续的动员召唤中。变化和运动的东西中没有什么还能够具有“历史”的质量。对于被称为“世界历史”的事件和叙述综合体的唯一补遗，有可能存在于世界气候备忘录、相应的世界能源惯例以及成为世界环境警察之中——这是一些空白，它们现在的实施只是作为一个遥远的选项而存在，因为美国以及其他的那些消费大国觉得自己过于强大，以至于不愿意放弃过高的环境消费的特权。

在人的空间体验方面，大地全球化对于欧洲国家的居民来说其主要后果在于世界一下子变大了，同时伴随着面对着无法居住的广袤海洋的恐惧。在前文中，我们也曾经指出过绝大多数近代欧洲人矛盾的反海洋的基本情绪——哲学上到达康德主张的顶点，物必须指向人们的，特别是这位取得了终生教席的哲学家的认知机制。接下来，海德格尔提出了影响很大的地方主义（Regionalismus），在这种观点看来，生活在港口城市或者直接生活在船上是一种充满歧途的生活。精神上对海洋开放，长期以来只是一种少数人才具有的心态，在海岸城市的亚文化，内陆地区则只在饱受渴望远方苦痛折磨的梦想者以及发现者回忆录的读者们当中，这种心态才真正能够找到它的家园。慢慢的，整个近代蔓延开来的，海上泡沫和脚踏实地的对立已经几乎完全失去了它的意义。人们究竟是更多地感受海上还是陆地，快速的媒体给视阈带来了新的规格。

现代和后现代之间的切口可以从生活在舒适空间中的人的空间感觉中展现出来。新闻的无处不在也导致了，无数人体验的过去很宽广的地球成了今天的一个肮脏的小球。没有生活在电视机之前的人，不知道在突破边界的世界中生活的甜蜜。真实的近代的感觉，它在世界各地一直维系到 20 世纪 30 年代，是以慢速媒体为前提的。只有远洋船只、地球仪和游记文学有能力给由敬畏和好奇混合而成的东西一个形式。无论是出海航行的人，还是在陆地上阅读的人，都可以用它来对地球上新开发出来的维度做出回答。同时，由于航海时代交通速度较慢，距离也因此可以保有其尊严。漫长的

道路使得通向陌生之途需要人们付出相当大的代价；异域的面纱还遮蔽在待发现的世界之上。关于世界的一手知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众旅游业兴起之前，都是一种非常昂贵、罕见且具有诱惑性的东西。别忘了，奥赛罗就是因为会讲关于他外出旅行的故事，才赢得了苔丝·狄蒙娜的芳心。^①

这一切都因为 20 世纪的速度科技而成了无关紧要的回忆。电话网络、无线电波通信和喷汽式飞机等只用了不到两代人的时间，就使得人们对于长距离的克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而空间似乎成了一个无足轻重的维度。因为空间已经无法给快速的交通手段制造什么值得一提的困难，所以它看起来构成了从自身迎合缩小、压缩和宣布无效的基本范围。鉴于资产阶级时代的“革命”功绩，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48 年《共产党宣言》第二著名的地方写道：“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于是 20 世纪的感觉加入进来：一切膨胀的和要求占据空间的东西都被压缩到了一个最小的、迟缓的匣子中。越洋电话是最显而易见的表现。如果谁想见证一个空间消失的神奇，只需要试着拿起听筒，或者试着点几下鼠标即可。

当下的“空间革命”，卡尔·施密特还曾属意在他的《陆地和海洋——历史世界的观察》中将陆地和海洋变得苍白无力的世界历史角色归因于此，^② 然而实际上，它的主题

① 参阅彼德·斯洛特戴克《百慕大的露水》，第 27~40 页。

② 卡尔·施密特：《陆地和海洋——历史世界的观察》（1942），斯图加特，1993，第 105 页。

却是空间的压缩。它真正带来的是距离的中立化。它扬弃了间隙分隔的作用，它把从这里到那里的路程缩减到一个不能再压缩的地步。最后残存下来的空间可能会变得令人生厌，它无法再要求足够的重视和尊重。尽管现代人仍然没有能够拥有相传中世纪时圣徒的分身两地的能力，但是，跨越空间对他们来说已经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虽然他们不能分身，同时处在两个地方，但是却可以直接地依次处在任意多的地方。

鉴于这样的情况，空间看起来变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的维度。作为距离和阻碍的空间在实践中也被克服了，在理论上作为主宰维度也被唾弃，作为交通和通信的载体则成为沉默的背景，从意识形态批评角度，空间曾经是作为事物化的所在地也声名狼藉。当追求速度的时候，只有一个死了的空间才是一个好的空间；它的第一美德就在于有能力把自己变得毫无感情。为了快速的过程，它必须放弃一切传统上本体的东西：引发谨慎的相邻，撒落微小颗粒，分开身体，定位主体，为膨胀之物提供边界，为聚集形成阻碍，限制爆炸范围，将多元集中成统一体。空间经典的特质所能保留下来的只有它的传导能力：更确切地说，就是传导性—连接性—媒体性三者的结合，没有这一点的话，现代性试图通过压缩来克服空间的努力将无任何有意义的结果。取代被人们称为自然的距离、分隔和定位的空间的是集会、连接和密集的空间，它以技术世界的形式包围在我们周围。在这个情况下，遥远之物便可任意地以实体或是图像的形式从远处引用到这里和当下来。显示器显示了对于当下空间性的一些操作：人

们呼叫、操纵、组合、保障、删除。应该归功于全球的联网，无数的点就变成了地球表面无数个阅览室。前提在于，读物是海德格尔想要揭示的：这里—现在—我们—真理的集散地（Hier - Jetzt - Wir - Wahrheitssammelstelle）中存在符号的整合。如我们所知，海德格尔执拗地认为，对于存在的宏大研究，只存在着两个确实可信的世界阅览室：一个是在前苏格拉底时代的智者那里（或者是亚里士多德），另外一个则是在弗赖堡的托特瑙山（Todtnauberg）。我们当然高兴地在这里表示，不仅在这一点上，海德格尔的观点无人继承，而且他关于语言才是最关键的收集者的哲学观也没有得到当下多媒体时代的证据的支持。

现代的空间压缩（又称“空间革命”）继续着一个文化史上的重要切入点，这是在古希腊时，人们在中东的辅音文字的基础上添加进了元音时产生的。麦克卢汉（McLuhan）、古迪（Goody）、哈夫洛克（Havelock）以及其他一些学者都认为，单就希腊文字这个事件本身就可以发展出古代欧洲人文主义的读者主体性（Leser - Subjektivität），它的重要标志在于“与文本相处”的能力，即能够不依赖于情境而理解含义的能力。^① 希腊诗歌和散文表现出了一个除此之外可能隐形存在的人类的智力能力，即在当人物、事情和关系不在场的情况下抽象的想象能力。由于文字的记录，智能从被强制停留在现场（In - situ - Aufenthalt）解放出来。它导致

^① 参阅德里克·德克霍夫（Derrick de Kerckhove）/克洛德·德·沃斯（Claude de Vos）《识字的人》（*Le monde de l'alphabet*），手稿，2004。

的结果是：要想从认知上把握一个情境，人们不必再作为一个参与者潜入情境中，并与之融合，而只需要阅读对它的描写——同时，我身处何地，以及我有想做什么的联想与之无关。自文字切入之后，处在世界之中就鲜明地分裂成了经历过的和想象出的情境——更确切地说，由于有了文字，想象的情境打破了处在情境中方可理解的垄断。随着希腊文字的出现，存在去语境化的冒险经历也开始了。它的意义显而易见，只要看到 19 世纪媒体转向时，所有的欧洲强势文化，除了音乐和美术艺术以外，都是文字文化，其实就是对于不在场之物的模拟，即使是音乐和图形艺术也都和书写系统密切相关。与之相适应的还有来自官僚主义和帝国的叙事小说精神的政治。

古代欧洲的文字传统属于现代空间压缩的前历史阶段，因为它实现了文本对于语境的起义，即意义从活生生的情境中剥离出来。只要不断地践行着去语境化的思考方式（通常情况下这个被叫做阅读），人们就能把智识从真实的局面的强制中解放出来，从而开启不处在现场的世界（Nicht - in - situ - Welten）的无边无际的广度。文字传统产生出理论的人——尼采以苏格拉底为例专门批判过。作为这种传统的代表人物，是个强大的观众，这个绝对的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原则上是身处别处。甚至是在死亡的时候，这位智者的举止都仿佛他曾经在什么地方阅读过这个场景；是的，苏格拉底甚至说，在他活着的时候，就已经去过了死神将会把他带去的地方，另外的观众席，永恒形式的场所，不朽字母的家

乡。苏格拉底可以成为欧洲真正的智慧英雄，因为他穷其一生在不懈地拒绝在场之物的权威；他首先拒绝苛求人们深信不疑的潜进雄辩家、政客和夸夸其谈者操纵的情境之中。他是智慧和洞察力的重要证人，而这种智慧让人们从既定的环境中“走出来”，为了能使自身在理念的关系当中重新语境化。这种双重操作——智慧和当下情境的断裂加上再进驻理想情境当中——自柏拉图以后，便被称为哲学。它留下痕迹的地方，人们必须要区分开阅读的和参与的生活关系。^①

这个最伟大的欧洲解放运动的成就，人们可以从古典时代就出现了反智主义复辟的现象中看出，它反对在被真实的联系清空的想象空间中飘浮的所谓虚假自由。耶稣和法利塞人的冲突就属于这种亲身经历对阅读经历的反动，类似的还有特拉克的妇人对于心不在焉的哲学家——来自米利都的泰勒斯的嘲笑。自斯多葛学派以来，古代智者学说纷纷表达了重新嵌入亲身经历中去的愿望，尽管人们还是以特有的哲学高傲地宣讲着生活世界和宇宙的统一。第欧根尼是重新回到可被表现之物（das Verkörperbare）中怪异的代表。

人们可以把这种倾向说成是“在现场原则”（In-situ-Prinzip）的第一次重新占领——它表达了参与意义对于（人们认为的或是实际如此的）过分强调阅读性和观察性智慧

① 参阅埃特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致胡果·冯·霍夫曼斯塔（Hugo von Hofmannsthal）1907年1月12日的信：召唤建立在共同的对“纯粹审美”的看和“纯粹哲学”的精神状态（纯粹，rein这个词在三页纸内重复出现了13次）激情以及共同对于在纯粹生活中拘束的排斥的基础上，艺术和现象学的结盟。

与参与到情境之中相脱离的抗议。因此，第欧根尼、耶稣还有特拉克的妇人都是精确语义上讲的反动者，至少从那些把阅读放到比生活更重要的位置上的人看来是如此。这三者，还包括斯多葛派以及伊壁鸠鲁派，都会对标上的这张标签表示满意——至少他们会为了表明立场而提出这样的主张：想要基础的自我冲动不停息，生活中就必须时不时地存在着反动：单纯的反对使形状发生变化的强制力，单纯的对不合适的压缩进行反抗。用妇人的语言来说就是：人们不能总逆来顺受；而放在韵文里就是：若不抗拒，生活便是个错误。

自此，这样的“反动的”动力就以多样的烙印在各个时代中漫游；在早期社会主义者、情境主义者、社群主义者以及集体治疗者那里重新涌现出来。它的回响也存在于活力论者对于周围理论化的旁观者的批评中。而它的最高级别应该是在麦克卢汉对于听觉文化的赞扬中表现出来的。麦克卢汉认为，听觉文化还给了整体的，非线性的感知方式自欧洲书写文化以来瓦解了的权利。对此，莫里斯·布朗肖则以书本浪漫主义的论点回应到：文学本身就蕴藏着发展成为“总体经验”的潜力。这个见解以及荒诞显现出来：一方面他盛赞阅读是总体的吸收力量，同时，他又借此来忘却，阅读的本质就是要消解亲身经历情境的极权。^①

另外一个与之相当的修改运动则发生在当下的有关被忽

^① 莫里斯·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未来之书》（*Le livre à venir*），巴黎，1959。

视的空间方面的思想中。回到语境中，现在在多种关于“嵌入”的反思中以一种被动的团结表现出来。当距离看起来只是为了被克服而存在在那里的时候；当国家文化的存在仅仅是为了和其他的传统相融合的时候；当地球表面所有的地方只是作为地图和航拍优雅的结果不能移动的对应物的时候；自从空间成为两个电子的工作场所之间的虚无的时候——就完全可以预料到对这种去实在化（Entwirklichung）的反抗将会走上什么样的方向：在场文化（Präsenzkultur）或早或晚地会在想象和回忆文化面前更加强烈的表达自身的效力。膨胀的体验也会尽可能的抵抗压缩、缩减和掠过效应。如同去语境化的意义“在最终权力等级上”一直以来总是依赖于嵌入某个不可逾越的情境，而使得自身不至完全在抽象中消释一样，压缩了的空间也必须同自然生发的膨胀体验耦合起来，以免在二级的过程中完全消失。上述事实在当下，被那些用对地区的回忆来与普遍性和远程机器去语境化的倾向对峙的人一眼洞穿。

新的空间思考是对缩水了的世界发动的起义。对慢（Langsamkeit）的重新发现和对于局部地点的膨胀同时出现。当我们突然停止把我们自己的存在按照 1 比 10 万或者 1 比 1000 万的比例缩小，如果我们突然要学着再在地图上阅读膨胀了的生活，^① 当我们从对时间的膜拜中回归到对地点的偏爱感觉，会发生什么呢？简言之，如果现在又到

① 参阅卡尔·施略格（Karl Schlögel）《我们在空间中阅读时间——关于文明史和地缘政治》，慕尼黑/维也纳，2003。这是一本关于新的地理文化以及历史的存在地形描绘学的核心著作。

了把无耻的商贩从寺庙中驱赶出去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呢？

修改运动看起来能有多么具有说服力：我们能够确定，在抽取走所有的商贩以后去听地点发出的纯粹的声音吗？再次强调地方性有着其狡诈的特点，因为“地方的”（*lokal*）这个词是那些选择了全球化为其专业领域的记者和社会学家们在玩文字游戏时最容易误解的一个词汇。“反动的”空间思考也声称已经学习了。通常情况下，“地方”这个词汇是作为“全球”（*global*）或者“全部”（*universal*）的反义词来使用的——同时，地方和全球这对词汇是和同一个均质以及连续的空间相联系的。均质空间是由各个点之间的等值能力以及借助于直接的线条形成的联结性决定的。

由于这种空间的概念，可以推出这样的论点：“全世界是个没有墙的‘地方’”^①——这是一个时常能够涌进我们耳朵的话语，但却错得不能再错了。它能赢得好感，因为它把世界定义为各个地区的累加——那么就不再具有普遍性，而只有地区间的关系。它还具有典型征候，因为它表达了无助的常识判断力，人们总是在全球时代中存在的空间状态被提及的时候遇到它。它还是幼稚的，因为它给不可能的地方强加对称性，而又在没有墙的地方试图拆毁墙。由世界社会学家罗兰特·罗伯森提出的杂合概念，全球地方、使全球地方

① 原文为：“The universal is the local without walls.” 米格·托伽（Miguel Torga）：《世界的创造》（*The Creation of the World*），转引自 T. N. 哈珀（T. N. Harper）《1850～1914 年全球主义的帝国、离散和语言》，载 A. G. 霍普金斯主编《全球化和世界历史》，伦敦，2002，第 141 页。

化、全球地方化 (glocal glxalize glocalization) 也是同一种做派^①，它也反射出了常见的、存在于全球化话语中的误解。

简短地说，谬误在于，把地方和全球之间的关系比作点和场之间的关系。如果真是这样，地方就不可避免地被理解成好像它们和全球是同类一样，然而居住在各个地区的人们通常并不乐见于此。地方就好像是一个均匀的空间栏杆上的一个污点一样。我们设想一个阿尔卑斯山山脚下闭塞的小村镇，而一家跨国公司想在这里开设一个分支机构：当经理向这里的当地人解释，他们为什么要到这里来，然而当地人承认，允许陌生人和自己打交道并无坏处——于是一段时间以后就可能出现了我们 (Uns) 和那里的那些人 (Denen - da) 之间的联盟，随即，宏大在渺小之中，就如同反过来渺小在宏大中一样。总是以之为前提的是未被证明之事：陌生人和当地居民之间的关系发生在一个均质的地点空间中，并且原则上其位置是可逆的。

事实上，“地方”的意义在于再次强调的非对称性连同其一切推论。这是一个有着一定影响范围的精神事件，因为随着对于某个地点的强调，申明了一种关于不可压缩或者不可缩减性的语言。强调“地方”就是承认在自身中膨胀出来的本属权利，尽管存在着不断进步的去语境化、压缩以及

① 参阅罗兰特·罗伯森 (Roland Robertson), 《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同上，第193页。按照罗伯森的说法，全球地方化 (Glocalization) 这个词是仿照日语词“dochakuka” (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译者注) 而造，它试图近似地再现日本产品在世界市场要能够适应各个地方具体的社会关系的思想。

空间的测绘和中性化。

有了地方主义，就可以说，人们以空间分析的方式重新表述了存在主义。那么它就能足够清楚地说存在意味着一种能够自我空间化的力量。它学着详细地阐述，确定性通过嵌入关系在事实上一直以来都是个不可空置的量。这样就产生了一个关于参与、定位以及定居的普遍逻辑——我们再次指出如下事实：当代艺术随着向装配的转向，已经在这方面比哲学的分析做出了很大的优势。^① 以这个方面就很明确地表达了，没有哪种生活是不参与到未经缩减的膨胀、绑定以及着迷当中的——除非，嵌入的能力被精神变态消磨殆尽或是由于不断的逃避而被破坏掉——但是精神变态不正是一种野蛮的建设，而逃避从某种角度上说不也是构建空间的吗？作为本属特征的世界条件——20世纪重要的空间概念思想家们都说明了——，总是和一个构建内部的行动，一个消除距离的实践（在海德格尔的意义上）和一个使安静平和的培植（在施密茨的意义上）联系在一起。^② 在有居住行为发生的地方，物品、共生生物以及人都被纳入一个地方的团结体系中去了。居住草拟了较长时间忠诚于地点的实践活动——特别明显地能从那些经常被引用来证明不忠诚于某个地点，但实际上是被误读了的游牧民族，他们往往会以较长的时间间隔重复回到同样的地方。居住创造了一个由重复动作而组

① 参阅《球面学Ⅲ—泡沫》，第523页及其后。

② 参阅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105页及其后；参阅赫尔曼·施密茨《哲学系统》，空间—第四部分，第218页，波恩，1995，第258~308页。

成的免疫系统；在成功的习惯化的帮助下，该系统通过清楚的任务，将减轻负担和增加负担很好的联系在一起。

因此，定居下来是非对称性之母。也许，社会哲学家们的见解是正确的，当他们教导说，人是要借助于学习接受他人的角色才能“社会化”；所指的当然不是接受他人的居住。他人的外壳之中的位置既不能被偷走，也无法租住。定居因此就显然是一个，我只能在我自己这里，而他人也只能在他自己那里从事的事情。本体上说，位置不能弄错，就像我们的身体两边左手和右手不能弄混一样。当然必要时，我们也可以决定居住共同体（*synoikismós*）或是共同生活在一个共同的围墙之内（*koínos bíos*）的生活方式——这样，就会产生一个新的分配劳动成果的机制，按其量和争执，又会将另外的一些他人排斥在外。在这种情况下，有可能更高级的居住共同体又会把另外的他人再次纳入其体系之中——这样的综合体在超越了一定的量之后，就只能是一些法理意义上的人物以及修辞意义上的地址。

基本的大厅团结（*Foyer - Solidarität*），如果我们可以这样称呼它的话，是说“我们”的能力的最根本的层面——这个复数第一人称的代词并不是一个团体对象的描述，而是从表述行为上诱发起的一个由自我激发和自我空间化建立起来的集体。它并不排斥基于移情将未在场的他者纳入其中的跨地方的团结感——基督教教会，当他们还未就最终的解脱达成一致的时候，包括比如佛教的僧侣，两者很好地证明了，爱作为离散居住状态下的一种远程关注和联系能够构成一种独特类型的物质存在。当然，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投射式

的团结现象，它往往以一种远程的感伤情绪，一种符合时代的歇斯底里的变体披着“我们的外衣”（Wir - Kostüm）表现出来。这种情况首先经常出现在向水晶宫中的居民们展示外部发生的各种灾难时。

定居者对于他居住的地方以及周围的世界，不会表现得像一个绘图学家或是一个土地测量师。当一个地球测绘员回到家里的时候，他就结束了测量和按比例缩小的工作，他会把自己按一比一的比例投射成为一个居住者。定居是被动地投身于自我的情境中，是一种遭受和共同产生它模糊的却又是不可混淆的膨胀；它意味着和谁站在一边以及看到自己被纳入地区的神圣地域当中。这既不是按比例缩小，也不是按一定标尺来扩展。

嵌入情境的膨胀，人们马上就能理解，是可持续性的自然的共犯。从它当中可以派生出整个农业，而这如果没有在同一个事情上的重复和坚持是不可能完成的。人们当然可以搬家，然后在另外的地方重起炉灶，人们也可以离婚再结婚，人们可以离开故乡，然后寻找新的居住地——现代的人们比古代人更加频繁地从事着这些事情。然而在新的情境中，原有的那些社会关系还是会重新出现；任何人在一个特定的地方站稳了脚跟就会因为当地的谐振效应而不断的膨胀出来。荷尔德林凭直觉就用最清楚的话表达出了“在情境中原则”：“丰功伟绩，人诗意地居住在大地上”；现象学家梅洛庞蒂指出个体的存在与其自身无比巨大的世界之间的联

系时说：“身体并不是存在于空间中，它是其固有”^①；海德格尔就这个话题则在他的分析“处在世界之中”时说了一句在所有可能的表述中最普遍的话语：“在此在之中有一种求近的本质倾向。”^② 这些论点最终都聚集到了一个空间理论的视角上来：它们共同说出，作为占据了一定象征和实体体积的此在，意味着在不可压缩性当中的逗留。人们甚至还可以说，此在和自我膨胀会聚到了一起。居住隐含了一个“即兴诗”（*Gelegenheitsdichtung*）原则。它意味着：即使是一个经常搬家的人，也不得不在迁徙的过程中去培养一种居住的特质。对于经常旅行的人，心理学家观察过他们的行为模式，它大概可以被称为“移动的茧”；这种模式可以在前面提到的游牧民族身上找到，因为他们——如果我们想表达得更优美一些的话——是在旅行中安家，或者说得不那么美好的话，他们是在去领土化当中对自身重新领土化。^③ 这是一种新的解释方法，它指出了，人们一贯认为的，最具灵活性的游牧民族的文化其实构成了人类社会进化史上出现过的最保守的、最“爱待在家里的”、最封闭的体系。

① 梅洛庞蒂：《感知现象学》，第169页及其后。

② 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105页。

③ 吉尔·德勒兹/弗里克斯·伽塔利：《一千个柏拉图》，第525页。

第 41 章

赞赏非对称性

所以说，虽然夸张地说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这句话是正确的，但事实上，却是错误的。资本的动员必须丢下使反抗消解的力量不管。它不能够简单地通过境外汇款的方式来兑换地方文化，它可以作为修改生成的过程，但不能代替。另外也不正确的是，一切膨胀了的东西并没有因为压缩而消失。马克斯和恩格斯以及近来执空间消失理论的诡辩家们的论点不过证明了，资本主义世界变得越来越稠密的事实被过多地用一种高傲的夸张手法反映出来，对此，我们不能指望着它们可以长久地保有其在审美以及伦理

上的可接受性。“全球化”除了其在事实上有可能是的一切东西之外，还是一个惯用语，它吸引着成群的平民主义的鬼火——它是个有关世界发展进程所有不靠谱的言论的收集处。除了它本身复杂的真实运行之外，全球化还为家庭或者国家的使用创造了一个建立在简化性的幻想和恐慌上的上层建筑——绝大多数是飞行梦想组成的社会学的愿景，恐慌的、令人不安的关于失去就业机会、自身重力或是地方认同性的图景。全球化带来了本土提供的能力的贬值，宣告入侵和过渡异化，但提到的最多的还是被迫要和看不见的对手竞争，他们没有任何束缚，而且总能以更便宜的价格把业务做得更好——就像那些来自匈牙利或者波兰的“不要脸”的牙医们，为西欧人换牙只收平常价格的二分之一。

政治出版商们，当他们为眼前这个时机带来的好处而喜悦时，正让风筝飞过公众的头顶，而人们也会在一段时间内被它吸引，认真注视。只要我们把惯常的幻象和夸张放回到实际的尺寸来观察，就会呈现出一些说着另外一种语言的结构和过程。在神志不清的“全球化”中，大多数的业务、工作和交易不可避免的还是地方性的，不仅仅在电话通话中，市内电话远远多于长途，即使是在经济交易中，也是地方的和邻国之间的交易占主导，尽管现在不必是一种面对面的交易形式。就算是德国的出口贸易，在全世界无论是总量还是占国民经济比例都非常可观，它主要的业务还是欧盟内部的贸易伙伴，而其中最密切的还是法国和荷兰等几个邻国，尽管实物的远程贸易非常巨大，如巨型的油轮和大型集装箱货船。不提在货币市场上的投机，绝大多数的实物交易

买卖中所有人的变更都发生在一个延伸了的每周市场，而在很多行业中所谓的竞争的说法，不过是些谣言。内需始终是真实经济的灵魂；举个著名的例子，比如美国的汽车工业，很长时间以来也不做更多的努力去扩大国际市场的销路。多数法国人现在也基本上喜欢在本国南部度假，无论他们是主权主义者还是大西洋主义者，也无关他们是说全世界化（mondialisation）还是全球化（globalization）。

上述提到的经济领域的事实情况显然只是间接地触及了地方主义的意义，因为地方的形成最具决定性的维度还根本没有涉及，比如关于地区市场和世界市场，村庄和大城市之间的对立。生活过的膨胀不是人们可以出手转让的产品，既不能在邻近的地方，也不能在远洋。而且，城市与农村的对立对于处在地点（Sein - am - Ort）的存在拓扑学阐释也只有非常间接的作用。为了能让读者最贴近非对称性的最强有力的事件，我们可以举繁衍的例子，这是一个人们无法拒绝作为谓词的“地方”的过程。这一过程处于一种特殊的空间法则之下，肇始于母体的浑圆，而这种法则无论是全球化的反对者还是所谓的新自由主义者们的主张中都没有能够足够的重视起来。这种无意识的、入侵性的居住在第一个小室内表达出的并不是一种访客和女主人之间的对等关系，从这个将成为独立个体的孩子的角度来看，这就是一个单方面的他将在其生命中开始的操作过程。但是，这个过程还受到欢迎，就证明了非对称性的张力，这也是生命所在。

除了生物上的繁衍以外，就是孩子的成长和教育。它作为文化的传承以及下一代人要把上一代人的这种财富继续过

来，是不可压缩性最强有力的范例，直到今天，它依然很顽固地以非对称性的方式开展着。学习生活意味着学习存在于某个地点；地点是本质上无法再缩减的球面伸张，在它的周围环绕着一圈被略去的以及摆放得远远的东西。^① 处在世界之中总是具有抛弃一切，而自身又不能在场的基本特征。因此，关于此在的学说隐含了对膨胀的学习就是在不可压缩的空间时间结构（Raum - Zeit - Gefüge）中的导航。

在繁衍和子女教育方面，传递中的非对称性在一切成功的代际过程以及“传承”中都可以观察得到。迄今为止，没有哪个文化不期望自己的下一代在传承过程中扮演接受者的角色。语言在对于那些要学习它的人面前是不可逾越的存在；它内在的强力如此宽敞，有足够的理由成为“存在之屋”（Haus des Seins）。这种性质刻画直到现代媒体世界中才作为一种浪漫主义的过度溢美而显得很突兀，因为随着语言实践的边缘化，它实在名不副实。也正是在这种时候，人们才更加清楚地理解了，为什么说自然语言会令那些执有我们必须更多的动起来的观点的人感到不快。这些迟钝的符号系统构成了障碍，因为它们根本不会屈从于压缩和加快速

① 海德格尔在谈到世界上动物的贫乏时说过，动物被纳入了一个摆脱束缚（这意味着引发某种行为）的量组成的圈子中；反观“构成世界”的人类，却应该说，他们被一些他们不再继续关注的物品和关系组成的圈子所包围：这是一种软性的不包含状态，即不专门拿来使之包含在内而造成的排斥在外。顺便还要提一下，对于把外部的东西就放在外部永远是人拥有世界以及被他者拥有的基本特征。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用他自己的方式表达成：“……首先它（世界）是那些同时——已经为此而不可控制——发生了的东西的荒芜之地……”，见卢曼《社会的社会》，法兰克福，1998，第527页。

度的要求。它们在符号的帝国里就如同物之帝国中的不动产一样——区别仅在于，不动产作为商品可以进入流通领域，而语言则既不能买，也不能卖，必须要学习。对于那些追求快速的人来说，语言的习得是最可怕的考验之一，它就如同中国式的刑讯逼供一样，慢就是其残酷的灵魂。从自由派的视角来看，自然语言在世界范围内是现代化进程中最大的障碍，它们证明了说话者后退的灵活性以及自我的满意度。如果谁真的相信，凭法语、波兰语、德语、朝鲜语或者类似的昏昏欲睡的容器就在 21 世纪通行无阻，那么他一定是把自己归入了失败者的集体中。未来无能的别名：单语性，也即是人们固守在用自己出生的地方的惯用语来说话。按一些现代化者的观点，一切允许的情境都可以用基础英语（Basic English）来表达——在机场或者在董事局的会议中还特别证明了这一点，其他的情境又有何不可呢？出于一个相类似的原因——鉴于更发达一些的文化实践的膨胀阻力——实证主义的教育计划者们普遍地在精神科学中，特别是在文学以及音乐的教育理念中感到了阵阵不快。他们显然非常清楚：阅读《浮士德》需要人们花大量的整段时间，而《战争与和平》则会让读者们滞留其中几个星期^①，而要想真正熟悉贝多芬的钢琴天籁或是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弦乐四重奏，必须投入几个月的时间。

非对称性的膨胀原则不仅在微观社会学现象或者语言发

^① 对于该例子，参阅雷吉斯·德布雷（Régis Debray）《机器和灵魂——三场讲座》（*Des machines et des âmes. Trois conférences*），巴黎，2002，第 30 页。

展以及高级文化能力方面具有特别的标志意义，它还贯穿于整个政治球面的核心领域——从国家的公民权开始，它将活着的未长羽毛的两脚动物的群体分裂成极其非对称性的群体，国家的成员及其非成员。相同的“我们—他们—差异”还是深植于团结共同体结构的内心深处，特别是养老金体系中，人们可以以合法的嫉妒心理去保证，赋予请求权和相应参与者的功绩相联系：体系的能力一切都在于成功地建立起作贡献的人和不作贡献的人之间的非对称性以及控制“社会蛀虫”的颠覆。

地方主义并不具有天然的创造力，而是必须被理解成一种对创造性的在地点的膨胀的肯定。这体现在民主生活的主要事务中，即公民权招募公民从事“公共任务”。欧洲中世纪晚期，自城市回归以来，要求城市居民为了共同事务而一起行动起来的是地点的力量场。在这个力量场中，自身利益积极的响应者突然以一种市民的身份——这意味着共同利益或是溢出的公共文化活动的载体——发现了自我。地点的力量场不是政治的，只要在其中循环着的是集体情感——否则的话，政治不过是地方的不安和狡黠的放射；地点的力量场又是政治的，只要有共同的事业，在这里指城市、国家（也许还是国家间的合作同盟）是为了实现一个在本地方体现出来的借助于充分争执的观点和激情的差异来解决已经发现的问题，以及复核检验找到的解决方案的意志。这只能在政治的地点同时带着地方利己性以及地方热情向未来投射时才能成功——它指的是，当地点强于意识形态，公民的社区比意图染指国家的多国的邪教教派更具有吸引力时。如果我

不会带着乡土的观念来感受问题，就不能职业地从事政治。公共事务（*res publica*）只有作为地点精神的议会才能运行正常。市民社会如果落到了到处招摇过市的意识形态主义者和邪教领袖的手上，就会以极快的速度堕落（希特勒就是这种外来者的一个典型代表，他通过花言巧语在被削弱了的当地人当中脱颖而出，攫取了权力——赫尔曼·布洛赫感觉到了这一点，并在他的山区小说——并且一直还是影响最深远的法西斯理论——中加以了描写）。20世纪极权主义概念政治家已经充分展示了，虚幻的政治纲领一旦取得了权力，就会在短短几年之内牺牲建立在城邦基础上的免疫力量和市民的地区精神的情况下将会何去何从。

至于说到投机的资本主义作为抽象的，成功的入侵纲领，人们就应该要求诠释家们必须要能证明，他们自己并不是一个全球运行着的邪教的追随者；人们说出了对“资本主义教”的怀疑，并等待着疑虑的消除。^①“民主国家”作为一种生活的形式，也只能有效地在自身利益以及自我优先和其他的自由以及有东西可以付出之间找到平衡，才可以继续存在下去。

^① 参阅迪尔克·拜克（Dirk Baecker）主编《作为宗教的资本主义》，慕尼黑，2003。

第 42 章

天界和尘世的左派

那么从充分发展了的地方概念中产生一系列特征，它会让抽象进步者满面通红。在混乱的普遍主义的压力下，通过反压力而清楚地映入眼帘的——20 世纪的思想家们推动了这一问题的澄清——是成功进行的生活的膨胀，它在没有免疫、自我优先、排他、选择、非对称性、地方保护、不可压缩以及不可逆转的情况下，不会成为其可能成为的东西。这份名目很像极右翼党派纲领的总结；但实际上，却给我们列出了一份真实的人的球面空间中形成过程的基础设施所固有的特征的清单。它们属于无穷尽的、具体的、嵌入的以及有

传承能力的生存方式的特征。试着再用本体论的言说方式：在自身地点的膨胀性是良好的习惯。

只要左派试图保持或者成为一个尘世间的左派，就必须带着一切对称性之爱去和上述的特性建立联系，除非他优先考虑具体事务——这也完全可以理解，因为尘世间的社会民主党人哲学上无聊，审美上不满足。

关于替代清单上的价值，更确切的是关于对元生活（*Metaleben*）的要求——如果说它的世界联系是无免疫的、他者优先的、包含的、不加选择的、对称的、零关税的、可任意压缩的以及可逆的——总是有一些方面在现实中是可以实现的，然而只是那些在第一份清单中也共同提起的。那么如果说没有第二份清单，我们可能永远也无法呼吸“其他星球上的空气”。而没有这种空气，在西方文化承载者们看来，生活就如同一种持续的窒息。是的，也许致力于把不可能之物植入现实当中，就是所有高水平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它将旧世界的嫁妆投射到公众当中。从一个内在哲学视角来看，这意味着从当前的状态中散射出更高级的，令人难以相信的状态：积极的本性促进奢侈的倾向走向更高级的阶段。第一份清单局部向第二份开放描绘了通过不断扩大、进步和差异化而保持自我的文明的激情——单单第二份清单向第一份的反向联系就阻止了幽灵统治。

在全球化时代难以置信之事确实有上升势头证明了，心灵参与了视野的增长。在紧张不断增长中，他们在 2500 年前就学习了，在本体的普遍概念中表达自我。当视野在飘移时，普遍价值的思维就能给予稳固性。因此抽象的普遍主义

并不仅仅像实用主义者、尼采主义者以及现实主义者一切可能的范畴所认为的那样都是狡黠的胡作非为（卡尔·施密特说：谁提人类，就是要欺骗）；它还是变大了的世界在世界体系形成时代的语义反射。普遍主义是成熟的一个阶段。落入反射的骗局是启蒙者的职业风险。他们也有权要求支持。即使是他们，因为自己的教职而成为学习障碍者，也总有一天能洞悉到进修的必要性。

灵魂随着世界的形式而增长，在荒野、在城市、在帝国中。这是作为哲学的出发点的众多事实中的一个；它还能在它在鉴于全球的情境下必然的变形中指出方向。在城邦时代，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是，只有当宏大灵魂的感受（*megalopsychía*）成为第二本性的时候，才有可能成为市民。人们可能并不能正确的洞察，为何对于今天民族国家和全球化时代的人来说，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已经不合时宜。其实只是因为今天的人们已经用创造力取代了伟大的灵魂。有的时候，有创造力的人就是那些阻止整体沉湎于有害的例行公事的人。也许现在进入了一个需要在说话时夸夸其谈的时代。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页

目录页

第一部分 世界体系的形成

第1章 宏大叙事

第2章 彗星

第3章 重返地球

第4章 世界时间，宇宙时间

第5章 离开东方，进入均质空间

第6章 儒勒·凡尔纳和黑格尔

第7章 水世界：现代主元素的转变

第8章 幸福女神或是：机会的形而上学

第9章 风险贸易

第10章 狂迷与时间：资本主义和心灵感应

第11章 主体性的发明——初步摆脱束缚及其入门
指导

第12章 漫反射能量：领先的本体论

第13章 航海的狂喜

第14章 无边大海上的企业认同感 人才分离

第15章 根本运动：金钱回流

第16章 理由和保证之间：论陆地思维和海洋思维

第17章 探险与真相

第18章 发现者的标志 论制图学和帝国的名字魔力

第19章 纯粹外部

第20章 海盗理论 白色恐怖

第21章 现代和新大陆症候群——美国学之一

第22章 全球化的五顶华盖 欧洲空间输出面面观

第23章 船舱的诗学

第24章 船上的牧师 宗教之网

- 第25章 总督之书
- 第26章 全球化的图书馆
- 第27章 译者
- 第二部分 大内部
- 第28章 同步世界
- 第29章 第二地球
- 第30章 免疫学的变形：走向薄墙“社会”途中
- 第31章 信仰与知识——以此标志（全球标志）你将胜利
- 第32章 后历史
- 第33章 水晶宫
- 第34章 密集的世界和二次摆脱束缚：恐怖主义作为纯粹攻击的浪漫派
- 第35章 凶手不明和责任伦理 控制论的复仇女神
- 第36章 资本主义的世界内部空间 里尔克几乎遇到了亚当·斯密
- 第37章 娇纵空间的突变
- 第38章 重估一切价值：过剩原则
- 第39章 例外：引诱的解剖——美国学之二
- 第40章 不可压缩或膨胀的再次发现
- 第41章 赞赏非对称性
- 第42章 天界和尘世的左派
- 插页页
- 附录页
- 封底页